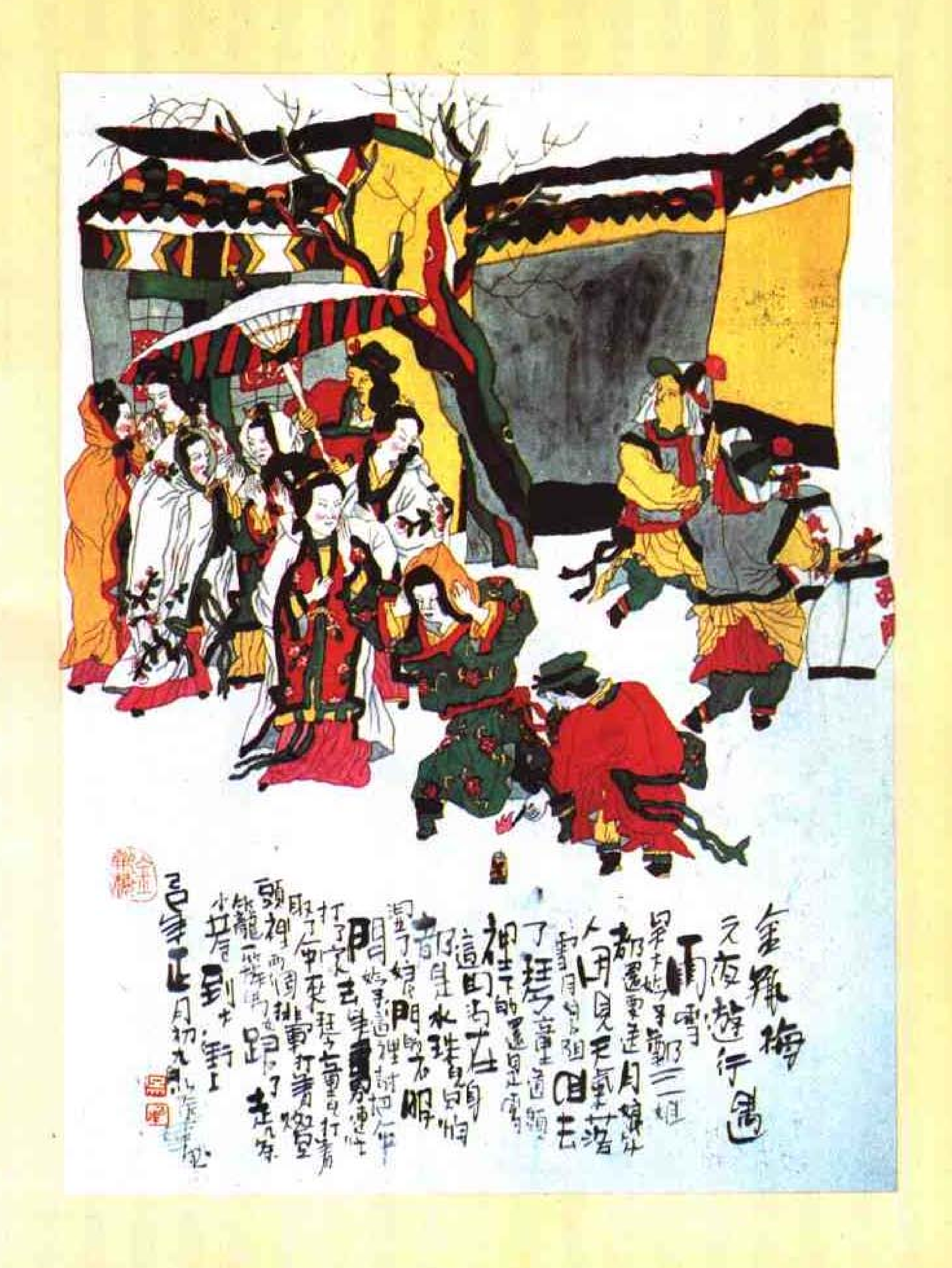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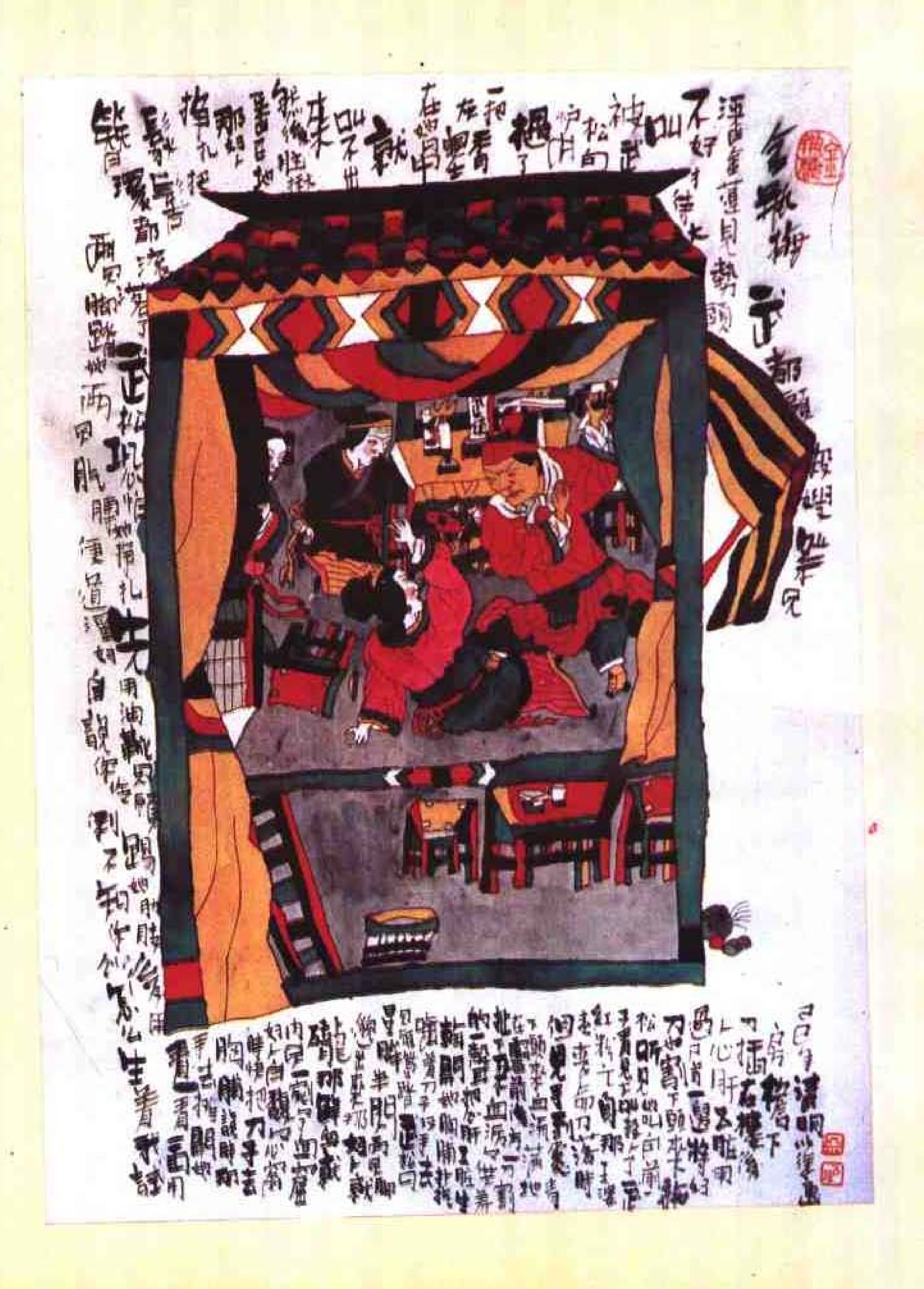

金瓶梅




金瓶梅
元夜遊行圖



导　　言

何香久

传播学，是刚刚发展起来不久的一门新兴学科，关于它的定义，至今还在争论不休。英国学者丹斯和拉尔森所写的一部专著中，就列举了126种对传播学定义的不同解释。作为人类借助于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直接或间接地传递信息、意见、感情的过程，传播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以这门新兴的学问，去认识我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全新的文化视角。

事实上，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部文学名著能像《金瓶梅》那样，经历过而且还在经历着如此波澜壮阔的传播历程。

它神秘地，几乎是突兀地出现在十六世纪中叶——那个中国正在经历着阵痛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立即在诞生它的土地上引起了一片惊诧。

它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传阅、传抄开始了半公开化的神

秘传播，万历四十五年始有刻本刊行。漫长而又坎坷的四个世纪过去了，直到如今，它还有许多文化密码无法破译。

有人说：《金瓶梅》的名声是“禁”出来的。这话有些偏颇，但一个“禁”字，确确实实是与《金瓶梅》的传播历程共始终的。

从它问世以来：

官府禁它，民间也禁它；

古代禁它，当代也禁它；

中国禁它，外国也禁它；

阳世三间禁它，阴曹地府也禁它……

在它身上发生的种种故事，都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负重”和“现实惯力”。

当代金学家王汝梅先生说：《金瓶梅》是一个“伟大的问号”。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奇书有那么一连串的未解之谜，同时，这个“伟大的问号”也是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拷问。

——今天，我们如何接受这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命题。

《金瓶梅》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坐标系——纵：上下四百年；横：脉脉五大洲。它所包容、携带的文化信息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名著等量齐观。因此，我们对于这部旷世奇书的文化审视，也应找到一个相应的立足点。

这本《金瓶梅传播史话》，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但是却吸收了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运用传播学的系统方法，写一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跟对《金瓶梅》有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寻幽探谜。

目　录

附录

《金瓶梅》传播史资料


兰陵笑笑生是谁
EXLIBRIS
金瓶梅

1

横空出世的文学逆子

——奇书其书

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以降，明隆庆至万历二十年之间，世界小说史上一部伟大的煌煌巨著，以传抄本的形式问世了。

它一问世，便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且一直到四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场大波还在激荡着诞生过它的土地。

四个多世纪以来，围绕这部旷世奇书的争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有人骂它是“天下第一淫书”；

有人赞它是“天下第一奇书”；

有人斥它“秽黩百端”；

有人誉它“云霞满纸”；

有人说它“坏人心术”；

有人称它“写尽世情”；

有人说它是一部《史记》；

有人说它是一盘“狗肉”；

有人主张“当焚之以秦火”；

有人呼吁应刊行于天下……

它多舛的命途仿佛与生俱来。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

官府禁它，民间也禁它；

古代禁它，当代也禁它；

中国禁它，外国也禁它；

阳世三间禁它，阴曹地府也禁它……

它屡屡遭禁、遭骂、遭谤，沉冤数百载，跟它有关的人，也一样在劫难逃。

然而，尽管天网恢恢，它却傲然红杏出墙，屡屡被传抄，被刊行、被改编，被使船载之以外邦。

这部奇书，便是跟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作家兰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

这部长达一百回的话本小说，是“先为附庸，后为大国”。

它原本取自《水浒传》中武松打虎，遇其兄武大郎一段，引出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勾引西门庆，进而奸杀本夫的故事，转而发展铺陈为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闺阁艳情，并以此为线索，描绘了一个上自朝廷中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上官僚恶霸乃至市井上的地痞流氓、帮闲篾片所构成的鬼域世界。

笑笑生以无量功德，把《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潘金莲从好汉武松的刀下救起，让他们跟《水浒》中的其他“移民”一道，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人生活剧。

《金瓶梅》的主角儿西门庆，是个集官僚、恶霸和富商三种身份于一身的封建社会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原来只是清河

县的一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从小是个浮浪子弟，使得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又在县里管些公事，交通官吏，放高利贷，因此，满县人都怕他，人称“西门大官人”。

由于他善于钻营、巴结权贵，官府成了他的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成为其螟蛉之后，这个地方上的土痞浪子，竟步步高升，由一介布衣提拔为山东省理刑副千户、千户。这更使他可以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贪淫好色。

西门庆原娶的陈氏娘子早逝，留下一女。继娶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为正室，又将勾栏里的妓女李娇儿和私窠子妓女卓二姐娶在家中。接着，又娶了孙雪娥和富孀孟玉楼。在这期间，他勾引潘金莲，毒死武大，纳潘为第四妾，同时收用了婢女春梅。不久，他又与自己结义兄弟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私通，并设计害死了花子虚，把李瓶儿纳为第五妾。

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后，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官哥。当时西门庆平地坐了千户之职，生子又加官，喜上加喜，好不春风得意。然而悲从中来，潘金莲出于嫉妒，处心积虑加害于瓶儿母子，终于用一只驯好的狮子猫儿吓死了官哥，李瓶儿也终因恼恨悲伤而死。

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在瓶儿的灵床前与奶子如意儿成奸，不久又在妓女郑爱月的唆使下，和王招宣夫人、寡廉鲜耻的贵族命妇林太太打得火热。

一天，西门庆从姘妇王六儿（韩道国之妻）家回来，在潘金莲房里酣然人睡，耐不住如炽欲火的潘金莲，乘他昏睡时，给他服用了超量三倍的胡僧药，致使这个作恶多端的淫棍，纵欲

过度而暴卒。

西门庆死时，正妻吴月娘生下遗腹子孝哥。

西门庆死后，他的几个妻妾，重新归院的归院（李娇儿），嫁人的嫁人（孟玉楼，嫁与李衙内而离去），孙雪娥后来也被辗转卖到酒家为娼。紧接着是韩道国拐财仗势，汤来保欺主背恩，西门府忽隆隆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出现了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潘金莲和陈经济，则由西门庆生前的偷期幽欢到进一步纳姘通奸，甚至跟春梅一起三人同时淫乐。潘金莲因怀孕打胎，风声透露，吴月娘先发卖了春梅，驱逐了女婿陈经济，后让王婆把潘金莲带出去任凭发卖。

潘金莲被逐出西门家之后，陈经济与王婆立约，回京后筹措一百两银子，买出潘金莲。正在这时，被刺配孟州的武松遇赦，回到了清河县，设计杀了潘金莲和拉皮条的王婆，报了兄仇。

春梅后来卖给周守备做妾，因生一贵子，被扶为正室，十分得宠。陈经济被驱逐后，挥霍败家，先是逼死了西门大姐，后沦为乞丐。不久由其父之友王杏庵引荐，出家当了道士。陈经济因宿娼被告发，送到守备府，被春梅认出，春梅不忘前情，救了他，陈经济复又行乞。

后来，春梅谎称陈经济是其表弟，瞒过周守备，把他招人周府。后周守备升为统制，出征作战，给陈经济安了个参谋的空头职衔，并为他娶了葛翠屏小姐为妻。

嗣后，陈经济去临清开大店，不期而遇王六儿母女，同王六儿之女韩爱姐遂成奸情。葛翠屏死后，他又与春梅重续旧欢，

乘守备出征，与春梅纵情淫乐，终被周府家人张胜所杀。

陈经济死后，春梅又与家人的儿子，十九岁的周义暗中勾搭，终因纵欲无度，竟生出痨症，死在周义身上。

西门庆家彻底衰落之后，各房丫环、媳妇如食尽鸟投林，风流云散，家赀也几被拐骗一空。趋炎附势者如应伯爵之流，也忙不迭的去寻新的靠山。众叛亲离，只有吴月娘拉扯着西门庆的遗腹子孝哥，凄凉度日。

金兵南下，抢占了东京汴梁。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中原无主，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吴月娘打点所剩细软，与玳安几个男女仆从，带着十五岁的孝哥避乱逃难，去找西门庆十兄弟之一的云离守投亲。

在济南，路径永福寺，梦见西门庆一生因果及死去诸人，知孝哥乃西门庆转世，因使孝哥出家做和尚，以赎前愆而修后果。吴月娘收西门庆生前心腹小厮玳安继承这份破败的家业，以七十岁高龄善终。

小说最后的偈诗曰：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怜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以上便是全书的大体内容。

《金瓶梅》的故事编年，从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1112）写起，到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1127）结束（据朱一玄先生

《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这中间一共16年所发生的事件。然而读过这部书的读者都清楚，它实际上是托宋写明，假借宋代，实以明代中叶社会生活为背景，描绘出了中国16世纪中后期的一场剧变——即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的现实图景。

具有这么大的社会生活含量的作品，却以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为主线，并通过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来展现的。

《金瓶梅》这部书，其书名是从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连缀而成，实际上这部书是西门庆的一部"史记"，也是西门庆时代的一部"史记"。

西门庆在《水浒传》中第一次亮相，是个泼皮加淫棍的角色。到了他的这一部"史记"中，这个三位一体的暴发户血肉丰满起来，成为市井文化的代表和商业资本的人格化象征。

诚然，《金瓶梅》对西门庆的基本定位没有改变，而且强化了他作为一个"淫棍"的形象。清代为《金瓶梅》作评的"金学"开拓者张竹坡，曾开列了一个《西门庆淫过妇女》的名单，列入这个名单上的名字，竟然有25人之多(名单中本27人，其中潘金莲、王六儿又列入外宠，系重出)。拿这个名单和张竹坡开列的另一个名单——《西门庆家人媳妇》相对照，可发现第二张名单上的大半，已成为西门庆淫过的人目。六房妻妾不能满足他的淫欲，他日夜淫乐无度，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宿妓嫖娼，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只要他经眼的女人，不论是朋友之妻，有夫之妇还是年少年富，美丑妍媸，都不放过。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男色的性变态者。正如潘金莲讥讽他时说的，"属皮匠的，缝(逢)着的就上。"

西门庆自有一套“淫棍理论”：“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把这话的因果关系倒置一下，便是：只要有我的“泼天富贵”，就是把天上人间的女人“都要遍了”，又该奈我如何？

西门庆纵欲滥淫而有恃无恐，就在于他有钱和有权。你看他去招宣府与招宣夫人林太太幽会时那副志得意满的神情，完全是作为理刑千户和巨富家主优越感的流露。早年作生药铺小老板的西门大郎，对显赫的招宣府大门，怕是连瞅一眼的勇气都不会有的。

西门庆确是个富甲一方的“大款”。他家“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外面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何等的“泼天富贵”。他家“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请一桌酒席，便“费勾千两金银”，而当时买一个丫头，也不过是四、五两银子。其奢靡无度，令人触目惊心。

他的钱是怎么来的？

笑笑生一语道破天机：“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人说西门庆是他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甚至说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就是因为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新兴商人的全部特征。

明代是中国从中古向现代逼进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

别是万历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那个在欧洲已经发生，迟早也会在中国发生的早期资本主义因素，也终于萌芽。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破，随之，城市中开始出现了一个不仅拥有巨额财富，而且也对社会政治生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商人集团。

西门庆就是这个集团的卓越代表。

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他父亲西门达，就是一个长途贩运棉织品和丝织品的商人。但后来生意败落，留给西门庆的只是一家生药铺。西门庆子承父业，仅仅五、六年的时间里，便增开了缎子铺、绸绢铺、绒线铺、解当铺等多处铺面。再加上走标船、贩盐引、纳香蜡、放高利贷等手段，到他死时，已经积累了除房屋等不动产以外的10万两白银，跻身于当世的巨富之列。据有关资料记载，明代后期的商人资本，“非十数万不称富”。一两万不算数，五六万刚起步，西门庆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完成了十分可观的资本积累，说明他是一个善贾的好手。

西门庆如何从事经济活动的呢？

首先是靠长途贩运。他多次派韩道国、来保、崔本等人远到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松江贩运布匹，往久享盛名的丝绸出产地——南京、湖州、杭州等返运绸缎。他工于决策，精明练达，关键时刻敢下本钱，第五十八回写韩道国去杭州，一次就置办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长途贩运使他有奇货可居，因此他的商品就比别人更容易脱手。

第二，是靠“兴贩盐引”。中国的盐业，历代一直官营的，从明代起，才开了允许商人贩鬻的先例。对于贩盐的行商，由官府批发给盐引，每引200斤。盐引是盐商专利的证券，又是

官家下达的"指标证明"。商人买到盐引后在指定区域行盐，垄断食盐买卖。贩盐的利润极其丰厚。但弄到盐引却不那么容易。西门庆是置办了"千两金银"的宴席，买通了巡盐御史蔡一泉，才比别的商人早拿到盐引一个月，而且是"淮盐三万引"之巨。这是六百万斤盐的一笔大买卖，获利当然可观。西门庆的伙计从扬州支出盐来卖掉，又往"湖州贩了些丝绸来"，带回了价值万两银子的货物。按照应伯爵的说法，是"决增十倍之利"。

第三是替朝廷和官府采办货物。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者奢侈之风再度盛行。朝廷中要"多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明书》）。这么多的香蜡，由揽头承包下来，向民间收购，官府用地亩税支付，"每月五分行利"。一些奸商便乘机大捞一把。当应伯爵告诉西门庆："揽头黄三、李四派了年例，三万斤香蜡等料钱拨下来，该一万两银子，也有许多利息。"西门庆见钱眼开，说："我哪里做他揽头，以假充真，买官让官，我自家做了罢，敢量我拿不出一二万两银子来?"

第四是放官吏债和开解当铺。官吏债也就是高利贷。明中叶以后，吏治败坏，社会上贿赂公行，连乌纱也明码标价。买官的要钱，做了官的为了巴结上司也要钱，新考中还未乌纱加顶的进士更是得处处用孔方兄开道，一般士人阶层，到哪儿去弄这诺大款项，只好向别人借贷。这样，便产生了专一以官吏为对象的贷款方式——官吏债，也叫"京债"。西门庆靠放官吏债和开典当铺，赚了不少黑心银子。尤其是他开当铺，赚钱赚得昏天黑地。第五十四回写有人拿了一座价值一百两银子以上的"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他却只兑给人家三十两银子。

第五是靠机敏的胆略和才识。西门庆是个商场的奇才。他谙熟市场行情，了解商品的销售状况，因此能把握时机，合理地调度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他也懂得管理之道，他同乔亲家合资开办缎子铺，每人集资五百两，利润分成办法是：他本人得五份，合股的乔亲家得三份，没有股份但却负责经营管理的伙计韩道国、甘出身、崔本均三人分其余的二份。这样，即维护了资本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又调动了实际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强了经营责任感。第三十三回，湖州商人何官儿有价值五百两银子的丝线急于脱手，西门庆乘人之危，狠狠压价，果断地以四百五十两银子将货全部盘下，然后立即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丝线，一日也数十两银子"。几年之间，这个因此面开张的绒线铺就发展成为一个有六千五百两本银的铺面了。

作为商人，西门庆有着强烈的商人自我意识。他懂得货币的流通价值——"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一处?"这是他对货币流通机能的朴素而形象的解释，货币只有投入流通领域，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利润，因而能获得更多的货币。

西门庆因"奸巧"而得富贵，但是，他要想跻身上流社会，只有钱是不行的。只有钱那是"有钱的牛"，要想"做得麟"，就要有"功名"。"功名"怎么得来，"全仗邓通成"也。中国是个封建社会，是个官本位、官有制社会，要想发迹变泰，必须依附封建官僚的势力。其实西门庆早谙此道，小说一开篇，就介绍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在他羽毛未丰，还是生药铺小老板的时候，便已懂得如何利用县衙公职之便以权谋私了。

经济上的爆发，使他有实力把目光转向官场。他的商业活动，是跟他在官场上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他深知“打点”之道，从基层上的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开始，一直“打点”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当朝太师和封疆大吏以及皇帝的亲信太监、宠妃，最后甚至做了蔡京的干儿子，成了集官僚、富商于一身的炙手可热的人物。连回乡省亲的蔡状元、安进士、赴任的宋巡按，离京的钦差黄太尉等朝廷大臣，都屈尊到他家去“接交”、“落座”、“吃酒”。

有了官场的保护，他的商业活动更加势如破竹，这个身无半分功名的“白身人”竟然“突击提干”，被任命为“金吾卫左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成为“本处提刑所理刑”，最后蔡京又为他冒功，升了正千户。西门庆终于和那些世代簪缨之家平起平坐，问鼎封建等级制的金阶，并惠及眷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舅子吴典恩封了清河县驿丞，连家人来保也封了山东郓王府校尉。

在西门庆身上，有许多旧商人的印记，又有许多新商人的特质。这种由商而官，由官而商，也是明代商人集团的成员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权力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力”（《资本论》第1卷）。

《金瓶梅》是把西门庆放在一个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来描写的。从明代的正统以后，因国库空虚，开始卖官鬻爵，尤其是地方荒赈之年和军饷不足之时，更是“仕途如市”。到嘉靖时，买官卖官越演越烈，特别是严嵩当政时，其子严世蕃借父权专

利无厌，私擅爵赏，悬秤卖官，广致赂遗。当时，各级官职都是明码标价的："某职银若干，某官银若干。至于升迁亦然，某缺银若干，某缺银若干，群众竞相价值转增"（《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官职既然明码标价，谁有钱谁就能买到较高的位子。所以说西门庆的飞黄腾达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

西门庆如此作恶多端，却为何能步步高升？原因在于那个统治集团从上到下都已烂透了。西门庆贪赃枉法，被山东巡按御史曾孝序参劾，请求圣上罢斥西门庆、夏延龄这两个贪官。谁知这二位早已重金买通蔡京，曾孝序的奏本不但不能上达，而最终反遭到了被抄家、被流放的迫害，这一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以西门庆因祸得福、官晋掌刑正千户而划上了句号。兵部的考察报告竟然说他"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也。"真是天大的讽刺。

应该说，在《金瓶梅》之前或同时的我国长篇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够像它那样，对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揭示得那么深刻。

《金瓶梅》中有多少无告的沉冤：武大被毒死，主谋西门庆却逍遥法外；宋蕙莲被逼死，她的父亲想给她讨个说法，于是也被迫害而死；苗员外惨遭杀害，杀人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来旺被西门庆霸占了妻子，自己还遭受酷刑和发配……而那个作恶万端的西门庆，却一生富贵荣华，虽然他死的时候正是日高中天，刚刚三十三岁，但那是因为他过份的纵欲，并不是因为受了什么惩罚。而且，甚至在阴曹地府，他也没有因为种种

罪恶下地狱。作品的最后一回，写他的鬼魂与武大等人的鬼魂一起去投胎，并说明他来世依然做富户。天上地下，找不到一寸净土。《红楼梦》中焦大骂贾府只有门前两个石狮子干净，而在《金瓶梅》世界中，你连一个干净的石狮子也找不出来。

《金瓶梅》不愧是一部暴露文学的杰构，兰陵笑笑生所塑造的西门庆这个形象，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如鲁迅所说："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

《金瓶梅》这部奇书之奇，在于它建构了全新的价值取向：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然而，正是这种道德的堕落伴随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3页）。

《金瓶梅》以汪洋恣肆的笔墨，独树一帜地从世俗人生的角度，反映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时代的灾难，入骨三分地写出了其当世的弱国民性，它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部有名的"淫书"，其实正是一部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有为之作"。

这也便是奇书名副其实的所在。

2

“兰陵笑笑生”知多少？

——谁写出了《金瓶梅》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如今，他的假定者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了：

徐　渭　卢　楠　薛应旂　赵南星　李卓吾
王世贞　李开先　贾三近　屠　隆　贾梦龙
王　寀　谢　榛　刘修亭　冯梦龙　王稚登
陶望龄　冯惟敏　汤显祖　李先芳　丁耀亢
沈德符　丘志充　汪道昆　李　渔　（笠翁）
袁宏道兄弟……

还有更早一些的“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据统计，这个名单目前已有40余众之多了。但这决不是最后的数字，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名单就要上升到三位数了。

列入这个名单中的“候选人，诸家争议较多者有以下二十

位：

1.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天池，晚号青藤道人，浙江山阴人，诸生。才华出众，亦精书、画，曾客总督胡宗宪幕。以草献白鹿表负盛名，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徐渭之预谋。后宗宪系狱，徐渭惧祸发狂，自戕不死。遂杀其妻。系狱，久之得免。尝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有著作《笔元要旨》、《徐文长集》，于三教及方技书，多有笺注。

执徐渭说者，为阿瑟·韦利，他在《金瓶梅》英译本导言中说："现在我们也已知道在《金瓶梅》的问世之初，就被认为是嘉靖间大名士所作，这种说法对徐渭是合适的。"阿瑟·韦利是现代英国著名翻译家和东方学专家，这篇引言，是他为1939年、1940年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及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的英文译本而写的。他未举出徐渭为《金瓶梅》作者的依据。

2. 卢楠：《金瓶梅》满文译本（清康熙四十七年）序中称："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卢楠，生卒无考，字少楩、次楩、子木，河南浚县人，国学生。以骚赋为王世贞赏识，主要活动在嘉万年间。有著作《蠛蠓集》行世。

3. 薛应旂：江苏武进人，字仲常，嘉靖进士。屡迁南京考功郎中，忤严嵩，谪建昌通判，历浙江提学副使，以大计罢归，有著作《宋元资治通鉴》、《考亭渊源录》、《甲子会纪》、《四书人物考》、《高士传》、《薛子庸语》、《薛方山纪述》、《宪章录》、《方山文录》等行世。

清代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续庭闻州世说》，倡《金瓶梅》作者为薛应旂之说。根据是薛为嘉靖间大名士，又为武进

认为王世贞不可能系该书作者。

朱星教授则坚持《金瓶梅》是王世贞所作，理由是：①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②他不只是大名士，且能作小说；③他有这样的大魄力能够独立完成这样一部为个人创作之首的大创作；④他有二十四年的时间可以从事这项创作；⑤他不只是大名士，还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许多官场大场面；⑥他到过山东、浙江等不少地方做官，更熟悉北京；⑦他最崇信佛道，故书中多有这方面内容的描写；⑧他是苏州府太仓人，但其祖籍却在山东，又在山东做过官，不仅具有运用山东语言的客观条件，也具有怀念山东乡土的主观感情；⑨他生活放浪形骸，好色醉酒；⑩他知识面广，所以才能写出这煌煌一百回的巨著。

朱星的观点发表后，赵景深、徐朔方、张远芬、黄霖等先后撰文予以商榷。

7.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子，山东章丘人，嘉靖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罢归，治田产，蓄声伎，诗歌豪放，尤工词曲，尝作百阙《傍妆台》，为康海所赏。为"嘉靖八子"之一，有《宝剑记》、《断发记》、《一笑散》等戏曲作品传世，诗文有《闲居集》。

最早持"李开先说"的学者是吴晓铃先生，他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金瓶梅》一条所写注释中说："《金瓶梅词话》本欣欣子所撰序文中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的化名。另外，有人曾推测作者是李开先，或王世贞、或赵南星、或薛应旂，但是都没有能够举出直接证据，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

徐朔方先生在1980年第一期《杭州大学学报》发表《金瓶

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之后又发表《〈金瓶梅〉成书补正》，第一次系统地对“李开先说”进行论证。赵景深、杜维沫，以及日本学者日下翠也主张“李开先说”。青年学者卜健，曾考察李开先章丘故里，发现了《李氏族谱》以及李开先和妻子张氏、王氏的墓志铭拓片等重要资料，面壁经年，写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洋洋二十三万言，1988年6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8. 贾三近（1543～1592）：字德修，号石葵，山东峄县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十四岁时，举山东乡试省魁，文声大噪。隆庆二年（1568）三十四岁，赴京会试，中进士，名次又为“山东省第一”。以博学宏词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历官吏科给事中、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等职，有《滑耀编》等著作行世。

持“贾三近说”者为徐州师范学院教授张远芬，他曾撰《金瓶梅作者新证》一文，提出十条依据。①张远芬自己的三篇专论中，已证明《金》的作者肯定是峄县人，贾三近符合这一最重要的条件。贾家从远祖始至贾三近，在峄县定居已整整六代；②贾三近确是嘉靖间大名士；③如将《金瓶梅》成书期限，定在隆庆二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贾三近恰是隆庆二年中进士，并于万历二十年去世，这正处在他三十四岁至五十九岁的当口。事实上，也只有这样年龄的人才能写出《金瓶梅》来；④贾三近官至兵部右侍郎，为正三品，不但是大名士，也是大官僚，而在当时的峄县，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有如此经历；⑤沈德符说，《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而贾三近身为谏官，几乎是以“指斥时事”为业。张与当时权臣张居正、高拱有极为尖锐的矛盾，他指斥的对家，并非严嵩，而是张居正、高拱二人；⑥《金瓶

梅》中运用了大量的峄县方言、北京方言和华北方言，贾三近活了五十九岁，其间在北京和华北生活了十五年，其余时间皆是在峄县度过的，因此，他必然是即能运用上述三种方言，又能对北京的风物人情“异常熟悉”；⑦从贾三近的奏折看，他对明代上层统治的腐朽、地方官吏的贪酷，不但认识深刻，而且和《金瓶梅》用具体形象所描绘出的明代社会是完全一致的；⑧《金瓶梅》一书，只有两个正面官僚形象，一是参劾杨提督的宇文虚中，二是参劾西门庆的曾孝序。而贾三近即做过吏科给事中和户科给事中，又做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此可视为贾三近之自我形象；⑨《金》作者于元明戏曲十分稔熟，1586 年贾三近请告家居之后，向父母“日进醴酏珍异，多宣园亭花竹，征乐佐酒，以娱侍其意”；⑩贾三近从入京做官到去世，前后三次共十年的时间在家中闲居，物质生活和时间条件，都有充分的保证，让他来完成《金瓶梅》的创作。

李时人撰《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等文，（《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否定了张远芬的“贾三近说”。

9. 屠隆（1542～1605）：字赤水，号一衲道人等，浙江鄞县人。祖上曾居江苏武进。万历五年进士，曾历官青浦令、礼部郎中等职，因与西宁侯夫人淫纵而罢官。罢官后，为人“佻荡不检”、“放诞风流”的屠隆并未收敛，仍旧“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张应文《鸿苞居士传》）。屠隆喜爱俗文学，有戏曲作品传世。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黄霖教授持“屠隆说”，曾于 1983 年第 3 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1984年第5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等文，主要依据在于《金瓶梅》中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在《开卷》一笑中标明为屠氏所作，且屠隆曾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许多学者曾就此说展开讨论，提出异议。

10. 贾梦龙：贾三近之父，字应乾，号柱山，生于明正德八年，曾随其父贾宗鲁在江南高淳、南阳生活二十余年（贾宗鲁曾任南阳教授），三十多岁时回到峄县，任教于县学，后又到直隶顺德府内丘县任训导。隆庆五年六十岁时归养峄县。贾梦龙的著述，有《昨梦存》、《泮东诗集》、《永怡堂词稿》等行世。

持“贾梦龙”说者为枣庄市政协许志强。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1992年6月15日～20日，山东枣庄）上，他向大会提交了《〈金瓶梅〉与〈永怡堂词稿〉》的论文，从十二个方面列举了贾梦龙所著《永怡堂词稿》与《金瓶梅》的共同点和一致性。

11. 王寀：王寀在《金瓶梅》中即是林太太儿子的王三官。历史上王寀实有其人，但他不是什么大名士，他是景州人，监生，万历元年在徐州做过通判，管理运河漕务。《景州志》记载，他系纳贡监生，曾任鸿胪寺序班。

持“王寀说”者为徐州师院物理系副教授洪城（李洪政）、讲师董明（董文莲），他们的依据是：①作者应是冀南人；②作者应在北京生活过，熟悉北京；③作者熟知官制和官场礼仪，应在朝廷为官；④作者熟知徐州历史、地理特征，表明他应长期在徐州生活；⑤作者曾在徐州为官，此官应与运河与军队有关；⑥作者大量抄引他人著作，应非大名士；⑦作者应生于嘉靖二

十年之前，卒于万历三十年之后；⑧作者有一段痛心家史，他是为解冤而写作；⑨作者官运不佳，写作时生活贫困；⑩根据书中陈经济的救命恩人王杏庵，其谐音应是“王幸安”，表示历经变故，王家幸好无恙，倒读其名，谐音是“俺姓王”，由此推断作者可能姓王。王寀附合以上十个条件。

12.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山东临清人，有文名，以布衣而列身“后七子”中，其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时期，约在嘉靖、隆庆年间。他又是有明一代大诗家，与李攀龙、王世贞等辈结为诗社，后又在赵康王府作幕客，《明史》记载他：“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明史》7375～7376页），谢榛的著述，传世有《四溟集》、《四溟诗话》等。

持“谢榛说”者为临清王萤、王连洲，依据是：谢榛是嘉靖间大名士，又是临清人。且祖籍东海，即兰陵，同时，谢又是大手笔的文学家，喜爱俗文学，少年时代即显露了歌词乐府方面的才华，一生写作散曲颇多。谢榛早年生活穷困潦倒，后半生为赵康王幕府，享受过豪门生活，他流连声色、贪图享乐，带有一定的市民意识的趣味。王萤、王连洲认为《金瓶梅》的写定是三人合作，主作者为谢榛，（即兰陵笑笑生），副作者一为郑若庸（昆山人，曾同谢榛一道在赵康王府作幕客），一为赵康王朱厚煜。

13. 刘修亭：即刘守，修亭为其号，人称刘九，生活在嘉靖年间，瞽目艺人，擅说书，李开先说他“卜算符咒，医药方术，天文地理，内眷外丹”无不通晓（《瞽者刘九传》）。

戴鸿森先生《我心目中的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一文持“刘

修亭说”，然刘在嘉靖末年即去世，且一盲艺人，不可能写作这样百回巨著。

14.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长州（今江苏吴县）人。曾任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参加过抗清活动，后死于故乡。其思想受市民意识影响，重视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辑有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此外还编有时调集《挂枝儿》、《山歌》，散曲集《太霞新奏》，传奇剧《双雄记》，并修改汤显祖、李玉、袁于令诸人作品多种，合称《墨憨斋定本传奇》。

陈昌恒先生在《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一文中提出：冯梦龙即是东吴弄珠客，是他在原作三十回的基础上完成此书。

15. 王穉登（1535～1612）：字百谷，江苏长州人，祖籍江阴，系布衣，有较高文名。

持“王穉登说”者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鲁歌。

16. 冯惟敏（1511～1580）：字汝行，号海浮，明代著名散曲家，山东临朐人，嘉靖举人。官至保定府通判。与兄惟健，弟惟讷都能诗文，著作有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山堂辑稿》。

持“冯惟敏说”的学者是孙楷第先生。

17.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临川镇于1955年设立抚州市）人。所居名玉茗堂，早年有文名，万历十一年中进士。曾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上疏劾大学士申时行，降职为广东徐闻典史，后改任浙江遂昌知县，又以不附权贵而被议免官，未复出。作有传

奇《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五种，以《牡丹亭》最著名。诗文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

持“汤显祖说”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原名大卫·劳埃（David Tod Roy）］，他撰有《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一文，作了大量详尽的考证。徐朔方对此说持异议，撰文与芮效卫商榷。

18. 李先芳（1510～1594）：字伯承，号北山，祖籍湖北监利，生于河南范县，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历新喻知县、户部主事尚宝司少卿等职，为“后七子”之一。

持“李先芳说”者为叶桂桐（山东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阎增山（聊城师范学院讲师），他们曾合著《李先芳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

19. 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万历举人，精音律，熟谙掌故，所撰《野获编》多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国故，并保存了一大批有关戏曲小说的资料，有《清权堂集》。

持“沈德符说”的学者是台湾金学家魏子云先生。魏子云先生又倡沈自邠、沈德符及其他文人集体创作说。

20.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太函，南溟、晚年号函翁，徽州西溪南松明山人。明代后五子之一，诗人，剧作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历任义乌县令，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右佥都御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等职，史称“汪司马”。

持“汪道昆说”的是潘志义（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

乡供销社职工），他向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及著者考》论文，依据是汪道昆与徽商的关系，此说已引起学界注意。

除此之外，还有“世界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而丁朗先生则认为，《金瓶梅》的原著作权，并不属于“兰陵笑笑生”。所谓“兰陵笑笑生”基本上是一个冒名顶替、欺世盗名的人物。他有可能是现存《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和五十四这两回的修改者。更大的可能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纯粹是炮制序文的那位夫子为了满足出版商的需要，心血来潮，随手杜撰出来的一位“乌有先生”、“子虚真人”。丁朗先生主张“挂一张寻人画像在北京街头”，他给这位作者画了一幅肖像，认为他应具这样一些特点：一、他长期生活于北京东部城区。二、他经常出入于“本司三院”之类的地方。三、他对武官生活的了解超过了他对文官生活的了解；他对京城知识的了解超过了对外地知识的了解；他对实际生活知识的了解超过了他对书本知识的了解；而他的书本知识（包括历史、地理知识等等）又主要来源于宋元话本和各种戏曲的戏文之中。四、他几乎没有什么诗才，甚至不大懂得诗词格律，而对流行歌曲及民间小调的爱好，非同一般。五、他与曲艺界关系密切。六、他同嘉靖朝失势一派的太监们观念一致，爱其所爱，恶其所恶。而且他本人极可能是个性无能者和性饥渴变态的患者。七、他同明嘉靖丁未科的某些进士有交往，同时可能与嘉靖皇帝有深仇大恨。（见丁朗著《金瓶梅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四百多年以来，学者们为了解开这个谜，作了多少深文周

纳的辨析、研究，至今仍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周续赓副教授曾幽默地说，除非哪一天地下出土了什么有关文物，否则这场争论便永远不会完结。

3

第一个读者就丢了性命

——王世贞因何成了《金瓶梅》的作者

《金瓶梅》的第一个读者就倒了霉，为此丢了性命。

佚名的《寒花盦随笔》中，记载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

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

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东巡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云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

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一夜，读书静室，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须留遗书嘱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书数行，笔头脱落，以管就烛，佯为治笔，管即毒弩，火热机发，镞贯刺客喉而毙。凤洲大失望。

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耳。荆川索之切，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

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

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这是一个三百余年来一直伴随着《金瓶梅》而流传的故事。许多相关的记载也大都因袭或大致相同于这种说法，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还有一个故事，说严世蕃其实并未被毒死，反而成了这部奇书的传播者：

> 《金瓶梅》一书，相传为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陈河失事，为奸嵩构死，其子东楼（世蕃）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濡纸，冀使传染入口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瀋阅，此书遂以外传。
>
> ——王昙《金瓶梅考证》

不管是为此丢了性命还是几乎丢了性命，这两个传说，似乎都预言了同《金瓶梅》这部奇书有关联的人的命运，也预言了这部奇书自身的命运。

王世贞成为《金瓶梅》的作者，也因此几成定谳。

这两则故事的主旨，都是王世贞为了泄愤和复仇，才写出了《金瓶梅》。

王世贞与严世蕃的杀父之仇，是由于一张名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该是我们所熟悉的了，它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字正道，山东诸城人）的一幅宏伟钜制。是图以长卷构图的方式描绘了汴京东南城内外清明时节的广阔场景，笔法细腻，构思缜密，层次分明，引人入胜，因系实景绘画，竟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合。李东阳有诗赞曰："翰林画史张择端，研朱吮墨镂心肝。细穷毫发夥千万，直与造化争雕镌。图成进入缉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天津一夜杜鹃啼，倏忽春光几回

变。朔风卷地天雨沙，此图此景复谁家？家藏私印屡易主，赢得风流后代夸”（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九《题〈清明上河图〉》）。

据史料记载，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确实喜欢名画器玩，于此十分留心，家藏颇为丰富。后来抄没其家时，清单上就有这一幅《清明上河图》。

我们还是回到王世贞与《金瓶梅》的故事。

《寒花盦随笔》中的那个“巨公”唐荆川，即唐顺之，字名德，武进（今常州市）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曾经督领兵船在崇明抵御倭寇。因为战功，擢升为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人称荆川先生。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清人沈德符的《野获编·伪画致祸》条，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和佚名的《缺名笔记》都大体与《寒花盦随笔》相类，所不同的是，刘廷玑把《清明上河图》换成了《辋川真迹》——唐人王维的作品，把识画人换成了当时的一个著名的装裱工匠汤裱褙。那个故事说：

王忬家里藏有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的名作《辋川图》，王维曾置别业于陕西蓝田之辋川，绘辋川别业二十景于画中，此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为稀世之国宝。喜欢名人字画的严世蕃知道王忬家藏有此画，便去索要。王忬因爱惜世宝，但又不敢得罪严世蕃，便请人临摹了一张，将摹本送与严世蕃。

严世蕃有个为他装裱字画的汤裱褙，原来曾在王忬府中，曾认得这幅画的真迹，便告诉严世蕃，王忬送来的这画是一幅赝品。严世蕃恨在心里，但没发作出来。

不久王忬总督蓟辽军务，武进人唐顺之以兵部侍郎的身份

奉命巡边，严嵩便在家中设酒为唐顺之饯行，席间，透露了对王忬的不满。唐顺之心领神会。

到了蓟门王忬军中，唐顺之故意找碴儿，要行军中的驰道，这驰道是君王行驶马车的道路，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上边行走的。王忬面有难色，唐顺之十分不快。回京后，便参了一本，说王忬军政废弛，虚縻国帑（冒领军饷），这篇奏稿长达数千言。先把奏章呈严世蕃，由于严世蕃从中推波助澜，王忬便被治罪，逮至京城，砍头弃市。(原文见附录刘廷玑《在园杂志》)

而清人的《缺名笔记》，又把《寒花盦随笔》中这则故事的结局进行了改造，变成了另一种传说：

王世贞为了报杀父之仇，千方百计寻找向唐荆川下手的机会。适逢唐荆川解职回家，闲来无事，遍寻奇书，王世贞便匆匆写了这部《金瓶梅》，并在书页上渍以砒霜，献给唐荆川。因为他已事先侦知唐荆川有个怪癖：读书时必用手指蘸了口水去揭翻书页。唐荆川得到《金瓶梅》后，一口气读了下去，整整读了一夜，把这部书读完了。忽然觉得舌苔僵硬苦涩，拿镜子来一照，整个舌头变成了黑色，心里明白，是被人暗算了，料难活命，赶忙把儿子招到近前，说："有人谋杀于我，我死后，除非至亲，他人一概不得进入我的灵堂。"说完就死去了。

吊孝时，突然来了一位身穿孝服，头戴孝帽的人，呼天抢地的匍倒在唐荆川儿子之前，说自己曾受过荆川先生的大恩，愿趁未盖棺之前，一亲先生恩容。唐荆川的儿子见来者十分虔诚，就让他进了灵堂。那人扒在唐荆川的尸体上，哭得非常伤心，哭过之后，又再次拜跪行礼而出。

等到入殓时，忽然发现唐荆川的一只胳膊竟不知哪儿去了。唐荆川的儿子这才醒悟过来，悟到来人就是谋死他父亲的人，这人因其父亲受了缳首之辱，投放毒药毒死唐荆川还不解恨，竟断残他的肢体来进行报复。（原文见附录《缺名笔记》）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也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严嵩势炎炽盛的时候，在全国各地搜罗了许多稀世珍宝和书画古董。那时他的爪牙鄢懋卿以总鹾（负责盐政的官员）出巡江淮，胡宪宗、赵文华以督兵出使吴越，都各自奉了严嵩的意旨，搜罗珍玩器物，不遗余力。当时听说有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手卷，收藏在已故宰相王文恪（鏊）的长子家中，但是王家家资巨万，难以用金钱去打动其心，便托苏州人汤臣前去寻取。这汤臣以善于装潢裱褙字画而在当时极负盛名，人称汤裱褙。汤臣因这一手绝活儿，成了严嵩的门下客。汤臣也与王忬有来往，便劝王忬把这幅画设法买下来。王忬当时镇守蓟门，就让汤臣出高价去买《清明上河图》，但王家说什么也不愿出卖。于是，便委托苏州人黄彪将《清明上河图》临摹下来。

这个黄彪，是当时著名的画师，他摹写的这幅《清明上河图》跟原作一模一样，几可乱真，于是王忬就把这幅临摹之作献给了严嵩。

严嵩得到这幅画，视为奇珍异宝，用来作为手中所藏诸多名画的压卷之作，遇到家中来了高贵的客人，才拿出来让人赏玩。有妒嫉王忬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便径直告发这是一幅赝品，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又羞又怒，把王忬恨得了不得。也有人说是汤裱褙因为对王世贞兄弟的怨恨，而自露始末，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原文见附录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伪画致祸》

沈德符这个故事说，《清明上河图》本不是王忬所藏，是汤裱褙托王忬设法不得，才用摹本取代，最后还是他自己口风不牢，以致酿成大祸。因为沈德符的时代与王世贞相去未远，他的祖辈、父辈跟王家又是世交，所以后人对沈德符的这一说法比较偏重。

顾公燮《消夏日记摘抄》又一次穿凿附会，于是这个故事又变成了如下的模样：

太仓王忬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世蕃强行索要，王忬不忍舍，于是找名手临摹后，以摹本献严世蕃。开始王忬在两浙任巡抚，遇裱工汤臣流落在外，便把他带了回来，因其善于装潢书画，很快又把他荐给严世蕃。

当献画时，汤臣在侧，对严世蕃说："这幅画我曾亲眼见到过，此卷并不是真品，试看这只小小的麻雀，脚却居然踏着两只瓦角，就凭这一点，便知真假了。"严世蕃心中十分恚恨王忬，也鄙视汤臣这样的势力小人，从此不复重用。

适逢外寇入侵大同，王忬总督蓟辽军务，于是严嵩的爪牙鄢懋卿便唆使御史方辂弹劾王忬御边无术，皇帝终于下令斩了王忬。后范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为《莫怀古》，劝人不要收藏古董，说的就是这件事。

王忬有个儿子名凤洲（世贞），为父亲蒙冤而死痛不欲生，千方百计想报这杀父之仇。一天偶然遇到严世蕃，世蕃问："近来坊间有好看的小说没有?"王世贞回答说："有。"严世蕃又问："叫什么名字?"仓促之间，王世贞见瓶中插着梅花，于是便信口答道："叫《金瓶梅》，但是字迹湮没，漫涣不清，等我抄写整理后再送给你阅览。"

王世贞回到家里，构思了好几天，最后借《水浒传》中西门庆故事为蓝本，写作小说《金瓶梅》。因为严世蕃住在西门，小名叫庆，借西门庆的故事，讥讽严世蕃家中闺门的淫荡，但严世蕃却浑然不觉，看了以后，十分高兴，爱不释手。

相传严世蕃有个爱好，就是喜欢修脚。王世贞便花重金买通了修脚工，乘严世蕃专心致志地看《金瓶梅》的时候，故意轻轻地伤了严世蕃的脚，并暗中给他涂上溃烂的药物。后来伤口渐渐溃烂，不能入朝当直，只有他老子严嵩在内阁。严嵩老迈年衰，反应迟钝，代皇帝起草的条旨，往往不能称皇帝的意。嘉靖皇帝逐渐讨厌严嵩，严嵩日渐失宠。趁这个机会，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终于扳倒了严家父子。（原文见附录，顾公燮《消夏日记摘抄》）

梁章钜《浪迹丛谈》引孙之騄《二申野录注》说：当严世蕃受刑之时，王世贞兄弟用重金买下了严世蕃的一只胳膊，煮熟后来祭奠父亲的灵位。兄弟二人哭得死去活来，然后一起把这只胳膊吃掉了（见附录梁章钜《浪迹丛谈》）。

而徐树丕所著《识小录》，则说汤裱褙这个人很懂得鉴赏古董，有以古玩行贿于严世蕃的，必须要先贿于汤裱褙。严世蕃让他辨别真伪，给他行了贿的就说是真品，没行贿的就说是赝品。吴中一位御史偶然得到唐代（按：应为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摹本献严世蕃，因为事先没向汤裱褙行贿，汤便一口咬定这是张伪作。严世蕃大怒，后来这个御史果然死在他手里。而那个汤裱褙，也在这之前以匡骗的罪名远远遣戍了去。

徐树丕又谈到《清明上河图》的真假之辨：我听我的先人说过，《清明上河图》上的人物只有豆粒般大小，马也只有一寸

左右。其中有四个人正在掷骰子，五个骰子全都是六，而又一个骰子还在旋转，掷骰子的人就张着嘴喊"六"字。汤裱褙当时谈到这画的真假时，就说：张择端画的是河南开封府，开封人喊"六"应当是撮口，而您这幅画上的人却是张口，这是操的福建口音。汤裱褙就是凭这一点断定这是一幅赝品的。这个说法与苏东坡所说相类，怀疑是好事者牵强附会而为之。(见附录·徐树丕《识小录》)

一部《金瓶梅》，一帧《清明上河图》，居然引出了这么多关于王世贞的故事。

究竟是不是王世贞写了《金瓶梅》?《清明上河图》究竟跟王世贞父子有没有干系？廓清这种种迷团，是后来的事了。

4

有关《金瓶梅》作者的民间传说

四百年的岁月逝如烟水。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孰谁？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作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求，而在民间的市井里巷，也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这里不妨采撷几则：

谢茂才误著《金瓶梅》

在《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山东临清县，流传着谢茂才误著《金瓶梅》的故事。

谢茂才是临清县的一个书生，他与离临清不上五七十里的清河县的武大郎是同窗好友。

这两个人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同在一起吟诗属对、登高郊游，友情甚笃。

那年，正逢春闱开科，谢茂才磨拳擦掌，准备到京兆一试

身手，而武大郎却愁眉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原来，谢茂才家道殷实，颇有几分产业，而武大郎却十分贫寒，常无隔夜之粮。谢茂才看出了武大郎的心事，便说："兄弟，别犯愁，你不就是缺少赴考的盘缠吗？哥一发替你准备就是了。"武大郎惭颜说："小弟平时全靠哥一力接济，实不敢……"谢茂才忙说："兄弟不要说了，你不去赴考，怎么对得起这十年寒窗？"

于是，谢茂才征得了父母的同意，给武大郎备妥了去京的盘缠，又赶做了几件时新衣裳，把武大郎感动得涕泗交零。眼看着考期临近，二人准备上路。

谁知在这时，谢茂才却突然病倒了。这场病突如其来，十分沉重，谢家人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武大郎自然也全没了进京的念头，一门心思全在谢茂才身上。

考期越来越迫近，谢茂才便用心劝说，一定要让武大郎一个人进京赴考。武大郎说什么也不答应，谢茂才的父母也一力劝说，武大郎这才勉强同意，与谢茂才洒泪而别。

武大郎雇了头牲口，日夜兼程，赶到京师，正好没误考期。武大郎天资超群，聪颖过人，又深怀着对谢茂才的一番感激，自是别有一番胸襟。放榜之后，得中进士，便被授了官职，准许衣锦还乡。回到家乡，武大郎第一个就去拜见谢茂才，没想到谢茂才却不知去向。

原来，武大郎赴京后不久，谢茂才经过医家细心调治，病体慢慢好了起来。没想到天上飞来一场横祸，吃了一场大大的官司，不久父母双亡，家业凋零，他不得不撇下妻子儿女，到处流浪。

又过了几年，武大郎调任阳谷县尹，谢茂才在外闻得消息，

便来拜见武大郎。武大郎见了谢茂才，已不是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书生了，只见他衣裳褴褛，面目黧黑，弯腰弓背，整个一个叫花子模样。

开始，武大郎倒也十分热情，盛情款待，但在酒席上，谢茂才提出跟武大郎借点钱，回家修理房舍。武大郎却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谢茂才压了一肚子气闷，席后不辞而别。

谢茂才来到东昌府，心中的火气越烧越旺，无日不在诟骂这个忘恩负义的武大郎。一日行经书坊，一个念头倏然而生：我何不写一本书来骂骂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让他留下个千古骂名，也泄我心头之恨。

于是，谢茂才把自己闭门关了三个多月，终于写完了这部书，起名曰《金瓶梅》，便送往书坊。之后，他便由东昌回到临清。

谢茂才回到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原来那几间东倒西歪的破草房已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一幢青砖明瓦的大四合院。

谢茂才恍如梦中，这时他的妻子正好从屋里出来，便把谢茂才拉到家中，将武大郎如何派人来修造房子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谢茂才听完，捶胸顿足，懊悔不迭，知道把武大郎给错怪了，忙返回东昌府，去追那部书稿。

来到书坊，谢茂才向书坊老板讲了索回书稿的情由。原来谢茂才走后，书坊老板仔细看了《金瓶梅》的书稿，觉得这部书云霞满纸，实是一部奇书，如还给他，心中难以割舍。于是便推诿说："您不愿刻印这本书，当然可以，不过这部书稿现时在一个朋友手中，等我要回来了，便完璧奉还。"谢茂才无奈，

只好等他去索回书稿。

书坊的老板立刻雇了几个人，白天黑夜地抄写，把书稿抄了下来，然后按原样包好，还给谢茂才。谢茂才被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老板作了手脚。

没多久，这部《金瓶梅》就传开了。因为是雇人抄写的，本来这些人水平就不高，又加上白天黑夜地赶抄，萝卜快了不洗泥，就有了许多错别字，个别地方甚至卯榫不合。

这个故事的讲述人，是临清人王连洲。

谢茂秦孤愤著谤书

谢茂秦，即是有明一代饮誉海内的大诗人谢榛，他也是临清人。

谢榛生于明弘治八年（1495），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便喜作歌词乐府，度新声，通音律，写了很多散曲。那些散曲有不少是写春怨闺情的艳曲，每成一首，则少年争歌之。曾自记一阙云：“隔花漏残春梦醒，星斗落江城。珠箔金钩低控，玉钗珊枕斜横。画堂前紫燕交飞，绿杨枝黄鸟和鸣。倚危栏，又看三月景，杳不见多情。断肠芳草碧，回首乱峰青”（《四溟诗话》）。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也足见其才情。

谢榛后来与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名列“后七子”之首，是嘉靖间的“大名士”。

谢榛终生为布衣，出身微末，前半生生活潦倒，十分贫寒。中年以后，入赵康王府做幕客，来往于公卿、王侯、权贵、缙绅、名流之间，赵康王曾把自己的爱姬赠给他。在这种际遇中，

他便也逐渐习惯了声色犬马的豪门生活。既有潦倒生活的体验又有出入于达官显贵之间的丰富的阅历，使他成为众说纷纭的《金瓶梅》作者之一。学者们对他一生的行径与著述多方考证，民间对此说也曲为演义。下面，便是临清人刘谦讲述过的一则民间故事。

那个时候谢榛还没有显达，他住的是低矮的草房，吃的是粗淡的茶饭，但是他刻苦好学，孜孜以求，年届而立，便成了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无所不通。做学问做得太苦，以至于把一只眼睛都弄瞎了。谢榛这人，本来就淡薄功名，眼睛一出了毛病，就更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于是，他利用家里的几间草庵，开了一个学馆，课授蒙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所教授的几个学生身上。

那一班学生中，最让谢榛喜欢的，是清河县的武植。

这武植虽在弱冠，却相貌堂堂，又异常聪慧，诚恳虚心，颇有颜回之风。

谢榛对武植颇有偏爱，每天临清的学童散学回家，他总是把武植留在自己的屋里，再单独给他讲授些诗书文章。武植的练习诗文，他也总是细细圈点，认真评讲。这样耳提面命，武植的学问不断精进，没几年，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高中进士，被授予阳谷知县。

谢榛这一下子可真的扬眉吐气啦。

可没有想到，武植上任足有半年多了，竟连一封信也没写来。谢榛是多么盼着能跟这个亲传弟子好好叙叙啊。他想武植想得厉害，有时梦里也会出现师生相会的情景。

可是谢榛渐渐又多了几分耽心：眼下世风日坏，朝中权奸

当道，吏治不纲，当官的贪脏买法，鱼肉百姓，整个社会逐末营利，填衢溢巷，新贵蜂起，竞尚奢靡，市井贩鬻厮隶，也多缨帽湘鞋，纱裙细袴。酒垆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女不织，男不耕，都以卖俏做营生。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如果武植能不随波逐流，那就是万幸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从阳谷县来的两个商人那儿，听到了对武植的议论，说武植是个贪酷不仁的赃官。谢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那两个商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人不信。

谢榛这一回可真的气懞了，心说，难道我谢茂秦真是瞎了眼睛不成？难道我眼瞎了心也瞎了不成？当初看他是个少年才俊，没想到倾尽半生心血，教出了这么个人皮包狗骨的东西。谢榛越想越恼恨，索性把学馆也封了，将一班蒙童遣散，关在屋里生闷气。心想：从今后再不开这学馆了，如再教出这样几个贪官，岂不贻害了黎民百姓。

谢榛一连几天愁眉不展，思谋着教训武植的办法，思谋来思谋去，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写书。那年头淫词小说盛行，何不也借这事作他一部出来，为那些醉生梦死之人说说因果？

没过几个月，书写成了。因为谢榛从少年时代就负有文名，弄部小说对他可不是什么难事。

在这部书中，武植被写成了一个形象猥猥的三寸丁谷树皮，他眼见老婆跟人私通却束手无计。可武植的老婆跟谁私通呢？一天谢榛在城外散步，忽然见城西门打开了，一眼就看见城门洞里倒扣着一口大铜磬。这口铜磬由于年代久远，已生了一层铜锈，在阳光下闪着幽绿的光。

原来临清城座落在运河东岸，西门里原是皇家的粮仓，因

此，州城的西门是不轻易打开的，除非是一年一度的运粮，再不就是处决人犯。望着西门里的铜磬，谢榛想了很多，最后，他即把书中那个因奸害命的家伙定名为西门庆。

谢榛想：我带上这部书上阳谷县去见武植，他若是个正人君子，这书就算白写，回来一把火烧了了事，他若是个赃官呢，我在回家途中便将书散发出去，出出他的丑。

谢榛带上书稿，走了二三百里路，来到了阳谷县。

武植见到先生，非常惊喜，问道："先生远道而来，可曾见学生派去的人？"

谢榛心里骂道："这不是哄鬼吗，见到了你派的人我还到这儿来干啥？"

武植没有察觉出先生的不满，他见了恩师，喜欢得没人脚处。立刻为先生安排接风洗尘。酒宴上，武植一个劲地抱怨自己公务繁忙，竟没顾上去看老师，心中十分思念云云，谢榛只是漫不经心地应答。

阳谷县的秀才、举人们听说大诗人谢榛到了，欢呼雀跃。谢榛虽是布衣，但诗名颇震，人们都想一睹其容，所以第二天在著名的狮子楼摆的那场接风宴，别提有多盛大了。名士们争相向谢榛敬酒，交口称赞他培养出了武植这么一个好门生。纷纷说：武知县可真是个好官，在阳谷任上不到一年，几乎是马不停蹄，察访民情，整顿吏治，清理旧案，整饬积弊，把个阳谷县治理得百业兴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且，武知县为官清廉刚正，恭谨俭约，实是难得。人们都说：这全是谢先生您教诲有方，阳谷有了武知县这么个好县令，可真得感谢您这位大宗师呢。

听了这些，谢榛的气算是消了一半，但他仍是心存狐疑，他要亲自看一看武植的行径。谢榛在阳谷县一住就是三个月，他亲自看到武植是怎样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甚至病倒在床上也拥被披阅文牍。没事的时候，他总爱在街上走走，明察暗访，所到之处，对武植皆是一片赞扬之声。

这时，谢榛才彻底放下心来，他感到十分欣慰，他的学生武植果真是个好官，没有让他失望。

三个多月了，一来不耐烦那些场面上的酬接，二来也惦着赶快回去，把关闭的学馆再开办起来，于是告辞武植，准备回家。

武植再三苦留不住，只得为先生饯行。临行前，武植取出些银两给先生作为盘费，谢榛接银在手，一看，刚好够他回去路上的花费，心中大悦，这才是我的学生哩！既然一不贪赃，二不受贿，哪来许多银子送我哩。

谢榛离开了阳谷县，路过东昌府，又在一个老友家被留住盘桓数日。当他回到临清故里，却傻了眼，家中的旧草房不见了，却平地矗立起一座红檐绿瓦的新楼，恍惚如入五里云雾之中。这时，家中的人走了出来，告诉他，就在他出门那天，武植派的人到了，接着拆旧房，购新料，给盖起了这座高楼。

谢榛心中立刻又充满了狐疑，这武植哪儿来的如许之多银两，莫非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家人看出他的疑问，忙从屋里取出一个花名册。谢榛翻开一看，原来是一部捐助银两的簿子。原来武植为官清正，深受万民拥戴，名界父老，纷纷要求给他请功。武植对大家讲，说自己这一点学问和政绩，全是老师谢榛教导的结果，大家要感谢，就感谢我的恩师吧。当人们

知道声名卓著的大诗人谢榛如今却依然遭受困苦时，心中十分不安，有人提出要为谢先生捐一座新楼，大家纷纷响应，踊跃捐银，武植也将自己来年的俸禄预支并入，结果，盖了这座新楼还剩下了许多银子。

谢榛听了家人叙述，不由得老泪纵横，他深悔自己过于书生意气，听了两个小人的鬼话，就写什么书去埋汰弟子。想到这些，他赶紧去摸书袋，突然他大叫一声“不好!”便昏倒在地上。

家里人全吓呆了，赶忙救治，半天才醒了过来。问起原由，才知写的那书不见了。原来这三个多月，谢榛早把写书那事忘得精光，现在努力想一下，大概是回来的路上把它丢在东昌府了。

谢榛顾不上一路劳顿，立即返回东昌府，谁料那本书已被那位朋友传播开来，虽然取回了原本，可那些抄本却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谢榛急得死去活来，但已于事无补了。

临清王氏作《金瓶梅》

临清人就是对《金瓶梅》情有独钟。

在那里流传的所有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传说中，其主角必是临清人。他们坚信是临清人写出了这一部旷世奇书。

这一则故事亦概莫能外——

传说临清文庙后边，住着一个姓王的落魄书生。他家原先也是个书香门第，可到了他爹这一辈，家道就中落了。不得不

开始经商。可他爹却不愿自己的儿子像他那样，日后总要有个功名才好。便千方百计地让他儿子读书。

要说这姓王的书生，也算得上天资聪明。在同私塾中入学的学生，就数着他最得先生的宠爱，以为将来必登龙门。

谁知一年年过去了，那些学习远不如他的学生都先后中了秀才、举人、进士，做了官，而这姓王的书生，却命途多舛，一年又一年的屡试不中。

眼看着年纪一年年大起来，也就渐渐冷了这举业之心。开始诗酒放诞，不再读圣贤之书，专爱看那些市面上流行的小说、戏曲之类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说也奇怪，别看他做正经学问不行，可写的诗词歌赋，却工巧精致，很受妓女和少年们的喜爱，因此，他经常出入青楼，变成了一位浮浪子弟。

要说这王姓书生一味放荡，在脂粉队里胡混，也算冤枉了他。他天生一种性格，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对当时的社会非常不满，于是借宋映明，写了《金瓶梅》这么一部奇书。

因为写了这部书，这书生可惹下了一场大祸。且不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官府来追查，便是同宗的人，也容他不下。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外出避祸。

有人说他因为作了这部《金瓶梅》，便成了断子绝孙的绝户，其实不然。他也有后代儿孙，只不过因为背上了这“黑锅”，子孙辈不敢声扬罢了。年代久远了，一般临清人只知有个姓王的书生曾写过《金瓶梅》，其他情况却极少有人知道了。

讲过这故事的是一位清末的秀才，名王凤梧。他家也住在临清的文庙后面，他也是读了大半辈子书，却没有挣得上半点

功名的穷秀才。他家里曾藏有一部不知什么版本的《金瓶梅》，并且经常给人讲《金瓶梅》、《水浒传》的故事。曾经很明确地给人指点过那位写《金瓶梅》的王氏住处的位置。这位名叫王凤梧的老秀才，一直活到1958年春天才去世，关于临清王氏作《金瓶梅》的故事，他是听他祖辈、父辈讲过的。

转述这个故事的陈黎明、国务元、王连洲等，也都是临清人。

笑笑生写《金瓶梅》

《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可这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在《金瓶梅》故事的另一个发生地——河北省清河县，也有一个故事——

明代的清河县城西关，有一家肖家开的生药铺。店掌柜的叫肖长明，是清河县里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这肖老板有个儿子，名字叫肖晓升。

肖晓升与城东武家村的武植同在一个先生门下读书，二人友情甚笃。武家生活困窘，曾得过肖家不少资助。

这天底下总有些难以摆平的事，肖家虽然广有钱财，那公子肖晓升本人也算聪明伶俐，但只是在读书方面却不大肯用功。

后来，肖晓升与武植一起到城外去访友，恰巧碰上了潘员外的女儿潘金莲。肖晓升立刻为金莲的美貌所倾倒，回来后即托人去求亲，没想到金莲却意在高大英俊的武植，便一口回绝

了他。

一年后，金莲与武植喜结连理，肖晓升自然是通身的大不自在。金莲刚过门的那半年中，肖晓升经常去武植家串串门儿，武植两口对他自是热情接待。可每逢武植不在家时，他却有意拿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挑逗金莲。金莲一开始不理不睬，肖晓升以为得计，越发得寸进尺，金莲正色对他提出了忠告，并且事后将这事告诉了武植。

武植听了也非常气愤，但考虑到毕竟同窗数载，又受过他不少资助，没有将这事挑破，但却冷淡了肖晓升。肖晓升自然明白自己被冷淡的原由，天长日久，双方也就慢慢断绝了往来。

武植乡试中举，大比之年又高中进士，被授了官职，携妻去外地赴任。而肖晓升自从得中秀才后，居然连年名落孙山，徒有万贯家财，而功名却偏偏与自己无缘，想来非常懊恼。这天晚上，又一个人喝闷酒，直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等到他被店里的伙计从屋里抬出来的时候，家中财产已被焚烧殆尽。诺大一个铺面，也只剩了些断壁残垣。

谁知祸不单行，没多久，父母又双双离世，办完丧事，他已家贫如洗了。因生计无着，只得一个人离乡远游去了。

这一天，在京城外的一座破庙前，他意外碰到了一位远亲。这位远亲见他这一副落魄样子，很是可怜他，便介绍他到一个暴发户家去做西宾。

这暴发户是一个丝绸商人，连着发了几笔横财，遂成骤富。这家的子弟只有一个，学堂就设在后花园，与这富户的五房小妾的住宅仅有一道矮墙相隔。

富户是个声色犬马之徒，本来家中有一妻二妾，近来又娶

了三个绝色佳人为小妾，终日饮酒作乐，即使青天白日亦无所顾忌。淫声媟语时时传入后花园。肖晓升除了教授这一个弟子的功课外，并无其他事情可做，闲来无事，遂将主人家的妻妾间的靡烂生活，逐日做了记录，并添枝加叶，使之绘声绘色。在记录、编写过程中，隐去了主人真实姓名。为了给书中的主角取一个正而八经的名字，肖晓升颇是费了些冥思苦想，近日听说刚娶回来的这个小妾，原是丽春院的粉头庆庆，而富户又住在西门附近，于是便把主角取名为“西门庆”了。

肖晓升写着写着，自家曾有过的富贵生活不时浮现在眼前，每到这时，他便越发怀恨武植夫妇，为了泄一己私愤，便将这二位也写进书中。武植成了个模样猥亵，百无一用的窝囊废，而潘金莲在书中也被写成了俏口毒心的淫妇。

书成后，也须署个著者的名字，想来想去，顿觉人生如梦，事事堪笑，索性以自己真实姓名的谐音，署作“笑笑生”了。至于加在“笑笑生”名字前面的“兰陵”二字，也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他的家乡清河县，在东汉三国时期曾为甘陵国，但如果署上“甘陵笑笑生”，日后明眼人一看便知著者根蒂，为掩人耳目，便借大诗人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之句，改“甘陵”作“兰陵”，如此移花接木，即使日后这书传播开来，人们也不会知道究竟谁是它的真实作者了。

上面的几则民间传说，当然不能成为究竟是谁写出了《金瓶梅》的佐证。然面，它却从一个方面说明，《金瓶梅》这部奇书，在中国民间有着何等深远的影响。

5

曲终人不見，江上数峰青

——兰陵笑笑生匿名之心路历程

《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怎样一个人？

吴晓铃先生1982年在美国印第安大学讲演时，曾指出这部书的作者应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一、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人；

二、作者应是山东人；

三、作者熟知嘉靖年间的北京；

四、作者在北京做过官；

五、作者在京居官时与首辅不谐，因而罢官回里；

六、作者对非正统文学熟谙、爱好且有造诣。

古往今来，学者们为兰陵笑笑生制做了一顶又一顶的尺寸凛然的帽子，然而，种种"砍头便冠"式的寻觅，使"一个个假想的'作者'被提出、被论证，有些也很快被淡忘。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那些'涉嫌者'也像走马灯一样上台亮相——展览其辉煌的业绩、缤纷的文采，也展览其偶然的不检点或放纵

的积习。”（刘辉、杨扬主编《金瓶梅之谜》）

好一个兰陵笑笑生！

他把一部奇书留给世间，也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

果然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也许，从一开始，笑笑生便做好了终生埋名的打算。他知道他的这部书，会被人们喜欢，也会被人们拒绝，出于某种警戒性的文化自觉意识，他决定隐姓埋名，作壁上之观，对他来说，这一“埋”便成为永远。

兰陵笑笑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条耿直的汉子，他宁肯埋名于千古，也不加入唱颂歌的帮闲文人行列，不趋流俗，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才写出了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小说。

青史留名，是多少文人墨客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名，作为一种文化密码，也表现了这种文化的现实惯性。而笑笑生的匿名，可视为最绝对的一种匿名——情愿跟人们眼中的那个常态的世界永不相见，孤独地承担《金瓶梅》中的现实世界。

他知道他触及了一个民族的隐密面、忌讳面、行为面，而让这个民族文化的光彩面、理论面、宣传面大为尴尬。他知道他在写一部为人所难容的书，他必须为此承担以下后果：

一、社会意识的谴责

笑笑生的时代，是一个连改变社会道德的幻想都不可能有的时代。由儒、佛、道合成的道德观，是那时一切中国人的道德观。虽然这些在他的小说中是作为对立的观念形态存在的，然而，他毕竟是社会中人，他知道他的书一旦刊行，便会把人人心中那一池静水搅得洪波滔天，便会为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这种人生的终极审判，并没有一个新的文化理性的后

盾，因此他无法逃避社会意识形态对他的谴责。

二、被官府抄斩的危险

自秦以来，历代文厄深重，而明代文祸及禁焚最烈。明太祖时，即“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小书（即小说）作者被列为合编充军的对象，与贩卖私盐者、土匪和盗贼等并列。

到永乐九年，禁收藏传诵印卖“不良杂剧词曲”，出榜后五日，“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有所藏私书下令后三十天不送交官府者，罚筑长城四年（黥为城旦），永乐则是五天之后“敢有收藏”便“全家杀了”。如此干脆，秦始皇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皇帝自己也在看春画，用春药，一批善于淫邪方术的江湖骗子被充任高官，从皇帝到权臣，谁无一大队妾媵，他们自己可以先天下之乐而乐，却不容许百姓有任何悖于所谓“社会道德”的言行。何来笑笑生，竟如此斗胆，皇帝和大官一震怒，随时都会脑袋搬家，且祸及九族。

我想，在写作此书的全部过程中，这份恐惧，怕是一刻也离不开这位文坛斗士的。

三、终身乃至永远背着诲淫的黑锅

兰陵笑笑生隐名的一个主动因，是书中写了“房中事”。

为他写序的欣欣子认为，这样的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一个永恒的禁区，“那事可做不可说”，儒家思想向来将“欲败度，纵败礼”（《尚书》），“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奉为金科玉律，即使是合法的夫妇之间，也应保持一种“度”——“上床夫妻，下地君臣”。而且

明代又是理学统治的全盛时期，明成祖朱棣曾命儒臣将宋代理学家的著作辑成《性理大全》，颁示天下．这种思想上的空前专制，更将人们的本能欲望完完全全地控制在“天理”之下。

而这位笑笑生，却用一枝如椽之笔，大写了饮食男女，超前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危机，展示了人性的觉醒。他比别人更知道他将为这部书付出怎样的代价。

四、必须忍受穷困的磨难

笑笑生不会是一个钟鸣鼎食的“大名士”，倒很可能是位“上无公卿大夫之职，下非农工商贾之民”的穷途末路的文人。

从应伯爵拿给西门庆看的水秀才写得一篇《祭头巾文》，或可想象这位老兄当时的寒酸与窘迫：“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赖了多少束修银。告状助贫，分谷五斗，祭下领支肉半斤……你看我两只皂鞋穿到底，一领蓝衫剩布筋。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历过冷淡酸辛。赚尽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数载犹怀霄汉心。”

写这种不见天日的书，于他的衣食丝毫无补，便是他之后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也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换一句话说，如为了稻粱之谋，他宁可去歌颂升平，加入到他所暴露的现实中丑的行列之中。那么，《金瓶梅》就再也不属于他所有，文坛上也不会留下笑笑生这个光辉的名字了。

清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并无一字追寻作者为谁何，他写道：“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

矣。"（《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三十六）

张竹坡洞悉了兰陵笑笑生隐姓埋名的心路历程。

尽管任何一种原因都可以使兰陵笑笑生停笔，但他还是坚韧不拔地写了下去。笑笑生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是这一部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旷世之作，而且还有他那一副不趋时势的文学品格。


EX LIBRIS

6

抄本之谜

——关于《金瓶梅》传世的信息

《金瓶梅》问世之后，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不同的地区流传了二十多年。

谁读过《金瓶梅》的抄本？又有谁收藏过《金瓶梅》的抄本？

从明人关于《金瓶梅》的文献资料中，可知当时读过和收藏过这部奇书抄本的有徐文贞、王世贞、王肯堂、王穉登、屠本畯、刘承禧、谢肇淛、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李日华、丘志充、文在兹等人，以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为重点传抄区。

第一个记载这个抄本的文献，是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一封信，信谓：

>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衔斋，摩霄极地，无所不

谈，病情为之少却。独恨不见季伯时耳。《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这封信的收信人董思白，即董其昌，字玄宰，思白是他的号。他是江浙华亭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当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曾任皇长子常洛的讲官。

这封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十月，此时，董思白已调湖广提学副使，离开京师。

由此信可知，袁宏道从董思白那里借到的这部《金瓶梅》抄本，实际上只有上半部，“后段”在谁手中，就不得而知了，以至于他顾虑把前半部抄完了，后半部却不知去何处倒换。

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在致谢在杭的信中，再次提及《金瓶梅》，信谓：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憾也。

此信收信人谢在杭，即是谢肇淛，他是袁宏道的同年，万历二十年（壬辰）进士。

信中提到的这个谢胖，不知谁何。台湾学者、著名金学家

魏子云先生考证，万历三十四年（1606）春，有一位名叫谢于楚的朋友（歙县人，谢于陛之弟），曾到袁宏道家乡隐居地“柳浪湖”访问过他，住了些时日，遂“东归歙”。但这位谢于楚，却不大可能是那位“谢胖”。因为这个人的性格，不会“持数刺谒贵人”。谢肇淛的《小草斋文集》中，有一篇《谢于楚诗序》，谈到了谢于楚的品格，说他在长安时：“长安多贵人，朱门碧瓦，宝勒金鹰，陌上红尘，几失天日，于楚不闻也。日惟二三酒徒，击筑踏歌，醉胡姬酒肆中，而无一语及时政。”又说他：“夫骨骸不媚于仲翔，不无恨于青蝇，而于楚能之。于楚于是乎可与友也。”

为什么说袁宏道这封信写于万历三十四年呢？信中有“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句，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和他哥哥袁伯修、弟弟袁小修，与在京诗酒友人等，时去崇国寺葡萄园饮宴唱和。此一聚会，袁氏兄弟称之为“葡萄社”。第二年，这个“葡萄社”便因人事星散而解体。

袁宏道给谢肇淛写了此信的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又作过这样的记录：

> 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

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甕肠。

这位屠本畯，字田叔，浙江鄞县人。他晚年自号憨先生、憨憎居士、乖龙丈人、无盖庵头陀。

他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与明代另一位文学大家屠隆同宗同族。他的年纪比屠隆大，而辈份却小。屠本畯隆庆六年（1572）授刑部检校，迁太常典簿，历南缮部郎中，出为两淮运司移福建运司，拜辰州太守。万历二十九年（1601）为同僚同乡所陷，罢官归里。屠隆有诗《闻田叔罢官》纪其事云："薄宦二千石，危途三十年。"宁波师院郑闰先生曾考证这位屠本畯便是为《金瓶梅》写序的欣欣子，依据是屠本畯在杂剧《饮中八仙记》中谓："太憨生自报家门说：家住洗墨溪畔明贤里"，又在《山林经济籍》之《五子谐策》中自号为"欣子"，跟《金瓶梅词话序》末所署"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相吻合。

屠本畯在这段文字中，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三位收藏者的信息：即王世贞、王宇泰（肯堂）、王百谷（稚登）。

王世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而信中提到的王太史宇泰和王征君百谷，我们却不太熟悉。

王太史宇泰，即王肯堂（1549～1613），宇泰是他的表字，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十八岁中举，万历十七年（1589）已丑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一，三年授检讨。这期间他结识了屠本畯。时倭寇平秀吉破朝鲜，声言内犯，王宇泰疏陈十议，触怒了皇帝。万历二十年（1529）春，请告归里，家居十有四年。屠本畯在金坛获见《金瓶梅》这二帙抄本的时间，大体上是在王宇泰万历二十年请告归里之后，屠本畯本人万历二十五

年由南京转赴福建之前的这段时间内。那么，王宇泰用重赀购入此书抄本二帙的时间，理所当然还要早一些，早到什么程度呢——

这位王宇泰，于董其昌交往甚契。他们俩是同年进士，一道入翰林院。董其昌是有明以来知名书画家，而王肯堂字泰不仅好读书、抄书，而且又喜欢收藏。董其昌不止一次到王宇泰家去欣赏珍本秘藏。在王宇泰于翰林院任职期间，董其昌从他那里看到了《金瓶梅》的抄本。袁宏道说的他所见《金瓶梅》前段抄本，说不定即源于王宇泰，“前段”与“二帙”在数量上竟那么一致。

由此可知，王宇泰在万历十七年进翰林院之前，已买到了《金瓶梅》的二帙抄本。

王宇泰怎么会买到这个珍贵的抄本呢，他少年时即好博览，“九派百家，无弗探也，遇会心处，欣然至忘寝食”（王宇泰《郁冈斋笔记序》），他同时还精通歧黄之学，以医名于世，曾著有《证治准绳》、《伤寒理境》。经常外出行医，使他有机缘访得秘本，《金瓶梅》或因此而购得也说不定。

《金瓶梅》抄本的另一位收藏者王百谷，名稚登（1535～1612），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江苏武进，后移居吴门（即今苏州）。他一生喜欢交游，善结纳，颇有诗名，著有《吴社编》、《王百谷全集》、《吴骚集》等。重要的是，他与王世贞不仅同郡，而且交情甚笃。所以，他所藏的《金瓶梅》抄本二帙，跟王世贞家所藏该书抄本不无关系。

藏有《金瓶梅》抄本片断的，还有袁小修、丘志充和文在兹。

袁中道（即袁小修）著《游居柿录》，谈他所见到《金瓶梅》一书的经过：

>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

这段文字，写于万历四十二年，即1614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有一段记载，云：“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

沈德符抄了这部《金瓶梅》，已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所证实：

> 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初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该书卷七）

这位李日华，字君实，浙之秀水人，万历二十年（壬辰）进士，与袁宏道是同年。他的这一则日记，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沈德符（景倩）手中已有了《金瓶梅》抄本。

藏有《金瓶梅》抄本的还有丘志充。谢肇淛《小草斋文

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记：

>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此书向无镂板，钞写流传，参差散失，惟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釐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谢肇淛提到的"丘诸城"，名丘志充，字六渠，（魏子云先生记"六区"，亦同），山东诸城人。明万历三十一年举人，三十八年贡士，未殿试，延于四十一年再试，中二甲进士，在工部任主事，是谢肇淛的同事。后升至郎中，于万历四十八年外放河南汝宁知府，天启六年（1626）擢升为山西布政司布政使，从二品，因行贿谋升，于天启七年（1627）论死，但延至崇祯五年（1632）才执行死刑。李清《三垣笔记》曾记："王抚化贞，邱副宪志充，皆诸城人，又皆癸丑进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贿谋升，同日弃市，亦云怪矣。"（见中华书局版该书，P155）

这位丘志充，不但藏有《金瓶梅》的抄本，而且还藏有其续书《玉娇李》，从何处而来，尚不得而知。

以上诸藏家所藏，都非《金瓶梅》的全本，或者二帙，或者半部，那么，谁藏有最完整的抄本呢？

麻城刘家。

让我们来看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载：

>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

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这位刘承禧，其生平见民国之《麻城县志·刘守有传》，刘守有，是刘承禧的父亲，其传曰：

刘守有，号思云，袭祖庄襄公荫，官锦衣卫，加太傅。神宗宠眷殊渥。子承禧，号廷伯，亦袭职。好古玩书画。奕叶丰华，人认为邑之王、谢也。

刘承禧是一位大收藏家，与当时文士交往颇多，袁中道曾从他那儿见过周昉《杨妃出浴图》和《浴鹓鹅》图，编订《元曲选》的学者臧懋循，曾从刘承禧家借得元人杂剧二百余种，多系秘本。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有名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也曾归刘承禧，此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附有“麻城刘承禧永存珍弥”题跋字样。

如此看来，刘承禧拥有全帙《金瓶梅》便在情理之中了。

袁中郎交待了刘承禧这部全帙《金瓶梅》的来历，说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刘承禧是徐文贞的侄孙婿。

这位徐文贞，名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嘉靖进士，曾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后为高拱所扼，致仕归，卒后谥文贞，有著作《世经堂集》、《少湖文集》行世。

刘承禧之后还有谁见过《金瓶梅》抄本呢？

王重民先生（已故北京图书馆馆长）所撰《中国善本书提

要》一书，《新刻金瓶梅词话》条，引明人薛冈《天爵堂笔余》所记，云：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闵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该书卷二）

这位薛冈，浙江鄞县人，嘉靖四十年（1561）生，字千仞，少以事避地客于长安，为新进士代作考馆文字得与选，因有盛名，一时共称薛千仞先生。因所著名《天爵堂集》，亦称天爵翁。年八十归里，旋卒。

薛冈这段笔记，是《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重要信息。它表明：

一、薛冈所初见《金瓶梅》，系翰林院庶吉士文在兹所藏，亦非全本。按，明代翰林院庶吉士，只有两个姓文的人，一是文在兹，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陕西三水人，另一个是文安之，天启二年（1622）进士，湖广夷陵人。薛冈言“关西文吉士”，文在兹恰是关西人，时间上也相吻合。

乾隆《三水县志》卷十《科贡·进士》：“万历辛丑科，文

在兹，字少元，在中胞弟，登许獬榜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载以终养归卒。”由此可知文在兹在京师的时间并不长，他离开京师时约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个时期，北京已有抄本不全的《金瓶梅》在流通了。

二、后二十年，薛冈的朋友包岩叟送了他一套新刻全本《金瓶梅》。包岩叟，名士瞻，岩叟为其号，少有文名，以太学生官同知德州。其生平不详，《德州志·职官》列其州判第三十四名，仅谓其为“鄞县人，监生”。包氏所荐此一刻本之序，当为东吴弄珠客所作。薛冈这个名叫包岩叟的朋友会不会同《金瓶梅》的早期刊刻有关系，曾引起过学界论争。

《金瓶梅》的抄本是什么样子的，可惜这些收藏家和早期读者都没讲出来，从薛冈的态度来看——“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则初期出现《金瓶梅》之抄本，即有淫秽描写。

魏子云先生认为：袁中郎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首先读到的那个抄本部分，是一部有关政治讽喻（规谏）的书，因袁宏道致董思白信中即谓此书“云霞满纸，胜枚生七发多矣”，如果不是有关乎政治讽喻的内容，怎会同枚乘的《七启》作比况？《七发》在《昭明文选》中，同张景阳的《七命》，曹子建的《七启》列为一组，它们皆是有关政治谏诤的文章。

7

吴中高悬国门的黑旗

——《金瓶梅》的初刻本

最先透露了《金瓶梅》刊刻消息的是沈德符，据他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他在京邸曾问起袁中郎有没有见过全帙《金瓶梅》，袁中郎说只有麻城刘承禧家有全本，是从他的妻家徐阶府上抄去的。又过了三年，袁中郎的弟弟袁小修到京城应进士闱，竟带来了这部书，于是，沈德符便借抄了一部，携回家乡——

吴友冯梦龙见之（指沈德符抄录的这部《金瓶梅》）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王究结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

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金瓶梅》的初刻本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呢？

根据沈德符如上记载，鲁迅先生曾提出“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之说。根据是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跟袁中郎打听这部书的全本，三年之后，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袁小修已有了该书，沈德符借来抄录，带回老家，冯梦龙看了大为惊喜，便怂恿书坊重价购刻。

然而，鲁迅先生忽略了这段记载中另一个人与初刻本的关系，这个人是谁？他是主政浒墅钞关的马仲良。

马仲良，河南新野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二甲五十一名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中有他的名在。他也是沈德符的朋友。

《浒墅关志》记述他“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征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沈德符所说的“吴关”，即是浒墅关，在苏州附近，明代是一大钞关，监收船料钞，是个肥职，所以其任职官员每年轮换一次。《吴县志》记载：“明景泰元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差主事一员，一年更代。”

马仲良出任的时间，《浒墅关志》中有确切记载：

万历四十年：张铨，字平仲，北直大名人，甲辰进士。

万历四十一年：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人，庚戌进士。

万历四十二年：李佺台，号为舆，福建惠安人，丁未科进士。

由此可知，马仲良出权吴关的确切时间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

沈德符所讲的“未几时”，是指万历四十一年之后的一段不太确切的时间。

因此，有学者推断，载有东吴弄珠客万历四十五年丁已（1617）序的《金瓶梅》，为“吴中悬之国门”的第一个刻本。

刘辉先生同时亦举出薛冈“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这一见于《天爵堂笔余》中的话来印证，薛冈与他的朋友文在兹认识，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文在兹在京中举进士的时候（见《抄本之谜》所引资料）。按这个时间往下推二十年，便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所以，薛冈见到刻本全书，则必定在此之前。包岩叟寄给他刻本《金瓶梅》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五年或稍后一点。因万历四十四年，薛冈与包岩叟一道由南京归，九月离开京师，抵瓜洲已到腊月岁末。到了江南，二人分手，薛冈经钱塘返故乡鄞县。包岩叟因故滞留，然后去钱塘。第二年，恰是东吴弄珠客序刊本《金瓶梅词话》问世的一年，包岩叟又正好在吴中一带。所以，他这个时候有机会见到全刻本，并寄给朋友先睹为快。

刘辉先生推断，沈德符和薛冈目睹的《金瓶梅》最早刻本，所指皆为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刊本。结论是：《金瓶梅》最早刻于万历四十五年。

从此，这一面吴中高悬国门的黑旗，便以它独特的光芒，烛照了一个别样的世界。

可惜的是，这个初刻本却没有流传下来，现存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是这个初刻本的翻版。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李时人先生认为：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从第六十三回开始，一连十三次将“花子由”的“由”字改刻为“油”，应是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所以，这个本子不可能是万历四十七年沈德符见到的初刻本，很可能是始刻于万历末，中经天启改元后才完成；

二、薛冈《天爵堂笔余》曾谈到及初刻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而此本简端却是欣欣子序。

三、沈德符曾提到初刻本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也。”此本与这一情况相吻合，可知当为初刻本的翻刻。（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 1991．8）

《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三部比较完整的本子传世，一为国内藏本，1932 年在山西介休发现，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33 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一百二十部。

另有台北联经朱墨二色套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校点本即据此排印。

其余两本藏于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见《传到了日本》一节），1963 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曾据此“两本补配完整”影印出版（大安本）。

传世的三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版式几乎完全相同。

8

“词话本”与“说散本”

《金瓶梅》的版本，有两个大系统，一是“词话本”，一是“说散本”。

所谓“词话本”，是指以《金瓶梅词话》为代表的版本，所谓“说散本”，则是指《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也有学者把《金瓶梅》版本的两个系统称“万历本”和“崇祯本”。

“词话本”保留了说唱文学的特色，“说散本”是文人对“词话本”的改写和增删。

“词话”，是元明说唱艺术的一种形式，其特点是可说可唱，如明代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以及《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快嘴李翠莲记》等篇什。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词话话本，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出土的明成化年间的词话刻本《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16种。

《金瓶梅词话》具备了这种说唱艺术的种种特点：

一、书中大量采用了可唱的曲子、小令、词和套数。据吴

晗和赵景深两位先生的统计资料，小曲有《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驻云飞》、《寄生草》、《罗江怨》等27支；小令有《绵搭絮》、《落梅风》、《朝天子》、《折桂令》、《锦堂月》、《桂枝香》、《柳摇金》、《一江风》、《水仙子》、《荼蘼香》、《一见娇羞》、《六娘子》、《两头南》、《锦橙梅》、《玉芙蓉》、《青杏儿》、《小梁州》、《黄莺儿》、《清江引》、《普天乐》、《驻马听》、《江儿水》、《红绣鞋》、《醉扶归》、《雁儿落》、《四块玉》、《四换头》、《渔家傲》、《皂罗袍》等59支；词有《西江月》、《踏莎行》等8首；套数有《梁州序》（“向晚来雨过南轩”，二十七回）、《朝元歌》（“花边柳边”，三十六回）、《新水令》（“凤城佳节赏元宵”，四十二回）、《醉花荫》（“雪月风花共裁剪”四十六回）、《好事近》（“东野翠烟消”九十六回）、《一枝园》（“小园昨夜放红梅”五十五回）、《端正好》（“享富贵受皇恩”七十回）、《集贤宾》（“忆吹箫玉人何处也”七十三回）、《玉交枝》（“彤云密布”，七十三回）、《宜春令》（“第一为来压惊”七十四回）、《春纳袄》（“想多娇情性儿标”七十七回）、《粉蝶儿》（“九腊深冬雪漫天”九十三回）等共20套。

刘辉先生统计，全书中的曲、词、诗、赞、赋及其他可唱韵文共599首。

还有许多描写，是韵、散杂揉，如八十六回王婆与潘金莲的一段对话：

> 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哑装聋。自古蛇钻窟窿蛇知道，各人干的事各人心里明。金莲，你休呆里撒奸，两头白（音bù）面，说长并道短，我手里使不

得你巧语花言，帮闲钻懒！自古没个不散的筵席，出头椽儿先朽烂。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苍蝇不抱没缝儿弹。你休把养汉当饭，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金莲道：“你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常言一鸡死了一鸡鸣，谁打锣，谁吃饭。谁人常把铁箍子戴，那个长将席篾支着眼？为人还有相逢处，树叶落还到根边，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撵，是非莫听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时衣，男儿不吃分时饭，自有徒牢话岁寒。”

这样的句子，在说表时也能琅琅上口。

二、许多人物出场以一段韵文“自报家门”。如六十一回李瓶儿染病，请来赵太医，那赵太医便有一段韵白来作自我介绍：

我做太医姓赵，门前常有人叫。只会卖杖摇铃，那有真材实料。行医不按良方，看脉全凭嘴调。撮药治病无能，下手取积儿妙。头疼须用绳箍，害眼全凭艾醮。心疼定敢刀剜，耳聋宜将针套。得钱一味胡医，图利不图见效。寻我的少吉多凶，到人家有哭无笑。

这实际上是作者或说书人对读者或听众在介绍这位姓赵的庸医，哪有一个医生这么埋汰自个的？

还有三十回接生婆蔡老娘出场，也是先称“我做老娘姓蔡”，四十回有一位姓赵的裁缝出场，却是说书人替他报家门曰“我做裁缝姓赵”。

还有的地方干脆用韵文作对话，如九十一回玉簪儿不愿给

孟玉楼端洗澡水而使性子，被李衙内怒打，玉簪儿向李衙内哭诉："告爹行停嗔息怒，你细细儿听奴分诉……"

三、经常使用说书人的口语。如"看官听说"、"安下一头，却表一处"（或"却说一人"），"说话的"，"话休饶舌"等等。且往往在情节描述中夹上说书人的评议，如第八回的一段议论："看官听说，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个'鬼乐官'，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此一篇议论，专说这为僧戒行。"

四、大量抄录引用别人的作品。周钧韬先生所著《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分为五个方面：

1. 该书明托宋徽宗朝事，实写明嘉靖、万历（初期）朝事，故宋、明两代史事在书中相杂而出，屡见不鲜；

2. 该书脱胎于《水浒传》，无论是两书内容重迭部分还是非重迭部分，《金瓶梅》从《水浒传》中摘抄了大量的文字，后者可谓是前者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

3. 与艺人创作话本、文人创作拟话本小说的情况相类，该书中抄入了许多前人创作的话本中的文字；

4. 明代的戏曲活动十分兴盛，作者从当时流传的南戏、杂剧、传奇剧本中摘抄了许多文字；

5. 明代中期，民间唱曲活动风靡一时，作者生活在其间，耳濡目染，信手采摭，将大量当时盛行的散曲、时调小曲写入书中。

如《金瓶梅》第一回开头的"词曰"："丈夫只手把吴钩"那

一段词，便是抄录于《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刎颈鸳鸯会》。其入话一诗一词，词即“丈夫只手把吴钩”。《金瓶梅》只有两个字的改动，即将“君看项籍并刘季，一以使入愁”，改为“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

接下来一段关于潘金莲的描写，却是将《水浒传》与话本《张志诚主管》（《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三卷）的情节拼合、抄改而成的。三十四回和五十一回西门庆两次提到的阮三与陈小姐一案，则是改编《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戒指儿记》。至于抄引戏文之处，就更多了。《金瓶梅》写到演剧的情节，对戏曲的念白亦大段大段地抄录不误。另外，作者还抄引了许多僧尼说唱的“宝卷”和前人的诗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词话本”是一部未经文人作家所写定的民间艺人说唱“底本”。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便是受“词话”这一艺术形式所规范制约的。因此，有不少学者指出，“词话本”是民间讲唱艺人的集体创作，而非作家个人创作。

再说“说散本”。

最早提出“说散本”这个概念的，是与笔者同乡的前辈学者孙楷第先生。他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中著录《金瓶梅一百回》本时谓：

> 以校词话原本，原本开首数回演武松事者删去，易以西门庆事；诸回中念唱词语亦一概删去，白文亦有删去者。每回前附诗多不同，是为“说散本”《金瓶梅》。张竹坡评本《金瓶梅》自此本出。

"说散本"是与有说有唱，韵散杂揉的"词话本"相对而言。一般认为，"说散本"是经过文人作家写定的本子。

"说散本"的写定者对"词话本"进行了哪些方面的修订呢？

一、删削了"词话本"中大量的唱词和抄引他人之作。

对"词话本"中所引录的大量的唱词和韵文，"说散本"作了全面的删削，或全部刊落，或一笔带过，据刘辉先生统计：

"词话本"		"说散本"
诗	170 首	刊落70首，改写6首，另加3首
词曲（包括小令、小曲）	112 支	刊落 59 支
套曲	23 套	刊落 15 套
赞赋	83 首	刊落 33 首，删节 15 首
回末韵文	64 首	刊落30首，改写4首，另加2首
俚曲韵文	4 首	全部刊落
曲艺（有唱词者）	8 处	全部刊落
其他韵文	13 处	刊落 6 处

至于"词话本"中写到演唱戏文、杂剧，除了海盐子弟演唱《玉环记》第六出保留之外，其余一概削去。

再就是"说散本"对"词话本"中的"看官听说"也进行了大量的删削。"词话本"有"看官听说"47处，"说散本"删去了12处，改写了3处，增加了一处。所保留的部分，多是与交待重要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有关。

二、调整了回目和结构。

"词话本"的回目不工整者，"说散本"则进行了调整。如：

“词话本” （《新刻金瓶梅词话》）	“说散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第二回：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贪贿说风情	第二回：俏潘娘帘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说技
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 西门庆茶房戏金莲	第三回：定挨光虔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
第四回：淫妇背武大偷奸 郓哥不愤闹茶肆	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 闹茶坊郓哥义愤
第五回：郓哥帮捉骂王婆 淫妇药鸩武大郎	第五回：捉奸情郓哥设计 饮鸩药武大遭殃
第六回：西门庆买嘱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第六回：何九受贿瞒天 王婆帮闲遇雨
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第八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第九回：西门庆计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外传	第九回：西门庆偷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皂隶
第十回：武松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赏芙蓉亭	第十回：义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赏芙蓉亭
第十一回：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第十一回：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第十二回：潘金莲私仆受辱 刘理星魇胜贪财	第十二回：同“词话本”
第十三回：李瓶儿隔墙密约 迎春女窥隙偷光	第十三回：李瓶儿隔墙密约 迎春儿隙底私窥
第十四回：花子虚因气丧身 李瓶儿送奸赴会	第十四回：同“词话本”

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
狎客帮嫖丽春院

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妇
应伯爵庆喜追欢

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招赘蒋竹山

第十八回：来保上东京干事
陈经济花园管工

第十九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第二十回：孟玉楼义劝吴月娘
西门庆大闹丽春院

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勾使

第二十二回：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春梅正色骂李铭

第二十三回：玉箫观风赛月房
金莲窃听藏春坞

第二十四回：陈经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詈来旺妇

第二十五回：雪娥透露蜂蝶情
来旺醉谤西门庆

第二十六回：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惠莲含羞自缢

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第二十八回：陈经济因鞋戏金莲
西门庆怒打铁棍儿

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
潘金莲兰汤午战

第十五回：同“词话本”

第十六回：西门庆择吉佳期
应伯爵追欢喜庆

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许嫁蒋竹山

第十八回：赂相府西门脱祸
见娇娘经济魂消

第十九回：同“词话本”

第二十回：傻帮闲趋奉闹华筵
痴子弟争锋毁花院

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簪花勾使

第二十二回：惠莲儿偷期蒙爱
春梅姊正色闲邪

第二十三回：赌棋枰瓶儿输钞
觑藏春潘氏潜踪

第二十四回：敬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骂来旺妇

第二十五回：吴月娘春昼秋千
来旺儿醉中谤讪

第二十六回：来旺递解徐州
惠莲含羞自缢

第二十七回：同“词话本”

第二十八回：陈经济侥幸得金莲
西门庆糊涂打铁棍

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定终身
潘金莲兰汤邀午战

第三十回：来保押送生辰担 西门庆生子加官	第三十回：蔡太师擅恩赐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壶觑玉箫 西门庆开宴吃喜酒	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壶构衅 西门庆开宴为欢
第三十二回：李桂姐拜娘认女 应伯爵打诨趋时	第三十二回：李桂姐趋炎认女 潘金莲怀妒惊儿
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失钥罚唱 韩道国纵妇争风	第三十三回：同“词话本”
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 平安儿含愤戳舌	第三十四回：献芳樽内室乞恩 受私贿后庭说事
第三十五回：西门庆挟恨责平安 书童儿妆旦劝狎客	第三十五回：西门庆为男宠报仇 书童儿作女妆媚客
第三十六回：翟谦寄书寻女子 西门庆结交蔡状元	第三十六回：翟管家寄书寻女子 蔡状元留饮借盘缠
第三十七回：冯妈妈说嫁韩氏女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第三十七回：冯妈妈说嫁韩爱姐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第三十八回：西门庆挟打二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第三十八回：王六儿棒槌打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 吴月娘听僧尼说经	第三十九回：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济拜冤家
第四十回：抱孩童瓶儿希宠 妆丫环金莲市爱	第四十回：抱孩儿瓶儿希宠 装丫环金莲市爱
第四十一回：西门庆与乔大户结亲 潘金莲共李瓶儿斗气	第四十一回：两孩儿联姻共笑嬉 二佳人愤深同气苦
第四十二回：豪家拦门玩烟火 贵客高楼醉赏灯	第四十二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
第四十三回：为失金西门骂金莲 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	第四十三回：争宠爱金莲斗气 卖富贵吴月攀新
第四十四回：吴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门庆醉拶夏花儿	第四十四回：避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第四十五回：桂姐央留夏花儿 月娘含怒骂玳安	第四十五回：应伯爵劝当铜锣 李瓶儿解衣银姐
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雨雪 妻妾笑卜龟儿卦	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雨雪 妻妾戏笑卜龟儿
第四十七回：王六儿说事图财 西门庆受赃枉法	第四十七回：苗青谋财害主 西门枉法受赃
第四十八回：曾御使参劾提刑官 蔡太师奏请七件事	第四十八回：弄私情戏赠一枝桃 走捷径换归七件事
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寺饯行遇胡僧	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第 五 十 回：琴童潜听燕莺欢 玳安嬉游蝴蝶巷	第 五 十 回：同"词话本"
第五十一回：月娘听演金刚科 桂姐躲住西门宅	第五十一回：打猫儿金莲品玉 斗叶子敬济输金
第五十二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看莫菇	第五十二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调爱婿
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息 李瓶儿酬愿保儿童	第五十三回：潘金莲惊散幽欢 吴月娘拜求子息
第五十四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 任医官豪家看病症	第五十四回：应伯爵隔花戏金钏 任医官垂帐诊瓶儿
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东京庆寿诞 苗员外扬州送歌童	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两番庆寿诞 苗员外一诺赠歌童
第五十六回：西门庆赒济常时节 应伯爵举荐水秀才	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 常峙节得钞傲妻儿
第五十七回：道长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劝舍陀罗经	第五十七回：开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
第五十八回：怀妒忌金莲打秋菊 乞腊肉磨镜叟诉冤	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
第五十九回：西门庆摔死雪狮子 李瓶儿痛哭官哥儿	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

第 六 十 回：李瓶儿因暗气惹病 西门庆立段铺开张	第 六 十 回：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
第六十一回：韩道国筵请西门庆 李瓶儿带病宴重阳	第六十一回：西门庆乘醉烧阴户 李瓶儿带病宴重阳
第六十二回：潘道士解禳登祭坛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痛哭李瓶儿
第六十三回：亲朋宿伴玉箫记 西门庆观戏感李瓶	第六十三回：韩画士传真作遗爱 西门庆观戏动深悲
第六十四回：玉箫跪央潘金莲 合卫官祭富室娘	第六十四回：玉箫跪受三章约 书童私挂一帆风
第六十五回：吴道官迎殡颂真容 宋御使结豪请六黄	第六十五回：愿同穴一时丧礼盛 守孤灵半夜口脂香
第六十六回：翟管家寄书致赙赙 黄真人牒度荐亡	第六十六回：翟管家寄书致赙 黄真人发牒荐亡
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第六十八回：郑月儿卖俏透蜜意 玳安殷勤寻文嫂	第六十八回：应伯爵戏衔玉臂 玳安儿密访蜂媒
第六十九回：文嫂情通林太太 王三官中诈求奸	第六十九回：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
第 七 十 回：西门庆工完升级 群僚庭参朱太尉	第 七 十 回：老太监朝房邀酌 两提刑招府庭参
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	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家托梦 朱太尉引奏朝仪
第七十二回：王三官拜西门为义父 应伯爵替李铭解冤	第七十二回：潘金莲抠打如意儿 王三官义拜西门庆
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郁大姐夜唱闹五更	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西门庆新试白绫带
第七十四回：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吴月娘听宣黄氏卷	第七十四回：潘金莲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

第七十五回：春梅毁骂申二姐
玉箫愬言潘金莲

第七十六回：孟玉楼解愠吴月娘
西门庆怒斥温葵轩

第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倚牖盼佳期

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吴月娘玩灯请蓝氏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得病
吴月娘墓生产子

第 八 十 回：陈经济窃玉偷香
李娇儿盗财归院

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倚势
汤来保欺主背恩

第八十二回：潘金莲月下偷期
陈经济画楼双美

第八十三回：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大闹碧霄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第八十五回：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夜卖春梅

第八十六回：孙雪娥唆打陈经济
王婆子售利嫁金莲

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受报
武都头杀嫂祭兄

第八十八回：潘金莲托梦守备府
吴月娘布施募缘僧

第八十九回：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吴月娘误入永福寺

第七十五回：因抱恙玉姐含酸
为护短金莲泼醋

第七十六回：春梅撒娇西门庆
画童哭躲温葵轩

第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带水战情郎

第七十八回：林太太鸳帏再战
如意儿茎露独尝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丧命
吴月娘失偶生儿

第 八 十 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

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
汤来保欺主背恩

第八十二回：陈经济弄一得双
潘金莲热心冷面

第八十三回：同“词话本”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第八十五回：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第八十六回：雪娥唆打陈经济
金莲解渴王潮儿

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

第八十八回：陈经济感旧祭金莲
庞大姐埋尸托张胜

第八十九回：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第九十回：	来旺儿盗拐孙雪娥 雪娥官卖守备府	第九十回：	来旺盗拐孙雪娥 雪娥受辱守备府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衙内怒打玉簪儿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思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第九十二回：	陈经济被陷严州府 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第九十二回：	同“词话本”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仗义赒贫 任道士因财惹祸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义恤贫儿 金道士娈淫少弟
第九十四回：	刘二醉殴陈经济 酒家店雪娥为娼	第九十四回：	大酒楼刘二撒泼 酒家店雪娥为娼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盗假当物 薛嫂巧计说人情	第九十五回：	玳安儿窃玉成婚 吴典恩负心被辱
第九十六回：	春梅游旧家池馆 守备使张胜寻经济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游旧家池馆 杨光彦作当面豺狼
第九十七回：	陈经济守备府用事 薛嫂卖花说姻亲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续鸾胶 真夫妇明谐花烛
第九十八回：	陈经济临清开大店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第九十八回：	陈经济临清逢旧识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怒杀陈经济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陈经济
第一百回：	韩爱姐湖州寻父 普静师荐拔群冤	第一百回：	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

全书一百回，回目完全相同者只有十回。

除了第一回作了情节上的较大调整之外，第十六回，第四十五回等回目亦作了调整。在许多细节上也做了增饰。

三、对回前所引诗词曲作了大量删削修订。

“说散本”与“词话本”回前引首相同者只有两处，一是二十四回，一是三十九回，其余全部作了改动。

这种改动，一是修改了每一回起首的格言和俚俗韵文，如

第四十回，“词话本”为：

善事须好做，无心近不得。

你若做好事，别人分不得。

经卷积如山，无缘看不得。

钱财过壁堆，临危将不得。

灵承好供奉，起来吃不得。

儿孙虽满堂，死来替不得。

“说散本”为：

种就蓝田玉一株，看来的的可人娱。多方珍重好支持，掌中珠。

傞俹漫惊新态变，妖娆偏与旧时殊。相逢一见笑成痴，少人知。

［右调山花子］

另外是修改了与回中内容脱节的引首，如“词话本”二十九回，引首为：

百年秋月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

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二杯酒渡韶华。

闲敲棋子心情乐，闷拨瑶琴兴趣赊。

人事与时俱不管，且将诗酒做生涯。

"说散本"为：

新凉睡起，兰汤试浴郎偷戏。去曾嗔怒，来便生欢喜。

奴道无心，郎道奴如此。情如水。易开难断，若个知生死。

[右调点绛唇]

这样，文人改写的味道就很浓了。

经过文人作家修订之后这个"说散本"，面目大为改观，冲淡了民间说唱气息，删削了繁冗的枝蔓，也省略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使之更加整洁有条理。

9

说 续 书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几乎每一部都有多种续书。续书最多当数《金瓶梅》之后的《红楼梦》，有《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真梦》、《红楼幻梦》、《青楼梦》等洋洋三十几种。

众多续书的出现，一是中国文人“附骥尾”的文化心态的影响，二是书商被刺激起来的钱欲所致。当然，续书中不乏有精彩之作，但狗尾续貂者却为数不少。

《金瓶梅》最早的续书，为《玉娇李》（亦作《玉娇丽》），明万历沈德符《野获编》，曾引袁中郎之语，谓此书亦出自《金瓶梅》作者之手：

> 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即《金瓶梅》——何按）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

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卷首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看来，袁中郎只是听别人讲过有这样一部书（耳剽），但并未亲睹。沈德符是见了的，但也只看了个开头，便觉得“秽黩百端”而弃置不复再展。待到他想看完时，书主人邱工部已到外地去做太守，这部书也不知道流落到何方去了。

可惜的是这部书业已失传，只能从有关文献记载中得知一些基本梗概。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亦可看出，这部同《金瓶梅》并驾齐驱的续书，绝非狗尾续貂之作，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

《绣像平妖全传》（得月楼初刻本）有楚黄张无咎序，称：“《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日用帐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重刻时，他的序中则说：“《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水浒》之亚。”把《玉娇李》同《金瓶梅》、《水浒传》相提并论了。

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中也提到过它。清初宋起凤《稗说》卷三《王弇洲著作》条谈及此书时，说其为钞本，“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颃，惜无厚力致以今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真是不幸而言中。

由于失传，更增加了这部书的神秘色彩。学者们千方百计

去进行多方面的考据。有人论证此书系大名士李开先所著，李开先是山东章邱人，曾被认为系《金瓶梅》作者。香港一学人苏兴先生，把原书的内容居然都推了出来，他写了一篇论文《〈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洋洋二万余言，称这部小说“以武大等转世后的淫滥生活为纲，穿插当时朝臣的倾轧，构成官僚与一般市井人民活动相结合的画卷。”

《玉娇李》佚于何时，已不可考，从明人的记叙中，知其在明末确实是很风行的。清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奏禁的书目中，却不见此书，说明彼时已经失传了。

现在流传下来唯一可以称为正宗续书的，是紫阳道人的《续金瓶梅》。

《续金瓶梅》十二卷，六十四回，题“紫阳道人编”，这位“紫阳道人”，姓丁，名耀亢，字西生，别号丁野鹤，又号木鸡道人，系山东诸城人氏。

关于丁耀亢的生卒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定其生卒年为：约1620～1691；《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则又定其生卒年为约1607～1678；《辞海·文学分册》中是：1599～1699；而叶子振《小说琐谈》中又是1599～1670。

丁耀亢的父亲丁少滨，曾官至侍御，丁耀亢十岁丧父，少负奇才，弱冠为诸生，后为贡生，万历四十五年（1618）左右南走吴会，从董其昌游，并与陈古白、赵凡夫、徐闇公辈联文社。光宗泰昌元年（1620）回到诸城，崇祯元年（1628）冬，在诸城城南五十里之遥的橡槚沟筑舍五楹，名曰“煮石草堂”，与友人在其中饮酒赋诗，“或入城谒先祠，非有大故吊贺不行于

里”（《山居志》）。

崇祯五年（1632）至崇祯六年（1633），丁耀亢与其子玉章专攻时艺，山居其间。有九华老僧明空及新城俞五秀才，俩人皆深于庄老，丁耀亢遂邀而偕隐。

入清后，顺治四年赴北京，由顺天拔贡充当镶白旗教习。顺治十一年，任直隶容城教谕。这老夫子拿出教学生读四书五经的补天手段，经营了这样一部续书。

丁耀亢称：五伦之中，夫妇一伦是最多变故的。“造出了许多冤孽，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慾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

丁耀亢笃信佛教，想借此书来说佛法，所以在每一回的开头都讲一段佛经和《太上感应篇》。

《续金瓶梅》第一回，紧接《金瓶梅》第一百回《韩爱姐湖州寻父，普净师荐拔群冤》，叙写吴月娘抱着四岁的孝哥，在金兵入侵中原时，逃进永福寺避难。吴月娘见到老僧普净，普静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超度众生，传出法旨唤来轮回判官，以大簿所记的未来之事指点群鬼，使西门庆、李瓶儿、潘金莲、春梅、孙雪娥等人，都有了将来的恶报。

小说前半部分，叙述李瓶儿的后事：西门庆来世投胎。到汴京沈越家，名曰金哥；李瓶儿投胎到沈越小舅子袁指挥家，名曰常姐。两人青梅竹马，十分亲密。后来，常姐十三岁时被名妓李师师收养，改名银瓶，以备将来“梳拢着勾搭皇帝。”不久，北宋灭亡，金哥沦为乞丐，银瓶也沦为娼妓，与帮闲小官郑玉卿勾搭，后又嫁与洛阳富户翟员外为妾。但是，两人旧情不断，

被李师师和翟员外发现后，两人星夜出逃，跑到扬州，遇上了富商苗青。苗青因杀过主人，由于用重金买通西门庆，才没吃官司。这时，他已成了贩盐的巨富。郑、苗结为金兰兄弟，郑玉卿又嫖上了娼妓董玉娇，收了苗青一千两银子，把银瓶卖与苗青，银瓶不依，自缢身亡。

后半部分叙述潘金莲、春梅后世之事。

潘金莲投胎到黎指挥家，名曰金桂；春梅投胎到孔千户家，名曰梅玉。金桂嫁刘指挥之子，梅玉许配王千户之子。

不久，金兵入侵，武官皆调往边关，黎指挥任居庸关参将，孔千户任真定府游击。后来，孔游击降了金人，被经略钟道师杀了头、梅玉的母亲改嫁，母女过着贫困的生活。梅玉当了大官挞懒的公子哈木儿之妾，受到原配夫人的虐待，想要自杀，做梦知道自己前生之事，知自己是春梅后身，而哈木儿原配是孙雪娥转世，便看破红尘，长斋念佛了。

金桂嫁的丈夫，是一个穷困的刘瘸子。这刘瘸子，原是陈经济投胎的，因前世造孽，才落了个瘸子的报应。金桂最后也得了痼疾，跟孔梅玉一样，看破红尘，出家去了。

《续金瓶梅》虽以因果报应作说教，但依旧有不少导欲宣淫的猥亵的描写。作者说："写得淫秽，叫人肉麻，才露出病根。"西湖钓叟在《续金瓶梅序》里也说："果因禅宗，寓言亵媟……而其旨一归之劝世。"这也是明末小说家常用的"以淫戒淫"的借口。

尽管作者称写此书目的，是遵奉顺治皇帝的意旨，宣传"太上感应篇"，劝戒世人，但还是遭到了焚禁。虽然罪名是淫书，但其中也有禁书者不便明言的"罪名"，即作者在书中用大

量的笔墨描述了金人入侵中原后烧杀抢掠的罪行。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说："其中叙金人南行的行动与汉人受苦之状，颇似作者像在描写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却足以动人。"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丁耀亢携家逃往一个海中小岛上，以避兵祸。此时清兵攻破诸城，丁耀亢之胞弟耀心，侄大谷，皆殉难。"长兄虹野，父子皆被创"（《乱后忍辱叹》。）《续金瓶梅》有着很明显的反对异族入侵的思想内容，如第三十四回，写汉奸刘豫"原是无耻的小人，见金兀术兵到济南，开门迎降，即时剃头垂辫，学起番语来。"同回中还有一首诗：

破船渡海不同心，宋失中原反为金。
自古舟中多敌国，一家人害一家人。

这些内容，在后来的坊刻本中，因避文字狱之祸，全被删去了。

另外，作者在"说佛、说道、说理学"中，夹杂着对清朝统治者的影射和反清的民族意识，这是《续金瓶梅》的精华之所在。

《续金瓶梅》成书于何时，学者多有争议，或大略地讲作于顺治年间，或考定为丁耀亢在顺治十八年(1662)六十三岁时所作。

丁耀亢的长子丁慎行，在《乞言小引》中的一段文字，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丁耀亢)由容城广文除惠安令，旋以疾致仕。历闽越诸名胜，纵笔成野史，聊消旅况，又坐触宵系狱。"（见丁耀亢《听山亭草》）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丁耀亢由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随即带病赴任，在赴官途中，遍游了闽越名胜，此期间，为消解旅途寂寞，纵笔成野史，完成了《续金瓶梅》这部书。

丁耀亢“由容城广文除惠安令”，时在顺治十六年（1659）“已亥十月，捧檄而往”（丁耀亢《归山草自述年谱以代挽歌》），由容城南下。顺治十七年，新年伊始，抵杭州，作过一段短暂的逗留。与当时的一些名士，如李渔（笠翁）、宋琬等都有交往。至同年秋天，他仍因病未动身。这期间，大约有七八个月。《续金瓶梅》的成书，便在丁耀亢滞留杭州的这段时间。

顺治十八年（1661），丁耀亢回到故乡诸城，康熙四年（1665）因《续金瓶梅》罹祸，八月被下狱，至冬得放，坐牢一百二十多天。结果是“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归山草·焚书》）。人被赦免出狱，书却遭到焚毁。

关于丁耀亢为《金瓶梅》作续书，民间有许多传说，其一谓丁耀亢进京应试时，答卷字字珠玑。皇帝看后，叹曰：“中了诸城丁野鹤，天下文墨数不着。”担心丁耀亢考中后，会看不起天下所有的文人，遂不取。丁耀亢很气愤，回家后，便写了这部书，来骂皇上。此书横竖读之皆能成文，竖读为一炙脍人口的小说，横读则恶语骂清。皇帝知道了，下令逮捕丁耀亢并抄其家。丁耀亢的老师叫张青霞，早已预知丁耀亢此生必有大难，故而在分手时给了他一个小铁盒儿，嘱咐他说：“若是你遇到大灾大难，再打开它。”所以，丁耀亢闻知皇上因他写了一部《续金瓶梅》而下令抓他，便打开了铁盒儿，只见里边有几枚银针，一包石灰。丁耀亢一看，便明白了老师的用意，遂用银针刺瞎了双眼，然后再用石灰揉搓，便彻底双目失明了。等前来抄家

的钦差大臣赶到，见他是一个盲人，便没有逮捕他，只抄了他的家，率兵而回，丁耀亢得以保全了性命。

丁耀亢是一位著述等身的作家。除了《续金瓶梅》外，他的作品尚有诗集《逍遥游》、《陆舫诗草》、《漆园草》、《椒丘诗》、《江干草》、《归山草》、《听山亭草》、《向天亭放言》以及《丁野鹤先生诗词稿》，传奇剧本《化人游》、《赤松游》、《西湖扇》、《表忠记》、《非非梦》、《星汉槎》，并有《出劫纪略》、《家政须知》、《增删补〈易〉》、《天史十案》、《天史管见放言》、《天史集古》等。

同时，他还是一位有名的画家，以画竹见长，与诸城的另一位善于画雁的画家张石民并称双绝，民间有"丁耀亢的竹子张石民的雁"之谓。

《续金瓶梅》问世后不久，又有《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简称《隔帘花影》）一书出现。

《隔帘花影》三十八回，为《续金瓶梅》的改写本，不题撰人名字，书首有"四桥居士"所作序言。这位四桥居士，曾评点过《快心篇》并写序，由此推知，此书大约产生于清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谓："当即作者……殆是康熙后书肆所为，"而平步青则认为是清初大诗人吴伟业所作。（《霞外攟屑》）

与《续金瓶梅》进行对照，可见《隔帘花影》有以下删改之处：

一是把《续金瓶梅》中封建迷信最浓重的八回内容全部删除，还把每回开始部分的封建迷信说教也删了；二是改动了某

些情节和人物，如西门庆改名叫南宫吉，吴月娘改名楚云娘，潘金莲改名叫红绣鞋。还改变了吴月娘母子、李银瓶、孔梅玉、黎金桂等人的故事过于散碎的状况。这样，把错杂的情节进行条理。三是对一些淫秽描写略有删节。

但《隔帘花影》同时也删去了金兵大军屠城、宋徽宗被掳，张邦昌称帝、宗泽收复东京、韩世宗败金兀术、洪皓哭徽宗、秦桧通挞懒这些故事情节。把金主帅之子哈木尔改成汉族福建将军金静庵之子金坚，使之由异族通婚问题变为贫富婚姻问题。

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提及此书，说作者如此改动是"为隔一字读之成文，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其门下士恐有明眼人识破，为子孙祸，颠倒删改之，遂不可读，但成一小说耳。"

其实这样一改，原书的思想倾向和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均受到了破坏。尽管如此，《隔帘花影》亦未逃脱被禁焚的命运。

到了民初，有"梦笔生"参照《隔帘花影》，对《续金瓶梅》再作删改，编成六十回，接近《续金瓶梅》的原貌，题名为《金屋梦》，并冠之以"醒世小说"的头衔。

《金屋梦》序称此书为旧钞本，实际上是清末民初的书商所为。

这个本子将《隔帘花影》删掉的一些情节和人物恢复了原貌，但文字和情节都比较粗糙。因为续书的作者与原作者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差异、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变迁，都使其与原作难以息息相通。这也是为什么续书总是吃力不讨好的原因之所在了。

代人立言难，代天才立言更难，代文学天才立言难之又难。

当然，续书的作者也总是希望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当世的时代精神，领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把握原作者创作时的具体体验，但往往是事倍而功半，至多会给原作增添一册摹本而已。

《金屋梦》原由莺花杂志社印行，近年来齐鲁书社亦将其挖掘再版，这毕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金瓶梅》的异流

《金瓶梅》虽屡遭禁焚，但自清季以来，异流纷呈，略举几种：

玉 瓶 梅

全称《绣像第六奇书玉瓶梅》。吴兴于茹川著，光绪二十二年石印袖珍本。其作者自序云："余于壬辰（光绪十八年）秋，偶有客来，谈及善书……客曰：……今请君作奇书《玉瓶梅》，其文只取消淡如白话者，使愚人亦得易为善。"

由此可知，作者试图作一部"善书"，一部"奇书"，同时又是一部人人都能懂的书。

《玉瓶梅》全书共十回，每回独立成篇，类似评话。但第四、七、八、九回均为《聊斋》式笔记小说，其内容颇多糟粕。如第一回写一夫人与人通奸，奸夫遗衣在床，为本夫发觉，奸夫奸妇即共同杀死本夫，案发立斩。第七回末节讲的是童子陈璋

遇一美人，但遭其父责骂，陈遂装病，后与美人成其夫妇，短短几百字，实不堪读。

其余回目，多系拼凑，在内容上与《金瓶梅》风马牛不相及，只是从《金瓶梅》引进了书名。作者附庸风雅，标新立异，竟以"第六奇书"称之，实是好笑。此书现已绝少为人知道。

也有狄岸散人编《平山冷燕》共二十回，描述才子平如衡和才女山黛、淑女冷绛雪及书生燕白颔的爱情故事，并仿《金瓶梅》摘取四人姓氏为书名，亦为效颦之作。

戏曲《金瓶梅》

清人郑小白编剧。

郑小白，籍贯生平无考，有人疑为郑少白。清俞蛟《梦厂杂著》(道光八年）有《郑少白传》。

郑小白根据《金瓶梅词话》改编的这出戏，共两卷三十四折，以西门庆，潘金莲为关目，中间插入张清、琼英及田虎的故事。该剧于刻画人物性格和组织情节上颇见功力。如二卷第十出《义朋邀会》中应伯爵和谢希大的一段自白：

副净扮应伯爵巾服上，

【翠地锦裆】 苏鞋净袜串街头，满口胡柴滑似油，帮闲画就忝风流，终日酕醄花里游。

(白） 区区应伯爵是也。开口带胡嘲谑，正经没分毫，习惯成轻薄，好做大老官，宿娼与赌博。祖业绸缎行，不是供挥霍。生意即凋零，手中渐消索。头

家翻面皮，老鸨情犹恶。把我推出门，一身竟流落。讨吃已无路，妻儿有谁托。亏得回头快，帮闲忙着脚。扶头陪早饭，东道叼夜桌。大号不虚传，到处称伯爵……

（下，净扮谢希大巾服上）

【前腔】　西瓜帽子称猴头，一撮胡须夹嘴兜，趋承心性最搂搜，伯爵跟前输一筹。

（白）　小子谢希大，浑身是刁诈，东舍绰秋头，西家攘皮话。流荡下稍头，那管被人骂，哄骗作生涯，天雷也不怕……

这两卷剧本，上卷前半卷，下卷后半卷钞本为长乐郑氏藏；上卷后半卷、下卷前半卷钞本为大兴傅氏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2月影印《古本戏曲丛刊》三集第十一函载有全剧。

《绣像金瓶梅》

全名《雅调南词秘本绣像金瓶梅》，道光壬午（1822）年刊刻，序言作者是曾给《麒麟豹》和《十五贯》作过序的“废闲主人”。但这篇序却是原封不动抄的谢颐第一奇书中的文章。

本书十五卷一百回，系用官话写就的长篇弹词。第一回开篇是唐诗唱句《窥浴》：“夏日炎炎日正长，薰风吹遍芰荷香。绿荫深处鱼杆隐，画舫游人纳晚凉。穿曲径、绕羊肠，细步行来的美貌郎。恋情人要把佳期赴，潜入花园向绣阁张。但只见，绿棂概开纱窗扇，鼻息微闻安息香。睁眼隙中观仔细，却原来，佳人正在浴兰汤……”

正文接下去便是《第一奇书》的摘要了。

这部弹词，从《第一奇书》中每回各自选择了二至三个主要情节，将每一事件组成一回而逐回进展。这样，《第一奇书》的三十八回，在这本书中就到了七十九回。虽然大体上以同样的内容叙述，但三十九回以后的情节就是跳跃性的了。

《绣像金瓶梅》以武松杀死潘金莲，血祭其兄武大郎而告终结。

《富贵图》

阿英《小说搜奇录》记：

> 曩昔闻绍兴有《乌龙院》弹词残册，前去访求，已为主人弃去，不无怅怅。苏州东大街来青阁老店，在二楼上再搭一搁楼，满贮藏书。去年征得主人同意，曾数数翻检，所得罕见残本不少，《富贵图》即其一也。

《富贵图》，是《金瓶梅》的弹词唱本，阿英先生见到的该书，系残存的一册乾隆巾箱本，题《东调古本金瓶梅》，收四集卷十一至十四。因此阿英推论，每集当为四册，全书至少有十集四十册。

每卷卷首有题词四句，具说内容。如十一回写西门庆恋着李瓶儿，当时因杨戬被劾一事，杜门不敢出，瓶儿着急，让冯妈妈去打探：

郎有心来女有心，哪知好事未能成。

大张晓谕拿奸党，吓煞西门落了魂。

铺叙则完全依照《金瓶梅》说部，笔力殊不弱，也删除了一些淫秽的描写。

《奇 酸 记》

《奇酸记》系根据《金瓶梅》部分章节改编的戏曲，全剧分四折，每折六出，共二十四出。每一折的题目分别是：《梵僧现世修灵药》、《内相呈身启秘图》、《薛尼种子造奇方》、《禅师出山超孽业》。

画舫中人撰《奇酸记传奇凡例》，略云：

一、传奇之次，元人为折、明人为出，折长出短，故折可概出。是记分为四折，每次六出合为一折；四折二十有四出成为一本。

一、故事悉从原书。惟明者隐之，隐者明之，而金瓶梅三人结束，概从原书，以存其真。

一、南北曲调遵九宫大成，文词均用原书中语，其中字有舛讹，如女真国，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之类，原书外不自造语。

一、科白用原书中语，归于中原音韵，虽有呼吸方语之病，而自成原书一家之义。

一、每出诗句，概集原书，故于楔子注明，下不

重注。

一、脚色以副末开场，左右以生旦为主。左以小生、大净、老外、副净、小丑为辅，右以老旦、正旦、小旦、贴旦、花旦为辅。以大净为开端，以老外为收局，馀俱以杂概之。

一、古者当场之妓有四：曰狚、曰靓、曰鸨、曰猱，则即明院本之正旦、老旦、小旦、贴旦也，后增花旦以代古之引戏，不知古之引戏印所谓狚者是。花旦一色，已失古制。后又分旦为一门，曰闺门旦，而正旦次之，是又于古之狚、靓、鸨、猱引戏之外，又增一色。浸以成俗，失古更远，是书则从今俗……

芦樵山长所撰《奇酸记传奇跋》中说："从来人有难言之痛，遂至戴天衔不共之悲。昔人鉴尽孝之性真，极其难而名以苦。今人体含酸之况味，尝之备而该以奇。笔阵纵横，思抽一一，文心变幻，想入非非。前贤应畏后生，休夸蓝本；旧事忽翻新曲，最喜白描……原夫《金瓶梅》之作也，韵语伤风，拔舌已追难四马；威权蔽日，炙手之势挟六龙。颈血模糊，意向梗断，心机险阻，终属株连。"

又云："是书也，采张竹坡之批评，补王凤洲之野史，孝为阴德，恒伏于无字句之中；酸视春时，尽发于有色之地。高僧古佛，皆知味之人，狗党狐朋，尽乞怜之辈。世上谁非酸裹，人中悉是醯鸡。总搜罗以供驱策，且打叠而入排场。鼎沸笙歌，悲由乐起；云屯冠盖，凉自炎生。酸随过而即呈，奇因酸而毕露。试为设身以处，有心人能不攒眉。何殊染指而尝，人口者因之

擁鼻。极内相达官之富贵，都是酸丁。终道君教主之江山，终归酸子。爰以心源之印合，极此意匠之经营。看四折之平分，每六出之递演，现身则法从此说，贾毒则祸实自招……”（乾隆乙卯年刊《奇酸记》传奇卷首）

编剧画舫中人，名李斗，字艾塘，清江苏仪征人。晚年以疾，食防风而愈，名所居曰“防风馆”。有《防风馆诗》、《艾塘乐府》，《扬州画舫录》及传奇《奇酸记》、《岁星记》等。

《不垂别泪》

无名氏撰，弹词，共四回，又名《遣春梅》。根据《金瓶梅》第八十五回《吴月娘识破奸情，春梅姐不垂别泪》情节改编而成。语言清丽可赏，如：

“从古来，千日筵席千日散；又只是，一番拆洗一番新。旱苗儿雨透生枝叶，船只儿风顺走江心。我劝你，且自安心睄日后，切不可，只将俗眼定终身。你看那，黄河尚有澄清日，岂有人无得志辰？”

又如春梅对潘金莲说的一番话：“人生总是一场梦，世事犹如几片云。聚来了，水面浮萍攓密密；散将去，风前弱柳乱纷纷。眼前聚散原无定，尽可以，一笔勾消莫理论。”

这篇弹词写得是庞春梅被吴月娘逐出，卖与周守备为妾，为周守备生下一子，扶为正室，回西门府游旧家池馆之事。该曲流传不多，有乾隆间文萃堂刻本。

人，与“兰陵笑笑生”的地域标准契合。

4. 赵南星：（1550～1627）河北高邑人，字梦白，号清都散客，万历二年进士，曾官至吏部尚书，广有时名。执赵南星说者亦为宫伟镠，同见于上书，但并未有考证根据。

5. 李卓吾（1527～1602）：即李贽，卓吾为之号，字宏甫，又号温陵居士等，福建晋江人，举人。曾官南刑部员外郎，姚安知府等。为明代重要文学家和哲学家，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说，主张重视功利，对封建传统教条和伪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迫害而死。曾评点《水浒传》，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行世。

执李贽为《金瓶梅》之说者为清代王昙，他在《金瓶梅考证》中提出：“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似乎他自己并不十分相信这一推断。

6.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其父王忬为严嵩所害，曾作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太保歌》等，揭露严氏父子罪恶。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著述颇丰，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较早提出“王世贞说”的有清代宋起凤、顾公燮、李慈铭、梁章钜等人，主要依据是《清明上河图》的传说。吴晗先生1931年发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1934年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二文，廓清了诸说设置的迷雾，并从大量内证入手，考证该书成书年代在万历中期，而王世贞于万历十八年已逝世，故此说不能成立。鲁迅、郑振铎也

《得钞傲妻》

子弟书，二回。韩小窗著。韩小窗事迹生平无考，仅知其为满族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子弟书大作家。此作取材于《金瓶梅》第五十六回上半回《西门庆周济常峙节》，曲演常峙节因贫向西门庆贷银后而傲视妻儿的故事，世态人情摹写得非常深刻。第一回开篇即云：

“不经爱富嫌贫事，怎长争名夺利心。英雄气短，是钱财的气短；夫妻情深，是柴米的情深。”

第二回开篇曰：

“那是冤家怎是恩，人面高低总为银。冷语催残怀恶妇，热心周济感西门。去时节，寒烟晓月眉头儿蹙；喜归来，暖日清风面目新。都只为，怀内揣雪银数两，常峙节，前后就如同两个人。”

此曲第一回，写常峙节困苦之时，受妻子百般奚落，第二回借银回家，妻子又百般献媚。

《续钞借银》

韩小窗著。此作原为《得钞傲妻》续篇来写，但其取材自《金瓶梅》第五十六回：《西门庆周济常峙节，应伯爵举荐水秀才》情节，应在《得钞傲妻》的一二回之间，实际上并非续篇。

此作二回，第一回一百零二句，开篇曰：“世态炎凉最警人，闲将笔墨点迷魂。趋炎须尽逢迎态，附势岂无谄佞心！友义朋

情浑似假，夫恩妻爱也非真。无端冒昧把前文续，欲写出，猫鼠同眠一类人。”接下来写常峙节为借银先去求应伯爵。第二回一百一十句，开篇曰：“莫怪人生偏爱银，开门七事靠何人？只因柴米夫妻事，费尽交游市井心。满眼悽惶非泪浅，一番趋奉见情深。凭谁指点炎凉态，试看得银这段文。”下面写应伯爵和常峙节从西门府里借到银子后，应伯爵如何索要“抽头儿”，以及常峙节得银归家时的喜悦心情。

《永福寺》

无名氏撰，四回子弟书。根据《金瓶梅》第八十九回《清明节寡妇上新坟，永福寺夫人逢故主》的情节改编而成。第一回开篇曰：

“繁华转眼一场空，成败兴亡似梦同。适见名花迎晓日，忽看落叶舞秋风。此日凄凉悲水逝，当年声势映天红。早知道，循环道理都如此，使什么心机，逞什么英雄。”

第二回开篇曰：

“丈夫无志最堪惭，有志娥眉胜过男。青衣队内偏拔萃，红粉群中独占先。当日沉埋香闺里，今朝吐气画堂前。劝世人，放开眼界从长看，莫将这，一时贵贱就定愚贤。”

第三回开篇曰：

“故主相逢情意深，感旧伤今最断魂。说不了别离凄凉事，诉不尽从前挂念心。几阵松风惊昨梦，一声幽磬醒前因。世间多少兴衰败，只到了佛地虚空，都化做尘。”

第四回开篇曰：

“从来儿女最情长，幽冥路隔渺茫茫。青冢有灵娘怜我，红颜无命我怜娘。伴香阁，如形不离影；哭墓门，地老又天荒。世间惟有情难尽，就到了万劫千轮永不忘。”

此书《子弟书目录》著录，注曰“李瓶上坟遇春梅。《遣梅》以后，《池馆》以前，四回。一吊六。”傅惜华先生藏有旧抄本。

《旧院池馆》

原名《春梅游旧家池馆》，一名《春梅游旧院》，三回（后改分四回），据《金瓶梅》第九十六回《春梅姐游旧家池馆》前半回改编。说的是庞春梅嫁与周守备之后，由妾做了正室夫人，重返西门家园，探访故主的故事。抒景写情，清新婉约，为子弟书中之杰作。如写吴月娘等人陪春梅来到花园，看到一片凄凉景象：

“艳秾秾的夭桃郁李全干死，娇滴滴的细草鲜花无一存，一枝枝芍药凋残堆败叶，一丛丛牡丹憔悴剩枯根。韵萧萧翠竹飘零丹凤足，碧森森苍松退却了老龙鳞。冷凄凄庭前红叶无人扫，空落落三径黄花何处存？细条条兰蕙离披无气色，娇怯怯梅花冷落少精神。乱蓬蓬杨柳心空横岸上，干叉叉梧桐根朽卧墙阴。扑拉拉乌鸦展翅惊人起，当啷啷铁马摇风入耳频。凄凉凉庭院经年无熟客，静悄悄楼台终日锁寒云。又见那，满地花砖堆粪土；又见那，几条香径长苔纹；又见那，颓垣坏壁东西倒，又见那，野蔓枯藤上下分；又见那，纱橱暗淡灰都满，又见那，匾对模糊看不真；又见那，回廊的画壁经风坏；又见那，夹道的

雕栏被雨淋。卧云亭狐狸出没真凄惨，大卷棚鸟雀成群可叹人。荼蘼架霜寒雪冷无花朵，太湖石土没苔封卧水滨。玩花楼辜服了良宵与丽景，鞦韆院消磨了月夜与花辰。翡翠轩游蜂穿碎了窗棂纸，藏春坞鼠子钻通了山洞门。亭儿里鹿儿也死鹤儿也去，池儿里藕儿也烂鱼儿也沉。门儿外帘儿也收钩儿也落，镜儿边人儿也散影儿也昏。炉儿里香儿也尽灰儿也冷，琴儿上弦儿也断声儿也闷。窗儿前槛儿也折风儿也透，地儿下苔儿也厚土儿也屯。春梅姐对景伤怀人肠欲断，不由得思前想后泪沾襟，一步步徘徊四顾频回首，一处处张望凝眸暗痛心。也不顾金钗轻惹竹枝儿挂，也不顾云鬓斜搭松刺儿针。也不顾冰碴湿透了凌波袜，也不顾泥点沾污了锦绣裙。独自个拈花问柳情无限，围随着奶母丫环人一群。呆呆呆斜倚栏杆一声长叹，说道是：这番光景好伤心。"

原本系傅惜华先生藏，为乾隆间文萃堂刻本。

另外，《金瓶梅》被改编成子弟书尚有：

《葡萄架》，无名氏著，全一回，《中国俗曲总目稿》、《曲艺论丛》、《子弟书总目》著录。

《挑帘定计》，无名氏著，全一回，《曲艺论丛》著录。

《升官图》，无名氏著，全一回。百本张《子弟书目录》著录标作《满汉兼升官图》，别埜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均著录。

《哭官哥儿》，韩小窗著，钞本四回。《子弟书总目》、《曲艺论丛》著录。

《王婆说计》，清·鹤侣著，全一回。傅惜华先生藏清钞本。

被改编为俗曲的作品有：

《戏叔》，无名氏著，全贯串。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钞本。

《挑帘裁衣》无名氏著，牌子曲。

《开吊杀嫂》，无名氏著，牌子曲。《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

《潘金莲晒衣》，无名氏著，新下河调。《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

《潘金莲拾麦子》，无名氏著，《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

《金莲调叔》，无名氏著，《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

《武松杀嫂》，无名氏著，《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

《武大郎上坟》，无名氏著，《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有北京宝文堂刻本。

《潘氏金莲》，无名氏著，载《霓裳续谱》。

《潘氏挑帘》，无名氏著，四川月调，作家出版社 1957 年 7 月版胡度编《清音曲词选》选录。

《常时节》，无名氏著，皮黄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旧钞本。

被改编成戏剧则是五四以来的事。有以下几种：

《磨镜》，一幕剧。杨晦编剧，原载《沈钟》第 6 号，1926 年 6 月。

《武大郎之死》全二十五场，京剧。王一达编剧，载上海杂志出版社出版《大众戏曲丛书》第 11 种，1951 年 8 月初版，1953 年第 2 版。

《潘金莲》，京剧。欧阳予倩编剧，载《新月》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28 年。

将《金瓶梅》改编成现代小说的作品，有台湾南宫博的

《潘金莲》，有北京韩英珊的《金瓶梅故事》，河北郭戈的《金瓶梅传奇》，河北张凤洪的《金瓶梅传》等。

另外，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曾编导《金瓶梅三部曲》，即《金瓶双艳》、《武松》和《蕙莲》。

李翰祥十二三岁就偷读过禁书《金瓶梅》，后来，又在国内购得多种珍贵版本，读之赏之，极具心得。由他编导的《金瓶梅三部曲》，角度各异，颇具特色。因另有专章，此不赘述。


EXLIBRIS
金瓶梅天下第一奇書

11

早知不入时人眼　多买胭脂画牡丹？

——明人评《金瓶梅》

《金瓶梅》产生于明中后叶。明末人论《金瓶梅》，是当代人的时评，当会比我们更早地接近文本。虽然一些观点有所因袭，但让我们更直接地看到此书在当世的影响。

明人对《金瓶梅》所发的议论，主要来自最先看到此书手抄本、或为之写序跋的几个人，如袁中郎、袁小修、袁伯修三兄弟，沈德符、谢肇淛、李日华、冯梦龙、李贽（他曾被认为是《金瓶梅》的作者之一）以及欣欣子、东吴弄珠客、廿公等等。

他们大多是与当时传统的拟古主义对抗，追求表现个性自由的文人。

东吴弄珠客、欣欣子、廿公，系化名，同笑笑生一样，后人对他们的孰谁也有诸多猜测，我们姑且不做考证。

袁中郎（名宏道，号石公）、袁小修（名中道）、袁伯修（名宗道）这三兄弟，并称“三袁”，都是万历进士，亦同以

"公安派"著称（三兄弟系湖北公安县人）。袁小修官南京吏部郎中，有《珂雪斋集》行世；袁中郎官吏部郎中，在三袁中数他的成就和名气最大。他早年受李贽思想影响较深，诗文多抒写性灵，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著作有《袁中郎全集》。袁伯修则是白居易和苏轼的推崇者，他的著作也因此名《白苏斋集》。

沈德符是万历时举人，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他精音律，熟谙掌故，所撰《野获编》中，保存了许多戏曲、小说资料。

谢肇淛，福建长乐人。字在杭，也是万历进士。官广西右布政使，熟悉河流水利，曾作《北河纪略》。笔记《五杂俎》，多记掌故风物。他还有一部著作名《文海披沙》，以文学家之名传于后世。

李日华，是浙江嘉兴人，沈德符的同乡。字君士，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能书画，所著《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等，笔调清隽，极富小品意致（注意，还有一个同时代的李日华，系剧作家，乃江苏吴江人，以《南西厢》名世，彼李日华非此李日华也）。

至于冯梦龙、李贽，更是明代文学大家。李贽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形成影响颇为深远。

他们代表着明代文学涌现出的新的潮流，所以，《金瓶梅》首先为这些新派文人所注意，也就理所当然了。

袁小修最先是从画家董思白那里知道的《金瓶梅》这部书，他有笔记记载：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

董思白，即董其昌。袁小修看到这书的半部，是从他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赋闲的哥哥那里。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六——二十七年，辞官移居彼处，与董其昌结下友谊。袁中郎曾从董其昌处借了《金瓶梅》抄本的半部来读，他是极赞这半部《金瓶梅》的了。看过意犹未尽，想“掉换”后半部。并把其同西汉辞赋家枚乘（即枚生）的《七发》相比。按：《七发》系汉代大赋之前躯，文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探问，向他叙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七件事，故曰“七发”。指出腐朽生活的弊害，终使太子感动，出了一身大汗，病也立即好了。袁中郎说《金瓶梅》这部书，实在要比《七发》好得多，大概是《七发》只偏重讲大道理，而《金瓶梅》却敢于把一个社会的面具撕下来让人看。

此后袁中郎一直对《金瓶梅》兴趣不减，据袁小修的文章所记，他离开吴县时带走了这半部《金瓶梅》。十年之后，他写《觞政》，又一次推崇这部书，将其与《水浒》一起作为小说中的逸品来推奖。沈德符《野获编》记之甚详尽：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袁中郎终未见过全本的《金瓶梅》。但仅看了这片断，他便喜不自胜，“亟称之。”

在袁中郎家看了这半部书的袁小修，观点却与他哥哥大相径庭。他认为：“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多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便是借给袁中郎这半部《金瓶梅》的画家董思白，也称其书：“决当焚之。”两者态度之鲜明，语气之决绝，结论之迥然，可见一斑。

沈德符也觉得，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刊刻于世是大逆不道的。彼时，在若干罪大恶极之事中，传播一部淫书，要犯“百罪”，即使死了，阎王老子也断然不会放过的。

冯犹龙，即大文学家冯梦龙。犹龙是其字，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他曾被认为是为《金瓶梅》作序的“东吴弄珠客”。四十年代姚灵犀先生曾执此说，见其所著《金瓶小札》。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也赞同这一说法，并有专文作过深文周纳的辩究，认为冯梦龙是《金瓶梅》的最初刊刻者。

李日华则认为，袁中郎称赞《金瓶梅》只不过是由于他这人本性好奇而已：

>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正月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沈德符字）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浑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李贽一向主张创作须抒己见，并重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他评点过《水浒》，也称赞过《金瓶梅》，这从时人徐谦的笔记《桂宫梯》中可以看出。然而这位徐谦，却是一个顽固的“淫书论”者，他说：

> 李卓吾（李贽字）极赞《西厢》、《水浒》、《金瓶梅》为天下奇书。不知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甚矣。有聚此等书，看此等书，传费此等书者，罪与造卖者同科。

然而，在谢肇淛、弄珠客、欣欣子的笔下，却是丝毫得不出它是一部淫书的结论。

谢肇淛曾抄录过《金瓶梅》，对这部“以刻毒之笔出之”，“血透纸背而成”的奇书对艺术的贡献，他的论述最为全面透辟，他为《金瓶梅》所写的跋，是今日所知评论《金瓶梅》最早的专论：

>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轮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奉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骇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

也。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卷，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

以上文字，很精炼地概括了《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指出它全部的内容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的。欣欣子的《序》中，也指出它"寄意于时俗"的命题立论。

明人的评论，立论角度和观点各有不同，对于一部充满矛盾的、思想内容极其复杂的作品来讲，不同的人生观、道德观和艺术观，不同的着眼点和方式方法，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殊属正常。即使再过四个世纪，也许还会这样。

笑笑生对他自己这部书的命运是再清楚不过的。欣欣子解读《金瓶梅》时，揣度作者的意愿说：

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即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拔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

笑笑生也许从一开始就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领悟他的这一番苦心。

"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然而，他宁愿把一盆浓浓的墨汁泼在纸上，也不愿为粉饰这鬼蜮世界涂一点胭脂。

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这部奇书魅力永恒之所在。

为了捍卫艺术的本真，他宁可坠入阿鼻地狱。

12

为谁翻看“风月鉴”

——性描写与时代背景

《金瓶梅》是在它那个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

明中晚期，是中国从中古向近代递进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万历以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那个在欧洲已经发生，迟早也会在中国出现的早期资本主义因素，也终于萌芽。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已见大端。封建社会成全面崩溃之末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不仅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被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礼法堤防的崩溃，带来了整个社会风尚的畸变，即由禁欲主义的极端滑向了纵欲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那是个无处不在溃烂的时代。

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代皇帝的滥淫便代不乏人，实属空前而不绝后。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亦因献房中行乐秘方而获骤贵。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

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位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以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卷二十一《进药》条）

明代的皇帝之中，武宗的淫纵是最有名的。他十五岁登极做皇帝，不干什么正经事，却对经商特别感兴趣。不但于京师大开皇店，而且还经常穿着商人的行头，到市中贸易找乐子，或者到廊下家等中官卖酒的铺子里去游逛，于管弦嘈嘈的酒肆上“坐当垆妇于其中，杂出牵衣，蠢簇而入，濩茶之倾，周历诸家。”“且实宫人于勾栏，扮演侑酒，醉则宿其处，如是累日。”（《明武宗外纪》）

武宗登极之后的第二年，就大兴土木，筑“豹房”，日召乐工入“新宅”承应。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是色目人，善阴道秘术，遂召入“豹房”，与语大悦。于永说色目女皙润瑳粲，大胜中土，时都督吕佐亦色目人，永矫旨索佐家善西域歌舞之色目女十二人以进，歌舞达昼夜。然犹不足，凡诸侯伯家有色目籍的妇女，悉数召入，驾言教舞，而择其面目姣好者留之，不令出。后来又要于永的女儿，于永饰邻居白回回女儿冒名顶替，深得武宗喜欢。然而于永怕有朝一日事发，便推风痹辞职。

武宗好游幸，凡车驾所至，必先使近侍掠良家女以充幸御。出巡宣府，每昏夜出游，遇高房大屋，便撞入人家，或索饮，或搜其妇女，居民苦不堪言。以至市肆肃然，白昼闭户，像瘟神降临一般。

他驻跸大同，掠妇女数十车于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闻。他到扬州巡幸，让太监吴经去打前站，选民居豪华者改为提督府，以便驻跸。吴经大索其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儿的人家，赶忙去拉寡男，拉着了就将女儿匆匆配给他。一夜功夫，全城的少女都在这“拉郎配”的闹剧中成了有夫之妇。有的乘着夜黑跳墙出奔，知府蒋瑔去求情，吴经大怒说：“汝小官敢尔，汝头不愁去颈也？”

吴经搜寻不到少女，便记清了寡妇和娼优家门户。夜半遣数骑促开城，传呼驾至，令通衢燃烛光如昼，吴经率官校径入所知之家，掠掳妇女。有藏匿的，则破垣毁屋，搜得乃已。寡妇无一幸免，哭声震远近。后又把这些女人分寄尼寺，有愤恚绝食而死的，便随意弃置。

武宗的荒淫，同隋炀帝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宗、穆宗衣钵相承，比武宗尤甚。方士陶仲文，因献红铅而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都御史盛锡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借具“秋石方”致大位。可见这个社会荒唐到什么地步。由于淫佚无度，穆宗皇帝朱载垕死时才三十六岁。

神宗朱翊钧，专蓄男宠。且后宫荒淫，分列“春夏秋冬”四季名目——春天之滥淫自不必说，夏日，明月高悬之夜，与后宫戏，令人自轻罗制成之绣囊中，放出流萤无数，再令宫女以

轻罗团扇争相扑捉，若流萤落在哪一个宫女鬓上，则是夜帝幸之。因此，宫女争以香水洒于鬓上，以吸引流萤光顾；秋天，神宗题唐朝王建宫词前二句于红叶上，令宫女题该词后二句于另一片红叶，一起放入御沟，若遇两片红叶相叠，则令人取起观看，如成全首宫词，则书后二句之宫女，获帝是夜宠幸；冬天，在洛殿大池注满香汤，选柔肌雪肤宫女同池洗浴，谓之"鸳鸯之会"。

神宗专宠郑妃，三十年不临政，不建储。幸御嫔妃尚嫌无味，即"选重譬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与之"同卧起"，内庭皆目为十俊。（《万历野获编》）

从万历八年开始，张居正、万象春、邹元标等相继进疏，请神宗"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起居以时，嗜欲以节。"

神宗尽管因纵欲失度而体力不支，动火头眩，但却依然如故，万历十一年三月，他一日而娶九嫔，演出了一幕荒唐绝伦的闹剧。

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疏《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箴以献，直攻神宗之失，略曰：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以惟闻圣体违和，一切免传。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矣。

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倖门，溺郑

妃，靡言不听。忠谋摈弃，储位九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至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绌不申，赐环无日，此病在气也。

四者之病，膠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钟鼓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

雒于仁疏入，捅到了万历皇帝的心病，神宗大怒，骂雒于仁"出位沽名"，逼着雒于仁引疾去任。

《金瓶梅》中有个人物——山东两司八府中的右布政陈四箴，显然是影射这一史实而设计的。

万历一朝所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无一不是神宗好色的直接结果。

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纵淫无度，不理朝政，当朝宰相亦联袂狎妓，守土官吏随便宿娼更是常事，使整个晚明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福建省税监、中官高宷，听信方士胡言乱语："生取童男女脑髓和药饵之，则阳道复生，能御女种子。"这阉人淫兴勃发，令人多买童稚，碎颅刳脑。"贫困之家，每割爱以售。恶少年至以药迷人稚子，因而就宷，幸博多金者。税署池中，白

骨齿齿。嗣买少数妇人，相逐为秘戏，以试方术。歌舞娈童，又不下数十人，备极荒淫。”（张燮《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

高寀的暴行和淫行，为福建、广东人民所切齿痛恨，以至最终激起民变。

官风如此，民风焉不江河日下。《梅圃馀谈》载：“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窑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做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往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一时而出。”后人称妓馆叫“窑子”，是明代已有此风了。

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奇靡的性风俗，比如西门庆曾脱了潘金莲的鞋用以载杯行酒，这种“吃鞋杯”，便是时人之习尚。

鞋杯，又名“金莲杯”，“饮绣鞋”。《辍耕录》：“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野获编·妓鞋行酒》条：“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长歌以纪之。”

何元朗是江南名士，著名的戏曲家，王弇州即王世贞，是当时的文坛泰斗，低级趣味如斯。

褚人获有一部书名《坚瓠集》，那里边记录了三首关于“鞋杯”的词，也全是出于名家之手。第一首是名士瞿士衡请杨廉

夫饮鞋杯时，应客人所邀而做的《沁园春》，词云：

一掬娇春，弓样新裁，莲步未移。笑书生量乍，爱渠尽小，主人情重，酌我休迟。酝酿朝云，斟量暮雨，能使曲生风味奇。何须去，向花尘留迹，月地偷期。

风流，到手便宜。便豪叹，雄吞不用辞。任凌波南浦，惟夸罗袜，赏花上苑，只劝金卮。罗帕高擎，银瓶低注，绝胜翠裙。深掩时华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谁知。（庚集·卷二《鞋杯词》）

第二首是许少华所作，词云：

借足下，权为季雅，向尊前，注满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儿大，鹦鹉鸬鹚恁让他，把一个知味人儿醉杀。（壬集·卷四《鞋杯》）

第三首是冯惟敏之作，冯惟敏是大名鼎鼎的才子，曾被列为《金瓶梅》作者的名单之中。《坚瓠集》说，临朐冯汝行（冯惟敏字）少负才名，领乡荐，知莱水县，改教润州，迁保定府通判，因仕不得显秩，肮脏归海滨，以文酒自娱乐，作《鞋杯词》：

高擎彩凤一钩香，娇染轻罗三寸长。满斟绿蚁十分量。窥生生，小酒囊。莲花瓣露泻琼浆，月牙儿弯，环在腮上，锥儿橘，团图在手掌。笋儿尖，签破了鼻

梁，笋儿尖签破了鼻梁。钩乱春心，洗遍愁肠，抓辘辘滚下喉咙，周流肺腑，直透膀胱。举一杯恰象小脚儿，轻跷肩上；咽一口好疑是妙人儿，吮乳在胸膛。改祥风光，着意珍藏。切不可指甲掐坏了云头，口角湿了鞋帮。

妓鞋行酒的陋俗，亦是当时“小脚崇拜”的文化现象。清人方绚，曾作《贯月查》，很详细地叙述了妓鞋行酒的仪式：

客人取小脚者之绣鞋，仿投壶仪节，众人投果于其中，名曰：“摘星贯月”。视其贯否，即以载酒行觞。弓鞋纤妍如贯月，投之以果，如星之贯，以之行酒，周流客座，又似浮查，故曰“贯月查”。

还有一种行鞋杯的方式，是大家把绣鞋在座上传递，传递中摹仿月亮的阴晴圆缺把绣鞋擎在手里，数着初一初二初三至三十的日子。擎鞋的姿式，也随时而各有差异，或口向上，或口向下，或持其尖，或执其底，或平举，或高举，或隐于桌下不让人看见，这需要行酒人把月亮在每一天的形貌记得非常准确。有一个口诀说：“双日高声只日默，初三擎尖似新月。底翻初八报上弦，望日举杯向外侧。平举鞋杯二十三，三十覆杯照初一。报差时日又重行，罚乃争差与横执。”

这是小脚崇拜最狂热的时候才有的事。这个方绚，还写过一篇骈文，叫《采莲船》，说的也是这种陋俗，开篇云“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屣之主人，延曳裙之上客。绮筵肆设，绣幕低垂，绿蚁频斟，红裙隅坐。绝缨而履舄交错，飞觞则芗泽微闻。”

《金瓶梅》还多处写到了男风问题。妻妾成群的西门庆是个好男色的性变态者，五十二回，就写到了苗员外为了讨好西门庆，把自己家里养着的两个歌童当做礼品赠给了西门庆，而西门庆为了讨好蔡京，又转手把这两个歌童送到了太师府。

西门庆家养的“西宾”温必古，也是个崇好男风的酸儒，人家送了他个外号叫“温屁股”。七十六回《画童儿哭躲温葵轩》活画了此人的丑态。

《金瓶梅》时代，社会上一般豪富人家，多购买少年英俊男童为仆役。或作为其变态性欲的发泄对象，或作专供缙绅酒席的“小唱”。当时风流缙绅，对于男色“莫不尽力邀至，举国若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有此类记载，很详细地反映了明代这一“举国若狂”的男色的繁荣状况：

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按院之事辞闺阁，阉竖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得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系狴犴，稍有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监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必相殴讦，告提牢官亦为剖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至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贫苦无聊，计遂出此。正与佛经中所云五处行淫者相符。虽可笑，亦可悯矣。至于习尚成俗，如京师“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有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竟

以此通博游猾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经中名男色为旃罗含。（该书卷二十四，《男色之靡》条）

为《金瓶梅》作过跋的谢肇淛，曾有一段话谈到了明代男风鼎盛的原因："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狎邪。士庶困于阿赌，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未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以男宠之所以日盛也。"（《五杂俎》）

另外，《金瓶梅》中写到的春画，也是当时的一种习尚。春画之起，源于汉代，明末君民淫风炽盛，春画因此而广为流行。如唐伯虎、仇十渊这样的艺术大家，同时也是写春画的圣手。如唐伯虎有幅春画，画的一边，床上男女正颠鸾倒凤，另一边，门旁一妙龄丫环在门缝中窥视，唾涎欲滴。因其精妙撩人，清代一般名士，纷纷题词其上，备加赞誉。

不仅名士乐于此道，一些民间画坊也以绘春画为谋生手段。天津杨柳青，为中国木版年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出艳丽名妓的地方。当地的妇女不论已嫁未嫁，皆精于此道，而且作为"女红能力"的标准。每年春节前，这种春画大量上市倾销，雅名"女儿春"。这种"女儿春"，也是北方女儿出嫁时陪嫁之必需品。如张衡《同声歌》有云：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甚至未嫁女子也不以春画为避讳，就连那些大家闺秀，也喜欢绘春画。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刊刻极尽精美豪华。其中《风流绝畅图》为彩色套印，当为现在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彩印书籍。

明中晚时期，市面上流行的刊版春画，不下百余种。就连酒杯茶具上，也绘有男女交欢的图画。《野获编》“瓷器”条记载：“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好在这些东西早已失传，不复见于今日。

在靡烂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一些文人学士和社会名流也堕落无已。被认为《金瓶梅》作者的屠隆，（字赤水，号一纳道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青浦令、礼部郎中，万历十二年十月被讦与西宁侯夫人淫纵而罢官，有戏曲作品传世）亦被时人传闻“狭邪游，戏人王侯之室，灭烛绝缨，簪遗珥堕，男女嬲而交错”（邹迪先《栖真馆集序》）。罢官后，仍“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张应文《鸿苞居士传》）这位留下了三部传奇《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长剧的才子，最终亦死于花柳病。他的好友，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汤显祖，得知他患恶疾，写了十首绝句以赠，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其中一绝为：

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
家间大有童男女，尽捧莲花当药王。

即使是得了性病，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有那么多“尽捧莲花当药王”的童男女簇拥，亦为人艳羡，是一幸事。

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记录了许多文人学士放浪不羁之事：“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髻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嘉兴姚壮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吴兴、沈雨若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中山公子徐清君，魏国公介弟也，家赀钜万，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日，把酒酣歌，纶巾鹤氅，其神仙中人也。”

世风如此，也必然反映到文学艺术作品中来，在《金瓶梅》问世的前前后后，便有《如意君传》、《金主亮荒淫》、《绣榻野史》、《昭阳趣史》、《于湖记》、《痴婆子传》、《肉蒲团》（一名《循环报》）、《灯草和尚》、《两肉缘》等一大批秽书以及艳词艳曲不胫而走，风靡天下。对于享乐的承认，甚至于赞美，几成为晚明社会思潮的主潮。

《金瓶梅》在裸露人欲的描写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时代色彩，全是因为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

明万历以来，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大转折。在文艺思想范畴，产生了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论、徐渭的“人性”论、公安派的“性灵”说。由于诸说构成的“人学”的新思潮，摇撼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体系。与此同时，出现了以“心”反“理”的哲学新思潮流派——泰州学派。王艮以“百姓日用之学”为之发轫，对程朱理学的“天理”之道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大大地阐发了“心”即人的自然要求，自然

欲望的合理性。百姓的日常生活，七情六欲，都是附合“天理”的。“人欲”与天理并不相悖。换言之，“人欲”亦即“天理”。

李贽在肯定人欲时，把“好色”与“好货”相提并论，晚明士大夫则首先肯定男女之欲原本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的需求。如汪廷纳在《投桃记序》中说：“自太极分则有阴阳，有阴阳则有交媾，恢恢宇宙安能人绳以礼法，家束之廉隅，而私合之事何者无之。”袁宏道也认为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之事。他在诗文中多次坦率地自称：“后来期，不敢问，我好色，我多病。”（《别石簣诗》）他对“好色亡国”论提出了批判：“齐国有不嫁之姐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朝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灵岩》）

就作品而言，汤显祖的《牡丹亭》突出了“欲”和“理”的冲突，体现了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使中国的戏曲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走向。冯梦龙对“三言”的整理和刊布，使宋元白话小说的艺术日臻成熟。《金瓶梅》的出世更是惊世骇俗，使长篇小说跳出了“演义”和“英雄”的圈子，跃入了真正写人的新格局。

然而，晚明思想解放的社会风潮冲击了封建伦理纲常，却没有提出新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众多的表现畸形人性的作品出现之原因。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近日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

故，晚明时期的某些作品，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禁欲

主义的虚伪，但同时也展现了人伦的丧落。

这个荒淫没落的时代，离我们确实是太遥远了。在这样的时代“风尚”的影响下，即使是一些名著，也难免杂有那个时代的脓血。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固然有其负面效应，但作者从大胆肯定人欲出发，进一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标志着人本意义上的觉醒，也带有比较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金瓶梅》冷静透视社会生活的丑陋、龌龊与肮脏，把历史和人生的种种罪恶一一悬挂出来，暴晒在阳光之下，使之显露其本质。《金瓶梅》的性描写，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男女问题本身。它从美的理想上来审丑，否定丑，实际上否定的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

《金瓶梅》中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他（她）们的毁灭，其原因皆在于性的放纵，这一连串个人毁灭的总和，便是整个社会的毁灭。

13

《金瓶梅》何以"久干例禁"

《金瓶梅》之被禁，始于清初。

实际上，在它诞生之时，小说和戏曲方面的作品，早已被列为重点查禁之列了。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应编合充军的"奸顽之徒"定为二十二种，分别为："贩卖私盐、诡寄田粮、私充牙行、私自下海、闲吏、土豪、应合抄扎家属、积年民害官吏、诬告人、无籍户、揽纳户、旧日山寨头目、更名易姓家属、不务生理、游食、断指诽谤、小书（即小说，这里指小说作家——何按）、主文、野牢子、帮虎伴良、直司"（姜南《墨畲钱镈》）。

写小说的作家与贩卖私盐者、积年民害官吏、地痞流氓划在了一个名单上，成为流放的对象。

明成祖以后，率先受到律条严禁的小说，便是《水浒传》、《会真记》和《剪灯新话》等。

作为《金瓶梅》故事衍生地的《水浒传》，是历代统治者必禁之书，郑暄《昨非庵日纂》云："《水浒》一编，倡市井萑苻

之首；《会真》诸记，导闺房桑、濮之尤。安得罄付祖龙，永塞愚民祸本”（该书三集卷十二）。

龚炜《巢林笔谈》则谓：“施耐庵《水浒》一书，首列妖异，隐托讽讥，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啃聚之端，害人心，坏风俗，莫甚于此；而李卓吾谓：‘宇宙有五大部文字，并此于《史记》、《杜诗》、《苏文》、《李献吉集》’，悖矣。若以其穿插起伏，形容摹绘之工，则古来写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于此耶！”（该书卷一）

尤其是明末，山东一带爆发了以李青山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效法《水浒》故事，以梁山为根据地，杀富济贫，闹得官府坐卧不宁。这场起义虽被镇压，但统治者却依然心惊肉跳，并迁怒于《水浒传》。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上奏折，陈请毁禁《水浒传》：“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出，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同年六月，崇祯降旨，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速令尽行烧毁，不准藏匿”。

《水浒传》是一部“诲盗之书”，那么，《金瓶梅》自然被列为“诲淫之书”了。

透露出《金瓶梅》最早的被禁信息的，是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文。他说：“《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

光绪十四年东武惜红生《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序》亦谓：

“《水浒》诲盗，《金瓶》诲淫，久干例禁。”

从此，《金瓶梅》便被舆论首先打入了坏人心术的淫书之列。

申涵光《荆园小语》称：“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每怪友辈极赞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反阅其似耶？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

林昌彝很赞同申涵光的主张，他说：“昌彝谓人见此书，当即焚毁，否则昏迷失性，疾病伤生，窃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视禽兽又何择哉”（《砚耩绪录》卷十二）?!

徐谦说：“姜西溟曰：‘人谓《金瓶梅》似《史记》，何不竟读《史记》？吾辈宜力辟此等书，尽投水火而后已，不得随众称扬其文笔之美也”（《桂宫梯》卷四引《劝戒录》）。

清代禁书，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其酷烈程度，时人用如梳如篦来形容，并不过分。仅是乾隆四十七年一年、仅是浙江一省，便累计奏缴应禁之书24次、538种，凡13862部。这一年《四库全书》告竣，“四库馆”正总裁官英廉进呈应毁书目140种，抽毁书目180种。各省也都编列禁毁书目，并日益扩充。

对小说、戏剧的限禁，也变本加利。理由是：“琐语淫词”，有害人心。

第一次对文学作品的禁止，是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其时尚未入关，对汉人的演义小说，只是“停其翻译”，手段还是温和的。顺治九年，清人入关后，对小说、戏曲的禁令便有恫吓色彩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它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重究治。”

康熙二十六年，禁毁小说书目开列为150余种，五十三年，

则颁谕："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

嗣后，禁毁律令日趋严厉。更可笑的是，雍正六年，有一位护军参领郎坤，在陈奏中引用了一个《三国演义》上的典故，竟差点丢了脑袋。最后还是皇上恩典，被枷号三个月，鞭一百，革职发落了。

乾隆三年，再颁《书坊禁例》：

"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务将书版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对禁查不力的官员，亦严加治罪，决不姑息。

江苏省巡抚丁日昌，是查禁小说、戏曲最卖力气的一个人。曾于同治七年颁查禁令，称："淫词小说，向干例禁"，"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崩其祸。"他建议："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

这一年，丁日昌上报给朝廷的禁毁书目，范围之广，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小说。

那一份洋洋乎大观的名单上，不仅有《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绣榻野史》、《株林野史》、《禅真佚史》之类的涉及男女私情的小说，也有《红楼重梦》、《续红楼梦》、《红楼圆梦》、《增红楼梦》之类的世情小说，甚至连《龙图公案》、《说岳全传》之类的公案，忠义小说和《夜航船》、《子不语》之类的小品也纳入应毁之列。

至于《金瓶梅》和它的续书《隔簾花影》、《续金瓶梅》、《唱金瓶梅》等等，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金瓶梅》既为“淫书之首”而“向干例禁”，对它的禁令，是格外森严的。清乾嘉以降，《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间刊布，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格收购坊间所藏的板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

清佚名《劝毁淫书徵信录·禁毁书目》记：“本局奉宪设立收毁淫书板片书本，照估给价，业奉学宪吴给事晓谕；兹特将应禁各种书目开后，凡铺户人家，如藏有此等版本者，务劝尽数交出，送局收毁，幸勿遗漏自误。计开……《隔簾花影》……《金瓶梅》、《唱金瓶梅》、《续金瓶梅》……此外名目尚多，未能备载，望各自行检点，一并送局。自禁之后，凡属省城内外，及各州县乡村等处，统宜遵照，设局收毁，其不能送局者，亦应自行销毁净尽，以免日后觉察，种多未便。特白。”

余治《得一录》卷五亦载：“本局奉宪设立收燬淫书，业经收得一百余种，并板片二十余种，照估给价毁讫。惟各坊铺中所藏淫书版本尚多，已奉臬宪挨户给示晓谕，自应赶紧缴局，以免日后觉察，致干未便。兹特将收过各种书目开后，如藏有此等版本者，务劝尽数交出。此外名目尚多，未能备载，望各自行检点，一并送局，幸勿遗漏自误，此白。……《隔帘花影》、《金瓶梅》……《唱金瓶梅》……《续金瓶梅》……”

不但《金瓶梅》和它的种种续书均在严禁之例，而且所有改编《金瓶梅》的剧曲，一律不得搬演。

裕谦《裕中丞训俗条约》中谓：“本部院前已奏明严禁淫画淫书，并不许妇女入庙烧香，及开设花茶馆，犯者必应惩办。自今各处园亭，不得开放，一应崑、徽戏班，只许演唱忠孝节义

故事。如有将《水浒》、《金瓶梅》、《来福山歌》等项奸盗之齣，在园演唱者，地方官立将班头并开戏园之人严拿治罪，仍追行头变价充公。其各处茶馆弹唱文词，亦毋许男女杂坐，闹至深夜。凡我军民，须知游熙皞之天，不得有越礼犯分之事。湖山花鸟，常此清妍，自爱之人，谅必乐闻斯语耳”（光绪乙酉宝善堂重刊本《得一录》卷上）。

同时，对小说和戏曲，清代统治者还寓禁于修，进行抽改。余治《得一录》中开列了一个“釜底抽薪”的药方，因为收毁淫书，搜罗不可能贻尽，而且一些书坊因为利益的趋动，对禁书的指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旋毁旋刻，令禁书当局望洋兴叹，徒唤奈何。余治因此建议：“向尝于无可如何之中，拟一釜底抽薪之法，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除《水浒》、《金瓶梅》百数十种业已全数禁毁外，其余苟非通部应禁。间有可取者，尽可用删改之法，拟就其中不可为训者，悉为改定，引归于正，抽换版片，仍可通行。所有添改之处，则必多引造作淫词及喜看淫书一切果报，使天下后世撰述小说者，皆知殷鉴，不致放言无忌。如用药然，大黄巴豆，一经泡制，即堪治病。抽换淫书一法，洵足以济毁禁之穷，标著作之准。宜约集同人，筹款设局，汇集各种小说，或续或增，或删或改，仍其面目，易其肺肝，使千百年来习传循诵脍炙人口诸书，一旦汰其芜秽，益以新奇。更如治盗然，引邪而归正，即化莠而为良，荡瑕涤垢之余，即训俗型方之选，此世道人心千秋大局，固非寻常操选家区区小补者比也。”

真不知这“釜底抽薪”之法，如果然施行，那些“脍炙人口”的诸多小说，将以何面目见于后世。

毋庸讳言，《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这部旷世奇书“向于例禁”的一个主要原因。缘此，它连“釜底抽薪”的待遇也轮不到。只能“全数禁毁”。另一个禁书者不便明讲的原因，便是《金瓶梅》对整个社会的痛砭和对黑暗统治的揭露。

另外，《金瓶梅》的性描写，也使有清以来的色情小说受到刺激，发展较快。这一点，笑笑生大概是没有料到的。所不同的是，《金瓶梅》的主旨是描写社会现实，其社会意义绝非是那些“专写性交”的滥淫之作所能够相比的。

14

民间禁书余波

最早的《金瓶梅》刻本，是在苏州刊行的。直到清代的道光年间，苏州、扬州两个郡城的书店中，仍藏有《金瓶梅》的书版。

然而，藏有此版的书坊，是为社会舆论所不容的。

相传苏州的《金瓶梅》版，藏在一家姓杨的书商家中。

这位杨老板，祖上以开书坊为业，家道殷实，在方圆一带也颇有名气。他因为刊印《金瓶梅》，印数多，销量大，钱也自然赚了不少。但是，杨老板却终年为病所累，日夕不离汤药，虽然娶妻多年，仍然生不出儿子来。他十分懊恼。

有一天，有朋友劝告他说："你虽然早已完娶，而子嗣甚艰。而且每年收入不菲，只不过挣的钱都泡进了药罐子。这其中的原因，不知你想过没有。"

杨老板问："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朋友说："只是由于你印刷出售了那部坏人心术的禁书《金瓶梅》，别人因此受了荼毒，而你却谋取了暴利，所以老天暗中

降灾来惩罚你。现在来看，唯一的办法是赶快把《金瓶梅》的书版毁掉，或者可以弥补你自己的弥天大过。”

杨老板这才如梦方醒。

这些年，他靠《金瓶梅》这部书发了大财，成了名噪一方的大书贾，可银子白花花地淌进来，又白花花地淌了出去，况且年近不惑却子嗣无存，原来是自家的孽报。

这位杨老板决心改过自新，他将坊中所藏的《金瓶梅》书版，当众劈毁，一把火烧了个净光。从那之后，他的病体一天天好起来，妻子不久也生了个男孩。他重开设了一家“文远堂”书坊，几年之内，家业遂成。

再说扬州《金瓶梅》版。

扬州之版，亦为一书商所藏。这个书商开了三处书坊，皆以此版而获大利。人屡戒之，终不毁。某年夏天，他同儿子到苏州去，儿子因办别的事先回，这位书商在旅馆，突然生了急病，同行们将他送到扬州，竟半路死在了船上。他的儿子得到消息，赶到时，其父尸身已腐坏，苍蝇绕着尸首乱飞，蛆虫在脸上爬动，血水横流，已不能装殓，只好用一件衣裳盖住尸体。记载这件事的作者评论道：俗话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这位书商因为印售《金瓶梅》，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这个书商死后，有位儒士捐钱买下了这部《金瓶梅》的书版，把它焚毁，从此吴中不再有这种坏书流传，人皆拍手称快。

讲了以上这两个故事的，是清代学者余治。讲完了这两个故事，他接着附了一段骈文，备论《金瓶梅》其书，是如何的坏人心术，不妨抄引如下：

哪一部淫书，不是聪明才子做成？不是风流学士做成？嗟乎，以身列士林而负异才者，奈何驱迫人群，尽入禽兽一路。祸天下而害世教，莫甚于此。从来名士词曲，有锦心绣口，香艳绝伦者，而其后人，往往书香莫嗣，不识之无。其甚者，一再传而血脉遽斩。世报如此，冥报可知。夫以非常之才，造非常之孽，受非常之祸，而竟甘此如饴，恬不为怪。噫，言念及此，不禁为天下才人学士，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青年子弟，因得闲于曲牌，溺于秽史，习惯自然，心雄胆泼，以媟戏为快，以谑浪为高，以纵观妇女为乐事，以侈谈闺阃为新闻。从此履邪径，污血刃，削功名，折寿禄，累妻女，辱子孙，行径不堪，祸变不测。噫，言及此，不禁为天下青年子弟，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绣阁名姝，为之骀荡春情，痴心往迹，或密约佳期，或私订姻事，以致成婚之夕，无颜见夫，即嫁之后，不能孕子。又或性颇贞洁，隐忍不言，独宿冥思，积成劳疾，对镜生愁，一病不起，未嫁而夭，魂无所归。噫，言及此，不禁为无数闺阁芳魂，一起恸哭！

此书一出，而未婚之人，先损真元，即婚之后，恣淫无度，遂致恩爱夫妻，中途抛却，生离死别，嗣续无人，鬼犹求食，不其馁而。噫，言及此，不禁为无数鳏寡孤独无告穷民，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闻者醉心，阅者迷目，遏禁痴情苟

合，自谓无伤，岂知奸人妻女者，有王法在，刑官可以杀却；有阴律在，阎罗可以杀却；有家法在，父母丈夫可以杀却。而且罗衾锦帐中，方欢乐间，有人举刀一挥，两颗血骷髅，同时落地。噫，言及此，不禁为无数杀身鬼魂，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巧言者添设艳曲，拙者亦制山歌，无字不秽，有语必淫。无赖奸徒缘以为利，弹唱街坊，哄诱大众，虽田夫贩夫，牧竖村童，渔夫樵子，坊作佣工，无弗丧心病狂，不言而喻。噫，言及此，不禁为愚昧小人，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画师握管，绘就春宫，画态极妍，描摹刻酷，竞夸笔妙，倾动一时。凡有见者，无不效尤。风流之债，辗转相欠。请为画师诵云："劝君莫欠风流债，欠得快时还得快。室中自有代还人，你要赖时他不赖。"噫，言及此，不禁为无数丹青名手，一起恸哭！

此书一出，而淫药春方，矫揉造作，争先献媚，以此为快；岂知其事愈快，其毒愈烈，不为痼疾，必发疮疽，妖淫者亡，迷惑者死。又争遍处招贴，多傍圊缸，秽气杂熏，神人共怒，不有人祸，必有天殃。噫！言及此，不禁为制淫药传春方者，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私奔子女，苟合成胎，惧人知觉，无地自容。乃有奸民，习学邪术，损子堕胎，遂令狡童荡妇，恃有此术，其心愈狠，其胆愈张，即乱人身，复戕人种，此等罪恶，较寻常百倍，永沉狱底，何日超生。噫，言及此，不禁为奸民损子堕胎者，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见者欲火如焚，按捺不住，心生幻梦，屡寻巫峡之缘；路遇冶容，错认情人之眼。充其意，但愿借端相合，诛其隐，何虞非偶相从。不能折名园之艳，乃潦倒于野花；不能酌太液之浆，姑沈缅于村醨。倘可娱情，遑论尸瘵之妇；急思行乐，岂嫌蛊毒之娼。腐烂有剥肤之痛，因而不齿于人；妻子有传染之忧，甚且自戕其种。噫！言及此，不禁为宿娼挟妓者，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伶人乐工，借此为由，当场演出，以博人笑谑为能，以荡人心志为巧。或且故示妖冶之容，绘影绘声，务使看者乱性而止。举动轻狂，不避妇女，中冓之祸，或由是生。噫！言及此，不禁为看点淫戏者，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远商孤客，携带行箱，偶展阅焉，游思耿耿，乃有羽毛之孽，花月之妖，木石之精，巫蛊之祟，乘间而入，佯与绸缪，借以吸其精，拘其魂，吮其血，啖其肉，客死异乡，无人扶梓。收埋义冢，不辨谁何。噫！言及此，不禁为无数流落孤魂，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湖山演剧，赛会迎神，渐至巧为传奇，以污神庙，甚至俳优混杂，妇女纵观，如其正神，岂肯启宠纳侮；如其邪神，未免唆恶诲淫。又况下界血食神祇，多是五通阴神，不修漏尽，即未断夫淫根，岂易免夫淫孽？如近世血食庙神，尝有占夺民间妻女者，神而犯淫，庶民同罪。夫在生积善，殁后为神。虽

著勋劳，未经修炼，满腔识神用事，何曾拔出生死轮回种子乎？听民间狱讼，最易生嗔，观世上繁华，不无动念，故青华上帝论神道曰："为灵为爽，总是孽因。"虽具聪明正直之德，而孽根未断，难免恶报，天福享尽，终归异趣；况为优伶亵侮，更无所不至耶。噫！言及此，不禁为下界血食神祇，一齐恸哭！

此书一出，而茅庵衲子，空谷全真，十世清修，千年道行，一见此书，偶动欲念，遂使历劫苦功，泄于一旦。如玉通禅师住虎阜四十年，持戒禁淫，竟败精于红莲妓之千拜，而死即随之。夫美人整服而前，犹令禅师破戒；岂淫书亵词而道不使淮子痴心。噫！言及此，不禁为空门戒士，一起恸哭。

此书一出，而异端左道，奸计频生，不言烧炼红铅，便说阴阳采战，污蔑三宝，罪不容诛。霹雳一声，碎尸万段。彼修真学道者，一时误听，堕入迷途，净行不修，淫风转甚。本想做九天真宰，反图了万劫风刀。噫！言及此，不禁为夙有仙缘清修志士，一齐恸哭！

任尔牢骚，冤氛俞高，与其千哭，不如一烧。万丈无明，一炉烈焰，电掣雷轰，云收雾卷。

斩尽淫魔，煎枯爱河，请君毁尽，为君作歌。

（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

社会舆论对书籍的禁毁，主要是利用"因果报应"之说，这是很有力量的理论根据。"君不见世上淫徒书作媒，此书一出鬼

门开。请君斩尽淫媒去，从此痴人绝祸胎。”（《淫缘狱报歌》）

所以，也便有了罗贯中、施耐庵子孙三世皆哑等许多“版本”不同的传说，评点刊刻过《水浒传》的金圣叹，也因之获阴谴责罚：“国初诸生金圣叹，才隽不羁，好评论奇书小说，透发心花，穷搜诡谲，阅者为之大快。以有司不公，哭文庙，构成狱，避匿僻所，卜满百日可脱灾；及三月定稿，仅欠一日，以为幸免矣，闷郁已久，暮稍出探巷口，旧门斗过，贺曰：‘相公幸甚，案定不追；但我拖累艰苦，须为压惊。’信之，旋为访拿抵案，陷辟，正落百日之厄。其评书儇佻刻薄，导淫诲盗，足资笑谑，而阴谴之重，尚不止此。才子自贻伊戚，岂特狂不顾忌，将为何等人耶？读其文者惜之。”（清·毛庆臻《一亭杂记》）

连批点《水浒传》，称赞过《金瓶梅》的李贽，也难逃恶报：

“李卓吾最喜翻驳前人，终身蹭蹬，惨死非命，此即以文害人之榜样。古云‘刀笔杀人终自杀’乃是实语，并不虚枉。”（清·石成金《天基狂言》）

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受到恶报，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在应考入闱之际，居然“狐鬼群集，挥之不去，竟莫能得一第。”（清·汪敘淑《水曹清暇录》卷十）

甚至王实甫和关汉卿也在拔舌狱里备受折磨。写《牡丹亭》的汤显祖，报应算是最惨重的了，《感应篇注》谓：

“有入冥者，见汤若士身荷铁枷，人间演《牡丹亭》一日，则笞二十。”（清·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

写《莺莺传》的董关，则“当以千劫泥犁报之”（清·祁骏佳《遯翁随笔》第二卷下），怕也不怕？

"昔有人游冥府，见阿鼻狱中，拘系二人甚苦楚，问为谁，鬼卒曰：'此即阳世所做《还魂记》、《西厢记》者，永不超生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又记《西厢记》作者，当编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之句，忽然扑地，嚼舌而死。后半部，乃另一人续之。"

如此种种，都是著书人的报应。造小说者，非有奇祸，即有奇穷。这些作家，活着时便已早登鬼录，死后亦必受犁舌之苦，且祸及子孙。以下是几则清人笔记中的果报个案：

祸 淫 案

维扬某生，造一淫书，即成，梦神呵之，醒而自悔，遂止。后因子殇家贫，仍复付梓，未几目瞽，手生恶疮，五指俱连而死。

（韩棨《不可录·祸淫案》）

袁某淫词秽语嚼堕其舌之报

吴中袁某，雅以音律自负，遨游公卿间。所著《西楼传奇》，优伶盛传之。然词品卑下，殊乏雅驯。不及王、康诸公远矣。为人贪污无厌，年逾七旬，强作少年态，喜纵谈闺阃事，每对客淫词秽语，信口而发，令人掩耳。人共嫉之曰："此君必当受口舌之报"。未几，客会稽，冒暑干谒，忽觉口中奇痒，因自嚼其舌，

片片而堕，不食二十余日，竟不能一语，舌根俱尽而死。

（徐谦《桂宫梯》卷四，引《阴骘文劝戒编》）

传奇削禄

吴中彭兰台孝廉希涑，芝庭尚书之孙，彭咏莪京兆之封翁也……尝手辑《二十二史感应录》，摘叙正史中果报之事，足以启聩振聋，读者并可收温史之益。适所亲朱蕉圃海，喜游戏翰墨，著有《钗燕园传奇》，颇传于世；封翁斥之曰："此桑间、濮上之词，最足坏人心术，虽系假托名姓，然宇宙之广，必有相同，诬人闺阃之愆，万不可逭。吾乡尤西堂太史侗，《杂俎》中，仅载《钧天乐》、《吊琵琶》、《黑白卫》、《登科记》，尚有数种，艳情丽事，匪夷所思。曾以才鬼降乩，告以冥中削禄。以西堂太史之根器才望，犹未免于冷宦不迁，子孙不振，吾曹可不知所儆醒哉。"后朱亦潦倒终其身。

（梁恭辰《劝戒录续编》卷五）

作稗乘者当坠犁舌地狱

近世多志怪之书，大抵出于才子文人所附会，其间亦必确有可信。如冤家索报、异类酬恩、是非邪正、鬼神祸福、关诸性术，凡可以为劝戒，虽为稗乘，不

无醒世之功，固宜节取。惟好说淫狠，荡少年子弟之心者，当坠落犁舌地狱。不徒贻害于人，亦且得罪于兽。

（李威《岭云轩琐记》卷一）

勿作淫词艳曲

字为天下古今之宝，随身随事，皆不可少。真所谓利生民于万世者也。而世人不知敬惜，轻易书写，妄以与人，及作淫词艳曲，擅写词讼退婚，与批杀批斩及钞不正药方，以至秤卖字纸，糊器践踏，扯毁杂用。所以天之报施，亦终其身于贫贱。《文昌宝训》云："一切闲文字，皆与藏经同。"故自古惜字者，每得科名报，亦得长寿报，亦得广嗣报，因果颇多，慎不可忽。若今世之不敬字纸者，因其前生罪重，无有智根，求善难入，所以目不识丁。学道先当敬惜字纸，敬惜者如前亵用咸宜永禁。

（明·陈慧《修慝余编》）

善恶皆以语为首

善恶皆以语为首。以其事最切而力最大，且无日可离也。人自能言而后，更无默坐不语之一日。略一启齿，善恶便判。自扬人丝粟之长，掩人尺寸之短，以至福被四海，泽及万世，皆语善也。自调笑以片言相

侮，杯酒以一语相欺，以至祸延国家，毒流门户，皆语恶也。语善不费一钱，极其量可以入圣；语恶不得一钱，极其量不止杀身。出自最易，防之最难，人生得过之端，未有多于此者。

不仅仅是作家写了这类文字要遭果报，书坊刊刻了这样的书，读者读了这样的书，也同样会损寿折福。

藏刻淫秽邪书之报

袁了孔曰："取淫秽邪书焚化者，得子孙忠孝节义报。将此等书与圣经贤传并贮者，得子孙流荡纵佚报。翻刻淫秽邪书，贩卖射利者，得子孙娼优下贱报。

（黄正元《欲海慈航》引）

编造称说家藏淫书之报

更有编造淫书，伤风败化，罪报尤甚。如《烟鬟秽史》，早登鬼录，《童痴》蝶编，显受谴罚，世共戒之。又有称说淫书故事，家藏淫书，不即焚毁，罪亦不轻。

（徐谦《桂宫梯》卷一引《文昌入门法节录》）

坏人心术，必有冥诛

吴中江铁君又言：有书贾周某，端且谨，出纳不苟。一日，语予曰：某贾书市中，有儒生携一少年，求小说所谓《肉蒲团》者，某正色言曰“君读书人，所携者，非子弟，即学徒也，奈何问此？何以训后生？何以作士子乎？吾虽市井，不屑售此也。君无复尔。”其人愧甚，揖谢曰：“某失言，谨受教，当书绅也。”踧踖而去。予曰：“此人闻法而受，必改过矣，亦善士也。”因忆有朱姓者，以鬻书，家渐起，后忽自刻小曲售之，予谓之曰：“尔鬻书，因与我辈往还，若售此，则与负担厮役往还矣，后毋如是。”朱曰：“我贪好价耳。”予曰：“尔贪目前之利，以此坏人心术，必有冥诛，可速改之。”不听。未及一年，其子窃赀淫于外，乃为之娶，而分室界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肩残书，鬻于市，旋死于街亭。

（梁恭辰《劝戒录续编》卷三）

看小说戏文折福

广陵有鹾商女，甚美，尝游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认此女为娼也，不由分辩，遂笞之。女号泣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梦神语之曰：“汝平日将旧书册夹绣线。且看小说戏文，随手置床褥间，

坐卧其上，阴司以汝福厚，特假醉令手，以示薄惩，否则，当促寿也。”事遂止。后痛自悔改，以夫贵受封。雍正初年事。

（钱永《履园丛话》卷十七《报应》）

阅读编造淫书孽报

汪棣香、福臣《劝毁淫书徵信录》云：乾隆末年，桐乡一士好阅淫书，搜罗不下数十百种。有子少聪俊，每伺父出，辄搜箧中，取淫书观之，从此缠绵思想，琢丧真元，患瘵瘵卒。其父悲恸不已，相继卒。又某邑一书贾，好刻淫书及春宫画像，易于销售，积资至四五千金，不数日被盗席卷而去，两目旋盲，所刻诸板，一火尽烬。及死，棺殓无措，妻子离散，此皆编造淫书之报也。

（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四）

《红楼梦》之贻祸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丰润丁雨生中丞，巡抚江苏时，严行禁止，而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缀时，父母以是书贻祸，

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

读《红楼梦》贻祸如此，至于《金瓶梅》，从始至终便被称作"丧心败德"之书，连皇帝谈起它，也勃然色变。

清人李宝嘉《南亭笔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道光皇帝在便殿里召见某位宠臣，因昼长无聊，便谈起了消闲之策。为臣的说，可读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品花宝鉴》等等。

道光从未见过这些书，第二天在军机处处理完国家大事，便想借来读读，因而留下了潘文公，问："听说你们家藏书颇多，像《金瓶梅》、《红楼梦》等等，想必也一定藏了吧？"

潘文公一听，吓得屁滚尿流，赶忙叩头，连称"臣不敢。"道光说："朕不过随便问问，怎么吓成这个样子。"潘文公这才说："禀皇上，这些都是淫书，不是臣所敢收藏的。"

道光一听，心中甚为不悦，立即写了一道御旨，将那个推荐他看《金瓶梅》的宠臣开消了。

不论是写淫书、刻淫书还是看淫书，都一样逃不过报应之掌，有《淫缘狱报歌》，略云：

可叹人世梦未觉，此身每被尘根缚。
启口频将绮语宣，挥毫惯把淫词作。
我闻鬼国苦非常，黑雾愁云布八方。
石飞沙走常暗晦，神号鬼哭更踉跄。

荆榛梗塞疑无路，血水横流难展步。
五百毒龙出没频，十千罗刹往来屡。
此中人与鬼无殊，面目如泥血肉枯。
魂魄漂摇无所定，皮肤渗裂泣穷途。
哀哀磷火燃昏暗，刮地狂飚何战栗。
未识如何种孽因，当年误汝一枝笔。
浮生空抱不凡才，无限痴情杂沓来。
一部笙歌传粉本，误他士女堕尘埃。
无边冤孽从斯起，漫道香奁闺阁体。
上天怒汝荡人心，罚使沉伦鬼国里。
谁将一炬爇洪炉，浪语淫词尽扫除。
从此孽根齐拔去，自然狱报成空虚。

这种民间社会舆论的力量，比官方的禁令往往要有效得多。故当时有好多人便纷纷花钱去买小说的板来焚毁，据说毁一板，冥司可计百功。这在当时是一件无量的大功德。

毫无疑问，真正的诲淫之书，决当焚之。人民主动起来抵制，确是净化社会空气的大举。然而有时泼洗澡水时，却会连同盆中的婴儿一同泼出去，焚毁坏书时，有一大部分不坏的书也殃于城火，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15

李渔与《金瓶梅》崇祯本批评

李渔曾被认为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崇祯本) 的写定者，这一说法目前尚缺少充分的根据．但崇祯本失名的眉批与旁批，经诸多学者考据，当是李渔手笔，或可成为定谳。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又字笠鸿，号天徒，又号笠翁，别署觉世稗官、随庵主人、湖上笠翁、新亭客樵、情隐道人等。宗谱尊称“佳九公”，文坛亦有称“李十郎”者。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活了差不多七十岁。他是浙江兰溪人，但自幼生长在江苏如皋。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不久回到故乡兰溪，二十五岁在金华应童子试，获考官赏识。三十岁之后，去杭州应过两次乡试，但都未能中举。入清后，痛恶满族蹂躏，从此绝意仕进，因改名谪凡。大约在顺治七、八年间，李渔由兰溪移家杭州，靠卖文刻书为生计。他的小说大多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戏曲亦半成于此时。后移家金陵，居金陵二十年。在金陵，一面继续刻书卖文，一面经常外出去“打抽丰”，攀结达官显贵。又多交结社会名流和文

坛名士，看花命酒，很是潇洒。特别是康熙五年他出游陕甘，得乔、王二姬，并组织了家庭小戏班，他的酬酢活动就更加频繁了。

李渔终身不应举，不做官，他的气节曾受到过吴伟业等人的赞赏，但他又以"登徒子"自命，逢场作戏，挥霍钱财，这也是他生前死后最招非议的主要原因。

李渔对于自己的庸俗是敢于正视的，他曾将严子陵淡于功名的高节懿行和自己的一生相对照，作《多丽·过子陵钓台》一词，进行自我解剖。

> 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终日抽风，只愁载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
>
> （《一家言全集》卷八）

这样的解剖是极其深刻而坦率的，那种难以名状的羞愧和自责来自他的内心深处。

对李渔这个人的生平与品格，说了这么多，似乎离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理解李渔对《金瓶梅》的批评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李渔对崇祯本所作的批评文字，有眉批、旁批，而没有回评，这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最早的评点方式。金圣叹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评点《水浒传》的。

李渔的评语，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非常珍贵的遗产，其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诸方面：

一、肯定了《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不是什么“淫书”。李渔一再强调：“《金瓶梅》非淫书也”（第九十九回）；“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第一百回）；他认为《金瓶梅》的全部价值在于“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之”（第五十二回）；《金瓶梅》之写人事，写天理，全是为了借这“一部炎凉景况”（第一回），“写出炎凉恶态”（五十三回）。

李渔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笔法来”（第十四回），“纯是史迁之妙”（第二十一回）。后来张竹坡发展了这一论点，认为《金瓶梅》“纯是一部史公文字”、“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这样，把李渔所谈到的表现手法上升到创作精神的高度，进一步肯定了小说的现实精神。

二、强调了《金瓶梅》的谴责和警世作用。如西门庆胡乱判案处，李渔批道：“近来刑狱，大抵如斯”。这评语中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也加了进去。又如九十回来旺盗拐孙雪娥事发见官，李渔批道：“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惩创之大意矣。”九十一回，写孟玉楼嫁往李衙内，街谈巷议：“西门庆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

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这里，李渔批道：“此一段是作书大意”。一语点出了《金瓶梅》这部世情小说的宏旨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实在是“为世人说法”。

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李渔的评点十分重视对《金瓶梅》小说艺术的开掘。《金瓶梅》一书，塑造了众多的性格复杂的人物，第一个打破了中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述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摆脱了传统小说平面化的描写，展现了生活中人真实的、复杂的、矛盾的性格层面。李渔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此一方面的艺术成就，他常用“写得活现”、“极肖”、“传神”、“写笑则有声”、“写想则有形”、“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俱一一摹画而出来，称赞《金瓶梅》中人物塑造得真实、生动、形象。

同时，李渔还注意到了人物个性特点的分析。如九十一回评玉簪时说：“写怪奴怪态，不独言语怪、衣裳怪、形貌举止怪，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之怪俱为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七十三回，写玉箫站在堂屋门首，说道：“五娘怎的不进去？”那个情节，李渔批道：“欲为稍果子打秋菊线索，偏在忙里下针。宁与人指之为冗为淡，不与人见其神龙首尾。高文妙法，子长以下所无。”八十九回写春梅婢作夫人，两个青衣伴当向春梅传周守备的话，小说中写道：“这春梅不慌不忙，说：‘你回去，知道了。’”眉批曰：“连用‘不慌不忙’，转似宜慌忙者，春梅婢作夫人，到底不饶。”对作者描写此时此地的春梅的气质，感受得具体入微。再如小说第五十一回写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四妻妾一起听姑子唱佛曲，李渔就指出了这四个人虽然身

份一样，但性格上却有很大的差异：“金莲之动、玉楼之静，月娘之愕，瓶儿之随，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说各是，都为写出。”

李渔曾称小说为“无声戏”，“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窥词管见》），既然是“无声戏”，就要恰当地把握每一个“戏”中的人物在此情此景中的心情，才能得其神理，把书中的人物写得“活起来”。他对《金瓶梅》的批点，十分重视对人物个性特点的分析，亦基于此。

四、李渔在批评《金瓶梅》时，注意总结小说创作中的规律和方法。他曾把《金瓶梅》中某些情节描写，归纳为“躲闪法”（二十一回眉批），“捷收法”（五十七回眉批），“绵里裹针”法（十回眉批）等等，并对一些精到的描写不断发出“映照得妙”、“写生”、“白描”、“趣”、“传神”、“天造地设”、“化工”、“意到笔不到之妙”等赞叹。

尤其是他所阐发的“冷”、“热”对立观点，对作品创作意图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更是别开新面。李渔的评语中，随处可见“冷”与“热”的辩正，如“无意中点出春梅，冷甚，妙甚”（七回）、“字字俱从人情微细幽冷处逗出，故活泼如生”（八回）、“西门庆爱春梅，往往在冷处摹写”（十二回）、“专从冷处摹情”（二十三回）。“一片菩提热念”（四十八回）、“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五十二回）等。这对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启发极大，张氏之“冷热金针”说，即发源于此。另外，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李百川创作《绿野仙踪》，也都从这里受到了最为直接的启示。

李渔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用小说创作的规

律，多方面地探索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尤其是他将戏曲批评的理论引入小说批评，冲破了小说评论重教化不重审美，重史实不重真趣的传统，对以后的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我们读《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时候，且不可把它的评点文字轻轻放过。

16

出了个张竹坡

张竹坡是谁？他跟《金瓶梅》又有什么关系？

张竹坡是继李渔之后第二个评点《金瓶梅》的青年学者，他的点评本对《金瓶梅》的传播贡献最为显著。

张竹坡，名道深，字自得，竹坡是他的号。他是江苏彭城（今徐州）人，生于清康熙九年庚戌（1670）7月26日，卒于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9月15日，只活了29岁。

彭城张家，是徐州的望族。清朝开国之初的顺治、康熙间，是这个家族的全盛时期。这时武有张胆（竹坡伯父）、张道瑞（竹坡从兄）父子，领兵于重镇海疆；文有张铎、张道祥、张道远叔侄，官至臬司府道，其结交上至宰辅，下至封疆大吏，多为当代显要。

张竹坡的父亲名叫张𬴖，是位名噪一时的书画大家，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侯朝宗、李笠翁、吴国缙等过从甚密，结社吟咏，诗文酬唱。他终身未仕，一生留连山水，笑傲林泉。

张竹坡兄弟九人，只有四个活了下来，张竹坡在兄弟中虽

然居仲，实际上排行第四。他的弟弟张道渊（亦书画名家）撰《仲兄竹坡传》中说，在张竹坡落生之前，他的母亲梦到绣虎跃于寝室，掀髯起立，化为伟丈夫，于是生下了竹坡。

张竹坡早慧，六岁时能赋小诗。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出了个对子："河上观音柳"，竹坡立即应对曰"园外大夫松"，举座皆为惊奇。因此竹坡深得父亲喜爱。张翃想让儿子早就科第，恐童子试羁縻时日，遂入成均，十五岁人棘闱，点额而回。不久，父亲去世，他因哀痛过度，本来身体就不健壮，这一下竟中下了病根。

父亲死后，家道渐见中落，为了糊口，张竹坡终日奔走他乡，饱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由于"穷愁所迫，炎凉所激"，27 岁时他已满头白发。

张竹坡少负奇才，长安诗社每聚会不下数十百辈，竹坡访至，登上座，竟病分拈，长章短句，赋成百有余首，众才子皆为倾倒，一时都下称他为"竹坡才子"。

张道渊记，竹坡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偶见其翻阅稗史，如《水浒》、《金瓶》等传，快若败叶翻风。日影方移，而览辙无遗矣。"

张竹坡性好交游，虽然家境困苦，但经常高朋满座，每天的收入，仅够茶饭而已。

26 岁那年，张竹坡开始评点《金瓶梅》这部旷世奇书，有人说，这部书卖给坊间可获重价，张竹坡说："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他的评点本付刻后，果然反响强烈，一时远近购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争相访求，每天都有十几人。

张竹坡为招待这些朋友几乎倾家荡产。有一天，他大呼曰："大丈夫宁事此以羁吾身耶？"遂将《金瓶梅》一书的书版，弃置于逆旅主人，孵身北上。遇到一个朋友在永定河工地当监工，便荐他到工地效力，于是，张竹坡白天督理施工，晚上秉烛读书，通宵达旦，有时竟数十夜目不交睫。完工后，张竹坡突然发病，呕血数升，同事急忙找来医生，已不能出一语，药铛未沸，竟奄然气绝。他死后，人们检点他的遗物，只有四子书一部，文稿一束，古砚一枚而已。这位青年评论家负才拓落，命途多舛，一生曾五次乡试，皆困于棘闱而不能博一第。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张竹坡为什么评点《金瓶梅》呢？

他在《竹坡闲话》中谓："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拘，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谓："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夫邪说当

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辟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若不预先辩明，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是用抒诚以告仁人君子，其予量之。”

虽然反复说此举不过是出于养家糊口所计，但其字里行间，却摆进了自己家世遭遇的种种感慨。

张竹坡是如何评点《金瓶梅》的呢？

他继承和发展了金圣叹评点《水浒》的方法，其评点形式为书首专论、回首与回中总评，以及眉批、夹批、圈点三部分。

专论部分，有《第一奇书凡例》、《杂录小引》、《竹坡闲话》、《冷热金针》、《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等九个篇目。明清小说评点中运用专论这一形式的，实从张竹坡开始。

这几篇专论和“读法”一百零八条，是《金瓶梅》全书的导读大纲。而每一回目中的回评和眉批、旁批，则是细部赏析指南，二者相形益彰，构成了中国所独有的小说理论批评结构体系。

张竹坡的评点，既有概括论述，又有具体分析，将这部百回大著以解牛之刀进行擘肌分理的剖析。对其主旨、立意、题材、布局、结构、人物、情节、语言乃至思想内涵，艺术特征，创作手法诸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细微、深刻的评价，把中国的古代小说批评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张竹坡的评点分别阐述了以下几点：

一、“非淫书论”。

张竹坡说：“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又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十二）”；“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读法”五十三）

张竹坡此论，可谓惊世骇俗。他强调了《金瓶梅》这部奇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确立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形态。须知，当时官方正大张旗鼓地禁“淫词小说”哩。

二、泄愤说。

张竹坡指出：“《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者。”这部书，实是“独罪财色”的泄愤之作，“著此一家，骂尽诸色”，“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它暴露的是整个封建势力的腐败。所以，在读《金瓶梅》时，“必须置唾壶于侧，庶便于击”，或“必须列宝剑于右，或可划空泄愤”，或“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饮，以消此世情之恶。”

张竹坡点评《金瓶梅》，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我却批完此一回时，心血已枯了一半也。”（第四回回评）“我不觉为之大哭十日百日千日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也”（七十三回回评），“我亦不能逐节细批。盖读此等文，不知何故，双眼惟有泪出，

不能再看文字矣。读过一遍，一月两月，心中忽忽不乐，不能释然”（七十八回回评）。

张竹坡的“苦孝说”是从另一个角度阐发和补充“泄愤说”的。他说：“《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苦孝说》）从创作主旨、作者意图到社会效果、思想意义，皆鞭辟入里。

三、“冷热金针”与“市井文字”说。

张竹坡认为，“冷”、“热”二字是这部大书的一只金钥匙。他说：“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热亦无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热而明日冷，则今日之真者，悉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竹坡闲话》）

又说：“《金瓶》是两半截书，上半截热，下半截冷；上半截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读法”八十三）“其起头热得可笑，后文一冷便冷到彻底，再不能热也。”（“读法”八十七）

一管冷热金针，痛砭了炎凉世态。

张竹坡还强调，《金瓶梅》是“一篇市井的文字”。《金瓶梅》中的男女主人公，皆为市井小人：“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

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读法”三十二）因此，写这些市井小人只能以“一派地狱文字”，于是作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作一钝笔，于瓶儿不作一深笔，于春梅纯用傲笔，于敬济不作一韵笔，于大姐不作一秀笔，于伯爵不作一呆笔，于玳安不作一蠢笔。”（“读法”四十六）

另外，对《金瓶梅》成功地塑造人物和其创作手法，张竹坡也作了极为详尽的评点，概括出其特色，立了许多名目。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十余万言的文字中，洋溢着这位青年评论家汪洋恣肆的激情。

张竹坡的评点，虽有些地方难免牵强附会，琐碎拘密，但他所建构的《金瓶梅》理论体系，却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张竹坡的评本，现在通称“第一奇书本”。是《金瓶梅》传播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本子。在张竹坡评点之前，只有少量的万历丁巳本与崇祯本，张评本一出，却一下子出现了几十种刊本，不仅第一个译本——满文本以此为据，连国外各种文字的早期译本也脱胎于此。

因此，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实在是功不可没。

除了评点《金瓶梅》之外，张竹坡还评点过张潮的《幽梦影》，也为《东游记》写过评语，并有诗集《十一草》行世。

潜心于张竹坡研究的学者，成就最大当推吴敢。吴敢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是治明清小说戏曲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5月以来，他多方访求，在铜山县罗冈村访得张竹坡后裔张

伯吹，并发现了《张氏族谱》，这一发现，揭开了笼罩学界多年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的迷雾。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虽然刘廷玑《在园杂志》早在康熙五十四年就作了记载，绝大多数版本的《第一奇书》也都镌有《彭城张竹坡批评》字样，但张竹坡是否评点过《金瓶梅》，始终有人持怀疑态度。国外有学者说张竹坡是安徽歙县人，更有人否定张竹坡的存在，认为系书商所伪托。《张氏族谱》的发现，张竹坡的家世生平遂全面揭晓，蔚成大观。

吴敢的张竹坡研究，有两部专著出版，第一部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推出。该书利用新发现的张竹坡著作、传记与宗族文献，考证理清了几种不同年代的张竹坡家谱，编制了张竹坡年谱。该书资料详实，一经刊布，遂成定谳。第二部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该书对张竹坡的生平行谊进行详细考证，对张竹坡的小说理论探奥发微。这一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并先后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等20多家报刊、电台作了专题介绍。

17

文禹门"反弹琵琶"

清代有三个人为《金瓶梅》作过评点，第一人被认为是李渔，第二人是张竹坡，第三人便是文龙。

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原籍不详。约生于道光十年（1830）前后。光绪五年（1879）任南陵知县，光绪八年（1882）改任芜湖知县。约卒于光绪十二年（1886）。

文禹门评点《金瓶梅》始于光绪五年（1879），止于光绪八年（1882），历时三年多。

文禹门的评本是手批稿本，没有刊刻过。他的评语就写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的在兹堂本上面。共有手书回评、眉批、旁批计六万余言。尤其是回评，独立成篇，对《金瓶梅》的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等作了多方面的评论与探索，颇多卓见。这个手批本是《金瓶梅》研究专家刘辉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分馆发现的。笔者1990年亦在该馆得以寓目。这个本子保存比较完好，仅有少数阙字。回评之后，往往附有简略的札记，记一些公办杂务、迎来送往，宾朋交接或家庭琐事。

文禹门什么时候读到的《金瓶梅》呢，据他写在第一册后面的附记上说，他从幼年就知道有这样一部书，但一直没有见过。直到咸丰六年（1856）在昌邑县公干逗留，住在李会堂广文学署，才得以纵览一遍，从那以后竟如浮云逝水。不久，就听说《金瓶梅》的原版已被劈毁焚烧，这部奇书，也就成了嵇康的《广陵散》了。他到安徽以后，有一次在安庆的书肆上，偶然遇到过一部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在兹堂棠本，书贾要价五元，当时嫌贵没有买下。有个叫邵少泉的朋友，知道他有闲书癖，到各处搜罗，竟然买回了这个版本，委托朋友寄来。可惜被人抽去了其中三本，不成全璧。不过没多长时间，邵少泉便将抽去的三本补寄给他，这样他就有了一套完整的在兹堂本《金瓶梅》了。

文禹门批点《金瓶梅》的态度是"不作人云亦云"。因为他的批语是直接写在张评本上的，所以有相当一部分评语是针对张竹坡的观点有感而发，在对一些人物和事物的评价上与张竹坡"反弹琵琶"，甚至形同冰炭。尤其是对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这三个人物的评价，文禹门与张竹坡更是处处唱反调，简直是针尖对麦芒。

比如，第七回张竹坡有关于对孟玉楼的评语谓："至其写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而文禹门则反唇相讥："批书者，总以玉楼为作者自况，不知从何处看出，而一口咬定，惟恐旁人不理会，时时点出，是可怪也。夫玉楼诚不愧为佳人，然亦有不满人意处。夫死不满两年，家资颇颇过得，宗保亦是乃夫胞弟，纵不能守，亦何必如此其亟，且又若此之草草也。岂一见西门庆，便魂飞魄散，如潘金莲不能自主，如

李瓶儿不能自由耶？妇人色急若斯，便非善良。”在第十八回的第二则回评（写于光绪八年）中，又谓：“批此书者，每深许玉楼而痛恶月娘，不解是何缘故？夫批书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过苛，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也。”这里，把评家应持之公允态度，说得很透彻了。

又如二十五回，张竹坡有夹批谓：“写玉楼真正好人。”文禹门则针锋相对：“写玉楼真正老奸之辣货也”。

再如第二十九回回评中，文禹门又直指张竹坡之失：“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批者深恶月娘而深爱玉楼，至谓作者以玉楼自比，何其谬也。”又说：“金莲之妒，明而浅，玉楼之妒，隐而深。金莲之妒为固宠，玉楼之妒在谋嫡。”

对吴月娘的态度，二人更是水火不相容。

第十二回，张竹坡有批语谓：“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文禹门大不以为然：“批者总以为月娘阴险，试问，遇此顶踵无雅骨，脏腑有别肠，为之妻者，将如此良人何也？”在第十八回回评中，文禹门又强调：“若吴月娘，一千户家女耳。非有褓姆之训导，又无诗书之濡染，不同阀阅之家，又非科第之室，一小武官之女，而嫁与市井谋利之破落户，既属继配，又遇人不淑。此而责之以守身以礼，相夫以正，治家以严，又要防患于未萌，虑事于久远，无乃期望太深乎……批书者何期望月娘之大，而责备月娘之深也。我非谓吴氏之不可多

得也，偏好偏恶，待人接物皆不可，而况形于笔墨，使人咸知其有所偏也。”

第十九回吴月娘在自家花园行走，张竹坡批曰：“又大书月娘之罪。”文禹门抱打不平：“然则自家妇女不可游自家花园矣。何罪月娘之深也。作者未必有此心，批者不知从何处看出，或者先生令正终日坐在床上不出房门也。”

对于春梅的态度，二人不仅相左，逗上火气来，文禹门简直要破口大骂了。第五十八回张竹坡评语认为：“《金瓶》内有两个人为特特用意写之，其结果，亦皆可观。如春梅与玳安儿是也。于同作丫环时，必用几遍笔墨描写春梅，心高志大，气象不同。”文禹门则讥之为：“其目光直不可尺计！”第七十六回张竹坡批语谓：“批书者自信，能为春梅，不能为玉楼矣。”文禹门怒形于色：“批者自愿为春梅，呵呵，现出原形，露出本色来了。看来也不是个好东西，无怪其满口胡谈，一味咒骂也，并无半句中肯处。然则并春梅之不如耳。”

二人这种激烈的争辩，随处可见。

尤其可贵的是，文禹门在他的评语中，有不少篇幅涉及到了批书的方法和小说的审美特征，如他说：“看书要会看，莫但看面子，要看到骨髓里去；莫但看眼前，要看往脊背后去，斯为会看书者矣”。（第二十七回回评）还有前面我们所例举过的他对张竹坡批书态度的指责，这些虽已超出了对《金瓶梅》的文本批评，但却可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另外，文禹门的评语中，对《金瓶梅》人物形象所揭示的社会意义，也有独到的见解。如他说：“《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

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其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第七十九回评）

在这里，文禹门指出，对丑的发现与否定，才是《金瓶梅》这部世情书的宏旨之所在。丑，也可以是不朽的。

《金瓶梅》实在是一部"审丑"的书，作者把一个丑恶的世界无情地撕破了让人看，正是由于他推倒了那堵人为地砌筑在美与丑之间的高墙，才使自己的艺术视野获得了纵浪大化的拓展。

对于《金瓶梅》这部书，文禹门是不同意把它作为"淫书"来定性的。他说："是书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决非若《驻春园》、《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书之信口开河，无情无理，令人欲呕而自以为得意者也"（七十五回评）。在第一百回回评中，他复指出："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一些淫秽的描写，毕竟是《金瓶梅》中的客观存在，如何认识这个客观存在，文禹门的观点是："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这比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更进了一步。

18

蒲松龄称《金瓶梅》为"淫史"

有学者认为：以一部《聊斋》而名满天下的文学大家蒲松龄，对《金瓶梅》颇有一些成见。根据是他的《聊斋志异》卷八中，讲过一则名为《夏雪》的故事：

丁亥年七月初六，本当盛暑，而苏州却忽然下起了大雪。老百姓惊惶恐惧，都到大王庙去祈祷菩萨保佑。菩萨忽然依附在一个求神者的身上，借他的嘴说："如今被称作'老爷'的，前头都加了一个'大'字，难道你们认为我这个菩萨小，消受不起一个'大'字吗？"众人害怕极了，齐声高喊："大老爷！"雪立刻就停了。照这么看，神也是爱奉承的。难怪那些治屁股病的医生，得到的赏格是格外丰厚啊。

讲完这个故事，蒲松龄发表了如下感慨：

异史氏曰：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举人称爷，二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

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谒中丞，亦不过老大人而止；今则此称久废矣。即有君子，亦素谄媚行乎谄媚，莫敢有异词也。若缙绅之妻呼太太，裁数年耳。昔惟缙绅之母，始有此称；以妻而得此称者，惟淫史中有乔、林耳，他未之见也。唐时，上欲加张说大学士，说辞曰："学士从无大名，臣不敢称。"今之大，谁大之？初由于小人之谄，而因得贵倨者之悦。居之不疑，而纷纷者遂遍天下矣。窃意数年以后，称爷者必进而老，称老者必进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称？匪夷所思已！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归德府大雪尺余，禾皆冻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术也。悲夫！

蒲松龄这则故事，意在讽刺世风。借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抨击社会现实中的异常现象，针砭了"下者益谄，上者益骄"的不良风气。这则故事虽未点出《金瓶梅》的书名，但却引用了《金瓶梅》中的典实：以妻的名分而得以被人称为"太太"的林、乔，即是《金瓶梅》中的林太太和乔五太太。

"太太"之称谓，始于汉。汉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为帝太后，后又尊为皇太太后。梁绍壬谓："此妇人称太太之始"。（见《两般秋雨盦随笔·太太》）明代中丞以上的官吏之妻，得称太太。《金瓶梅》中的林太太，是朝廷命妇，称太太尤未不可，但《金瓶梅》中第七十二回西门庆初会林氏，却一叠声地连称"老太太"，则大荒谬了。至于乔五太太，只是乔大户的老婆，虽沾了点皇亲，却是不能够称之为"太太"的。明季之礼崩乐坏，由此可见一斑。

借这部书的典实，蒲松龄给了《金瓶梅》一个“淫史”的定评。

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王”之称的蒲松龄，原本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他的《聊斋志异》，亦以情奇而称诸于世。他笔下的情妖、情鬼，风情万种；人狐之恋、人鬼之恋、人仙之恋、人妖之恋，更是情奇意深。那些感天地、通阴阳、跨越幽冥的至情至爱的故事，成为令人百读不厌的艺术佳作。

而他却把同样一部世情小说称之为“淫史”，则未免有失公道了。

然而，成见归成见，据有关资料记载，蒲松龄对《金瓶梅》这部书还是很喜欢的。他甚至与他的同乡朋友李希梅（字尧臣）以背诵《金瓶梅》中的散曲为戏。

一次，蒲松龄跟李希梅比着背《金瓶梅》书中的内容，蒲松龄先背诵了第八回中的《山坡羊》：“乔才心邪，不来一月，奴绣鸳衾旷了三十夜。他俏心儿别，俺痴心儿呆，不合将人十分热。常言道：容易得来容易舍。兴，过也；缘，分也。”

李希梅则背诵了第五回《捉奸情郓哥定计，饮酖药武大遭殃》的开场诗：“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姻缘是恶姻缘。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野草野花休采折，真姿劲质自安然。山妻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损钱。”

蒲松龄听罢笑道：“不是‘野草野花’，而是‘野草闲花’，该打板子了。”李希梅道：“此是初犯，免了罢！”

蒲松龄又背了第六回《何九受贿瞒天，王婆帮闲遇雨》中的一首诗：“寂寂兰房簟枕凉，佳人才子意何长。方才枕上浇红烛，忽又偷来火隔墙。粉蝶探花香萼颤，蜻蜓戏水往来狂。情

浓乐极犹余兴，珍重檀郎莫负忘。”

李希梅听了也大笑道：“这回该你老兄挨板子了，不是‘莫负望’，是‘莫背望’。”蒲松龄狡辩道：“背者，负也！可以互训，免了罢，免了罢！”

接着李希梅背诵了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杨姑娘气骂张四舅》的结尾诗：“乍睹多情风月标，教人无福也难消。风吹列子归何处，夜夜婵娟在柳梢。”

蒲松龄又背了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中，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在王婆家偷欢时的那篇赋：“交颈鸳鸯戏水，并头鸾凤穿花……”，李希梅即刻对以西门庆与潘氏在王婆家脱衣解带时的两首打油诗，二人相视大笑。

蒲松龄复曰：“只能背诵还算不得本事，咱们每人且赋诗一首何如？”说罢，即就《金瓶梅》第一回张大户收用潘金莲一事，顺口吟道：“二八佳人妻老郎，白发苍苍配红妆。夭桃却少春前柳，弱雨难当秋后霜。织女有情嫌夜短，牛郎无力恨更长。轻轻掀开红绫被，一树梅花压海棠。”

李希梅笑道：“孔夫子主张述而不作，正是圣人高见。高手正不用触景生情，且看咱如何点石成金。”接着，就将《金瓶梅》第七回的引首诗点化而出：“天下为媒实自能，全凭两腿走殷勤。唇枪惯把鳏男配，舌剑能调闺女心。利市花常头上戴，喜筵饼锭袖中挣。只有一种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

蒲松龄道：“如此点石成金，实为妙绝，将‘我做媒人’改做‘天下为媒’实是骂尽天下媒婆。只不知老兄将‘烈女’改为‘闺女’是为何故？”李希梅笑道：“难道兄台不知我素不喜‘烈女’二字？”蒲松龄抚掌叫绝。

李希梅道："圣人云：见贤思齐焉。兄何不一试身手？"蒲松龄道："善哉。"接口吟道："富贵功名，由命不由俺；雪月瑟瑟，无拘又无管。清闲即是仙，莫怨身贫贱。好月初圆，新醅倾几盏；好花初开，奇书读一卷。打油歌儿将无遣，就里情无限；留着待知音，不爱俗人看。须知着：识货的，另是一双俊眼。"

李希梅击节叫绝："果然身手不凡！我还只是点石成金，老兄简直是'夺胎换骨'了"。

原来，蒲松龄是将《金瓶梅词话》卷端的四首引词中的句子加以点化，却又天衣无缝。

以上是临清叶桂桐先生据蒲松龄《琴瑟乐曲》改编的一个故事。虽是故事，却是信而有征的。

另外，《蒲松龄集》中还收有一个未成稿的套曲《丑俊巴》，写的是猪八戒与潘金莲的一段荒诞不经的情缘。开头的"西江月"谓："一个说金莲最妙，一个说八戒极精；我遂及他撮合成，那管他为唐为宋。净坛府呆仙害病，枉死城淫鬼留情；丰都城畔喊一声，就成了一双鸾凤。"颇有韵致和风趣。

于此，蒲留仙对《金瓶梅》的态度，可见大端了。

19

大山水　大奇书

——清代学人眼中的《金瓶梅》

有清一代，文网最密，文祸最炽，书禁亦最为酷烈。

然而，对《金瓶梅》这样一部处在一片讨伐之声中的小说，却颇有一些绝去町畦的学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首先，他们认为《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而是一部奇书。且把它同《三国》、《水浒》、《西游》并列。李笠翁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中谓："尝闻吴郡冯子犹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

刘廷玑则把《金瓶梅》同其它三部奇书相比较，认为《水浒》写出了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串插连贯，各具机杼；《三国演义》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仿效陈寿（《三国志》作者）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不足之处，是描写战争场面，不脱稗官窠臼；而《西游》实为证道之书，平空架构一蜃楼海市，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妙理在。但"若深

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在园杂志》申报馆丛书本）

刘廷玑还谈到了端正读书态度问题。以上四部文学名著，全在于你善读不善读。不善读《水浒》的人，易生狠戾悖逆之心；不善读《三国》的人，易生权谋狙诈之心；不善读《西游》的人，易生诡怪幻妄之心。而要读《金瓶梅》，首先要领会卷前欣欣子序文，那序文中说：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如果只看书中那些关于秽行的描写，又岂非禽兽乎。

这位刘廷玑，曾开列了一串应予“斧碎枣梨”、“尽付祖龙一炬”的“淫词小说”名单，如《灯月园》、《肉蒲团》、《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间传》、《痴婆子传》、《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等，独不包括《金瓶梅》。

为《绿野仙踪》写序的陶家鹤，曾把《金瓶梅》比作说部中的大山水：

> 今天下山水一大游局也。故善游者，历三峰五岳九州之广，浮大河长江四海之阔，睹琼宫贝阙之巍焕，入茂林丰草之深幽，穷神仙之栖止，探虎豹之窟宅，举凡舟车所不能至，猿猱之所不能居者，皆遍览无遗焉。

然后与之观小山小水，宜其弃置而不顾。即间有一拳石，一勺水，视同千仞之岗、万里之流者，再目之而神气已竭矣。以其人胸次泼如，眼界廓如故也。若但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据邱岭以为崇，指池沼以为渊，管窥蠡测，又乌足语山水之大哉！余意读说部亦然，《水浒》、《金瓶梅》，其次《三国》，即说部中之大山水也。

……世之读说部者，动曰："谎耳，谎耳。"彼所谓谎者固谎矣。彼所谓真者，果能尽书而读之否？左丘明即千秋谎祖也。而世之读左丘明文字，方且童而习之，至齿摇发秃而不已者，为其文字谎到家也。夫文至于谎到家，虽谎亦不可不读矣。愿善读说部者，宜急取《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三书读之。彼皆谎到家之文字也。谓之大山水大奇书，不亦宜乎。

（道光二十年武昌聚英堂刊本
《绿野仙踪》序）

一部好小说，即是一部大山水。其中曲涧奇石，茂林修竹，自成气象。作为一部世情大书，《金瓶梅》可谓展示明代社会横断面和纵剖面的巨幅写真。它既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描写对象，也不同于《西游记》以神魔故事为张本，它拦腰斩断了英雄主义风尚和浪漫的精神传统，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说《金瓶梅》是一部"大山水，大奇书"，并不仅仅在于它所展现的开阔的场景，繁纷的布局，而在于它在反映现实生活

方面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书一百回，九十余万字，写了七百多个人物，多层面、多角度对社会现实作出了清醒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以西门庆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大开大阖、脉络关纽，自是一种卓尔不凡的腕底春秋。

跟李渔差不多同时的宋起凤，推崇《金瓶梅》为"晚代第一种文字"。他说：《金瓶梅》一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也，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稗说》）

宋起凤在《金瓶梅》作者问题上，是执王世贞说的，《四部稿》系王世贞平生著作，他认为《金瓶梅》是王世贞平生著作中最有光彩的文字，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这部才子书目为秽书，是何等的不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宋起凤不仅给予了《金瓶梅》很高的评价，而且对这部大著作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也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对它新的小说美学观念也予以热情的肯定。

《金瓶梅》的作者不是有意的猎奇炫异、耸动视听。它虽然从《水浒》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引出，蔚然而成大国，但却容纳了跟《水浒》完全不同的审美内容，表现了与《水浒》迥然相异的审美观念。《金瓶梅》作者所关注的，不是那些拔树举鼎的英雄，而在于那些有血有肉的市井人物，不是那些铁马金戈的征战厮杀，而是那些"吃饭穿衣"的"平常日用"。把那些

"碗儿碟儿"的"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写得凿凿有味儿。宋起凤的一段文字，可谓时评。由此，也看出了清代学者对小说艺术认识的加深和对《金瓶梅》成就的更深层面的理解。

夏曾佑也认为，作小说有五难：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三国志演义》竭力写一关羽，乃造成一骄矜灭裂之人。又欲竭力写一诸葛亮，乃适成一刻薄轻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是以作《金瓶梅》、《红楼梦》与《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写君子，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尚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而文明之君子则无法写矣"。

二、写小事易，写大事难。所谓小事，诸如打情骂俏、吃酒、旅行、鸡鸣狗盗之类，所谓大事如废立、打仗之类。夏曾佑说："《金瓶梅》、《红楼梦》均不写大事，《水浒》后半部写之，惟三打祝家庄事，能使数十百人一时并见于纸上，几非《左传》、《史记》所能及，余无足观。《三国演义》、《列国演义》专写大事，遂令人不可向迩矣。"

三、写贫贱易，写富贵难。

四、写实事易，写假事难。金圣叹曾说：最难写打虎、偷汉。所以《水浒》写潘金莲、潘巧云偷汉子很成功，写武松、李逵打虎则有不少败笔。"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蛮杀，固无足论；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头之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则其事不能不自见矣。

五、叙实事易，叙议论难。“其法是将实景点入，则议论成画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经世文编》面目，岂不令人喷饭”（清光绪二十九年刊行《绣像小说》第三期）。

由此看出，有清以来，学人对《金瓶梅》研究与评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层面。他们所探讨的，不仅仅是对这部旷世奇书的定义与评价，而深入到创作方法、作家风格和作品基调等诸多方面。


女人們就象一個蘋果
EXLIBRIS

20

“真本”与“古本”的迷雾

民国二年五月，上海的存宝斋发行了《金瓶梅》的又一种版本——《绘图真本金瓶梅》。

这个本子全100回，精装二册，上册卷首附《绘图真本金瓶梅提要》，还有一位蒋敦艮同治三年二月写的序，一位叫王昙的作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的《金瓶梅考证》。

这个蒋敦艮的序说：

曩游禾郡，见书肆架上有抄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为小玲珑山馆藏本，赠大兴舒铁云，因以赠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证四则，其妻金氏加以旁注，而元美作书之宗旨乃揭之以出。书贾索值五百金，乃谋诸应观察以四百金购得之。此书久列禁书之中，儒林羞道之，实不知其微妙推训乃尔（按：此书大约有二本，马本外惟随园本，曾询诸仓山旧主，据云：幼时犹及见之，洪杨之劫，园既被毁，书亦不知所在云

云），用是叹作伪者之心劳日拙，而忠臣孝子之心，卒能皎然自白于天下后世。分宜之富贵，东楼之贪侈，熏灼朝野数十年，已等于飘风之过耳，元美之口诛笔伐已快于九世之复仇，则此书之得以留遗，经一二名人之护持宝玩，完好如故，未始非天之劝恶惩善，有以阴相之也。此意曾与应观察道及之，拟集众力，付诸剞劂。观察以蒙禁书之嫌，故迟回而未有以应。人之好事，谁不如我，后岂无仲瞿其人乎？吾将完此书以待之。同治三年二月蒋敦艮识。

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云：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构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溥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旧说如此，窃有疑。元美为一代才人，文品何等峻洁，不应有此秽亵之作；阴险如东楼，既得其情，安得不为斩草除根之举？明知之而故纵之，亦非东楼之为人。得此原本而诸疑豁然矣。

曾闻前辈赵瓯北先生云："《金瓶梅》一书为王元美所作，余尝见其原本（随园老人曾有此本），不以似传之俗本，铺张床笫等秽语，纸上溥药以毒东楼，其说支离不足信也。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

忌器，断不压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此书曾于舒文处见抄本），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伪，何物圣叹从而扇生毒焰，扬其恶潮耳。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毁之（按今本每回后有圣叹长批，大半俗不可耐，或亦是后人伪记）。

按此原本乃小玲珑山馆主人赠舒文者，不知与云松观察所见之本有无异同（赵所见为随园本否，他日当问之），珍珠密字，楷法秀丽，余妻尤爱玩不置，绣余妆罢，意为之注，颇能唤醒恶人不浅。拟与舒文力谋付梓，为元美一雪其冤。

秀水王昙识于鉴湖借隐庐，时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日也。

蒋敦艮与王昙，何许人也？

蒋敦艮，实为蒋敦复，原名尔锷，字克父，一字剑人，他擅长诗词，喜欢谈治国的方针大略，曾经拿着自己的计策去拜访过杨秀清，大概杨秀清觉得这个人过于空浮，不愿意用他，于是，他便四处周游，到了晚年，郁郁不得志而死。

王昙，字仲瞿，他是浙江秀水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活了58岁。乾隆五十九年他中了举人，此人学问淹通，尤工骈体文，同时喜欢游侠，兼通兵家言，其著述达三百卷，大多散佚，现在仅留下《烟霞万古楼文集》、诗选以及《仲瞿诗录》、《回心院》曲本。

蒋氏的“序言”和王氏的“考证”，是一出绝妙的双簧。一唱一合，配合得十分默契。二人都说这部书才是“真本”，“原本”。而此书相传为王世贞原作，也有人说是李卓吾先生所编，像他们这样文品高尚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污秽不堪的东西?这些东西全是明末无德的文人加上去的。现在终于弄到了《金瓶梅》真正的原本，可以拨乱反正，给王世贞一洗不白之冤了。这个“真本”一出，所有的伪造的赝品可以全部烧掉了。

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

这个所谓的“真本”，跟万历本、崇祯本和张竹坡评本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本子，实际上是张竹坡评本的删写本。它在维持原书百回篇幅和主要线索的基础上，将所有的污秽描写都删除一净。第一回与张评本相同，第二三四回为重新杜撰，描写西门庆忽做一怪梦，梦醒之后，访高僧、拆字，寻金莲，以及卓二姐游地府、有唱道情者为西门庆、花子虚现身说法等，直到第五回才在情节上与张评本对接。

“真本”与张评本相比，其中回目改动处甚多，有的即使回目一致而内容却大相径庭。这个删改本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删去了原书中的淫秽描写。成为一部真正的“洁本”；

二、将书中的山东方言，全部改为比较通俗流行的语言；

三、大为缩小了原书的篇幅。

那么，这蒋敦复和王昙，是否就是所谓《真本金瓶梅》的作伪者呢?

问题偏偏不那么简单。

蒋敦复和王昙的“真本”既然发现于乾隆末年，但在1915

年之前，从社会上并无任何有关“古本”、“真本”和“原本”的信息，而且从蒋敦复、王昙和他们友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一点这件事的影子。

是谁最早披露出了《绘图真本金瓶梅》的消息呢？

最先报导这个消息的是1915年发行的《香艳杂志》第九期。

那一期上，发表了署名废物的《小说谈》，专谈《金瓶梅》，云：

不作《小说谈》久矣。客之阅我杂志者，书来屡以为言，勉应其意，聊贡数则，专说《金瓶梅》事。其书不久当发现于世，爱读者当不河汉我言也。

这段话颇值玩味，他怎么预先知道“其书不久当发现于世？”接下去他又说：

今春过某氏（某氏素富藏书，以藏此书故不愿宣其姓氏），见有此书原本，则与俗本全异，为乾隆时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所藏抄本，以赠大兴舒铁云，铁云转赠诸秀水王仲瞿者。仲瞿有考证四则，中有评注，则其妻金云门氏之笔也。简首有蒋剑人序。计此书经过之历史，由马而舒，由舒而王，由王而蒋，由蒋而归于某氏。近某书局请于某氏，拟借抄以刊行之，以存王本之真，以正俗本之误，甚盛举也。

这一期《香艳杂志》还全文附录了王昙的《金瓶梅考证》，

似乎来龙已十分清楚了。

这位“废物”先生者何人。

此人乃是《香艳杂志》的发行人和主编王文濡。

王文濡，字均卿，别署新旧废物等，浙江吴兴人。曾主进步书局、国学扶轮社，辑政多年。后来又为中华、文明两书局编刊了许多名家诗文集和楹联尺牍，尤以《说库》、《笔记小说大观》、《香艳丛书》费力更大。1914年冬，他跟邹翰飞、高太痴、张尊孙等编刊《香艳杂志》。

然而，《香艳杂志》上刊发的王仲瞿（王昙）的这篇考证，跟存宝斋《绘图真本金瓶梅》卷首的“考证”，不但题目不同，多了“古本”二字，且文字也多有出人。黄霖先生考证，存宝斋本与《香艳杂志》所附该文，重大不同有四处之多，章培恒先生曾指出，王仲瞿的《烟霞万古楼文集》中的《继室金氏五云墓志铭》曾说，王与其继室金五云成婚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四日”，但“考证”既是作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日，何来“余妻尤爱玩不置”之语，一眼便可看出此乃伪托。

至于“蒋敦艮剑人”的序，也疵漏迭出。特别是蒋剑人名敦复，而“真本”却一再称之“敦艮”，这个序也充斥着伪造的迹象。

“真本”《金瓶梅》付刊十年之后，即1926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冒称“从藏书家蒋剑人后人以重价得此抄本”，予以重印，易名为《古本金瓶梅》。

这年五月二十八日，有“穆安素大律师”者代表卿云图书公司为发行《古本金瓶梅》登报启事，申明该书“一百回七十万言，内容雅洁，绝无秽亵文字，”应当“依法尽保护之责”云

云。这部“古本”于是被一再重印和翻印，直到1935年排印的词话本问世，近十年时间，“古本”算是独领风骚，“市上公然销行者，只此一种”（周越然《金瓶梅版本考》）。正如《红楼梦》中所云：“假做真时真亦假”。

“古本”、“真本”的迷雾确实让一些人难辨庐山面目。不用说一般读者，就是清代的大学者袁枚和现代学者朱星先生也都上过当，认为这“真本”或“古本”《金瓶梅》就是最早的《金瓶梅》版本。

这两部佛头著粪的伪本，在现在的书摊上还时有见到，且颇能以“真”和“古”的旗子招徕读者，看来扫荡“真本”和“古本”的迷雾，依旧需要下些功夫。

21

山西介休：中国小说史的“地理大发现”

介休，在山西省中部，汾河中游，太原盆地南缘，因晋国贵族介子推隐居其境绵山而知名。介子推曾从晋文公流亡外邦，文公回国后，赏赐随从臣属，介子推却被晋文公忘记了。于是，他便同母亲隐居在现在介休东南的绵上山中。晋文公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不应该忽略的功臣，很是内疚，便到绵山来找他，却百寻不见，于是便放火烧山，心想山上一着火介子推就会跑出来，没想到介子推却宁愿烧死也不愿再与晋文公共事。

人们大多知道介休出好瓷，洪山镇白釉黑花的民窑瓷器斐声海内外。但绝少有人知道，民国二十年在这里发现的一部珍贵版本，刷新了一部中国小说史。

那部珍贵的版本，便是《金瓶梅词话》。

这要先从“文友堂”讲起。

“文友堂”是北京琉璃厂一家很有名气的古旧书铺，老板姓魏，同海内外著名藏书家交往颇多，尤与李盛铎、傅增湘交往

多年，和日本的文求堂也书信不绝。这家书店善本最多，在东口有书库，生意做得很红火。

文友堂在山西太原设了一家分号，收购山西各县所藏旧书。民国二十年，店员在介休县收购到了这部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词话》。此书为百回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无图，除第五十二回缺第七、第八两页，余皆完帙。有欣欣子序，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藏书的人不知这部书的价值，出价很低，一到北京，就定价八百元。

最先被这个中国小说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所激动的是北京的学者们。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都跑到文友堂来了。

这部书最后给北京图书馆买去了。

这部《金瓶梅词话》在明末付刻后，很快就被改写本（即“崇祯本”）取代而一直没有广泛流传。从清康熙张竹坡付刻“第一奇书”依据崇祯本的情况来看，连他也未见到过词话本。张竹坡之后的研究者，也没有谁提到过它。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海内孤本！

民国二十二年（1933），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发动学者集资，以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将这部珍本影印一百部，分给有志研究者参考。

影印本将五十二回所缺二页，用“崇祯本”配补，又将崇祯本每回前的图二幅，计二百帧，合辑为一册添附，共二十一册。21.5×13.8 厘米，附图用白绵纸印刷（孙楷第《书目》：“每回前有精图一页，前后二面写一回事。”刻工为当时名手，可代表当时最精工的徽派木刻画作品，学者们曾根据图上所署刻工姓名，推断崇祯本为杭州版）。

卷首正文前有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占六页，页五行，行十二字），廿公跋（一页），题为东吴弄珠客于万历丁巳冬作的《金瓶梅序》（占二页，每页七行，行十四字），包括有题作酒色财气四贪词的卷头语（占三页，每页八行，行十六字），以及《新刻金瓶梅词话目录》（占十页）。

正文一卷十回，计十卷，在各卷之首题曰“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口”，版心白口，上端题《金瓶梅词话》，鱼尾之下注明回次。基本可窥该书原貌。

尤值得称道的是，刊刻者对原书讹误之字进行了校订。

《金瓶梅词话》的发现和影印，世人才得以见到该书的庐山面目。在与当时流传的“崇祯本”、“第一奇书本”的对比研究中，人们耳目为之一新。

中国小说史上的这一“地理大发现”，很快在学术界掀起了一个《金瓶梅》研究和出版的浪潮。

民国二十四年（1935），郑振铎在其主编的《世界文库》中，分册出版了“词话本”的删节本（只出到第三十三回），民国二十四年十月，施蛰存校点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删节本，刊于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不久，又有襟霞阁主人重刊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刊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上海中央书店的《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另外，中央书店还出版了《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册。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二月，新京艺文书房出版了全本《金瓶梅词话》。

短短十年内，词话本的出版、影印达五、六次之多。

由出版热引起了研究热。除鲁迅、郑振铎、吴晗发表了大量论述之外，胡行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版《中国文学史

讲话》、胡云翼同年出版《新著中国文学史》、谭正璧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中国小说发展史》、陈子展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话》、杨荫深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郭箴一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等，都对《金瓶梅》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评介。

单篇专论的大量出现，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的深化和拓展。阿英、赵景深、阿丁、李冬辰、冯沅君等学者，用现代小说的观念和眼光，重新审视这部旷世奇书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作出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评价。

阿丁在《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一文中说："《金瓶梅》之意识，实是反抗的、积极的"，其宗旨"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他描写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他描写人情的险恶，世态的炎凉"，"他描写愤恨，他描写谄佞，他描写刁滑，总之把整个的现实社会，为之露骨的摄出。如其说《水浒》是反抗现实的小说、《儒林外史》是暴露智识阶级的丑态，《红楼梦》为描写人情的杰作，那么我可说《金瓶梅》一书是兼而有之的。或者还可以说《金瓶梅》是更深刻更现实的代言者。"（《天地人半月刊》第四期）

李冬辰则把《金瓶梅》比作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一样辉煌、反映了一个时代全貌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他于《金瓶梅法文译本》一文中说："《金瓶梅》是一部写实派的真正杰作。我们读了他后，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风俗，语言文字，更知道了那时候的家庭状况和妇女心理，连带着又知道了那时的社会的一切，等于我们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

《卢贡——马卡尔家族》二书，知道了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切一样。”（《大公报》1932年4月25日）

阿英的《金瓶辨》，则介绍了认为《金瓶梅》不是“淫书，而是‘社会小说’”的平子及曼殊两氏的评介，揭示了晚清时的《金瓶梅》观，给人以无穷的兴味。（其文收录于《小说闲谈》）

另外，冯沅君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和《〈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跋》（《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1）二文，整理了《金瓶梅》中一些关于“俗讲”的推测、小说蜕变的遗迹、曲的盛行、“笑乐院本”实例的痕迹等资料。

对《金瓶梅》的艺术特征和艺术成就，现代学者也作了许多方面的探究。施蛰存认为：《金瓶梅》的成功之处，在于“文章细腻，凡说话行事，一切微小关节”，“详尽逼真”，“镂雕入骨”，“所有人情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朝末年流离衰落的社会来”（《金瓶梅词话》跋）。

阿丁指出，《金瓶梅》的精妙，在于“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它“不似《水浒》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儒林’有寒酸可笑的穿插，及‘红楼’之儿女缠绵的言情，材料愈现实愈平浅，而能在平淡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来，这就是不可及处，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

四十年代初，姚灵犀出版了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瓶外卮言》（1940年天津书局出版），这也是现代学者唯一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它汇编了吴晗、郭源新（即郑振铎）、痴云等人的文章，并自撰《红楼抉微》、《金红脞语》、《金瓶小札》、《金瓶集谚》、《金瓶词曲》诸文，并对《金瓶梅》中难解

词语一千七百五十五条予以注释。

《金瓶梅词话》(万历本) 发现以来,《金瓶梅》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已初步看到了《金瓶梅》所开启的小说观念、小说性质的重大变革,以及这部奇书所反映的新的美学维度,比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22

鲁迅与《金瓶梅》

把现代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鲁迅先生是开创者。说起现代金学家，鲁迅先生也当推为第一人。

从1922年到1935年，鲁迅先生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论讽刺》等论著中，都曾对这部旷世奇书作过精深的论述。他站在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的成败得失，作出了客观、公允而又具体的评析，对其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作出了社会的、历史的科学评价。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小说史中的《金瓶梅》

鲁迅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独到之处，是把这部小说放到整个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它的地位和存在价

值。

他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经历了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到元明清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而《金瓶梅》，则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在长篇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是讲史小说的代表，《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而稍晚一些的《金瓶梅》，则代表了"世情小说"的主潮。

专门描写世态炎凉，着重表现人与人之间内在情感、态度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一大潮流，一直与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并驾齐驱。这种以人物的悲欢离合、发迹变态或因果报应为主要模式的世情小说，从晚明开始，便风行一时，《金瓶梅》是异文突起的一部。

鲁迅认为：《金瓶梅》的题材特征是"记人事"，"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鸩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传，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夜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

《金瓶梅》并非是纯客观地展览西门庆和他妻妾们的淫乱，而是通过对西门庆人生历程的淋漓的描写，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金瓶梅》的突出贡献，即在于它的“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一部《金瓶梅》，展现了十六世纪中国封建主义之将死，资本主义已萌芽时期的风情浮世绘，对于我们认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社会矛盾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使《金瓶梅》成为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它在人物塑造上的特征。《金瓶梅》中写出了各类“市井人物”多以数十计，这一群市井俗人，既不是凌空架构的英雄豪杰，又不是子虚乌有的神怪魔妖，他们全都是在生存竞争中有血有肉的各色人物，正是通过对这些士绅商民、贩夫走卒、妓女优伶、帮闲恶棍之类人物的翔实写照，使得《金瓶梅》描写世情的深度和广度，都堪称首屈一指。故鲁迅先生指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这不失为独树一帜之的评。

恒久的艺术魅力

鲁迅先生认为，《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手法有显著的特色。他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漏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同上《明之人情小说》）。

《金瓶梅》既不同于《三国志演义》那样依据史实而顺序铺排，又不同于《水浒传》那样以板块的形式拼接惊心动魄的故

事，它本身就是一部无所依傍的小说。

《金瓶梅》的作者没有去表现《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重大题材”，并不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缺少英雄故事和激荡人心的历史事件。晚明社会的动荡不安是众所周知的，在朝廷内部，各种势力和朋党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国家边陲，战事频仍，农民举义，如火如荼。而《金瓶梅》的作者，却“独罪财色”，选择了以西门庆一家为轴心，“写他一家的事迹”，并通过这一家及其与这“一家”相联系的权贵、士类等社会人物，深刻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现象的本质，展示了特定时代某一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生活真实，收到了“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同上书《明之人情小说》）的典型效果。

《金瓶梅》作者所选择的，并非是鸡零狗碎、平凡琐细、“碗儿碟儿”的小题材，而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尖”而且“新”的题材，非深具大小说家的眼光和腕力，对这样的题材是只能退避三舍的。

书中的人物，由西门庆而联系到他的妻妾、姘妇以及妓女、媒婆、乐工、优伶、和尚、道士、尼姑、相士、方士，以及丫环、仆妇、奴婢、伙计、商贾、帮闲、说客、捣子，以及衙役、县令、府尹、太监、御史、大臣、太师甚至皇帝，所有的人物都是因西门庆而生发出来的，都是以西门庆为轴心而旋转的。作者所关注的是普遍的人生和人的命运。因此，《金瓶梅》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小说中，对人生与命运最具自觉意识的小说。

对于《金瓶梅》“随在显现”的“变幻之情”，亦向为人所称道。为它作序的欣欣子，即称赞它“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谢颐也在序文中称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

望洋而叹。”它不是以时间为使故事情节直线发展的结构单位，而是在交错的时空中，使故事曲线演进，波澜迭出；它虽以西门庆一家兴衰荣辱为主线，但又不忽视对强化主题和主人公性格的副线和支线的拓展，从生活的复杂和辩证性质出发，创造出回旋式的网状结构。“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先生这八个字，实实在在概括了《金瓶梅》的艺术成就。

勿庸讳言，《金瓶梅》中确实有不少污秽的描写，容易在读者中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鲁迅先生从来就认为：对这样的作品，需要“识者给相当的指点”（《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他反对把《金瓶梅》目为“淫书”，他指出：“故就文辞与意向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而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

在这里，鲁迅先生对《金瓶梅》污秽描写的成因问题作了客观的探讨。强调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溃烂和腐败，才“风气既变，并及文林”。在此一环境中生活的《金瓶梅》作者，当然不可能超乎这个社会的世态。

鲁迅又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同上）。对于《金瓶梅》这种既有一定的艺术成就，又有严重的缺失的作品，应给予唯物主义的分析和一分为二的历史评价。不能"因为虎狼可怕"，而让青年们"连用铁栅围起来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

对《金瓶梅》，应有正确的鉴赏态度，"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对王世贞说提出挑战

现代金学家中，首先对《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说提出质疑的是鲁迅和郑振铎。

《金瓶梅》的作者之谜，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清康熙十二年，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将《金瓶梅》的作者坐实为王世贞，此后一些资料多沿用此说。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之说一直影响了二百余年。这期间，虽也有人如礼亲王昭梿等提出过疑议，但却并未动摇过此一说法的根基。

1924 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指出："至于作者是谁，我们现在也还未知道。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

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说'冠其首。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

为什么呢，鲁迅究其原因，指出："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夙仇的。像这部《金瓶梅》中所说的西门庆，是一个绅士，大约也不外是作者的仇家。"但如果一定要认为是王世贞写了《金瓶梅》，则缺少确凿的凭据了。"《金瓶梅》的文章做的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同上）

十一年之后，1935年鲁迅先生又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且介亭杂文二集》）。

虽然仅以"对话全用山东方言"而否定了江苏人王世贞，似乎还缺少一些必要的考据，但先生从读这部书的总体感觉和方言上进行把握，也是有说服力的。须知，当时词话本《金瓶梅》刚刚由山西介休县发现，影印本才出版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金瓶梅》祖本的"庐山真面目"刚刚揭示给世人，先生即有此论，也是难能可贵了。

成书年代的一个失误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是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鲁迅先生是第一个执万历庚戌刻本之说的。他在《明之人情小说》中谓：《金瓶梅》“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故声誉顿盛……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

鲁迅先生关于“万历庚戌刻本”之说的根据，是沈德符在《野获编》卷二十五中的一段记载，此说影响颇巨。郑振铎 1927 年出版的《文学大纲》、沈雁冰同年 6 月所著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均主是说。后来，郑振铎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在 1932 年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词话》，沈德符所谓‘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同时，《金瓶梅词话》“也载着一篇‘万历丁已（四十五年）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文，”因此，“可见它的刊行最早不得过于公元 1617 年，（即万历丁巳）。”在这里，郑振铎推测“词话本”即是初刻本，否定了“庚戌本”之说。

那么，究竟有没有“庚戌本”，我们还是再看看沈德符的记载：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

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房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沈德符所说的"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那一年他在北京遇到袁中郎，问他《金瓶梅》可有全本，过了三年，也就是到了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袁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于是沈借了去抄，抄完了才"挈归"，冯梦龙看了非常吃惊，便怂恿书坊重价购刻。那个时候，马仲良正好出榷吴关，也劝沈德符把抄本拿出付梓，沈没有答应，然而，"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这里有一个"时间差"，所谓"未几时"，是指马仲良出榷吴关而言，而不是沈德符丙午年在北京遇到袁中郎之后的"未几时"。

有学者考证出，马仲良出榷吴关，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此据出自康熙十二年序刻本《浒墅关志》卷八《榷部》。学者们的诸种考据，在前面的一节《吴中高悬国门的黑旗》中已详尽介绍，此不重复。

总之，鲁迅先生的这个失误，是将沈德符丙午年在京遇袁中郎，和马仲良在万历四十一年出榷吴关这两个时间差弄混了。

续书是因果小说的滥觞

鲁迅先生还曾多次谈到《金瓶梅》的续书问题。

在《明之人情小说》中，他详尽介绍了《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的内容和版本情况，并指出：《续金瓶梅》一书，“俱述他人牵缠孽报，而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顾什九以《感应篇》为归宿，所谓‘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第一回）也。明之‘淫书’作者，本好以阐明因果自解，至于此书，则因见‘只有夫妇一伦，变故极多……造出许多冤业，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欲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四十三回）矣。然所谓佛法，复甚不纯，仍混儒道，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惟似较重力行，又欲无所执著，故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

《金瓶梅》的几种续书，概莫能外地都强化了它们的劝戒色彩，如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劈头便是《太上感应篇》一段大文字，整本小说，也仿佛是给《感应篇》来做注脚，借色说空，由空证色。《金瓶梅》原书中的八十多个人物，除极个别人，皆是国贼禄鬼之流，《金瓶梅》世界，即是一片迷离纷乱的“色界”。而这些人物一一进入《续金瓶梅》中，却纷纷皈依佛门：吴月娘最后出家当了尼姑，孝哥当了和尚，仆人玳安则成了道士，连潘金莲和庞春梅二世轮回后也是这样。

从《金瓶梅》到《续金瓶梅》的演变，便是由“入世”到“出世”，由“色界”到“空界”的转换。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说：“此外叙放纵之事，更甚于《金瓶梅》者，为《玉娇李》。但此书到清朝已经佚失，偶有见者，也不是原本了。还有一种山东诸城人丁耀亢所作《续金瓶梅》，和前书颇不同，乃是对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之说，就是武大后世变成淫夫，潘金莲也变为河间妇，终受极刑；西门庆则变成一騃憨男子，只坐视着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的。从此以后世情小说，就明明白白的，一变而为说报应之书——成为劝善的书了。”

鲁迅先生的这个结论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中国的世情小说，以《金瓶梅》为大国，而又不幸终于《金瓶梅》。因为从《金瓶梅》的续书，就已成为因果小说的滥觞。

至于以后的讽谕小说《儒林外史》和杰出的世情小说《红楼梦》的出现，则是另外一种形态了。

鲁迅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开了现代“金”学研究的先河，为后之来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启迪。

23

郑振铎与《金瓶梅》

郑振铎是贡献卓著的现代“金”学家之一。

郑振铎（1898——1958），小说家，文史学家，笔名西谛、郭源新、文基、宾芬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曾创办和编辑过《新社会》、《人道》、《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儿童世界》、《公理日报》、《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报刊，一生著述等身。其所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郑振铎是最早见到文友堂发现的木刻大本《金瓶梅词话》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参与《金瓶梅词话》传播的现代学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郑振铎为上海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即将《金瓶梅词话》重新标点和进行删节，将前三十三回编入“文库”。

郑振锋对《金瓶梅》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亦颇有不少创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金瓶梅：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郑振铎认为，《金瓶梅》实在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它的伟大超过了《水浒传》和《西游记》，《三国演义》就更不能与它相题并论了。因为这部诞生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而且这个社会到了现在还不曾成为过去。

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是不大可能找到中国社会的实况的，因为那些传说中的英雄豪杰和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离现实社会实在是太遥远了。至于比较贴近社会现实的《水浒传》，它所揭露的政治上的黑暗，于现代社会中人读之，也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要在文学中看出中国社会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当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因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谈金瓶梅词话》，原载《文学》创刊号，北京生活书店 1933 年 7 月版）。

郑振铎认为，之所以说《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是因为它在色山欲海的后面，展示着一个病态的封建社会：

> 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
>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在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同上）

这一段文字，真是入木三分。

三十年代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郑振铎借《金瓶梅》大力针砭时弊，可谓一文坛斗士！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神秘的作坊，那么，文学就是挂在这作坊里的一方魔镜。

在这个神秘的作坊里，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是悄悄开始了的，然而那一方魔镜，却总在无情地折射着时间背面的光晕。

《金瓶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不留情面地照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弱国民性。

——泼皮无赖如西门庆者流，胸无点墨如西门庆者流，居然会凭着远远算不上出色的“登龙术”而骤贵一方，成为社会

的柱石。

——猥琐无能如武大者流，浑浑噩噩如花子虚者流，鸡鸣狗盗如韩道国者流，面对这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我们还有什么心境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那是一幅怎样的图景：“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亸，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然而，这幅图景的背后，却是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却是元元百姓的锥心泣血……

郑振铎振笔一呼：“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了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同上）

二、《金瓶梅》成为“秽”书的主要原因

《金瓶梅》，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世纪末荒诞。

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命运的偃蹇，还在抄本阶段，它就背上了“淫书”的不光彩的恶名。

诚如郑振铎所说，“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容不了一根针似的。”（同上）

对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有人曾作过统计：全书共出现一百零五处，其中浓墨重彩的描写三十六处，一般性的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者三十三处。

郑振铎认为，使《金瓶梅》成为一部“秽”书的主要原因，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还有当世的淫秽文学对《金瓶梅》作者的影响。

他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以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版《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同上）。

《金瓶梅》成书的明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穷途末路，整个社会腐败不堪，千疮百孔。淫风炽盛之中，一些文人也跟着推波助澜，于是各种淫秽小说和春宫图画应运而生。

郑振铎文中提及的《金主亮荒淫》，系《醒世恒言》中的一篇话本，收录于该书第二十三卷，原题《金主亮纵欲亡身》，写金主海陵纵淫之事，描写全无忌惮，与《金瓶梅》颇有相合拍之处，以至于郑振铎怀疑二书同出一人之手。

《绣榻野史》为“情颠主人”著，叙扬州二少年，一名姚同

心，号东门生，好男风；一名赵大里，也是一介浪子。二人“白天是兄弟，夜里同夫妻”，为固其爱，姚同心居然让自己的老婆与赵大里私通，赵大里奸占其妻和婢女阿秀、塞红。赵大里因使春药，曾重创姚同心之妻金氏，金氏设计复仇，使大里之母麻婆与姚同心成奸。姚又奸麻婆之婢小娇。此后赵大里、姚同心与金氏、麻婆四人日夜淫乱。麻婆、赵生、金氏终以淫乐过度而死。死后麻氏变猪，赵生、金氏变成公、母骡子，托梦给姚同心，姚忏悔，遂皈依佛门。

《浪史》则书叙一个钱塘秀才梅素先，风流无检，人称浪子的风流生涯。与晚明其它淫秽小说的不同之处，是它剥去了因果报应，以淫止淫的外衣，公开标榜情欲至上，直言“人非草木，岂独无情”，“青春错过，诚难再得”。为了情欲，可以不顾一切理教纲常。丈夫主动撮合妻子与宠奴滥交，母亲竟苦劝亲生女儿与姘夫苟合。并公然宣称“有甚羞处?”“一见才郎，遂丧名节，亦情之常也。”如此大胆地肯定情欲，彻底地否定名教，在中国小说史上殊为罕见。

诚然，这些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金瓶梅》的创作。有学者考证。《金瓶梅》中不少性事场面的描写，实是有意吸收了《如意君传》中的情节，或写动作一样，同出一辙；或写行为相似，同一模式；或具体描绘，一字不差。

郑振铎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也颇囿于当时的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长篇小说的进展》)，但与那些专门描写性活动的作家相比，还是有差别的。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仍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

第一次否定了“嘉靖说”

前代学人，基本上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如沈德符即谓“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之后的屠本畯等均执此说。现代“金”学家中，第一个对“嘉靖说”提出疑问的是郑振铎。

郑振铎通过考证，认为把《金瓶梅》产生的年代放在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

这是因为：一、东吴弄珠客的序作于万历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前流行于世。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故，“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更为合理些。”

二、《金瓶梅词话》中曾引了韩湘子《升仙记》和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看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欣欣子序谓：“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欣欣子所引诸书，把成化、弘治年间的人物称为“前代骚人”——《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都是成化、弘治年间之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况且“插入周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

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浚、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浚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另外，郑振铎又指出，欣欣子序中所举出的《如意传》（即《如意君传》）、《于湖记》，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文史学家，郑振铎不仅表现出对《金瓶梅》有独到的鉴赏力，而且在诸多学术问题上有独到的创见。他的见解对后来的学人，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24

吴晗与《金瓶梅》

吴晗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廓清了三百多年来《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说的迷雾。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尤以明史研究被尊为权威。他从“文学”与“史学”对比研究的独特视角，在1935年创刊的《文学季刊》第1期上，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和时代背景》的长文，令整个金学界耳目为之一新。

一、《清明上河图》与太仓王家毫无关系

吴晗认为，《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父子的被祸及《金瓶梅》的成书，并无任何联系。

王世贞之父王忬，虽确实死于严嵩父子之手，但其个中原因，王世贞自己在他所著《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王忬之获罪于严氏父子，原由颇多，但没有一条是跟《清明上河图》有关的。另外，王忬之得祸，据

《明史》和一些其它方面的资料记载，是由于王世贞不肯趋奉严氏，并且多次恶谑严世蕃所致。比如有一次王世贞跟严世蕃在一起饮酒，座中有客人不任酒，严世蕃举杯虐之，至淋漓巾帻，王世贞看不下去，遂以巨大的酒杯代客报世蕃。严世蕃推辞说因为患伤风，不胜杯杓，王世贞讥曰："爹居相位，怎说出伤风?"使严世蕃深为衔恨。（丁元荐《西山日记》）

《清明上河图》的藏家，曾数次更易，但没有任何一种资料证明王忬曾收藏过《清明上河图》。

那么，这幅名画怎样才与王家在传说中发生关系的呢？王世贞的《四部续稿》卷一六八有两篇《清明上河图别本跋》，王世贞在文中称他曾亲目见到过《清明上河图》的真本和赝本。他说真本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而赝本乃是吴人黄彪所造，也有人说是黄彪据张择端的稿本加以润删，然而与真本殊不相称，但是亦颇有笔致，所缺少的只是腕力。这个赝本为他的弟弟王世懋所藏。乡里的好事人，误以为这是《清明上河图》的真正稿本。

第二篇跋文又说：张择端这个人在宣政年间名气不是很大，陶九畴编纂《图绘宝鉴》时，把当时丹青名手搜罗殆尽，但却不曾载入张择端的名字。"昔人谓逊功帝以丹青自负，诸祗侯（按：系皇家画院中的画师）有所画，皆取上旨裁定。画成进御，或少增损。上时时草创，下诸祗侯补景设色，皆称御笔，以故不得自显见。"这些画师当时都是给皇帝捉刀的，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张择端才名不见经传。"然是时马贲、周曾、郭思信（按：与张择端同时的画家）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择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按：指严嵩）出死

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择端他画余见之，殊不称。附笔于此。”

这两篇跋文都成于万历三年以后，如果此图与他家有关，决不致于如此轻描淡写。何况他又明说这图有真本和摹本，一图为真本，为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后籍没归御府，一图为摹本，由其家弟世懋所藏。

吴晗先生认为：“由以上的论列，我们知道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无论他所说的是《辋川真迹》，是《清明上河图》或《上湖图》，是黄彪的临本，是王鏊家的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无中生有’，应该完全推翻。”

吴晗还认为，如沈德符、刘廷玑、顾公燮等这些有名望的学者，他们离王世贞的时代相去未远，为什么会捕风捉影，以讹传讹？这是因为：一，他们误读了《四部稿》两跋的原意，误会所谓“权相出死力构”的事迹是指他家的事，因而附会了种种故事；二，是由于信赖《野获编》作者沈德符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说的一定可靠；三，由于故事本身悲壮动人，由于好奇心使然，不予考虑，即据以记述，甚或替它装头补尾。

二、王世贞并非《金瓶梅》的作者

吴晗先生认为：《金瓶梅》并非王世贞所作，第一，已经证明《清明上河图》原本与王家无涉，剩下的就是作《金瓶梅》的目的了。因为王世贞作《金瓶梅》，目的是毒死严世蕃或唐荆川，然而实际上这两个人都不是毒死的。严世蕃死于被正法，而唐

顺之比王忬早于半年故世，王世贞怎么能预写《金瓶梅》报仇？

第二，嘉靖时“大名士”多如牛毛，不独王世贞一人。《金瓶梅》不是一部草率完成的苟陋之作，而王世贞的著作生活的序次中，却不能腾出一个位置给《金瓶梅》。

第三，即使王世贞有可能写作《金瓶梅》，但他是江苏太仓的“土著”，怎么能用山东方言完成这一部煌煌百万言的大著作？

三、《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吴晗先生通过大力考证，认为《金瓶梅》是明代万历中期写成的作品，其著作时代当在万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说，决不会后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568——1606 年）。

其根据是：

1. 关于太仆寺马价银子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孟玉楼跟张四舅的一段对话中，曾说过“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

《明史》卷九二《志第六十八·兵四》：

>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
>
> 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
>
>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

马尽买，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

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自万历九年始，上马八两，下至五两，又折征草豆地租，银盖多。……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功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

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

以上便是明代太仆寺贮马价银，朝廷借支的大略情况。《金瓶梅》借这一史实，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朝政的腐败和财政的匮乏。

由此亦可知，太仆寺之贮马价银子是从成化四年（公元1468）起，但数额不大，到了隆庆二年（公元1568）后定例卖种马之半，藏银始多。到万历元年（公元1573）张居正作首相，尽卖种马，藏银达四百余万两。

隆庆时便有了借支太仆银之事，当时因尚无前例，为朝臣所谏诤。到张居正死后（公元1582），神宗始肆无忌惮地向太仆寺支借。其内库所蓄，则靳不肯出。

吴晗先生还援引了《明史》中的大量资料，证实“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数。穆宗享国不到六年（公元1567——1572），朱衡以隆庆二年九月任工部尚书，刘体乾以隆庆三年二月任户部尚书，刘氏任北尚书后才疏谏取太仓银而不及太仆，则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银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后。由此可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即使支借太仆，其次数决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到了张居正当国，励行节价，足国富民，这十年中帑藏充盈，无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由于《金瓶梅词话》的文本中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吴含先生得出了“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的结论。

2. 关于佛道盛衰及演变过程

吴晗先生经过对明代宗教史的详细考证，认为有明以来，武宗时为佛教得势时代，到嘉靖时则道教主宰社会。陶仲文、邵元节等因擅长符咒、房中术而见宠，被封真人之号，所受赏赉，甚至远远超过了建功立业的文臣武将。到了万历时代，佛教又卷土重来，占了上风。《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活动的场面，但以全书论，仍然是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主干，渗透着典型的小乘佛教思想。整本小说，显彰着明显的明佛用意，释家的影子无处不在。

故吴晗先生认为："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3. 关于时尚小令

另外，吴晗还将《金瓶梅词话》与《万历野获编》所载时尚小令相互对比印证，《金瓶梅词话》中载小令，约计不下六十种之多，其中"山坡羊"、"寄生草"、"锁南枝"、"耍孩儿"、"醉太平"、"傍妆台"、"绵搭絮"、"落梅风"、"折桂令"、"新水令"等，大部分亦见诸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然沈氏所记万历中年最为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却又不见于《金瓶梅词话》。《野获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金瓶梅词话》的问世比《野获编》时代略早，故沈德符时代流行的小令，不见载于《金瓶梅词话》之中。由此推断，《金瓶梅词话》是万历三十四年（即《野获编》成书时期）以前的作品。

4. 关于砖厂与皇庄、皇木

吴晗先生指出：太监的得势与用事，与明代相终始。但嘉靖朝却是一个例外。嘉靖时期，世宗严抑宦侍，不使其干政作恶。反之，万历朝则从初年启用冯保、张宏、张鲸等开始，一贯地柄国作威。太监受到重用，一时倍于他朝。尤其是张居正死后，宦官无所顾惮，权焰愈炽，派镇守、采皇木、领皇庄、榷商税、采矿税，地方官吏甚至降为其属下。

《金瓶梅词话》中有许多关于宦官的描写，如看皇庄、管砖厂的两个内相赴席作客时，其座次居然排在地方行政长官的上首，那位周守备亦说："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小说五十六回写一个"六黄太尉"路经山东，一省的官员、巡抚、巡

按，全都围绕着他颠倒奉行。

另外，吴晗先生指出：嘉靖时代，并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词话》中管皇庄的太监，必然是万历时代的事情。至于皇木，更是明代一桩特别的恶政，尤以嘉、万两朝为祸最烈。凡此种种，可以证明《金瓶梅词话》的成书，不可能在万历之前。

吴晗先生对《金瓶梅》的研究成果，自是史家手笔。他对《金瓶梅》成书年代提出的相当有价值的论证，向来为后起的金学家所推重。

25

难得金瓶索解人

——关于《瓶外卮言》

《金瓶梅》研究的第一部论文集，是姚灵犀编著的《瓶外卮言》，1940年8月由天津书局出版。这本书在《金瓶梅》研究与传播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可是因为刊印较早，原刊本至今已极难见到。1989年11月，天津市古籍书店据旧本影印，使这部几成"广陵散"的著作以原貌复现于今日，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和读者。

《瓶外卮言》，"瓶"是指《金瓶梅》，"卮言"则是自己对自己这本书的谦词。"卮"，本指酒器，卮言，谓饮酒时的随意闲谈。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陆德明对这句话的释文曰："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已无常主者也"。姚灵犀用这个书名，意思是说这本书里所讲的，只不过是跟《金瓶梅》有关的一些闲言碎语，并无真知卓见，这实是过谦了。

姚灵犀氏何人，其生平已不可考。据本书江东霁月序，谓“姚子灵犀，饱学而多才”，又谓“姚子富于著述，且俱风行于世”。魏病侠于此书序言中，则称“姚君灵犀，夙好研究此书（著者按：指《金瓶梅》），辄有纂述。余昔年主《风月画报》笔政时，君曾撰《金瓶写春记》刊于《风画》，甚为当时读者所乐道。嗣余编辑《天风报》，适君之《金瓶札朴》以时寄刊，考证精详，颇足资同好者之研讨。”另据此书中所插入之《灵犀启示一》，知此书印制未及一半时，其父去世，大故猝遭，方寸已乱，又没有兄弟，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又赶上女儿患了很厉害的肺病，焦头烂额，时运乖舛，心绪不宁，以至于拖延了出版时间。检《金瓶小札》，文末附有著者地址，知其时住天津英租界孟买道义庆里58号。

如上，我们对于著者的印象，倒是有些“支离破碎”了。

《瓶外卮言》共分三部分：

一、是关于《金瓶梅》著者和版本考证的学术论文，其中有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郭源新（即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以及姚灵犀自己写的《金瓶梅著者及年代之质疑》和《金瓶梅版本之异同》二文。

二、为研究《金瓶梅》与《红楼梦》二者的系连关系，收录痴云《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阚铎《红楼梦抉微》（摘录）及作者本人的《金红胜语》等共三篇文章。

三、对《金瓶梅》语词注释，包括《金瓶小札》、《金瓶集谚》、《金瓶词曲》。其中《金瓶小札》实际上是一部最早的《金瓶梅》专用语汇词典。

《瓶外卮言》的精华部分是《金瓶小札》，这不仅仅因为此

一部分占据了全书的大半篇幅，是全书的主脑，而是由于这一部分注疏与考证对《金瓶梅》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札》注释语词约 1870 条，“举凡明代之礼俗、习尚、名物、方言，与夫涉及考证者，辄一一笔之于书，寖久而成巨帙……畀读者以南针，行见与《金瓶梅》后先晖映，相得益彰。”(江东雲月序)

应该说，姚灵犀四十年代对于《金瓶梅》的注释，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这部奇书，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考据简练、平实，却信而有徵。有不能解者，则注曰：待考。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巧为掩遮。

这里试拈出数例：

小说中称武大为“三寸丁榖树皮”，姚灵犀释谓：“榖亦书作谷。《荀学斋日记》：‘今市肆书榖作谷，书薑作姜，起于赵宋之世’。武松之兄武大，其浑名曰三寸丁榖树皮，此沿袭《水浒》而来，然颇费解。曾于上年刊稿《天风》，广询其义，奈答者无几人，而言多穿凿。嗣梦秋生告我曰：三寸极言其短，丁者，即今之比方土语，谓小为一丁点也。况人亦可言丁，如人丁、男丁之类。《小五义》小说中有皮虎其人者，身材矮小，惯使躺地刀，因得三尺短命丁之号，惬浑名之累赘，无如武大矣。至榖树皮之说，终不可解。或疑为槲树，又意为山谷中之老树。昨偶阅字典，木部内有榖字，古斛切，音谷，木名，皮白者曰榖，皮斑者曰楮，诗有‘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幼读心粗，实与五穀之穀异也。其字有三体，一从木，一从禾，一从米，大有分别。《史记》桑榖共生，榖音“构”，树名，皮可为纸。榖音谷，穀音叩，今多混，详《焦氏笔乘》中，榖树皮可以为纸。

又言皮有斑、白之别．武大混号之榖树皮，可读为‘谷’，又可读为‘构’，当以读谷之音为正。此树之皮，想不独粗糙，或正如人面之白癣，俗名白癞风者，故以形容武大之丑耳。”

一个词目，居然考证了如此之多的资料。

又如词话本第五回，郓哥嘲武大是“鸭”，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姚灵犀释谓：“浙人以鸭为大讳，北人但知鸭作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以其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宋人讳鸭，真如今人讳龟。”

这里，姚灵犀证实，《金瓶梅》作者不仅“时作吴语”，而且是时用吴中之典实的。这样的语词解释，对研究作者的文化背景，亦助益良多。

再如对“打背”一词的注释：“竹坡本作打背躬，应作‘打背公’。原书三十三回作‘背工’，此当时俗语也。凡交易事，居间者索私赠，谓之后手，又名打夹帐。《醒世姻缘》一回有云，着人往来说合，媒人打夹帐、家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又见《坚瓠三集》，皆一事也。两面人说两面话，于中取利，故李皂隶名外传，即里外传话之意，原书中已有解释。戏剧中扮者以袖障面，将心中事道出，曰‘背工’，恐即由此而出。按《说文》，‘厶’为‘私’之古字，到背厶为公，此适相反。”

这样的释文，又何尝不是一篇精悍的考据短章？

《金瓶小札》中，对“影射”、“马泊六”、“捣子”、“葫芦提”、“一丈青”、“白米”、“达达”、“窠子”、“寒鸦儿”、“望江南巴山虎，汉东山斜纹布”、“韶武”、“摭溜子”等词语的解释

与考据，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金瓶梅》的名物、行止、习尚，多有助益。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曾说他的《金瓶梅词话注释》即得益于姚灵犀，他的注本曾多处引用姚注。

姚灵犀这部书，亦甚为同代人所推重，王伯龙为其题词曰："志怪蒐奇取次新，闭门风月特关身。寒鸦儿过青刀马（书中俗语），难得金瓶索解人。"

姚灵犀在《金瓶集诗》后附录的"启示"中说："此书方言俗谚，索解甚难，赏奇析疑，殊饶兴趣。先此抛砖引玉，初非贵椟轻珠也。俟有增补订正时，再将《金瓶梅之批评》、前人记述、西门庆潘金莲之纪事年表、书中人名表、书中时代宋明事故对照表、暨《金瓶写春记》、《词话本删文补遗》等，一并付刊，以成完璧。"

但可惜后来未见"增补订正"本行世。由此，姚灵犀对《金瓶梅》研究之广博、精深，可见大端。

26

四马路两“霸主”的《金瓶梅》之战

——施蛰存先生话旧

施蛰存先生（1905－　　），著名学者、小说家，同时又是散文家和文学翻译家。他的心理小说，三十年代就已蜚声文坛。二三十年代，他曾创办或主持过《无轨列车》、《现代》、《新文艺》等颇有影响的杂志，并创办“沫水书店”和“第一线书店”。尤其以开辟和经营了《现代》杂志这个园地，而被尊为中国“现代派”的“寨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施蛰存先生曾为上海杂志公司标点了一部北京图书馆影印的《金瓶梅词话》（马廉本），列入该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这个删除干净了一切“淫言秽语”的本子，“帮老板赚了一大笔钱，自己却背上了一个‘标点淫书’的罪名”（《杂谈〈金瓶梅〉》，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那个时候，以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影印的《金瓶梅

词话》刚刚出版，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商纷纷把焦点聚合在这部奇书上，删节本和新校、新刊本竟相推出，郑振铎《世界文库》本《金瓶梅词话》，差不多出版于同一时期。

五十年后的1986年6月，施蛰存先生撰写了《杂谈〈金瓶梅〉》一文，对他点校的那个版本所引发的四马路两位出版界的"霸主"之间的争战，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就在施蛰存先生为上海杂志公司标点、删节《金瓶梅词话》的同时，"上海中央书店平襟亚，也在一声不响地请人删节、标点《金瓶梅词话》，交印刷厂排印。特别提高排字工资，要求印刷厂赶在上海杂志公司以前，把他们的《金瓶梅词话》抢先印出。"

目的再清楚不过，谁先印出，谁就占领了市场。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张静庐和他的上海杂志公司。

张静庐是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著名的出版家。他是浙江宁波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小学毕业后，去上海当学徒，曾编印出版小型报《小上海》、杂志《小说林》、《滑稽林》等。他编辑过《公民日报》副刊和《新的小说》杂志，及《救国日报》、《商报》、《海员工报》，又先后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和上海联合书店，印刷并出版刊物《萌芽》、《拓荒者》。1934年5月，出任上海杂志公司总经理，出版和经售《读书生活》、《译文》、《作家》、《自修大学》等刊物。1934年在重庆，以生活、读书、新知3家书店为核心，团结28家出版社组成联营书店，任总店经理。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供职于出版总署、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单位，1969年9月病逝。

张静庐1934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杂志公司"，这家公司除

经售全国各种杂志外，先后出版过由黄源编辑的《译文》、孟十环编辑的《作家》、黎烈文编辑的《中流》、平心编辑的《自修大学》、胡风编辑的《七月》、施蛰存、康嗣群编辑的《文饭小品》等，以及施蛰存、阿英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叶灵凤著《读书随笔》、于伶著《大明英烈传》、刘白羽著《八路军七将领》、姚雪垠著《战地书简》，以及《郁达夫游记》、《望舒诗稿》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内迁汉口、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复迁回上海，是一家很有影响和实力的出版机构。

施蛰存先生谈到当年那段上海出版史的秘闻时说：

"张静庐和平襟亚是当年四马路出版界的两位霸才，他们的营业竞争，勾心斗角，可谓旗鼓相当。张静庐听到平襟亚的《金瓶梅词话》已即将排版完成，而自己的全稿尚未发排完了，估计他的书势必落后一个多月才能出版，这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张静庐请平襟亚吃饭，席上就单刀直入，开了一个谈判。张静庐说：他的《金瓶梅词话》是编在《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中的，是《丛书》之一种，《词话》的销数，与《丛书》其他各种的销数有影响。中央书店的《词话》是单种书，销数多少，和其它书没有关系。因此，张静庐要求平襟亚把排好的《词话》让上海杂志公司先印一版，然后将全副纸版送给中央书店去印行。所有排字工资都由上海杂志公司负担。这样，就是说：平襟亚只要同意上海杂志公司先印一版，他就可以不费一文钱，印行中央书店的《金瓶梅词话》。

"平襟亚的中央书店开设在上海杂志公司后面的弄堂内，它没有门市部。上海杂志公司开设在四马路，有三开间的门市部。张静庐的门市收入，非平襟亚可及。但对全国内地的发行能力，

平襟亚独占优势。平襟亚考虑了张静庐的建议，估计上海杂志公司的《词话》虽然先出版，也只有一个月的门市销数，而在内地各省市，两家的《词话》可能同时上市。再加上中央书店的《词话》既是自来的纸版，它可以定价低于上海杂志公司版”（同上，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就这样，平襟亚接受了张静庐的建议。

可是，后来取来中央书店的排校样一看，张静庐这才发现原来那是个很粗糙的本子，不仅有许多标点错误，而且删节之处，上下文都接不上。同时字体较大，用纸势必较多。因此，张静庐便决定用施蛰存标点的本子，而不再采用中央书店的排本。

这样，复又达成协议，中央书店仍可推迟一个月出书，尔后上海杂志公司把自己的纸版送他们一份。平襟亚也同意了。

中央书店的《词话》，迟于上海杂志公司的《词话》一个月出版，两家用的是同一个标点本。以至于五十年以后，还有人问施蛰存先生，中央书店的《词话》和上海杂志公司的《词话》，在字型、标点、删节处为什么会完全一样？

上海杂志公司版的《词话》初版本印了20000本，按照协议，送了一份纸型给中央书店，但是，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中日战争，中央书店的《词话》不容易运销内地。这一盘棋，平襟亚输得不轻。

施蛰存先生标点、删节的《金瓶梅词话》，是个比较精良的本子，全书分为5册，各册附有《金瓶梅二百美图》图像8页。被日本学者认为是《金瓶梅词话》“活字本的祖本”（日本·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

中央书店版的《金瓶梅词话》，为有别于上海杂志公司，将书中插图汇为1册，另刊有《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小册，全70页，定价大洋三角。

三四十年代刊行的《金瓶梅词话》，大都利用了施蛰存先生校点本的纸型，如上海奇文书局发行的《绣像古本通俗小说金瓶梅词话》(刊行年月不明)，即是上海杂志公司本的原样再版。

27

墙里梅花

——建国后中国大陆的《金瓶梅》出版

1949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三大系统、七种版本的《金瓶梅》，兹将诸本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词话本系统

□《新刻金瓶梅词话》

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重印，两函二十一册，200幅插图合为一册。印量为2000册。

是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两千部。

这两千部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以及专门研究人员，所有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金瓶梅词话**》

戴鸿森校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删节本。全三册。印量10000册。

《校点说明》中谓："我们的愿望是试图提供这样一个《金瓶梅词话》的整理本：既方便于一般文艺工作者、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浏览、借鉴，也可供研究工作者的取资，基本上不致有失真之憾。"

关于本书的删节，《说明》中称："书中大量的秽亵描写，实是明代中末叶这一淫风炽盛的特定时代的消极产物，自来为世人所诟病。对正常的人来说，只觉其秽心污目，不堪卒读。至于有害青年人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的心理卫生，尤不待言。兹概行删除。具体办法是：只删字，不增字，删处分别注明所删字数。这样做，为的是免致研究工作者迷惑；文情语势间有不甚衔接处，亦易为读者所谅解。全书合计删去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四字。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涉及性行为的文字，与所写主要人物本为恶霸淫棍有密切关系，客观上有揭发暴露其道德败坏，灵魂丑恶和社会靡烂黑暗的作用，故一般性的叙说，即不加删除。"

该本选用崇祯本35帧插图，分别插入正文之有关处。

因为这个版本实际上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故在各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当时人民文学出版

社长韦君宜承担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金瓶梅词话**》(同第一种)

文学古籍刊行社据1957年影印本重印，1988年4月版，两函21册，图1册，线装。未标印量。

《出版说明》中谓："本书影印的目的，供古典小说研究者参考。

"原书是明万历年间刊本，旧藏北京图书馆（现在台湾），1933年，曾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我社即用此影印本为底本重印。"

该书第52回有缺叶两页，(第7、第8页）1957年影印时，以崇祯本抄补，此次重印，改用日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同版别部影印本配补。

该书为内部发行，发行对象：研究人员。

□《**金瓶梅词话校注**》

冯其庸　顾问　白维国　卜键　校注

岳麓书社，1995年8月版，全四册，一函。印量3000套。

该书的底本是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覆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朱墨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该书为删节本，删除了底本中跟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那部分直接描写性行为的文字，但涉及性器与性行为的一般性叙述及暗示性文字（包括韵文）不删，以免情节支离，文字破碎。能够深刻反映人物性格的文字亦不删。删节处均注明字数。

对原书中涉及的典章故实、职官称谓、释道方术、风俗游

艺、建筑陈设、服饰器具、饮食医药、方言俗语，以及诗、词、曲、赋、偈语等，均加注释。

绣像本系统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本，据北大图书馆藏本影印，1988年8月版，印量未标。4函36册，书首有序，每回插图2帧，全书共200帧。正文页20行，行22字，文中有圈点，行间有夹批并有眉批。

《出版说明》谓："国内现存崇祯本已屈指可数，其中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最为完善。"

阙字缺页，据张评本或天津图书馆本抄补。

该书发行对象：为副教授以上研究人员，每一位购书者均予以编号登记。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李渔全集》第十二、十三、十四卷收录，张兵、顾越点校，黄霖审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印量3500套。

该本依据的底本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校以上海图书馆藏本和北大图书馆藏本等诸本。200幅插图，以铜版纸影印附于卷首。有删节，但未注明字数，删文以"□"标出。

□《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

王汝梅会校　齐鲁书社1989年6月版

王汝梅先生有专文谈及该书的整理与会校工作，谓："近年来，通过版本调查，陆续发现若干种崇祯本、加上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等，已知现存约十五种。崇祯本会校时，约参校十种。校点体例规定：'版本参校范围，限于今存崇祯系统各本，一般不与张评本、词话本比勘'。本书校记，要求简明准确，不枝不蔓。"（《金瓶梅》探微——崇祯本校点笔记》，原载《金瓶梅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

王汝梅先生谈及会校本的校点过程时说："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吴晓铃先生给予会校工作以无私的援助，慨然把珍藏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清代乾隆年间抄本提供复印，得以参予会校。这是吴先生给《金瓶梅》学术事业的巨大支持。会校本出版之日，亦即吴晓铃先生藏《金瓶梅》抄本公诸于世之时。

"1989年1月24日至2月2日，我和马秀楣到天津，住南开大学谊园宾馆。每天上午同去天津图书馆查阅天津图书馆藏《金瓶梅》崇祯本（五十年代为王利器原藏）进行会校，马秀楣也参预工作。晚间，拜访朱一玄先生，并请朱先生审阅了会校本前言初稿。

"天津工作结束后，经北京，到济南，时值农历大年三十。为了不打扰齐鲁书社的同志们，我未按电话上预定的时间发接站电报，独自一个人带着书稿悄悄地住进了铁路公寓，在铁路公寓过了大年初一。到初二方与总编取得联系，老孙还以为我未到济南。从初二起，即开始紧张地工作。崇祯本会校本繁体竖排，在北京新华二厂拣字排版。审定的稿子分批派人送往北京。

"1989年2月16日，我携带全书100回校记稿从济南启程

南下上海。在上海图书馆借阅《金瓶梅》崇祯本甲、乙两种，进行核校。1989年2月中旬脱稿，到1989年6月崇祯本会校本出版，历时仅半年。经过出版社、印刷厂的同志们共同奋斗，如期印制出版，提交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文件批准，为适应学术研究需要而出版的。这是学术史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这是《金瓶梅》崇祯本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版排印本，一字不删，200幅插图照原版印制。此书的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是重视民族优良文化、繁荣学术事业的一个壮举"。(《走上探索之路——王汝梅自述》原载《我与金瓶梅》成都出版社)

张评本系统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齐鲁书社1987年版，全二册，印量10000套。

该本以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清康熙间刊本（甲种）为底本，参校绣像崇祯本（包括翻刻本）与《第一奇书》的九种版本。

对原书中淫秽部分，酌情删除，注明所删字数，全书合计删除10385个字。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王汝梅　校注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印量

3000 册。全二册。每回有校记、注释。

该本以吉林大学图书藏张评覆刻本（张评乙本）为工作底本，参校张评初刻本（甲本）。张评乙本的加工刊刻者，据王汝梅先生判定，为张竹坡的弟弟张道渊。张道渊是竹坡评点刊刻《金瓶梅》的知情者，支持者，在竹坡死后，又是张评本的修订覆刻者，也应是竹坡手稿的存藏者。

以上诸本，估计总印量在 40000 册左右。在日本，此一时期出版的日译本有 17 部，印量至少不低于 50000 册，而在欧美各国，仅是库恩译本及各种转译本便行销近 20 万册。

28

暖春履冰录

——金学家与《金瓶梅》

中国的"金学"研究，虽在三十年代初叶随着《金瓶梅词话》的发现而出现了高潮，然而蔚成学派，却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

现在，中国有成就的金学家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了，如台湾的魏子云、刘师古，香港的孙述宇、梅节，大陆的黄霖、徐朔方、朱一玄、朱星、张远芬、刘辉、郑庆山、周钧韬、王汝梅、杜维沫、卜键、宁宗一、蔡敦勇、周中明、陈东有、田秉锷、吴敢、蔡国梁、卢兴基、鲁歌、马征、孔繁华等等。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国学大家吴晓铃和王利器二位先辈，在"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如今，"金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日新月异"。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展，探讨问题在不断深化，"金学"终于能够成为同"红学"并驾齐驱的一门重要学问。

然而，谈起自己的研究历程，"金学"家们无不感慨万千。

在这一节中，我们来看一看“金学”家们是如何同这部使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奇书结缘的。

刘辉先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在《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上多有建树，特别是他发现了文龙评本，为“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刘辉先生说，他第一次看到《金瓶梅》这部书是大学时代。当时苏联留学生B·K·塔瓦罗夫在天津旧书肆上买到广文书局经删节后出版的《金瓶梅》，一部四册，暑假回国时海关不让他带走，便转送给他的辅导员刘辉。可惜这部书早已散佚，因此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后来，刘辉先生参加编辑《历代歌谣选》，访问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先生提醒他们《金瓶梅》中也有歌谣，应当抄出来。回到学校找书，遇到了麻烦。1957年影印的《金瓶梅词话》，中文系教授才有资格买。系资料室有一部，控制却非常严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书总算借了出来，但却不能逐字逐句地阅读，只能一目十行地“溜溜”。书中的二百幅插图，也早已取下，是看都不能看一眼的。

刘辉先生第一次认真阅读《金瓶梅》，是1973年，从他的一位同学处借来，得以静静看了两遍，被它描写社会生活之深刻所吸引，便下决心要研究这部奇书。

当时，看书之难难于上青天，线装书难，善本书尤难，带“金”字的书更是难上加难。为访书，刘辉先生跑了上海、天津、南京、徐州等图书馆。他在北京图书馆分馆发现了文龙评本，几万字的评语是他一字字抄录下来的，为抄那些极为珍贵的资料，一连两三个月，他在图书馆“安营扎寨”，每天风雨无阻，中午饭只是方便面充饥。因为那部书是不准许复印的，便是拍照也

仅仅能拍几张来作书影。

而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宁宗一先生的经历，简直具有传奇色彩。

他曾自述："1950年我上南开大学时，图书馆是不允许把《金瓶梅》借给学生看的，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当时我知道，我的父亲藏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和删节过的《金瓶梅词话》，我向他索看，他却拒绝，理由是：'你还小，先别看这些书！'

"毕业后我留校执教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并马上被安排教历史系学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根据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的需要，名正言顺，我开始有资格也有理由去看那部'禁书'了。于是，首先把我父亲的那部铅印本上下两册的《金瓶梅词话》堂而皇之地接收过来。继而又理直气壮地到图书馆去，想借一部我早已渴望看到的'全本'《金瓶梅》。可是管理员老王告诉我的是：'你看删节本，可以借出，至于没删节的那个本子，需要讲师以上的老师才能借阅。'我当时真的气昏了头，但也只好随老王进书库，结果胡乱拿了一部，后来才知道是更加糟糕的正中书局出版的《古本金瓶梅》。"（宁宗一《走进困惑》，《我与金瓶梅》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版）

然而，就是这一个糟糕的本子，让宁宗一这位年轻的助教第一次见识了这部被称为第一奇书的庐山面目。

终于压抑不住阅读这部小说的激情，在讲明清小说部分时，宁宗一面对着历史系二年级一百多位同学，大大赞美了一番《金瓶梅》"前无古人"的价值，同时，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大意是："对于一个今后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不能不读《金瓶梅》。"

刚刚讲完《金瓶梅》，不少男女同学便纷纷去图书馆借这部书，给图书管理员添了不少乱子，让他们费了许多口舌。管理员老王很是怪罪了一番，埋怨宁宗一不该"号召"学生读这样明令规定的"禁书"。

到了1958年拔"白旗"的时候，初出茅庐的宁宗一终于为此事栽了个大跟头。

按说，所谓"拔白旗"，是针对那些专家、权威而言，宁宗一当时年龄尚小，资历又浅，根本不够当"白旗"的资格，而应该是那一场运动的骨干力量。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下午，古典文学教研室全体老师正在开会，突然一位已升到历史系四年级的女同学打开了教研室的门，轻轻地在房门口对着开会的教师们说："我们给宁老师贴了大字报，请他去看看。"

会刚散，宁宗一便急匆匆跑到图书馆大厅，果然一张大字报赫然写着大字标题《宁宗一老师在文学史一课中散布了些什么货色》。在十几条批评意见中，第一条就是他在课堂上给学生大讲《金瓶梅》，并且极力宣扬这部书的所谓"社会的和审美的价值"，"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

看着大字报，他觉得脑袋"嗡"的响了一声，腿都软了下来。所幸那时他还不是内定的批判重点，所以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并没有谁来认真追究，最后不了了之。

宁宗一先生说："我像一切年轻人一样，不会满足看节本《金瓶梅》的。好奇心与性意识使然，极想了解《金瓶梅》那被删去的近两万字到底是怎样描述的。我知道我的老师朱一玄先

生有一部没删节过的《金瓶梅》，我曾担心他不会借给我看，只是到后来，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一个我想写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的理由，一天晚上到朱先生家，请求他借这部书给我看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朱先生二话未说，坦然又慷慨地立即从书柜中把书拿给了我。我完全不懂版本，只记得这是一部木版大字本的《金瓶梅》，插图绘制得极为粗劣，但我仍如获至宝，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又通读了全书。无庸置疑，我当时特别关注了那些删节本中没有的文字。这次读《金瓶梅》的印象与前一遍的不同之处在于：我除了领略那露骨的性描写而感到新奇和富有刺激外，当然还有那得窥全豹的愉悦。然而从理性上则确实意识到了这位笑笑生果然有一种超前的胆识，敢于冲破那人所共知的'禁区'。进一步说，我似又有一种疑问，为什么我还保留着第一次看删节本时的感受，足本《金瓶梅》并没有动摇它在我心目中属于古代小说中第一流的位置"(《走进困惑》)。

宁宗一再次因《金瓶梅》而罹祸是在六十年代中叶那场"文化革命"中。

进入六十年代，因为他已执教古典文学课，有了借阅《金瓶梅》的资格，再加上他自己手头已有一部《金瓶梅词话》，所以这本书通过他的手，曾在一些教师和研究生中间传阅过。俗话说，"在劫难逃"，"文革"刚开始，南开大学就"清理"出了一个"312室裴多菲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种种"不正常"的活动中，就有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一条罪状。因此，很长时期以来，宁宗一几乎讳谈《金瓶梅》，生怕他自己谈多了《金瓶梅》，会让人感到和《金瓶梅》一样"不洁"。因为只要有一点

风吹草动，《金瓶梅》就会给跟它有牵扯的人招灾惹祸，他实在是害怕了。

然而，最终他还是跟这部让他梦绕魂牵的奇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编写《中国小说史简编》的课题给了南开大学，由宁宗一和郝世峰担任主编。但是这部书的负责人和责编却不同意介绍《金瓶梅》这部有争议的小说。宁宗一和他的合作者当然不同意这个意见，并申诉了三条理由：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高度评价过这部旷世奇书；二、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小说史》辟有专章评述《金瓶梅》，《简编》予以评介亦在情理之中；三、评述《金瓶梅》一书并不是“展览”《金瓶梅》，而是有助于读者正确阅读和了解《金瓶梅》。然而，这三条理由并没有为《金瓶梅》在这部书中争得哪怕几百字的位置。结果，在一部中国小说史中，竟然对这部古典小说名著只字未提。

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的一篇题为《〈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的论文，投寄给本校的学报，却因“清除精神污染”受到波及，一直等到“清污”过去才获解禁。尽管该文责编一再申明该文决无精神污染的毒菌，且有对书中缺乏节制的性描写的批评，得到的却仍是“缓缓看”的回答。

青年金学家陈东有是在大学二年级时读到《金瓶梅》的。有一天，一位同寝室的同学在熄灯前弄来半部《金瓶梅》，整个寝室为之沸腾。那一夜，大家抓阄排先后，陈东有排在最后，凌晨四点被叫醒接看此书，两个小时，囫囵吞枣，只记住了几个人名。说到读这部书时的神态，他说：当时因为神秘和紧张，再

加上道德的力量，心头砰砰跳个不停。寒冬之时，手心脚心汗湿湿的。其实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都没有，那是半部删节过了的本子。

毕业后，他被留在了母校——江西大学当教师。第一年教“大学语文”，第二年便正式执教“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

讲明清文学，《金瓶梅》是个绕不开的话题。陈东有感觉到这一部分讲得又谨慎又艰涩。

课堂上，学生不断地提问：

“陈老师，你说《金瓶梅》写了世情，能说一段给我们听听么？”

“您说《金瓶梅》有局限，具体是怎么回事？”

“……”

陈东有无言以对，他毕竟只看过半部《金瓶梅》呀。

他的心被深深撼动了。

1987 年 2 月，他从研究生考场出来，便四处寻找全本、原本的《金瓶梅》。

有人问他：“你今年多大了？结婚了吗？”

陈东有答：“35 岁，小孩儿一岁半。”

于是他被告知：“那你到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去借吧，那儿就有一套。”

陈东有推开古藉阅览室的大门，表面十分镇定地向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和借书证：

“我想借影印本《金瓶梅》。”

“《金瓶梅》？”工作人员上下打量着他。他长得面嫩，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至多像二十出头的大学生。

“你要看《金瓶梅》?”工作人员满腹狐疑，摇摇头。

陈东有忙说：“这是我的工作证，是为了教学的需要。”

“教学？教《金瓶梅》？那得先办手续。”

工作人员很客气地介绍了办手续的程序。

按照程序，他先写了一份报告，说明动机在于科研的需要。不好说教学，怕节外生枝。然后系主管教学科研的领导批示，加盖系里公章，再然后由校党委宣传部，请负责同志审批、签字、盖章。

这样，21大本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便放在了他的面前。

陈东有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说：“当年偷看此书的心情又出现了，而且不仅心跳加速，手心脚心出汗，有时还感到全身的血液犹如钱塘大潮，或猛冲大脑，脸上发烧；或倾注下去，浑身不自在。做笔记如同龙飞凤舞，怕别人认出我在摘抄什么；不时偷眼观察四周，唯恐有熟人，特别是学生发现我此时在看《金瓶梅》。其实，大大的阅览室，不过才两三个人，谁也不去看谁”（陈东有《万倾纵我一苇如》，原载《我与金瓶梅》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版）。

这种心情，那个年代第一次看《金瓶梅》的人差不多都有过。

当时，大学里的文学史课堂上不讲《金瓶梅》，文学史、小说史中不载《金瓶梅》，诺大一个中国，若无其书，已不是咄咄怪事。

中国的“金学”研究，就是从那个如履薄冰的历险期开始发轫，终于走进了今天的姹紫嫣红。

29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海峡彼岸的《金瓶梅》探索者魏子云

近年以来，魏子云这个名字对我们已不再陌生。

在海峡两岸的"金学"界，魏子云先生影响最巨。

魏子云先生年逾古稀，从事《金瓶梅》研究，已近三十年，有专著数十部问世。近十年来，他的许多专论和专著有不少在大陆出版，不论在他执教和生活的台湾还是在大陆，都有许多知音。然而，长时期以来，他一直是在"独学无友"中进行着他的研究与探索的。

魏子云先生曾自叙苦衷：几十年了，"我孜孜矻矻地、孤孤独独地、像一个独入荒山的疯汉似的，在《金瓶梅》这座迷宫中，寻寻觅觅，而且冷冷清清，好在并不惨惨凄凄，而是在寻觅中，把迷宫中的道路，越摸越熟，还在企图把出入迷宫的道路门径，来指引所有的同道出入呢"。（《瓶在梅下·金其上乎》，转引自《我与金瓶梅》周钧韬等编，成都出版社）

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孤独地承担这一份冷

寂，而且还要孤独地承担社会上的诘难。魏子云先生就曾收到过这样一封由《××日报》转来的读者投书：

××先生：

随函寄上贵报副刊一纸，载有魏子云谈《金瓶梅》语言者，此本系每周随报赠送订户。鄙收到后以为不宜舍下少年人阅读，特奉请台处。《金瓶梅》一书，虽其序言故为开脱，有仁人见之生怜悯，禽心见之生贪欲之说，惟内容实乃“文字春宫”，若非身体老化心如止水，鲜有不因之败行丧志，最低影响也要摇荡心情，有误课业进修。魏某到处为此书拉马牵线，强调其文学价值，为鄙所不齿，久不愿家存其文。愿先生亦多以贵报青年读者为念，是幸！即颂

大安

—读者九月廿七日

魏子云先生百思而不得其解，该报的此一副刊，是专门刊登学术论文的，他虽在这里发表过几篇关于《金瓶梅》的学术研讨文章，但那些文章仅限于作者考索和成书年代问题之范畴，不要说中学生接触不上，就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也不会对其发生兴趣。而且所出版的专著，虽有几十种之多，但亦全部是学术性的，专门性的，大多数发行数量不足一千册，何以会贻害少年？

魏子云先生从事《金瓶梅》研究之始，正是这部书倍受冷落的时候，故此一方面的学问，是注定要坐冷板凳的。魏子云

先生说："吴晓铃先生说我的《金瓶梅》研究，是在'独学无友'中进行着的，但又何止如此？写出来的一篇篇，连我那身边最忠实的读者老伴儿，也不理睬，她一看我写的是考据，便说：'这种文章我不要看'。当然，报章杂志也很少垂青于它。像那部四十万言的《金瓶梅词话注释》，写完后连一文稿酬也不曾获得，转售给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刚刚再版，河南郑州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印了大陆版，获得了版税二千八百余元（人民币），今虽再版，一问版税不过人民币一百二十元，至今尚未料理。台北的学生书局，却不再版了。还有《金瓶梅札记》、《金瓶梅幽隐探照》、《金瓶梅第五十二回至五十八回之比勘与解说》，以及《〈金瓶梅〉这五回》，都是写完了就送给出版者付梓。百分之十的版税，半年一结，所获版税，有时连买书的钱都不够付。每半年售出不过十本二十本而已"（魏子云《瓶在梅下，金其上乎》）。

果然是"瓶在梅下，金其上乎"！作这一方面的学问，学者所缺少的，不是"略输文彩，稍逊风骚"，而是略输美元，稍逊新台币（就彼岛而言）而已。

所幸，魏子云先生是一个清净澹泊的学人，在台湾生活三十年，家居一直局促，一张书桌，全家人共用。所喜四子一女，个个均有所成，妻贤而子女无不肖。半年领一次退休俸，维持二老衣食，还需子女们按月补贴一些，至于买书和友情往还的应酬，则全靠这位七旬老人每周四堂兼课的教授钟点费了。

魏子云先生非常勤奋，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即坐在书案后，在《金瓶梅》的迷宫中寻幽探秘，每一周或每两周，总要有一天去图书馆，查考必需的资料，孜孜不懈，且日起有功。

魏子云先生第一次接触到《金瓶梅》这部奇书，是在抗战期间，一位朋友借来了这部书，是光连纸的石印本。这位朋友兴致勃勃地把书中几处性描写指点给他看，而他当时却未发生过任何兴趣。让他着迷的是老舍、张天翼、沈从文等人的小说，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骆宾基的《北望云的春天》、高尔基的《童年》、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斯坦贝克的《人与鼠》、《月亮下去了》等。对于线装石印本的书本，却早就厌了。

直到1966、1967年间，魏子云先生在台北逛牯岭街旧肆，见到了两部在抗战期间所见到的同样形式的石印本《金瓶梅》，引发了当年失去阅读机会的补偿心理，虽每部索价两百元，但却把这两部书一古脑全买了下来，另一部送给了朋友。

由于这个本子是翻印的，印刷十分糟糕，且字迹漫涣，读了前十回，就索然失去了兴趣。只是翻翻检检地知道了一个故事大略。后来读袁中郎（宏道）全集，看到了他写给董其昌的信，提到《金瓶梅》，到中央研究院读书，在书名卡上查到了《金瓶梅词话》，调出来一看，虽为缩小的影印本，但字迹却十分清晰，字体也大。把家里那部石印本拿到图书馆一对，第一回就不一样，其它各回，差别也很大。从这里开始，去查询有关《金瓶梅》的资料，渐渐地知道了有关《金瓶梅》的版本种种。于是，从读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开始，兼及二三十年代作家的有关论述，从此进入了对这一奇书的长达三十余年的探究。

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成书年

代”与“作者是谁”这两大方面。魏老先生是“出身于桐城学派的讲究义法、审问神理、以训诂为探索手段的徒众之一”，他的探究与考据特别注意立论的历史基础与社会因素。他尝谓：“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这两个问题上追寻，大可用‘上穷碧落下黄泉’这话来作比况。”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开始，魏子云便否定了郑振铎判定的“兰陵笑笑生”必是山东人的说法，又从“兰陵”地名与荀子的“兰陵令”问题，推演到“兰陵”一词，可能是附贴荀卿的“性恶论”（《金瓶梅探源》）。

魏子云认为，《金瓶梅》的语言驳杂，主要语言是北方“官话”，却间杂颇多“吴语”、“越语”，以及“燕语”，推想作者是一位在北方做官的南方人。他既熟悉北方的官话，却又没忘记南方的母语。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孰谁，魏子云先生不断修正自己的说法。最先，他曾推论“如沈德符的父亲沈自邠、会稽人陶望龄、晋江李卓吾都有写作此书的可能。”参与对词话本改写的人，“极可能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这原班人马”（《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湾时报公司，1981年版）。后又执屠隆说（《金瓶梅原貌探原》，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

对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的考证，魏子云先生认为应该遵守一个立论基础——历史的记录。从研究工作开始之时，他就紧紧盯住了明代人的一件件史料，把它们梳理、合并起来一一研制，并对明代资料中出现的彼此间的矛盾问题，进行一一辨析。魏子云先生将《金瓶梅》一书的问世，分为“抄本”与“刻本”两个时期，又将“抄本”也分作“前期”与“后期”。鲁

迅、吴晗、郑振铎都是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话，判定《金瓶梅》初版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魏子云通过查阅《苏州府志》等相关资料，匡正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些前后矛盾问题。尤其是他考证出沈德符所讲过的“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这段文字中，“马仲良时榷吴关”的准确年份，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这样，被大家公认了四十多年的“《金瓶梅》初刻于万历三十八年”之说，便因这一重要资料而得以纠正。学界对此一成果是颇为推重的。

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金瓶梅》语词的注释。他的一部《金瓶梅词话注释》，洋洋乎80万字，由台湾增你智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12月出版后，反响热烈，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了大陆版，很快又再版，受到了“金学”研究界和读者的欢迎。

除了研究成果，魏子云先生还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潘金莲》与《吴月娘》。

可喜的是，魏子云先生的研究与探索，已不再是“独学无友”。在盈盈一水间的台湾，又有东郭先生（刘师古）、朱传誉等同道，前者注重对《金瓶梅》思想与艺术的探讨，后者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这部旷世奇书的流布与影响，各有心得与收获。

因为《金瓶梅》毕竟是中国的。


EXLIBRIS

30

《金瓶梅》是狗肉？

——一张调查表引出的话题

1992年，为写作这部《金瓶梅传播史话》，我编制印发了这样一张公众调查表——《金瓶梅读者函访表》，内容如下：

一、您对《金瓶梅》这部书所知道的程度

A　仅仅听说过（　　）；

B　知道些故事梗概（　　）；

C　从有关资料中读到过评介性文字（　　）；

D　从未听说过（　　）；

E　其它＿＿＿＿＿＿＿＿

二、您所读过的这部书：

A　属于何种版本（如有可能，请尽量填写上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

B　系全本（　　）还是删节本（　　）；

C　您什么时候读到过这部书________

D　您同时参考过哪些评介资料：________

三、您读此书时的心理态势：

A　非常平静地读完全书（　　）；

B　不敢让别人知道您在读这样一部书（　　）；

C　有一种"不高尚"的感觉（　　）；

D　有一种"尝禁果"的忐忑（　　）；

E　读完后觉得不过如此（　　）；

F　其他____________

四、您认为这部书：

A　是一部淫书（　　）；

B　是一部很难说清楚的书（　　）；

C　是一部好书，堪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比肩（　　）；

D　是一部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世情小说（　　）；

E　虽有些不健康的描写，但有一定认识价值（　　）；

F　其它方面：____________

五、对这部小说的传播，您认为：

A　应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传播（　　）；

B　可出版经过删节的"洁本"（　　）；

C　全文出版（　　）；限制发行范围（　　）；不限制发行范围（　　）；

D　可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如影视、戏剧、美术等（　）；

E　其它：________________

以上诸项内容，把您认为正确的，在括弧内打一个“√”，把您所否定的意见，打一个“×”，须填写的部分，请书写工整，填不开可附另纸。

您的姓名____________　性　　别______________

年　龄：____________　文化程度______________

职　业：____________　职务或职称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份表格，印刷4000份，由我在全国各地的朋友、同学代为分发，我特别关照分发表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被调查者的职业层面，不能只发给文化人和专业研究、教学人员，强调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各阶层的一般读者。

几个月后，收回表格2703份，这个数字已出我所料。

综合调查结果：

接受问卷的2703人，男性读者1926人，女性读者777人。年龄结构为：35岁以下901人，35岁——55岁1021人，55岁——65岁624人，65岁以上157人。文化程度：初中以下文化程度79人，初中文化程度1427人，高中或中等专业文化程度798人，大专、大学文化程度398人，硕士研究生1人。

职业结构：农民592人，工人986人，在校大中专学生221人，机关干部360人，军职人员24人，大学讲师3人，副教授2人，其它各种职业（含离退休）327人。具有中等专业职称者459人，高等专业职称者17人。调查的主体是基层的读者。

对《金瓶梅》这部书所知道的程度：

仅仅听说过有这么一部书的426人，从传媒的介绍中知道该书或知道些大体故事梗概的1264人，从未知道该书的392人，对这部书有初步知识的读者，占被调查对象的62.5%。完全不知道该书的读者则为1.5%弱。

在读过《金瓶梅》的读者中，其中读到港、台各种版本，如“山人出版社”、“文海出版社”、“太平书局”等出版的洁本者101人，读过齐鲁书社1987年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者214人，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金瓶梅词话》者82人，读过浙江古籍出版社《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李渔全集》内）6人，读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者1人，读过齐鲁书社《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的1人，读过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新刻金瓶梅词话》者2人，读过据此本重印者2人，读过《绘图古本金瓶梅词话》者4人（未注明出版社），读过《足本金瓶梅词话》者1人，读过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金瓶梅词话》者3人，读过上海中央书店《金瓶梅词话》者2人，记不清出版单位及版本或出版时间者205人。在说不清出版单位、版本和出版时间的读者中，很多是从租书小摊上读到或借别人的来读，因而没有留意。

其中有614名读者读到了各种删节本，占读到该书读者总数的99%，只有7名读者读到了全本，占读者总数1%左右。

另外，还有一些读者附言说他们读过《续金瓶梅》、《玉娇李》、《隔帘花影》、《金屋梦》等各种续书。许多读者称他们买了《金瓶梅辞典》、《金瓶梅鉴赏辞典》、《金瓶梅之谜》等多种工具书和导读参考资料。

关于读此书时的心理状态：

出乎所料，大多数读者谈他们读《金瓶梅》时都很坦然。很多读者表示：他们所读到的都是公开出版发行的"洁本"，跟读其它文学名著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

江苏镇江读者谢勇说他去南方某省出差时，浏览书摊，被一老板招徕，说有原本的《金瓶梅》，索价 1200 元，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 800 元一套成交，但拿回来一看，原来这部号称"香港原版"的《金瓶梅》，却是一个删节得非常拙劣，牛唇不对马嘴的本子。

有的读者说他向朋友借来此书，怕别人笑话，便用牛皮纸包上封面，封面上写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书名。有的把书锁在抽屉里，只有夜深人静时才敢取出来读。也有一位四川成都的读者胡某，说他读这部小说时偶被领导撞见，结果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了他。

河北省南大港农场一个经营个体书店的青年人马金辉，说他从黄骅书店批来 3 套台湾山人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结果被当地宣传部门严令停售，他先睹为快，读完了这套书。也有一位湖北的读者王某说他是在一个租书处读到了线装原本，出租人规定每小时收费 8 元，为了节约租金，他在那间租书处的"秘室"里，一目十行"跳着"（即只看性描写部分）读完了那部书。有一位青年女读者说她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部洁本《金

瓶梅》，尽管很小心，但还是被同室的女友发现了，因此遭到了嘲讽和奚落。而且她读《金瓶梅》的事很快传遍了单位。很有一段时间，她走路都不敢抬头，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的一位代我分发问卷的北大同学也自答了一张卷子，他谈到了一件原来不为我所知的故事。我们在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时，北大出版社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影印本刚刚凭票供应，只有副教授以上资格的研究人员才能买到这书。因为当时我正做明代文学研究课题，又有一个国家二级作家（相当于副教授）的职称，所以也设法买到了一套。这一套书被我那位同学偷了出来，在他们宿舍里传阅。一个宿舍四个人，正好一人看一函，他是从最后一函倒着看到第一函的，囫囵吞枣地看了一整夜，结果头昏脑胀，什么印象也没留下。

也有许多读者说他们只读了一半或只翻了翻，觉得这书并不像人们说得那么"蝎虎"，那位在租书处的"密室"里翻过全本的读者说："其实我见过一些公开的读物和地摊上卖的书，那些描写比《金瓶梅》也差不了多少。"

广西巴马读者卢怀生说，他的一位亲戚送给他一部残缺的北京艺民文艺书屋于民国三十一年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是从文革抄来的大书堆里拣出来的，但已不成全璧，全套 20 册，他只拣到了 14 册，他在信中请求笔者，能否设法为他补足所缺的那一部分。因为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找一个同等版本或是别的本子，进行抄补，但始终未能如愿。

还有一个刊物编辑，讲他曾在京城一家性用品商店里看到过公开出售的《金瓶梅》，在琳琅满目的壮阳水、丰乳器、保健环和闪闪发光的美国进口助勃器中间，赫然摆放着仿古线装本

的锦椟《金瓶梅》。

那位编辑感叹道：由此，我想起了《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大官人，他原本也有一个专门盛放性用品的“工具袋”——书中称作“淫器包儿”的，里面都是些土打土闹的玩艺儿，什么颤声娇、硫磺圈子、银托子之类，只有一样东西是进口的，那便是“原是番兵出产，逢人荐转在京，身体瘦小内玲珑，得人轻借力，展转作蝉鸣”的勉铃。笑笑生说这东西“来自南方缅甸国”，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恰好是买一个婢女的开价。

而今天的性用品商店里，则满架子是进口货，真真要羡慕煞老西。有意味的是，店员们一力向顾客推荐“进口的”药品和器械，而可以代表“国粹”的东西，竟然是被称为“四大名著”之一的《金瓶梅》。然而，在这里，它已经不再是名著了，而是跟电子助勃器、壮阳水一类的物件具有同样功效的器械或药品。因为店员们对以目光扫描此书的顾客落落大方地招徕：“这不错，就是贵点，开一副？”

广州的一个读者，寄来了一份1992年2月28日《南方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个体户子女教育问题文章的剪样，其中有一节谈到了一个案例：

一位相当有名气的工业个体户的儿子，年仅18岁便得了性病。

悲剧便是从一部《金瓶梅》开始的。

那位大老板——这男孩子的父亲曾从香港买回一套《金瓶梅》。这个男孩子头一次好奇地拿起这本书时，爸爸没有阻拦。看完之后，他抑制不住情欲的冲动，便上街找了一个妓女鬼混

起来，反正有的是钱。半年之后，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性病。

那位读者写道：

面对这个案例，我却在想着一个故事：

一个人去赶集，走路走得饥了，便进了一家饭馆，叫了一碟包子，吃到第六个的时候，他吃饱了，付账的时候，他愤愤地说："早知道吃了这一只包子就不饿了，前边那五个岂不可以省下。"

有人笑他说："没有前边那五个包子，你这第六个包子又顶什么用？"

《金瓶梅》就是这"第六个包子"。

毁掉了那个大老板的儿子的，决不会仅仅是这一部《金瓶梅》。在这个"有的是钱"的家庭里，他要想堕落，完全不必要靠一部书来指点"迷津"。

台湾"金"学家魏子云先生谈：他在台湾生活的前三十年，家居一向局促，一张书桌，全家共用，他的原版《金瓶梅》由于要随时翻阅，随手乱放。且不止一种，一部部都光明显著地插在书架上。那时他的小儿子刚读大学，经常把那些版本抽出去阅读。魏子云问过儿子对《金瓶梅》的看法，儿子答曰："读不懂嘛！"

年轻人该不该读《金瓶梅》，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原版《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的序文中，就明白指出，《金瓶梅》这部书，"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台湾学者刘师古先生说："读《金瓶梅》如果不明此义，只色巴巴地看重'导淫宣欲'的小节，

反不如看场‘成人电影’来得‘解馋’些。”

《金瓶梅》这部书，流传之后，因为其中不健康的、自然主义的描写，确实给没有辨别能力的青年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给没有文学欣赏功底的人读的。尤其是一个没有历经人事沧桑的中学生，就更不应去读它。

这位读者还写道：但愿今后有类似《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那样的少年普及版的《金瓶梅》就好了。

还有一位在南方一座小城工作的朋友，信中，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那位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大概姓傅，在一家工厂担任团委副书记。小伙子大学毕业，工作非常出色。那年团委书记调离，这个职务在人们眼里是非小傅莫属了，却没想到，突然在一个晚上，他被戴上了手铐，用警车押解到公安局。

原来厂里几个青工，聚在一个录相厅里看黄色录相，让警察端了窝，其中一个便招供出了小傅，说他虽未看黄色录相，却整天在看一部比黄色录相还黄的淫书。

看比黄色录相还黄的淫书的人自然不能放过，于是小傅便糊里糊涂成了严打对象。关进了拘留所，第四天才过问他的“案子”，知道他看的那部书是《金瓶梅》，警察在小傅的配合下，一点劲也没费就取回了那部“淫书”，那书就压在小傅的枕头底下呢。

公安局从未办理过这一类的案件，便向当地的文化部门咨询，被告知这是一部“含有毒素的古典文学名著”，这样就不好定性了，你说它是淫秽书吧，可它却偏偏又是“名著”，你说它

是名著吧，可它偏偏又背上个“淫书”的名声。问到这部书的来源，小傅没敢说实话，这部由台湾某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是一个开个体书店的朋友送的，小傅怕连累那朋友，便谎称是在外地出差时买的，但一查财务室的报销单据，小傅那个时间并没有公出。这样又纠缠了两天，小傅才被放了出来。

于是，全厂上下都知道小傅因为看一部淫书被公安局抓过，差点像看黄色录相的那几个青工一样给罚了款子，而也有人传播说他也被罚了款云云。

整整一年，小傅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灰溜溜的。本来爱说爱唱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目光呆滞，如同换了一个人。

有朋友气不过，让他向公安局讨个说法，他苦着脸摇摇头，什么也不说。

未失足已成千古恨，他现在最怕听到别人说《金瓶梅》这三个字。

关于对这部书的评价：

有 1726 人认为这是一部“淫书”或“准淫书”，占调查对象的 63%。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持“淫书”论者，绝大部分是仅仅听说过或仅知些大体故事梗概的那一部分读者。

认为可以同《三国演义》、《水浒传》比肩，堪称一部奇书的读者有 369 人，占调查对象的 1.5%，此一部分读者认为《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一座不可忽视的“里程碑”，这部书开了中国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有 412 名读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这些读者中有很多是在前面一个问题上画了

"√"的），因为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大众对生活的理解与认识，也是作者生命的表达和感情的流露。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侧重于对封建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全面总结、批判与反思的话，那么《金瓶梅》则是直接面对人生、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进行穷形尽相的描绘和特立独行的思考。因此，把这一部书打入"淫书"的行列是不公道的。

认为《金瓶梅》虽有一些不健康的描写，但有一定认识价值的读者有572人，（已经无法计算比例，这是由于大部分在前两个问题上打了"√"的读者同样也在这一条目旁边打了"√"，甚至一些认为《金瓶梅》是"淫书"的读者也在这一条目旁打了"√"）。有一位青海的读者说他曾把《金瓶梅》读了三遍，第一遍是雾里看花，水中看月，第二遍是初识其滋味，第三遍拍案击节，然后闭口无言。无独有偶，内蒙赤峰一位教师谈他读了三遍《金瓶梅》的体味，则全用禅家语，谓第一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遍仍旧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十分耐人寻味。

对于《金瓶梅》中不健康的描写，更多的读者谈到：毋庸讳言，这是《金瓶梅》最大的缺陷，也是它最大的传播障碍。那些描写确实"不健康"，尤其是对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因为更多的读者在没有正确的引导下，对这些东西的接受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是《金瓶梅》毕竟是《金瓶梅》时代的产物，作者对人欲采取自然主义的暴露，其心旨是在批判那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还有的读者在附言中谈到了西门庆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认为西门庆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商人阶层中的一个"成功者"，他身上更多地集中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他是一个与全部《金瓶梅》时代的社会节律完全一致的人。这个人物形象同封建主义社会共存亡。只要封建社会一天不变亡，西门庆式的人物就一天也不会绝种。这个形象不仅仅是具有文学上的典型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醒世意味。

对这部小说的传播：

认为应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传播的读者有 492 人，占调查对象的 1.8%，甚至那些认为《金瓶梅》是"淫书"的读者，亦不主张全面禁止其传播。有读者附言：《金瓶梅》从清初就被禁，一直禁了几百年，这几百年中它一直在人间流传，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应用大禹治水的方法，变禁锢为疏导，才是应持的态度。

有 2095 人赞成出版经过专家付出学术性劳动的删节本，这一部分读者占被调查读者的 77.5%，他们认为《金瓶梅》剔除了性描写，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的读者提出删节应适度，并注意情节与语言的连贯，他们认为戴鸿森删节的《金瓶梅词话》是一个不错的本子。但王汝梅的删节本更好。许多没有读过但已经从传媒中知道了《金瓶梅》的读者，表示愿意很快去买一部来读读，补补这一课。

主张全文出版的 107 人，占调查对象的 0.04%，其中限制发行范围的 69 人，不主张限制发行范围的 38 人。有读者认为，国内曾出版过几种专供教学人员和有关专家的足本，印数有限，而这个队伍却在日益扩大，供不应求。是否可以适当放宽界限，

比如说中文系的讲师和研究生，都可以列入可以看足本的人员。主张不限制发行范围的一部分读者认为：实际上这部书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开禁了，近年来有港、台版影印本大量流入，有的书店已将其赫然摆上了书架（天津的一位读者举出他曾在古文化街的几家书肆中看到过公开出售的影印本《金瓶梅》），不如索性整理一个全本，附上一些对读者加以正确引导的文章（或前言），亦不失为明智之举。

认为可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的读者 2101 人，在前面几个条目中画“√”的读者也多在此一条目中亮明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应将《金瓶梅》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以最普及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部名著。同时，他们也觉得这是剔除糟粕、消除误解和神秘感的一种最佳方式。

在“其它”条目下，有读者写下了“开辟《金瓶梅》文化与民俗旅游项目”等建议。

有一个朋友，知我在为以上这些仁智互见的调查结果激动不已，打来电话，称要兜头泼我一盆冷水，说：“你甭得意，其实一句话就把《金瓶梅》概括了。”

我问“什么话？”

朋友说：“《金瓶梅》是狗肉！”

这话让我傻了半天。

细细一琢磨：这话虽糙，可有些味道：我们这一带，素有“狗肉不上大席”的习俗。然而，这种上不得“大桌面”的东西，却又是人人都趋之若鹜的美味。我的老家，如果谁家打了一条狗，用不着招呼，一个村的人都会主动跑来“分一杯羹”。人人心向往之的东西，却居然人人轻之贱之，真是一个文化怪圈。

如果说狗肉能和《金瓶梅》沾上一点边的话，那么便是它所体现的“食色性也”的属性了。非此，即是“风马牛”。

然而《金瓶梅》毕竟又不同于狗肉。

《金瓶梅》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我的好友，青年金学家田秉锷先生曾说：“《金瓶梅》问世之后的命运，也戏剧性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二重特色—— ‘禁’，是一种文化，那是出于否定的文化价值判断。但屡禁不绝则说明，有文化价值则有生命力；‘读’，是一种文化，有人偷偷读，有人公开读，有人跳着读，有人一气呵成读……读是一种文化选择。选择又必然先有判断。《金瓶梅》的价值是由累代阅读实现的。读《金瓶梅》者，或‘生怜悯心’，或‘生畏惧心’，或‘生欢喜心’，或‘生效法心’，各随其便。这更证明《金瓶梅》是个谜，是一个人人心中深埋的谜”（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

这种文化的“二重特色”，将决定《金瓶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命运。

说来说去，《金瓶梅》终究还是一盘“狗肉”。

——看看它在各个不同的时期，被人挂上不同的“羊头”用来“暗渡陈仓”，你就全然明白了。

但就是这盘“狗肉”，能让你品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的那个“五味俱全”。

31

临清与《金瓶梅》

《金瓶梅》与临清，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临清，是《金瓶梅》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之一。书中写到临清的地方很多，如九十二回，作者如此介绍这座运河边上的新兴城市：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九十三回又写王杏庵指点陈经济说：“此去离城不远，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

此外，书中还多次写到运河和临清的钞关。管理钞关的主事钱老爹是西门庆的关系户，西门庆的货船经过临清钞关，便写封书信给他，求其“青目”，以便偷税漏税。

临清，原本是鲁西北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小县城，其有县，始于后魏。自隋开永济河，其地遂与运河为邻。但隋唐以

来，废置相寻，统属无定。元代开凿了会通河与通会河，处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之处的临清，一下子成了水路要冲。

然而临清的极盛却是在明代。这座新兴的商业城市在当时曾达到百万人口，号称天下第一码头，为运河沿岸最大的商埠，临清钞关是中国八大钞关之一。

大运河是一条经济主动脉，临清不仅成为漕运咽喉，也是南北货物的荟萃集散之地。“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时素有“南有苏杭，北有临章”（按：章，指山东章丘县）之美誉。时临清有十六大名景，曰：塔岸闻钟、泥寺春晖、官桥晓月、鳌矶凝秀、凰岭钟英、书院荷香、卫浒烟柳、土山远眺、南亭观花、平岗积雪、南林双桧、东郊椿树、津楼夜雨、古槐荫井、南郊孤松、汶水秋帆。代表着临清当时的繁盛。贺王昌有《题清源》二首，谓：

名区东郡首清源，水陆交冲市井喧。
翠羽名珠多大贾，奇花怪石有名园。

千帆寒影落平沙，烟火沿堤几万家。
富商善向红楼醉，豪客惊看白日斜。

大学士李东阳亦有《鳌头矶》诗：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这些诗句形象地刻画了明季以来临清的繁华，与《金瓶梅》中的描写是非常一致的。

临清城市的兴盛，如从明景泰元年（1450年）建城算起，至清道光四年（1824年）黄河决口运河淤塞为止，持续了近400年。这400年中，明嘉靖至清乾隆，是临清商业活动最为鼎盛的时期。

临清的发展，是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刺激使然。隆庆、万历以降，漕粮停止海运，每年由运河连樯北上。官府又规定漕船可以携带货物，江南的丝绸、绢缎、食盐又主要通过运河，所以临清成了极盛一时的商贾云屯、货物辏集之地，成为一座百分之百的货物与商品交换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市几乎遍布全城，明隆庆至万历年间，便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磁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有规模者13家，至于茶叶店、果品店、家具店、盐行、银店、古玩店等，更是不计其数。焦石木炭行、药材行、棉花市、绵绸市、线市、猪市、鸡鸭市等专业市场亦颇有规模。

这里不仅行商如云，而且坐贾甚伙；不仅外来商品和转销贸易火爆，本地手工业品和土特产亦独领风骚，时有歌谣曰："临清宝，真不少，瓜干枣脯千张袄。陈家剪子毕家刀，箍桶巷的柏木筲。商家的秤杆灵又巧，王一摸的镰刀不用挑。甜酱瓜，百子糕，进京的腐乳味道好。"

《金瓶梅》，就是在以运河漕运孕育的商业城市的背景下，展

开的一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活剧。

据专家考证，《金瓶梅》中写到的临清许多地名，至今遗址犹存。

如：临清闸、临清钞关（五十八回），头闸口（四十八、四十九、八十一回），新河口闸（七十二回），临清码头（四十七、七十七、八十一、九十二至九十五、九十八、九十九诸回），狮子街及石桥（十五，四十七、七十九回等八处），临清广济闸大桥（九十三回），晏公庙（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八回），宝塔（八十九回），僧正司（四十九回），石佛寺（二十四、三十七回），观音庵（三十九、五十回），莲花庵（五十回），真武庙（三十九回），玉皇庙（十四回），水月寺（九十六回），地藏寺（二十六、三十回），岳庙（十六回）、海神庙（三十九回），碧霞宫（八十四回），猪市街（六七回），帅府街（九十二回），南关街（一回），手帕巷（五十一回），细米巷（十五回），臭水巷（七十回）等等，近50个地名。这些地名皆能从《临清州志》、《临清县志》等资料中找到所在，其中有些地名至今仍在沿用。

如《金瓶梅》中多处写到“管砖厂刘公公”，现在临清有“北大窑”，即明代宫窑遗址。据王汝梅先生记：“在博物馆，在街道旧建筑房基处，随处可见明代的大砖。砖面上刻有印记，例如‘嘉靖十五年窑户罗风，匠人郑在仁’等。据《临清州志》记载：临清砖窑始建于明永乐初，朝廷‘岁征城砖百万’，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烧好的砖，经检验后，每块都用黄裱纸封住，用车推到运砖码头，由漕船搭解，后及民船装运。北京故宫各大殿、十三陵等建筑，大部分用临清砖建造。砖窑建在临清，一

是因为临清土质细腻无杂质，用之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二是因为临清为运河码头，便于运往京城。”（《〈金瓶梅〉地理环境与临清》）

至于《金瓶梅》中所写到的晏公庙，到民国初尚存，其遗址在今小白布巷85号，有位80多岁的老人张金春住在此处，他年轻时曾见到过晏公庙的面貌。庙内供奉晏平仲像，是一座道士庙。《临清州志》、《山东通志》也都有关于此庙的记载，与《金瓶梅》描写相符。这座庙是民国初赵仁泉指挥拆掉的，现遗址的院落内幸存数百年古槐一株，位置就在会通河北支（俗称死河子）入卫河口东约200米，即明代临清闸之处。《金瓶梅》中谓“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即此处。

另外，《金瓶梅》中描写过的许多名物，亦为临清所实有。如书中写到“杩子”（即马桶），有学者以为，用马桶是南方人的习俗，故《金瓶梅》的故事背景应在南方。临清王连洲等人考证：杩子确是运河船家必备之物，沿河人家亦多用之。女子出嫁时赔送的嫁妆中，就必须有马桶。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此一风俗才逐渐失传，不复见于今日。临清一带流传的歌谣俗语，有不少是与“杩子”有关的。如一首数说嫁妆的歌谣，便是：“包袱枕头，灯灯盒盒，子孙杩子长命灯”。临清仍未易名的箍桶巷，其主要产品中就有马桶。

再比如，《金瓶梅》中写潘金莲喂了一只雪狮猫，以红布裹肉驯练它，终于让这只猫吓死了官哥。这种雪狮猫，也是临清的特产，《临清志》载，这种狮猫比寻常猫个儿大，长毛拖地，色白如雪，以鸳鸯眼为贵。狮猫是用白色波斯猫杂交培育的珍奇品种，择食性强，习惯一种食物后，很难改变。雪狮猫

分“鸳鸯眼”、“两眼蓝”、“两眼黄”诸品类，是临清人喜欢的宠物。

临清的《金瓶梅》研究者，论证临清是《金瓶梅》真实地理背景，依据的不仅是一群与书载相同的地名集合，同时注意到它们的位置与故事叙事有惊人的一致性。王连洲曾按照明代临清地名图，对照《金瓶梅》故事脉络，画出了18条书中人物行动路线。如第七回“薛嫂说娶孟玉楼”路线、第九回“武都头误打李外传”路线、第二十六回“来旺儿递解徐州”路线、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路线、四十七回“苗青害主”潜逃路线、四十八回“狄斯彬查访尸首”路线、四十九回“西门庆迎接宋巡按”路线、五十八回韩道国杭州贩货归来路线、六十五回李瓶儿殡葬路线、七十七回崔本湖州贩货归来路线、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逃走路线等等，这些由人物与故事串连起来的地名，都与临清实际地理状貌相符。因此，专家们论证，无论从历史发展上、大环境上、细部地理上都可证明，临清是《金瓶梅》故事发生的背景城市。

其次，专家们还从临清方言、风俗、饮食习惯以及流行的民间占卜术等诸多方面，论证《金瓶梅》与临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临清人对《金瓶梅》是情有独钟的，这里有说不完的关于《金瓶梅》的故事与传说。临清人言必称《金瓶梅》，他们把《金瓶梅》引为临清的自豪。

中国民间的《金瓶梅》热，是最先从临清“热”起来的。临清的《金瓶梅》学术研究会建立于1987年，会员中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不足20岁，每年召开两三次研讨会，每年出版

一部会员的论文集，如今他们已拿出了数以百万字计的学术论文，他们的研究成果已越来越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32

王宝玉和《金瓶梅》宴

作为一部大写“饮食男女”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中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仅就“食文化”而论，比起《红楼梦》来，它是一点也不逊色的，甚至超过了任何一部古典小说。

《金瓶梅》写吃，可真是写得淋漓尽致。且不说那大宴小酌，酒海肉山，觥筹交错，铺尽繁华。光是那林林总总的肴馔、美酒、甜点、饼饵、粥品、汤饮，便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金瓶梅》中写到的菜肴，可以说是包罗南北风味，穷极山海之珍。从那一部花色锦簇的菜单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几乎接近于现代的烹调方式——烧、炒、烤、煤、蒸、酿、熏、炖、煨、煮、扒、烩、盐焗、蜜渍等等。

《金瓶梅》菜单中所并列的那些南北大菜，风味小吃，大多不曾写到烹制的方法，但有不少却可以在时人或后人的笔记中找到出处。比如：第五十四回写到的“蒜烧荔枝肉”，就是上了袁枚的《随园食单》的一道江南名菜。酸笋鹅鸭、白烧笋鸡（五十二回）、糟鹅胗掌（二十七回），都是南方菜系中的名品。

而王瓜拌辽东金虾（三十四回）白煠猪肉（三十四回）、水晶蹄膀（三十四回）、卤炖炙鸭（四十五回，亦为《随园食单》所列，系酒煮全鸭）、羊角葱炒核桃肉（四十九）等，则是典型的北方菜系。

许多研究过《金瓶梅》的人都感叹，如果哪一位有心人把《金瓶梅》中的菜谱整理出来，怕是一定会令人绝倒的。

在山东临清，还真有这么一位有心人，他名叫王宝玉，是个中专毕业生。

王宝玉曾在聊城商校专修烹饪，他从1987年开始研究《金瓶梅》菜系。他一遍又一遍地研读原著，把《金瓶梅》中所有的菜肴、小吃、面点以及酒类全都抄录下来，整理分类，然后查阅各种资料，重新编订操作程序。当时没有哪一家饭店敢让他鼓捣这些，他的试验只能在家里进行，花费的心血不算，仅是那"投资"，如没点信心，也早就望而却步了。

《金瓶梅》菜系，以"鲜、怪、绝、全"四大特色取胜，这里面的文章可大着呢。

以"鲜"为例：第六十八回，西门庆招待安郎中的随员，"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中，有一道"鲜鱼羊头"，那可真应了仓颉造字之法："鱼"加上"羊"，便成了"鲜"。可如今却极少有人尝到过把鱼和羊炖在一起会是什么滋味。殊不知，在《中国烹饪大辞典·江苏卷》上，就有一道"羊方藏鱼"，是徐州的名馔。

还有《金瓶梅》中多次写到孙雪娥做"鸡尖汤"，并且写出了烹制方法："原来这鸡尖汤，是雏鸡脯翅的尖儿，碎切的制成的汤。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两只小鸡，退刷干净，剔

选鸡翅尖，用快刀碎切成丝，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酱之类，揭成清汤”（九十四回）。王宝玉如法泡制，居然大获赞赏。

再如六十一回曾写到了“螃蟹鲜”：“西门庆令左右打开盒儿观看，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裹就，香油炸，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虽然写明了用料和简单的烹制方法，可真做起来也殊非易事，王宝玉几经试验，终于做成了这道菜。主料：螃蟹；配料：肉馅、姜蒜米；调料：椒料、团粉、香油、酱油、醋。制作方法：1. 将螃蟹洗净，揭下蟹盖；2. 将肉馅与蟹肉、蟹黄调好味，酿入蟹内。3. 用椒料、姜蒜米、团粉将螃蟹裹住。4. 把整理好的螃蟹放入香油锅中炸熟捞出。5. 酱油、醋对好汁，将炸好的螃蟹在里边蘸一下，即可食用。

再说“怪”和“绝”。《金瓶梅》中提到的更多的菜名，现今已失传，如：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舞鲈公、干板肠、柳蒸糟鲥鱼等。

关于这“柳蒸糟鲥鱼”，第五十二回应伯爵曾有过描述：“你们那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有谁家有？”

这鲥鱼，可见是极名贵的，当时是为皇帝采办的御膳贡品。明代诗人何景明有《鲥鱼诗》：“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桔未应先。赐鲜遍及中官第，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炎冻雪护江船。银鳞细细堪怜妆，玉著金盘敢望传。”

柳蒸糟鲥鱼，“柳蒸”是一种烹调方法，而“糟”又是另一

种泡制方法。

王宝玉查阅了很多资料，访问了很多老厨师，也未能找到烹制此道菜肴的方法，他又进一步去探访民间的烹饪绝招，鲁西北一带“糟鱼”的制作方法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糟蟹的制法给了他莫大的启示。

接着，他又在元代《饮膳正要》中找到了“柳蒸羊”的记载：“羊一口，带毛，右件于地上作炉，三尺深，周围以石烧，令通赤。用铁笆盛羊，上用柳子盖覆，土封，以熟为度。”

通过对以上诸种方法的研制，王宝玉终于琢磨出了柳蒸糟鲥鱼的制作方法：

主料：鲥鱼。

配料：蒜、鲜柳枝、石子。

调料：红香糟、香油、白糖、醋、酱油。

制作方法：

1. 将锅底放上蒜，上面放上宰杀好的鲥鱼（注意加工时勿去鳞。因鲥鱼名贵，全在于鳞，其鳞为脂性，含脂肪 4.5%，蛋白质 18.5%）。

2. 将各种调料放入锅内，先用旺火烧开，后用微火炖七八个小时。

3. 于地上挖一土坑，坑底放入烧得通红的石子、上面放上铁笆，置糟制好的鲥鱼于其上，然后以鲜柳枝覆盖，以土埋住，候石子凉后即成。

特点：色泽红亮，糟汁浓郁，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就这么一道菜，得费多少功夫。

《金瓶梅》中的许多菜肴，如：烧鸭、烧鹅、一龙戏二珠汤、

裂破头的高庄包子等，也被他一一研制出来。

1989年5月在临清召开的全国《金瓶梅》研讨会上，王宝玉做了10个“金瓶梅菜”。专家、学者们大大吃了一惊，他们品尝了王宝玉用明代烹制方法烧制的炙鸭，赞不绝口，认为比北京烤鸭味道还好，香而不腻，风味独特。《金瓶梅》研究专家王汝梅教授当场送了一套影印本《金瓶梅词话》给王宝玉，表示对他的嘉赏。专家们鼓励他搞一个专门经营《金瓶梅》菜的餐馆，发掘《金瓶梅》的饮食文化。

没多久，临清城里落成了一座漂亮、豪华的大酒楼，时名“鲁艺酒家”，王宝玉大着胆子把那座酒楼租了下来，那座酒楼有17个雅间，一百多个座位，这一下他有了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鲁艺酒家”易名“金瓶酒家”，专营《金瓶梅》菜系，果然大爆冷门，食客蜂涌。这个酒家挂牌不久，便接待了日本的旅游团队和美国客人，王宝玉的名字，也在方圆一带传响了。

毕竟，他是中国发掘《金瓶梅》菜系的第一人啊。

1990年，第四届金瓶梅研讨会复在临清召开，这一回，王宝玉可以拿出整桌正宗的《金瓶梅》全席了。

甚至连上菜的程序和礼仪，也全按照《金瓶梅》中描写的进行——先上四个干果碟，四个鲜果碟，便是剧曲清唱，然后撤掉果碟，上四个案酒。

《金瓶梅》宴上用的酒，是王宝玉与临清酒厂合作搞得开发研制，有的品类是开宴前半个小时才拿出的成品。当《金瓶梅》中着力描写过的“茉莉花酒”、“菊花酒”、“羊羔酒”、“三白酒”捧献到客人面前，众人为之愕然。

最后，是十几种《金瓶梅》面点：艾窝窝、桃花烧卖、玫

瑰饼、顶皮酥、花糕……专家、学者们不禁鼓起掌来。

1992年在山东枣庄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王宝玉交出了他《〈金瓶梅〉菜系研究》的论文，再次引起轰动。对《金瓶梅》菜系的开发和研究，他不仅有身体力行的实践，而且有了完整的系统理论。食文化，作为《金瓶梅》庞大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正在重新焕发出它的光彩。

33

从武大郎古墓开棺看清河与《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清河县。

但清河与《金瓶梅》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指出，《金瓶梅》中的"清河"意在讽谕，是对"河清海晏"的一个反讽。有人指出，《金瓶梅》中的"清河县"，实指南清河，而非"北清河"。

所谓"南清河"，是指明代的南直隶淮安府所属，即今江苏省淮阴县，"北清河"，是指北直隶广平府所属，即今河北省清河县。

九十年代初，《河北日报》上曾经发过一则报导，谓武大郎墓已在河北省清河县武家那村开棺，并发掘出了墓前的护墓碑。经过开棺证实，武大郎身材高大，据骨骼长度测定，大约在一米八〇左右，绝非《金瓶梅》上写的"三寸丁谷树皮"。那则报导配发了照片。开圹所发掘出的武大郎墓护墓碑现存清河县文化馆内。关于立碑的时间，残碑上有"乾隆岁次□申"等字，清

晰可辨，碑文已残缺，大意为：在坟场附近，不得动土、掘土、不准放牧、割草，武氏后裔均有责任好好看护云云。据此可知，此碑当为武氏后人所立。

《清河地名资料汇编》“武家那村”条目介绍：“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武、田、许等姓共同建村。因武姓人较多，故取名武家那”。

过去，“打谈”的艺人到了清河，不敢唱《水浒传》和《金瓶梅》，如果不小心唱了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非被清河人打跑不可。因为潘金莲也是清河县人，她的故里名叫黄金庄。

关于武大郎这座坟墓，清河县有许多民间传说。清河人说武大郎原本出身寒门，但自幼勤奋好学，年纪稍长，便一边帮助父亲料理庄稼活，一边抽空苦读，无论春夏秋冬，都不曾间断，终于得中进士，被皇帝御点为阳谷县令。他为政清廉，关心百姓疾苦，颇有政声。又带领百姓修治河道，兴办水利，把阳谷县治理得五谷丰登，一境太平。清河一带的乡亲有事相求，他也大力帮助，从不摆官架子。到后来他从任上告老还乡，乡亲们自然对他非常敬重。他为官一任，两袖清风，死时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附近的百姓和阳谷县自动赶来为他送葬的人一起，在村头为他砌筑了这一座宽数丈，高二丈有余的青砖大坟。1946年搞土改的时候，这坟曾被撬开过，但里边没有任何金银财宝，只有一口楠木棺材，其中一具骨殖相当硕长，那就是武大郎的遗骨。这座坟很快又被填平了。

关于潘金莲，清河人传说她是黄金庄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她嫁给武大郎以后，是正正经经的贤妻良母，与武大郎夫唱妇随，十分相得。经常提醒武大郎要做清正廉洁的官，主持公道，勤

政爱民。武大郎有事就和金莲商量，对夫人十分敬重。清河人都说，潘金莲让编书的人写成一个十足的淫妇，真是天大的冤枉。

不过，《金瓶梅》毕竟是小说，对此似不应过于执着。然而，探求《金瓶梅》与清河的关系，又实在是金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香港金学家梅节先生和大陆学者周维衍先生，都认为《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是南清河。

梅节先生首先从环境上进行分析，找到了三处对应点：一、气候：南清河在淮河南岸，北清河在今黄河北岸，相差3.6纬度，相距不下千里。北清河一月份平均气温－3.5℃，南清河－0.1℃，南清河一月平均最高气温5.9℃，最低－3℃，四百年前明朝气候估计与现在出入不大。《金瓶梅》写清河冬天下雪，河里结冰，西门庆家里也有完善的取暖设备，但整个来说，书中的清河冬天并不冷，男女一般很少穿棉或毛皮。甚至写到了下雪天打雨伞的细节。西门府的女人们元宵之夜“走百病”，也是只穿白绫袄、比甲之类。年初十，西门庆和宋惠莲在藏春坞雪洞儿里幽会，也只是拢了个火盆。这在北方（邢台、清河一线）恐难想象。二、地理：书中经常出现“淮洪”一词，如形容潘金莲“嘴似淮洪”，“随问谁也辩不过她”。书中清河与淮河南北相距近千里，北清河民间不可能有此成语。如以“洪”来形容，也只能是“黄洪”。但这个成语在地理上对南清河却比较合适。书中第六十八回，安忱升都水司郎中，奉敕管理河道，曾提到“南河南徙”。“南河南徙”，《明史》称“淮河南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注云：“淮人谓黄河为北河，淮河为南河”。因此，《金瓶梅》中的清河，当为南清河。另外，书中写清河流

行血吸虫病（又称“黄病”），且此地蚂蝗多，多有“立叮蚂蝗”之类的形容词出现，这些特征都接近徐淮、高宝地区；三、新河口。书中有八回提到这个地名，梅节先生认为，实指南清河之“三里沟新河口”。明初运粮，里外河不通，船至淮安新城，盘五坝过淮，溯淮从大清河——黄河北上。永乐时陈瑄开清江浦河六十里，运船直出天妃口入黄，设新庄闸拒黄济运，河运称便。成化间新庄闸淤，恢复盘坝。嘉靖末，为避黄河灌运之险，在清江浦南之三里沟开新河以通淮河，是为嘉靖运口，即“三里沟新河口”。此是南北漕运咽喉。而当时运河，除三里沟新河口，无一处与书中新河口相当。

周维衍则认为：一、以枣强县与清河县之间的距离来分析，书中说：枣强县到清河，“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北清河是卫河运道所经，与枣强相邻，说明作者实际上并不熟悉北清河的位置。二、四十七回苗员外被害，尸首从徐州洪陕湾落水，从“上流”漂到了清河县地面。徐州洪对南清河而言，才是真正的“上流”，从那里落水，不消一日就可以漂到南清河，而徐州洪去北清河要经过整段山东运河，河段地势高亢，沿运河还有数以十计的水闸，如何能漂得去。三、书中多次写到“新河口”，而北清河并不临近河北，也没有开凿过什么“新河”，根本没有“新河口”可言。（周维衍《关于〈金瓶梅〉的几个问题》，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

清河的《金瓶梅》研究者则认为：《金瓶梅》写清河，即今河北清河县（所谓“北清河”），不仅仅是借名假托。

徐成欣、赵杰曾撰文《清河县与〈金瓶梅〉关系之初探》，对北清河与《金瓶梅》的内在关系作了精僻的分析。

他们指出，《金瓶梅》中的清河县，有着明确的地理方位。小说在许多回目中，凡写南来货船无不先到临清钞关，然后再到清河县城，可见清河县是在临清之北无疑。小说第九十三回中，吴月娘把女婿陈经济逐出家门后，陈被王杏庵送往临清晏公庙当和尚，"出城门，经往临清码头晏公庙来，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方位和距离与现实情况完全吻合。

《金瓶梅》中，还有一个清河独有的特点，那便是城内无甜水。小说第三十七回中，西门庆初会王六儿，韩家为了招待主子，特别去买了一担甜水，买了些好细果仁，为西门庆泡茶。清河县旧城自宋朝建城以来，至近年城里无甜水，想吃甜水，要到城南三华里的花井上去挑。民间有"出城三里吃甜水"之说。据《清河县志》载："贝州多斥卤，井水苦涩，唯城南华井水甘甜。"这是清河县独特的一大缺憾，在周围的州县是没有的。《金瓶梅》写到了买甜水这个细节，说明作者对清河县了解的深度。

另外，《金瓶梅》中还写到了一个只有在清河县才有的地方曲种——"道情"。书中第六十四回，写薛内相到西门庆家去，西门庆预备了一班戏子，薛内相说那南腔"蛮声哈剌，谁晓得他唱的是什么！"他来时叫了两个唱"道情"的，并说还是"唱个道情儿耍耍倒好"。"道情"，在清河县俗称"道腔"，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曲种。表演时，是由两个人说唱，大多是一男一女，一人拿着长筒渔鼓，边唱边用手拍打，另一人拿着一扇大钹，边唱边敲击。至今仍为清河县的传统保留曲种。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清河县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社会状况，与《金瓶梅》所写到的社会环境十分相符。

嘉靖二十四年(己巳，1545)兵部尚书赵廷瑞为清河"崇功幕

德祠"撰写的一篇碑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清河县的社会状况："广平辅郡也，其属邑清河，地卤斥污，下民恒苦水患，极屡且艰。东南新集乡，曰莲花池者，国初有沮洳田七百余顷，令民开垦，蠲其税。后德藩以为闲田请之，田遂入德藩，岁征银一千七百两，民始告病。正德初，逆竖擅权，奸人乘机，投献戚畹。庆阳夏伯儒，请为庄田，贿逆瑾，差中使来囗(原缺字)，括地三千二百余顷，严刑迫民，岁课十倍于昔，民至鬻户易子不能输，愁苦无聊，逃亡相属。而豪势仆隶，多市井罔赖，横行乡邑，有司相顾，恣睢莫敢谁何。民罹其毒，屡叩阍陈诉不报……而豪猾每于常课之外，垂楚剥削，必极其欲而后已。加之水患相仍，蝗蝻为灾，转输不前，控诉无计，哀鸣嗷嗷，相视待毙……"(明嘉靖二十九年撰修《清河县志》)。此事出于正德、嘉靖年间，而入志亦在嘉靖间，可以说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一实录。

这篇碑记中可以看出：

1. 清河在明正、嘉时期多有庄田。

有学者说："清河是个小县，根本没有皇庄"，此说不确。从碑记中可见，德藩在清河原有庄田七百余顷，后武宗朱厚照又赐给庆阳伯庄田三千二百余顷，庄田共约达四千顷，约占全县百分之七十的民田被括为庄田。这种土地兼并的形式是非常酷烈的。《世宗实录》也载，广平府清河县全县官粮银只千余两，而戚畹子粒银则超过万两（卷一〇三）。庄田与皇庄之立，导致了土地的恶性集中，给农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金瓶梅》中出现了管理皇庄的薛内相、刘公公、王皇亲，即是此一社会背景的写照。

2. 清河县与朝廷间的联系。

据《清河县志》载：清河秦为厝县，属钜鹿郡；西汉高帝四年，置清河郡，下辖八县；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刘炟废太子刘庆为清河王，改清河郡为清河国，领七城。后郡、国多次反复，至唐为贝州，领县八；宋平王则后改称恩州，辖县四，当时的临清亦为其属县之一。元始降为县，属大明路，明属广平府。《金瓶梅》托宋言明，清河名义上还是宋时的清河。据县志载：宋时清河"城长九里，高二丈，阔二丈"，元佑六年始修，曾经是"城池高阔，地方繁荣"，并非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

虽然清河到明代已降为县治，但与朝廷之间还有割不断的联系，其原因便是庄田。如碑记中所载，清河这片土地大半括为庄田，所以也就有了百姓与朝廷之间的恩恩怨怨，有了朝中官员到这片土地上的往来，有了平民与皇亲国戚、伯候宦官的横向联系。一日有庄田，一日这种联系就割不断。

《金瓶梅》作者为什么把清河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这固然跟它从《水浒》中旁出一枝，蔚成大国有关系。但更重要的，《金瓶梅》是一部指斥时事的书，有学者指出，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是为在明嘉靖年间"河套之事"中震动朝野的夏言、曾铣冤案鸣不平。此说不免失之穿凿，但清河县这个背景，却是不能忽视的。

《金瓶梅》中展现了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种种画面，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本质，借"清河"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轴心地区，展示大明社会"河清海晏"的别一种人文景观，实是一个入木三分的反讽。

清河一县——实是行将崩溃的晚明社会的缩影；

西门一家——实是万历中期权贵缙绅之家的写照。

34

“孔方兄”的罪与罚

——《金瓶梅》特大盗印案的新闻启示录

毋庸讳言，对更多的读者来说，《金瓶梅》的“庐山真面目”，一直是这部奇书的魅力之所在。

尽管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齐鲁书社、湖南岳麓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相继出版过不同版本的《金瓶梅》(其中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内阁文库本《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收入《李渔全集》内)，但几乎全部是程度不同的删节本(或曰“洁本”)。《金瓶梅》的开禁是小范围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曾影印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1000 套，供给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和学者作参考之用，对每一位申请购书者都进行过认真的资格审核，售出的每一套书都严格地编了号码。

目前书店里的架子上陈列的《金瓶梅》，都是进行“洁化”处理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戴鸿森校本删去了 19161 字，齐鲁书社的王汝梅校本删去 10385 字，以这两个有代表性的版本

为例，删掉的文字各占2%和1%。

由此可见，淫秽的描写在这部一向背着“淫书”骂名的小说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然而，正是这被删掉的极小的一部分，在一些人眼里，才是真正有“含金量”的文字。

那些“洁化”的版本肃然而堂皇地站立在书店里的架子上，读者对它们的选择一样是平静而谨慎的。而一些来路不明的大陆外的“影印本”，却在黑市上交易得“洛阳纸贵”。

更有甚者，一些人专门把删掉的那一部分文字蒐集出版，名曰：“补遗”，实则是吊读者胃口以谋取高额利润。三十年代上海出版商平襟亚所主持的中央书店，在印行洁本《金瓶梅》之后，又把删掉的那一小部分作为《金瓶梅删文补遗》，印行一小册，全70页，售价三角大洋。

从事此一项活动者代不乏人。1992年笔者在郑州市火车站候车，就曾被一浓妆女子拉住，问：“先生你要买《金瓶梅》吗？”不待回答，即从随身带的坤包儿里取出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是电脑打印的一本16开的白皮书，由于油印技术不高抑或印量太大，字迹漫涣不清，匆匆一看，知是《金瓶梅》中删掉的那些片言只语的连缀，而且其中多有穿凿附会，添油加醋，驴唇不对马嘴。我惊诧地问：“这是《金瓶梅》？”

卖书的女子启齿一笑：“大哥你保准没见识过这书，这才是真正的《金瓶梅》呢。书店里卖的全是削过了的，削去的那些就全在这上头了。”

我问：“多少钱一本？”

女子说：“90元，一点也不贵，你买套全本没1000元不成，你花上三五十块到书店买一套削过了的，再拿这本对比着看，就

全了，一共花不了一百几十元，再说你就是花上1000元也不见得能买到全本的，想想哪头儿上算?”

我问：“你有多少本?”

女子说：“你想多要两本，中，可以便宜一些，优惠。”

我说：“我全要了，你得跟我到一个地方去拿钱。”

女子大概觉得苗头不对，冷不防从我手里抢下那个油印小册子，飞一样跑开了。

我心里算了一笔账：那个薄薄的，粗糙不堪的小册子，充其量也不过一两角钱的成本，居然开口卖到90元，《金瓶梅》中的那万把字，就有这么大的“含金量”?

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只有这一小部分，才是真正的《金瓶梅》?

没过多久，接连有两桩震惊全国的非法盗印《金瓶梅》特大案件见诸报端，我再一次被震撼了。

第一件盗印案发生在四川，成都市经营文化企业的业余作家邓树勋（笔名一夫）、《金瓶梅》研究专家吴红、成都市培风印刷厂厂长朱培勇三人合谋，盗印香港版《金瓶梅词话》2000套，35元一套的成本，扩大10倍变成350元，而且公开在各大专院校、研究所、图书馆和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有关部门进行“征订”，同时，印厂暗自加印800套，却通过地下网络流入社会。一些书贩见有利可图，从中做起了转手生意，价格驴打滚一样地翻跟头。

说起来，这位吴红是曾为《金瓶梅》研究付出过很多心血的学者。他原是小学教师，1968年夏天进入《成都晚报》社做编辑和记者工作，业余时间从事古典文学批评。1983年4月3

日，《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曾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他的长文《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金圣叹》，引起轰动。

1987年10月，他与胡邦炜合著的《〈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由巴蜀书社出版，王利器先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长篇书评，称赞这本书"文据兼赅，思路开阔"、"是中国小说研究的新进展"，海外汉学界对这部书也非常看重，当年香港一地便有28家报纸发表了对该书的评介文章。

吴红谈到这本书的写过作程时，曾说："暮春的一天，我和胡邦炜君静静地坐在锦江边一家茶馆的小竹桌旁，品着用岷山雪水煎的香茗，凝视着东去的江水和江边随风摇曳的垂柳，我们议定：写一部系统研究《金瓶梅》的书；已经开始的金学研究，需要扩展、深入，涓涓细流需要归长川、入大海。王利器先生从北京来信鼓励，并慨赐借珍藏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我因前些年被'运动'，工资提级无份，月入微薄，仅人民币50元，但立刻借钱飞京，为节约计，回程坐火车硬座。在火车的咣啷声和鸣笛声中，我一直抱着这在当时算是我国大陆上唯一的《金瓶梅词话》珍本，横中原，过黄河，，逾秦岭，返回成都。胡邦炜在火车站迎接我，说：'你真大胆'。我答曰'谁能知道我怀中的国宝，这叫出其不意。'……接着是读书，实地考察，二上徐州、二下江南，搜集资料，比较分析……我们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起来，几乎没有假日和周末，熬夜是经常的。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我们的笔还在纸上沙沙划过；终于感到有些倦意，暂时掩卷搁笔，窗外已经晨鸡三唱"（《瓶开梅花金归谁——吴红自述》，载于《我与金瓶梅》，成都出版社）。

那时的吴红，是多么专注。可以说，如果他能够抗得住金

钱的诱惑，在学问上会有更大的精进。他辜负了对他寄予厚望的王利器先生。

这个案件在国内外震动很大，许多外电也作了报导。“金”学界震惊之余，不禁为吴红扼腕。

第二件盗印案发生在河北，1993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金瓶梅》特大盗印案，主犯张计忠是个蹲过两次大狱的个体书商，他伙同经营地下印刷厂的灵寿县劳动局干部孟喜春，盗印香港太平书局印发的《金瓶梅词话》3000套，以每套665元的价格出售。

张计忠从事这一不法行动时曾有过周密的策划，印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全部由他一个人单线联系，制版的不问印刷，印刷的不问装订，装订的也不知销往何处，联系卖书的人也不知书是从哪儿来的。张计忠自以为万无一失，却没想到恰好是在最关键的销售环节上露了马脚。河北省新闻出版局于1993年6月3日作出决定，对张计忠处以386.7万元罚款，使其倾家荡产，以示法威。司法部门对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其他责任人也给予罚款和刑事处理。

这两桩《金瓶梅》特大盗印案，公诸报端之后，曾在海内外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这两件个案留给我们的思索是意味深长的。

两个案件的主要案犯，不管是博学多才的《金》学专家，还是胸无点墨的个体书贩，他们都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利益的驱动。

张计忠事先曾算过一笔账：就算只盗印1000套，每套600元，就有60万元的赚头，自个儿怎么也能到手30万。印5000

套就是150万。要做一个百万富翁也就是冒一次险的事。

但我相信他们都没有把这部“独罪财色”的书看懂。

《金瓶梅》中有个常峙节，因为穷困潦倒，连老婆也看他不起，经常羞辱有加。有一回房主催租金，这位常二哥费了好大的劲从西门庆那儿借到了十二两银子，于是腰杆硬了许多，望着白花花的银子大发感慨：“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无价之宝，浑身还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

常二哥的这番感慨，倒很像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泰门对金子的赞美：“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就可以让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这二位对金钱的颂扬，可谓异曲同工、心有灵犀。

《金瓶梅》在它的盗印者眼中，是在空中飞舞的黄金，只要你有足够的胆量和本事把它抓住，那么它转瞬就可以使你成为百万富翁。

“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金瓶梅》中“四贪词”，可为世戒。

两桩《金瓶梅》特大盗印案，均是孔方兄的罪与罚。

两桩特大盗印案给予我们的新闻启示录，还有更深刻的内容——为什么众多的“洁本”不温不火，而多了万把字的全本竟使人趋之若鹜？

如何正确理解《金瓶梅》所揭示的性文化现象，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性”的问题，似乎永远是一个辩争的焦点。

台湾学者刘师古（东郭先生）说：“笔者幸运，这两年能读

到完整的善本。在‘市井常谈、闺房碎语’中发现许多前人未道，圣贤不知的经世大典，不愧是一旷世奇书。笔者且认为较之古典第一名著《红楼梦》，尤有略胜一筹之处。设《红楼梦》是架构在贵族社会的爱情观，《金瓶梅》则是提示基层男女大众的社会相。……它今日之被历来厉禁不为世人认同感知，是由于反映现实，床第之事的赤裸叙写，一直是被世人误解为淫书的结果。虽然‘宣淫导欲’，在那时是一种末世的堕落风尚。今天，如果因此抹杀唾弃全书的精华义蕴，可就似乎损失太大了。……又如，历史上的中国人把婚姻、爱情与性的大问题，得到一致而合理的解决，是件智慧而特殊的发明。不像西方世界提倡一夫一妻制度，表面躯壳的爱情至上主义，不细加研究社会问题，似亦无懈可击，没有什么不对。然而，离婚如同儿戏，暴力奸淫之事不穷，这在中国历史上就不曾发现。有人以为是道德力量的约束，和女权不得伸张使然，实在是种误解。面《金瓶梅》对此一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世人把其中床第描写目为诲淫，比之西方文明产物的成人电影，总算小巫见大巫了。而笔者保证：《金瓶梅》中的床第描写，如果你肯全书用心精读三遍以上，那些‘场面’你就会视面不见了。因为锐意铺陈的叙写会更能吸引你，会觉得这本书绝对不是一部淫书。”（刘师古《闲话金瓶梅》）

有一位朋友借走了我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影印本，还书时对我说，他第一遍是“跳”着读的，专看“那些地方”，觉得很新鲜，第二遍就平淡了许多，读完全书，才知道《金瓶梅》的全部精华在于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他写出的是对一个腐朽没落世纪的懲戒。

《金瓶梅》特大盗印案留给我们的启示还有很多，透过孔方兄的罪与罚，我们也看到了对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面的揭示。


EXLIBRIS

35

李翰祥的《金瓶梅》系列

结识李翰祥，是在1992年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他为与会的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带来了他执导的《金瓶双艳》。于是，这一届研讨会便多了一个话题——李翰祥和他的《金瓶梅》系列电影。

李翰祥，是第一个把《金瓶梅》搬上电影银幕的导演。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十几年的时间，李翰祥先后编导了《金瓶双艳》、《蕙莲》、《武松》、《金瓶风月》、《潘金莲和他的七个男人》等影片，构成了他的《金瓶梅》系列。这在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中，尚属首创，为海内外影坛所瞩目。

以执导历史大片而名噪海内外的李翰祥，何以对《金瓶梅》一往情深。

李翰祥说，他喜欢《金瓶梅》这部书对女性命运的深层开掘。在《金瓶梅》那个不同凡响的女性世界中，蕴含着独特的美学价值。

那是一个纯粹从自然而非道德的角度描写的女性世界。金、

瓶、梅们不是“香草美人”的寓托，不是悲苦怨恨的写照，不是风流纯情的象征，她们是一切道德和礼教的叛逆。她们第一次走出男性的也是社会的道德界定：“道德越是将人的生命需要掩盖、扭曲，她们越是把人‘性’的追求和‘欲’的渴求放大、凸突；道德越是以假面的崇高树立偶像，她们越是以邪恶的真实突出个人。在她们赤裸裸如洪水般泛滥的私欲面前，所有的道德都显得虚弱、狼狈和无能为力。她们所表现的放荡的热情、卑贱的善良、粗鄙的情爱、低劣的真诚，不仅是那理性背反，感情裂变的社会的绝妙写照，也是对道德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冲击”（罗德荣语）。

基于对《金瓶梅》中女性世界的认知，李翰祥把他的笔触探入了一个全新的审美领域。

《金瓶双艳》是李翰祥《金瓶梅》系列中的第一部片子。其内容是西门庆奸娶潘金莲和李瓶儿，以及整个西门府的妻妾争风吃醋、家反宅乱，直到西门庆纵欲暴亡。

在对潘金莲、李瓶儿这两个主要角色的把握上，李翰祥不同意“翻案”之说。他说：何必要替潘金莲这个人物翻案？暴露她就好了，笑笑生的本意就是暴露。潘金莲不只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她是在那个荡漾着污水的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一朵“恶之花”。

潘金莲觉得这个世界很委屈她，所以才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疯狂地施行报复。她九岁被卖在招宣府，十五岁时又被转卖给张大户，刚刚十八岁，年过六旬的张大户竟野蛮地“收用”了她。因不堪主家婆攘骂，大户把她白白嫁给武大，以图长期奸占。武大人物猥琐浊蠢愚钝，为人懦弱无用，撞见自己的妻子跟张大户厮会，“亦不敢声言”，“只是一味味酒”，如在醉生梦

死一般。面对这样一个丈夫，美丽、聪颖的潘金莲如何能安心立命？这桩不幸的婚姻使她丧失了人的最起码的权利。

武松是潘金莲追求的第一个男人，然而，这位徒手打死吊白额大虫的壮士却十分不谙风情。她第一次美好的追求，化为泡影。正在她感叹"眼前恩爱隔崔嵬"的时候，她与风流倜傥的西门大郎邂逅相遇，一拍即合。与西门庆的偷情让她尝到了人生的真味，让她知道自己"枉活了二十五岁"，所以杀人放火全然不顾了。

潘金莲的毁灭，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潘金莲的悲剧，不折不扣地是一出社会悲剧。

李瓶儿原是蔡京的女婿梁中书的一个小妾，来路不甚明白，不是妓女从良，就是被卖到梁府的丫环。她嫁花子虚，同潘金莲嫁武大郎一样，也是一桩"恶姻缘"。

李翰祥在《金瓶双艳》中安排了一个情节，是花子虚这个性无能者在妓院里如何百般地对妓女施虐。这个情节从另一个方面衬出了瓶儿命运的不幸。

与西门庆偷情之后，她深深地爱上了西门庆，一颗心只在他身上，以至于最后活活气死了花子虚。李瓶儿害死花子虚，尽管没有潘金莲药鸩武大郎那般惨烈，但都是因与西门庆通奸后害死亲夫，二者异曲而同工。

当她最终如愿嫁到西门府之后，却性格温柔、待人慈善宽厚，这与她嫁西门庆以前害死花子虚、骂逐蒋竹山等行为判若两人。诚然，这是为了在西门家逐步巩固自己地位的举动，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李瓶儿，确确实实是在追求着一种纯然的、真挚的爱，尽管西门庆屡屡负心于她。在《金瓶双艳》中，李

瓶儿的这种真爱、被刻划得淋漓尽致。

剧中饰潘金莲的是香港影星胡锦，饰演李瓶儿的是香港有影响的影星恬妮。影片的全部外景、内景都是在韩国拍摄的，最先在日本公映。此片在台湾放映时，有关当局责难胡锦出演黄色影片，罚她不准再演，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在已经拍完的五部片子中，李翰祥最为满意的是《武松》。

《武松》的主要内容是：从武植、武松患难与共演起，经武松打虎、金莲戏叔、武植被害，最后是武松手刃潘金莲和西门庆，以奸夫淫妇的心脏祭奠长兄亡灵。

在对武松性格的刻划上，李翰祥既突出了他的凛凛正气、嫉恶如仇，也写出了他性格上的缺失，写出了欲与理的矛盾。在《金瓶梅》中，武松不是个重要人物，由于作者照抄了《水浒》中对武松的描写，对这一形象的再创作不够。李翰祥笔下的武松，则更多了几分“凡人色彩”，使人觉得可信。武松能打死猛虎，却不能战胜那个泼皮无赖西门庆。虽然他最终报了杀兄之仇，但他仍然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出现在银幕上的。

这部影片的剧本是李翰祥自己创作的，由香港走红的影星汪萍饰潘金莲、狄龙饰武松。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女主角汪萍因此被推举为“金马奖”影后。

拍摄《金瓶梅》，“性”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李翰祥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它所展现的一切情节，都是为了揭露那个时代的腐朽与靡烂。人，有人性和兽性两个方面，应该做人的时候作兽不行，应该作兽的时候作人就不那么率真了。影片《金瓶梅》是写意与写实的结合，李翰祥把握的一个原则是“乐而不淫”。毕竟，这几部还都算是商业片。

李翰祥最大的愿望是拍一部真正的、高品位的、非商业的“大片”《金瓶梅》。

这一部片子应是气势恢宏的晚明社会生活长卷，是一部家庭背景下的社会悲剧，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佳构。

它的故事、人物，都应是全新的、鲜活的。

为了拍好这部片子，李翰祥殚思竭虑，废寝忘食。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读明史，四处奔波去选择外景地，甚至对明代的社会风俗、饮食、礼仪、服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据。

会议期间，不少学者建议他选择《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临清作为外景地，他十分高兴。等不到会议结束，便通过有关方面用电话把临清的县委、政府负责人请到枣庄，商谈在临清搭景，建立《金瓶梅》文化城的设想。他建议在临清搞《金瓶梅》一条街，再现西门府宅院、花园、生药铺、狮子楼等景观。拍摄结束后，还可辟为旅游风景区，以独具风貌的《金瓶梅》文化供游人欣赏。

李翰祥早年曾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专攻油画，当时担任校长的徐悲鸿先生非常赏识他的绘画方面的才华。《红楼梦》一剧中，许多宏大的场景全是他一手绘制出来的。对于这部大片，他当然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他向“金学”家们宣布，他要在银幕上再现一部最能体现《金瓶梅》风貌与精神的《金瓶梅》，他要把《金瓶梅》拍摄成如同《清明上河图》那样一幅不朽的历史画卷。

由于种种原因，他后来在临清的设想没有获得成功。

再后来，传出了他在工作中猝然辞世的消息。

他终于没能完成他的这一夙愿。

36

为潘金莲“翻案”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一千个读者绝不会有一千个潘金莲。

说起潘金莲，人们差不多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她是一个天生的荡妇，一个妇女中的魔鬼。

连张竹坡也说，“拿砒霜来是西门庆罪案，后文用药是金莲罪案。”“俏心毒口，可爱可畏。”“潘金莲、蝎也，一挨手便掉尾螫人。”（以上均见张竹坡之评点“第一奇书”）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已先为潘金莲定案，但同《金瓶梅》相比，《水浒》中的那个潘俏娘儿，便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水浒》中，潘金莲只不过是一个丫头，她一开始反对张大户的逼奸，是值得同情的弱女子，这也是施老先生给她的闪光的一笔。凶狠的张大户为了报复她，把她嫁给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武大郎，那个“三寸丁谷树皮。”

她反抗过，但是徒劳；她爱上了武松，又受到了武松的严词拒绝。在失落感的支配下，便同西门庆勾搭成奸，这是她沉

沦的开始。后来又与王婆、西门庆一起，用砒霜害死武大。这时的潘金莲，已由一个被社会欺凌的弱女子，变成了一个杀人犯。

《金瓶梅》中，潘金莲被卖到张大户家时，已经学会“描眉画眼，溥粉施朱”。她没有拒绝张大户的“收用”，却最后淫杀了张大户。及至她毒死武大，嫁到西门庆家后，更是淫妒交加，坑害致死了李瓶儿母子。她勾引了许多男人，也害死了许多男人，她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给潘金莲翻案，很难。

1927 年，剧作家欧阳予倩写了京剧《潘金莲》，后又改为三幕话剧发表。

欧阳予倩先生谈及此剧写作动机时说：“我当时受了‘五四’运动反封建、解放个性、破除迷信思想的影响，就写了这样一出为潘金莲翻案的戏。”（《欧阳予倩选集・前言》）

那时的欧阳予倩，正是年轻气盛，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用个性解放的观点来探索促成潘金莲种种行为的原因，试图将潘金莲塑造成一个追求灵魂自由的新女性。

首先，剧中突出了以张大户为代表的专制统治的横暴，渲染了以武松为代表的封建礼法的不合理性，抒写了潘金莲个性被压抑的极度苦闷，以及她对命运的反抗和挣扎。

她追求自由，追求爱情，即不肯屈就于丑陋、富贵又有势力的张大户，也不甘心做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的妻子。她认为县太爷衙门里说的道理，只不过是男人折磨女人的“一面理儿”。她不肯做这种“理”的牺牲，主张“夫妻不相配，拆开了再配过”也无可非议。

她的种种言行，当然要遭到社会的反对，也遭到了她心中爱慕的武松的鄙弃。于是，她只好从西门庆那里去寻找失落的爱情。当她知道西门庆对她并无真情，只不过是仗着有钱有势来寻欢作乐，拿她做玩物，她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去报复西门庆。当武松杀她时，她说："死是人人有的，与其寸寸节节被人折磨死，倒不如犯一个罪，闯一个祸，就死也死一个痛快！能死在心爱的人手里，就死，也心甘情愿。"

欧阳予倩给潘金莲翻案，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让更多的人感到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他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和否定，对追求个性自由的理解、同情和肯定，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精神。

这个剧本在当时颇引起了一番轰动，潘金莲做为一个被凌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令人同情，但她做为一个杀人犯，她杀人的动机（像武大这种人"恶活却不如好死"）也更难让人接受。

田汉说过："由于把潘金莲作为封建势力下被牺牲者加以同情，又有很好的做唱，影响很大，学的人很多，但这个戏今天看来，是有思想错误的。潘金莲原是值得同情的，但她与西门庆勾搭，毒死武大就很不好了。予倩曾说他和陆镜若都沾染过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唯美主义思想，这个戏（京剧）在潘金莲的唱词中就有一些无原则地崇拜力与美的词句，像最后愿死在自己心爱的人刀下的那些地方，更表现了被虐待狂的倾向。"（田汉《欧阳予倩文集·代序》）

这一点，欧阳予倩自己在剧本发表后也感觉到了。

1985年，有一位因创作《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在全国评奖中连中三元，被称为"梨园怪杰"的魏明伦，创作并由他所在的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演出了荒诞川剧《潘金莲

——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再次轰动华夏。

魏明伦以八十年代的意识和视角，去重新审度这个人所不齿的女人。他对潘金莲的挣扎、追求、沉沦，进行了一番理性的思考。正如他在剧前引用一位著名文学家的话说：悲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诗人的，尽管这个人物具有历史的名字。

这出荒诞川剧，跨越朝代，不分时间；跨越国界，不拘地点——武则天跨朝越代而来，安娜·卡列尼娜跨越国界而至，贾宝玉从《红楼》奔来，《水浒》作者现身说法，《花园街五号》女记者吕莎莎代鸣不平，现代阿飞哥们趁势起哄，七品芝麻官束手无策，人民法庭女庭长评论古案。剧中人物有潘金莲、武大、武松、西门庆、张大户、王婆、泼皮甲乙丙；剧外人物有李莎莎、施耐庵、武则天、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法庭女庭长、贾宝玉、芝麻官、现代阿飞、上官婉儿等。

该剧从总体上打破时空、生死、古今界限，吸收了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因而以"荒诞川剧"名之。

川剧《潘金莲》中，出身贫贱、美丽纯真的丫环潘金莲，面对的是四个男人：佛面兽心的张大户、丑面欺心的武大郎，冷面铁心的武松，粉面狼心的西门庆。

魏明伦把潘金莲反抗张大户的逼奸作为重头戏，突出了她"宁与侏儒成配偶，不伴豺狼共枕头"的不屈精神，保持了自己的贞操和尊严。嫁给武大后，她能容忍武大丑陋的容貌，却鄙弃他怯懦的奴性，一再鼓励他要"抬起头走路，挺起腰做人"，而武大却逆来顺受；面对泼皮无赖们寻衅，她出手敢打，张口敢骂，而武大却低声下气地钻泼皮们的裤裆。

这时武松出现，打走了泼皮，替哥嫂出了气。潘金莲倾慕武松的英武，恨“为什么当初无缘识豪俊？为什么见面已有叔嫂分？”但是，她却不敢公开去爱武松：“依旧守我的有夫寡，依旧抱我的小木人。”只是醉酒后，她才敢于大胆地吐露了真言：“但愿共饮交杯酒，恨不相逢未嫁时。”这番真情，却召来武松的痛斥。

这时，西门庆乘虚而入，先是唆使一班泼皮去调戏潘金莲，接着以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面目挺身而出，赶走泼皮，又用春药迷乱并占有了她。当她看清了这位又阴又柔又甜又狠的西门庆时，武大已被他踢昏迷过去，她手里已接了西门庆送来的砒霜。

此时的潘金莲，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等着武松回来报复，顶着骂名，受着恶气，抱着木偶，活活憋死，要么毒死武大，与西门庆做长久夫妻。

她幻想武大能给他一纸休书，然而武大曾说：“我就剩下这点夫权了，使不得，使不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大郎烙烧饼，嫁给叫花子，夹根棍子抱着走。天上雨，地上水，天理使然，没什么说的。”潘金莲想吞砒霜自杀，但又下不了决心，在极度矛盾中，迫于西门庆的威逼，终于对武大下了毒手。那一场戏很有意味：

潘金莲：我活着怎么办，请陛下作主啊。

武则天：强扭姻缘，应该瓦解，你写一封休书，把武大休了罢！

潘金莲：从古到今，只准男人休妻，哪有女人休夫的

法典呢？

武则天：这……

武则天：（暴怒唱）

怒火烧，寻报复

女人杀男……

潘金莲：大郎，我实在不忍心毒死你，只求你依我一件。

武大郎：（唯喏）十件八件我都依你。

潘金莲：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为妻给你磕头了！（跪求）

武大郎：放你？（摇头）对不起，这件事情办不到。

潘金莲：（怒而起立，泼辣地）为妻已犯七出之条，你就写上三八二十四字——把老娘休了罢！

武大郎：莫吵，莫吵，（软弱的声调包含着强硬的决定）我武大无权无势，手中只有这一点点夫权！妇道人家，嫁鸡随鸡，嫁犬随犬，鸡犬也该共白头。我就是老了——老也不休死也不休！（隐退）

潘金莲：（绝望地）老也不休，死也不休！（苦笑、冷笑、狂笑）哼哼，哈哈，哈哈……

众西门庆：（齐呼）下手！快下手啊！

从向往美满的婚姻开始，潘金莲走向了罪恶的渊薮。同时，封建夫权的压迫，是她犯罪的直接动因。

所以，当武松要杀她时，她扯开领口，对着惶惶退后的武

松说："我能死在你手中，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一语包含了人生的全部酸楚。

魏明伦虽然也写出了潘金莲由沉沦走向堕落，走向犯罪，但却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导致她堕落犯罪的社会根源和客观因素，指出封建社会不自主的婚姻制度制造了她的悲剧命运。

魏明伦改变了潘金莲的形象，向施耐庵和笑笑生式的女人观提出了挑战。他写出的，是另一个潘金莲，一个全新的潘金莲。

魏明伦却不同意"翻案"说。

《潘》剧中，剧外人吕莎莎有句台词，反映了魏明伦的观点：

"不，'翻案'二字，太简单化了。我是站在八十年代的角度，重新认识潘金莲，思考这一个无辜女性，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沉沦。"

这可以说是整部剧本的宣言。

魏明伦谈创作体会的文章说："潘金莲是家喻户晓，古有定评，今有异议的艺术形象。在我笔下，她从单纯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变化甚大，首尾判若两人。何处该赞扬？何处该同情？何处该惋惜？何处该谴责？站在不同角度的观众，各有不同的认识。"

又说，他写潘金莲，是"始于同情，终于惋惜。""同样一个潘金莲，同样的遭遇，施耐庵是全用俯拍镜头，鄙视淫妇之恶；欧阳老是用仰拍镜头，抬高叛逆之美！"而他，则"是在俯仰之间，把人物置于光怪陆离的社会背景下，视其性格发展的不同阶段，该仰时则仰，该俯时则俯，该同情处则同情，该赞扬处也赞扬，该惋惜时就惋惜，该谴责时亦谴责。反思这一个

古代贫家女儿是怎样走上谋杀亲夫的道路？引出一串联想……”（魏明伦《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潘金莲〉随想录》）

该剧上演之后，反响之热烈，可谓空前绝后。

《潘》剧所到之处，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人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有人说它破坏了川剧艺术的传统。该剧在上海演出，场场爆满，在北京只做了三场内部演出，既未登广告，也未卖票，很多人知道消息时，潘金莲已不见踪影。

然而，仅管是三场内部演出，它所引起的反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吴祖光、黄裳、萧丁、舒展、中杰英、梅朵、胡伟民等，都写文章参与讨论，为《潘》剧鼓与呼。《人民日报》、《新观察》、《戏剧与电影》、《文汇月刊》、《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也相继刊发了讨论文章。

黄裳说：

> 潘金莲是封建社会里受侮辱、损害、摧残的女子，这才是没有疑义的；不过通常看到的只是表层的一面，却忽略了她在成长中的品性受到封建社会腐蚀、损伤的另一面。对她说来，这才是更为严重的伤害。施耐庵奠定了基础而未完全展开的人物塑造，在兰陵笑笑生笔下大大发展了。这种发展是合乎人物成长逻辑的。
>
> 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单纯少女，怎样一步步被改造，终于堕落，变成那样一个放荡、偏狭、阴毒的妇人。……在舞台上，她还应该更活泼、放恣。只有更深刻地揭开她这种特异的成长道路，才更有说服

力，也才能激起观众对她的同情。现实主义的力量就表现在这里。

（《关于潘金莲》）

萧丁说：

我看魏明伦的创作意图，并不是为了宣传性解放，因而抬出潘金莲，而是通过对一个具体人物的分析和探讨，启发观众对固有传统的观念进行再认识，以促进思想的解放。

……我倒认为，《潘》剧的意义，不在于翻案，而在于启发我们思索。

（愿载《上海文化艺术报》1986年6月13日）

著名演员梁谷音谈她扮演潘金莲这个人物的心得时，也认为，潘金莲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案”也罢，“重塑”也罢，都反映了一代人意识的觉醒。这才是真正具有时代意义的。

37

蛾与火的寓言

——新编古代京剧《金瓶梅》

荒诞川剧《潘金莲》的上演，带动了《金瓶梅》戏剧的创作。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戏剧舞台上，相继有一大批《金瓶梅》戏出台，如：吉林省京剧团的八场京剧《金瓶梅》，江苏省梆子剧团的七场江苏梆子戏《李瓶儿》、河南省豫剧三团的无场次豫剧《金瓶梅》、上海市越剧团的越剧《西门庆与来旺妇》等。一时间戏剧舞台瓶梅竞放，争奇斗艳。

新编古代京剧《金瓶梅》，是与荒诞川剧《潘金莲》差不多同时间搬上舞台的。这部八场京剧，并非是对《金瓶梅》的全本搬演，而是将潘金莲与陈经济的一段恋情进行了繁衍铺排。编剧为吉林省京剧团专业剧作家齐铁雄。在这部剧本前后，他曾完成了四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金瓶梅》，可谓对《金瓶梅》一往情深。

齐铁雄，1942 年生，吉林省梅河口市人，1967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

会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他创作的现代京剧《梅花案》曾风靡全国戏剧界。

京剧《金瓶梅》为八场，从潘金莲被西门庆强娶入西门府写起，到潘金莲被吴月娘发卖，逐出西门府结束。以潘金莲的命运为主线，展示了她在西门府内为争取婚姻自由、女性尊严所做出的种种抗争。剧中有一首反复出现的主题歌《蛾火颂》：

夜沉沉，月清清，翩翩彩蛾绕残灯。
只为求得光和热，痴情扑火向光明。

以飞蛾扑火、追求光明的勇敢，象征潘金莲敢于反抗封建礼教，不怕粉身碎骨的精神，因此亦可被视为一部"翻案"之作。

该剧有一个"大写意"的序幕：

〔音乐起，以琵琶为主的弹拨乐奏出一首如诉如泣的曲子。
〔音乐声中幕启
〔舞台由淡黄、淡蓝、淡红三种颜色的蝴蝶幕组成，正中是一只硕大的花瓶，瓶身是金色的美女图像，瓶上插一枝花繁枝茂的梅花，灯光渐暗，衬出花瓶金光闪闪……
〔淡淡的薄雾升起，环绕瓶身，金瓶上金光闪闪的美女图像忽然活动起来，化作翩翩起舞的美女——潘金莲。
〔潘金莲舞姿明快、跳跃，在鲜红的天幕映衬下，舞蹈

动作展现了潘金莲的懦弱、反抗、追求、毁灭。舞姿由慢到快，由平静到疯狂。

〔潘金莲渐渐隐入瓶身，音乐引出如泣如诉的主题歌〕

剧中的潘金莲，是个美丽、聪慧又十分不幸的女子。她反抗张大户的强暴，因此被逼嫁给身不满三尺的武大郎。她对西门庆的爱，是一腔真爱："慕他心肠侠义，爱他人品端庄，羡他仗义疏财气朗朗，敬他须眉男子志昂昂。"嫁到这个家反宅乱的西门府之后，她处处受气，不但正室吴月娘从不正眼瞧她，其他几房姨娘也对她百般刁难。最使她不能容忍的是，西门庆原本就是个风流浪子，刚把她娶回家，热突突的又恋上了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当她亲眼看到西门庆跳过墙头与李瓶儿幽会，她的心碎了："奴也要爱，奴也要贪，我和你麦芒历历对针尖。你缠蜂儿我绕蝶，你恋花儿我伴草眠，叫你也心寒。"私通琴童是她向错误的路上走出的第一步。

李瓶儿终于娶进了西门府，不久又生了儿子，这对潘金莲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官哥的"百岁"宴会上，她粧丫环向西门庆市爱，对李瓶儿却话里话外百般奚落。没想到她的雪狮子猫在人们欢宴时窜到李瓶儿房里，抓破了官哥的脸，终于吓死了官哥，潘李之间，遂形同冰炭。对官哥的死，潘金莲内心是抱愧的，所以当她听说李瓶儿病倒了，便让春梅备了乳饼去看李瓶儿。这时西门庆进来，怒冲冲让潘金莲去向李瓶儿"负荆请罪"，还扬言如不去便把她驱出西门府，做武二的刀下之鬼。潘金莲索性破罐破摔，执意不去看李瓶儿，正当西门庆举鞭欲抽打潘金莲时，陈经济破门而入，称衙门来人请岳父速去公干，为

潘金莲解了围。她对陈经济的爱，也就从这一场戏中开始了：

〔金莲慢慢取下头上的簪子，交给春梅，春梅茫然〕

金莲：你今后……好自为之……自己珍重！〔安详地整理衣和头，向门走去〕

春梅〔不解地〕：五娘，您……

潘金莲〔简捷地〕：出府去！

春梅〔大惊，扑向潘〕：五娘，五娘你不能走！

潘金莲〔冷峻地〕：五娘不愿受那负心人的欺凌，更不愿如此屈辱地生存。

春梅〔哭着抱住〕：五娘，五娘你三思……

潘金莲：思之再三，只好如此。

春　梅：五娘！

陈经济〔急上前〕：恕小婿多言，五娘此举，可悲可笑，堪称迂腐懦弱。

潘金莲〔愤怒而意外地〕：迂腐？懦弱？

陈经济：小婿往日对五娘倍加崇敬，不料今日却为这些区区小事所折服，竟然如此轻生厌世，岂不是可悲可笑，迂腐懦弱？

潘金莲〔气愤地〕：区区小事？你——真乃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怎知我这内中的酸辛，苦痛？你也来讥笑于我……

陈经济〔激动地〕：酸辛苦痛谁无有？〔一把撸起衣袖，将伤痕累累的胳膊呈现在潘金莲眼前〕五娘请看——

〔潘金莲，春梅见状大为吃惊〕

春　梅：姑爷这是……

陈经济〔痛苦地〕：西门大姐抓的、挠的、咬的、掐的！

潘金莲：陈姑爷，你——

陈经济：我父朝中被参，投奔岳父而来，西门大姐性情暴戾乖僻，嫌憎于我，每日动辄抓咬挠掐，小婿一一受之。为的是有朝一日伺机替父鸣冤，休妻另爱。这朗朗人世、浩浩苍穹，岂无我翱翔之地？不知五娘何苦要轻生厌世？想这死，乃世上最易不过之事！一死百了，亲者不得予以报答，仇者不得予以惩戒，死之何用？依小婿看，岳父背义，五娘亦可移情！……

〔潘金莲目瞪口呆，心悦诚服〕

潘金莲〔惊异地〕：呀，

〔唱〕只道他西门快婿刁钻秉性，却原来斯文君子忠厚至诚。

只道奴失情失意含羞忍辱，

谁料他无疼无爱受尽欺凌。

同是天涯客，

同病亦心通。

识得他人肺腑事，

人间知己最难逢。

〔陈经济从怀中掏出一方汗巾〕：

陈经济：五娘．〔唱〕

可曾见沉舟侧畔千帆竞，

病树前自有那万木争春。

艳阳天满目春光花似锦，

却为何自寻烦忧叹自身。

〔潘金莲感激地看着陈经济〕

陈经济：五娘，还须阔心胸，遣愁怀，（示汗巾）这是

小婿从东京为五娘捎购的汗巾，五娘请笑纳。

春梅〔急忙接过〕：真是漂亮，绛紫销金。〔奇怪地〕咦，

怎么绣一朵黄莲花，莲花不是红的、白的吗？

陈经济：不是黄莲，是金莲！

〔潘金莲为之一震〕

陈经济〔深情地〕：你看它夺目耀眼，玉立亭亭，出污

泥而不染，荡浊水而洁身，驱黄莲之凄苦，弃

白莲之娇嫩。她就是她——立乱世不倒，矗危

局不却的一朵金莲！

〔潘金莲大为震动，急切地夺过汗巾，凝视良久，

心潮起伏……〕

潘金莲〔唱〕：销金绢帕绣金莲，

一片至诚可动天。

奴此生谁人如此将奴念，

敬重奴为奴除忧为奴解难。

欲将这满腹忧思向他倾献……

潘金莲就是在这样的情状下爱上了陈经济的。她的爱很大胆也很真挚，她真要不顾一切了——“此生但求真情爱，敢做天下乱伦人”。

后来潘金莲怀上了陈经济的孩子，两个人又惊又怕，潘金

莲让陈经济同她私奔，陈经济却认为西门庆财广势大，此事断然不妥，还应想一个万全之策。潘金莲一狠二狠，终于在西门庆病重严禁喝酒时给他饮了"鹿茸虎骨药酒"，西门庆一命呜呼。在西门庆的灵堂里，潘、陈奸情败露，吴月娘发卖潘金莲，潘金莲说出了一番震聋发聩的话来：

说奴背理乱纶，未免太不公平，想当年，若非老爷茶馆勾情，焉有金莲杀夫进府？入府来，若无老爷绝情背义，焉有金莲弃旧移情。西门庆喜新厌旧，负心绝情，奴为何要空守虚名，从一而终？陈相公夫妻同床异梦，我与他同病同情，互敬互尊！为这情，顾什么纲常伦理，四德三从！为这爱，管什么家规王法，怕什么钢刀酷刑！

作者给潘金莲赋予了许多"新女性"的色彩，潘金莲的堕落与毁灭，全是西门庆一手制造的罪孽。如果说一开始她撩拨琴童，是出于对西门庆寻花问柳的报复，那么她与陈经济私通，就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爱了。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让她做出了这超越纲常和伦理的选择。当然，一开始她就知道会为这选择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之所以说京剧《金瓶梅》是一篇"翻案文字"，是由于这出戏不仅给潘金莲这个"虎中美女"翻了案，还给陈经济翻了案。

陈经济，在《金瓶梅》中是个不齿于人类的轻浮浪子，他"自幼乖滑伶俐，风流博浪志成，……只有一件不堪闻，见了佳人是命。"他十七岁娶了西门庆的女儿为妻，过两年，寄居在岳

丈家，即偷上了小丈母潘金莲与春梅。之后，他一有机会就奸丫头、玩妓女，所淫女人之多仅次于他的泰山老丈西门庆。最后，他是与春梅行淫之后赤条条死在张胜的刀下的。他是《金瓶梅》世界中的第二条淫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评他："勾挑软昵处在西门庆之上"。京剧《金瓶梅》中的陈经济，与潘金莲一样，也是一桩"恶姻缘"的受害者，因为家里遭了官司，他在岳父家避祸，妻子西门大姐对他非常憎嫌，这个性格乖戾的西门千金动不动就对他拳脚相加，他身上经常带着撕咬的伤痕。不同的是，潘金莲不堪于武大的猥琐蠢浊，终于在西门庆的一手策划和帮助下结束了她的"恶姻缘"，而陈经济则不能，他的对手不是武大郎那样的草包，而是富甲一方，重权在握的豪绅西门庆。他在西门府，是个寄人篱下的角色，只要西门庆动一动指头，他这条命就没了。潘金莲撩拨琴童，孙雪娥在外窃听，陈经济喝走了琴童，又提醒潘金莲："五娘心地良善，怎知这府内明争暗斗之事，适才小婿来时，见四娘匆匆而去，不是好兆，五娘还须留神一二！"西门庆死后，吴月娘欲将他赶出西门府，让他带上西门大姐到东街旧宅居住，他果断地拿过纸笔，写了一纸休书，休了西门大姐，扬长而去。

吴月娘这个形象，历来是《金瓶梅》中最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崇祯本评她"圣人之心"，是一个"可敬"的贤德之妇，而张竹坡却处处指摘她奸诈、贪婪、愚顽及纵容丈夫做坏事等等，说她是全书中最坏的一个女人。然而《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的原旨，是把她写成一个与众"淫妇"们形成对比的附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恁般贤淑的妇人"（第十八回）的。西门庆的妻妾们，数她的下场最好："月娘到老，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此

皆平日好善看经之报也。有诗为证：……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第一百回）

京剧《金瓶梅》中的吴月娘，则完全是一副封建卫道士和恶妇的面孔。潘金莲娶进西门府的第一天，她就给潘金莲来了个“下马威”，先是不接受潘金莲的拜见，继而几番对潘金莲的见礼不理不睬，有意使她难堪，最后潘金莲痛说身世，才接受了她。在西门府中有了她的纵容，孙雪娥之辈才敢于处处跟潘金莲过不去，天天给她找麻烦。西门庆死后，她发卖春梅，赶走陈经济，又以五十两银子的开价，让王婆把潘金莲领走。当王婆说：“那武大的弟弟武二，已从孟州放回，这几天手执钢刀，满大街寻找嫂嫂，要替兄报仇！金莲若是出去，犹羊入虎口，必做那武二的刀下之鬼呀！”吴月娘仍不为所动，平静地说：“我只管三尺门里之事，带走吧！”至于潘金莲出了西门府会是什么命运，吴月娘是最清楚不过，因为娶潘金莲进门时，西门庆曾跟她说过：“只因那武松回来后，扬言要杀嫂祭兄，她在外面凶多吉少，我才将她抬来。”吴月娘发卖潘金莲，就凭了那一条最堂皇的理由：“为了西门家的名声。”为了这个理由，她可以安之若素地把潘金莲推向死亡。作者意在说明：借武二郎的刀杀潘金莲，才是吴月娘的真正用心。

在笑笑生的笔下，李瓶儿嫁到西门府后，变得谦让、软弱，“好性儿，有仁义”，“性格儿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谦让，又和气”。京剧《金瓶梅》中的李瓶儿，却是个工于心计又特别爱泼醋的女人，没嫁给西门庆她就让西门庆把潘金莲的头发剪了给她垫鞋，想以此把潘金莲压下去。

京剧《金瓶梅》的作者写出了潘金莲、陈经济，旨在从漆黑一团的《金瓶梅》世界中亮起一盏希望的灯火——那是穿透黑夜的人性之灯，扑向它，万千飞蛾不惜付出自己全部的生命。

38

且听新翻杨柳枝

——七场江苏梆子戏《李瓶儿》

1991 年 4 月 20 日晚，北京吉祥戏院。

一千多个座位的剧场座无虚席，中外观众和中国戏剧界、文史界、金学界的专家济济一堂，静静地等候着大幕拉开。

这里即将上演的，是江苏省梆子剧团带来的一台大戏——七场江苏梆子戏《李瓶儿》。早在几天前，吉祥戏院大门前的巨幅广告牌上，便挂出了这台新编《金瓶梅》戏的广告，京城观众，早就翘首以待。

由江苏梆子剧团青年编剧周长钟创作的七场江苏梆子戏《李瓶儿》，系撷取《金瓶梅》中部分章节改编，即体现了这部世情大书的美学风貌，又不落其巢臼，手法别致，构思新颖，把一个全新的李瓶儿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戏剧舞台上。

李瓶儿，是《金瓶梅》“淫妇”列传中的第二号人物。书中说她生于夏历正月十五日，出生那天有人家送来一对鱼瓶儿，因此小字唤作瓶姐，又名瓶儿。她一生曾经历四嫁，先嫁给了太

师蔡京的女婿大名府梁中书，给他做偏房。梁中书之妻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李瓶儿只在外边书房内住。政和二年上元之夜，李逵率众杀了梁中书全家老小，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李瓶儿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上京投亲。不久，嫁花太监的侄儿花子虚为妻。瓶儿名义上是嫁给了花子虚，但实际却被那个花太监长期霸占着，花太监曾把她带到广南，半年后又随花太监至清河县定居，他与亲夫花子虚却是"另一间房里睡着"，花子虚是个名附其实的"子虚"。花太监宠爱她，瞒着侄儿，将贵重财物都交给她收管，花太监死后，钱财都落在她手里；再嫁给蒋竹山，蒋又是个"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死王八"。她"好风月"，但在风月场上却迟迟得不到满足，直到遇到西门庆的"狂风暴雨"，才满足了她的贪欲。李瓶儿之所以急急忙忙嫁给蒋竹山，是当时西门庆的"西门亲家"杨戬被参论倒了，吓得闭门不出，顾不上迎娶李瓶儿，李瓶儿染了邪病，被蒋竹山医好，见这人语言谦恭，一团和气，便招赘了他。西门庆得知李瓶儿嫁了蒋竹山，大怒，遂定计唆使地痞鲁华、张胜去逻打蒋竹山，又把他弄到官府，揍了一顿板子，李瓶儿也趁机把蒋竹山赶出门去，嫁了西门庆。

李瓶儿气死花子虚，逼走蒋竹山，可以说跟潘金莲毒死武大郎殊途而同归，笑笑生从这个角度出发，把她打入"淫妇"的行列是不冤枉她的。

江苏梆子戏《李瓶儿》，对上述情节进行了大量的扬弃，而着重写了嫁到西门府后的李瓶儿——一个美丽、简单、禀性柔婉、心地善良的少妇形象。

大幕启开的时候，瓶儿新寡，面对着"亲族讹诈，地痞垂

涎，隔花墙抛砖撩瓦，月黑夜掘壁挑帘”而一筹莫展。而这时，西门庆也三番五次派人来求亲，但李瓶儿对西门庆的求亲是有保留的，她的侍女绣春劝她不如嫁了西门庆，“总也比守着这空落落的院子，终日提心掉胆的好。”侍女迎春说：“傻妹子，那西门大官人专一做大生意，又在县中包揽词讼，图的是银钱，讲的是发财。他家中现有五六个妻妾，若是娘嫁过去，偌大个家业全随得去了，倘落下个不上不下，岂不后悔晚矣？”李瓶儿只是苦笑一下，说：“都是为这分家业才惹得四邻眼红，倒不如及早寻个主儿，嫁了过去。”

西门庆想娶李瓶儿，图的也正是她的一笔好财。剧中西门庆与玳安押运货物路过李瓶儿门首，见前门关了，后门也闩了，气恨恨地说：“这淫妇倒也可恼，自她丈夫死后，我三番五次托人求亲，应不应也罢了，如何便关门拒客？”

玳安给他出主意说：“爹，依奴才说，你莫如夜间搭个梯儿翻进她家，先占了她的身子，不怕这副家业不到爹手里。”

西门庆说：“哼！这寡妇比不得你五娘，倘若她不死心，岂肯把一个万贯家业全数交我。”

正在这时，花家三兄弟醉醺醺打上门来，要抢夺李瓶儿的家产，西门庆不失时机地从中调停，把手中的货物拨在花家兄弟名下，花家兄弟惧怕西门庆的财势，只好悻悻而去。

到了此时，西门庆和李瓶儿才初次相见。

李瓶儿见西门庆“却原来风流倜傥英雄性，托终身料不负终生。”

西门庆见李瓶儿：“只说她财过清河半城富，怎晓她风流俊雅貌倾城。似这般玉人儿不得调弄，我岂不枉为人虚度此生。”

可是，李瓶儿嫁进西门府，西门庆却不与她拜堂，她是被潘金莲按着头，对一把西门庆坐过的空椅子拜了四拜，算是成就了婚姻大礼。在潘金莲怂恿下，西门庆在与李瓶儿合房前收用了春梅，一连十几天，不进李瓶儿的房，李瓶儿气苦不过，悬梁自尽，被人救下，西门庆闻讯赶来，先抽了李瓶儿一顿马鞭子。李瓶儿哭诉衷情，西门庆受了感动，抱住了李瓶儿。

李瓶儿很快以她的美丽、温存和压倒众妾的富有在西门府的脂粉队里占尽风情，但一种危机感却无时不在攫住她。为了平息潘金莲们的醋意，她处处陪着小心。西门庆要到东京去送寿诞礼物给蔡京，为的是谋个官职。李瓶儿拿出了自己的一百颗西洋大珠，两颗四两重的鸦青宝石，给西门庆凑上礼数，到这时，她的全部家私已经倾尽。

李瓶儿怀孕那场戏中，西门府的妻妾争风也达到了高潮：

西门庆〔对李瓶儿〕：我的儿，你若能给我生个儿子……

〔顾盼月娘，尴尬住口〕

潘金莲〔又惊又恼却又屈意奉承〕：好妹妹，你若生了儿子，继了西门家的香火，以后这正头香主稳稳地落在妹妹身上哩！

吴月娘〔面含冷笑〕：是呀，妹妹若能生个儿子，我就把这大姐的份儿让出来也甘心了。

〔潘金莲自觉失言，退到一边〕

〔李瓶儿又欲吐〕

吴月娘〔略思〕：五姐，你去吩咐小厮快把赵太医请来。

潘金莲〔形如得赦〕：倒是大姐心细，奴即刻便去。〔下，

春梅随下〕

吴月娘〔冷冷一笑〕：我的哥，我想这六娘坐得是二月的胎儿，正犯上龙抬头的日子，须得有水命妇人托一托才好。

西门庆：怎么个托法？

吴月娘：只把水命妇人的头发剪下一绺来，垫在六娘脚下，把晦气回背了，这胎儿才坐得稳。只是不知我们姐妹中哪个是水命？

西门庆：前些日子潘道士来府上给你们姐妹算命，唯有潘五儿是水命，难道你便忘了？

吴月娘：这倒难了。倘若奴是水命，就把这满头青丝绞了也罢。

西门庆：这有何难，待潘五来了我自去与她要来。

〔潘金莲上〕

潘金莲〔讨好地〕：我的哥，奴已分咐小厮，怕是那赵太医即刻便到。

西门庆：潘五儿，哥求你件事可依吗？

潘金莲：我的哥，奴一身骨头肉儿都属了你，随你怎么没有不依的，说什么求呢？

西门庆：我想要你一绺头发你舍得吗？

潘金莲：啊，〔急忙护住头〕我的哥，你莫不是中了邪？六姐正不舒服，你要头发干什么？

西门庆：你当我是要来玩的吗？六娘身上怀得是二月的胎，正犯上龙抬头的日子，须得用水命妇人的头发垫在她脚下，托一托才坐得稳。你

们姐妹中，唯你是个水命……

李瓶儿〔情急地〕：我的爹，你千万不能如此！奴情愿这胎儿掉了也不可用五娘的头发呀！

西门庆：休得胡说！

孙雪娥〔旁白〕：好！好！头发让人垫了鞋，不主败运也主灾！看你以后再欺负我！（转身取来剪子）爹，给！

西门庆：潘五！〔按住潘金莲，剪下一绺头发来，托向李瓶儿〕来来来，哥亲自与你垫上。

〔李瓶儿执意不肯，被吴月娘按住〕

吴月娘：好六姐，如今爹一颗心全在你心上了，你怎的不识好歹。〔潘金莲浑身颤抖，忽然摘下李瓶儿送她的头面，使劲摔在瓶儿脚下，一声嚎哅，掩面跑下。〕

吴月娘：五娘，五娘——〔追下〕

〔众纷纷随下〕

李瓶儿〔一把抱住西门庆〕我的哥，你杀了奴家了！

〔痛苦地抽泣，切光〕

这一场戏，可谓声情并茂，写出了西门庆妻妾之间殊死的明争暗斗，也为瓶儿的命运埋下了伏笔。果然，潘金莲用它驯养的一只雪狮子猫，吓死了官哥，李瓶儿也因此染上重恙，撒手而去。

随着李瓶儿的死，西门府的崩溃也迅速完成，瓶儿还未出殡，东京蔡太师犯了官司，被下监抄家，圣上降旨，清查余党。

玳安报来这个消息，使痛失李瓶儿的西门庆顿时呆若木鸡。西门庆吩咐玳安，准备银两投奔宋御史疏通关节，玳安说："那铺子里的银两，码头上的货物，都叫伙计们闻风卷逃了！"

终场时，西门府众家人仆妇争箱夺柜，分抢财物。众妻妾束手无策，漫天黄叶化作纸钱飘摇而落。

这台戏对李瓶儿性格的塑造，可谓层层递进。作者对李瓶儿嫁西门庆以后在感情上的专注、性格上的温和、仁慈、宽厚、大方、乐于助人的品格刻划得细致入微。李瓶儿的失败，是她的悲剧性格的失败。在西门府那个家反宅乱的世界里，她不仅缺少足够的强悍和胆识，而且缺少足够的坚强和精神的抗磨性。她的温良和谦让，只能使潘金莲那样的恶人对她的加害更加肆无忌殚。

官哥被害死，潘金莲趾高气扬地骂街，她只有忍气吞声，甚至在重病缠身时，还惦着西门庆，不让丫环把自己真实的病情告诉他："大娘处常代我多多问候，姐妹间少议论我得病原由，见你爹……切莫说我因他瘦，衙门中事儿多，说与他又添忧；若问起我的身躯也，只说我大病从没有。"当她得知西门庆贪赃枉法，放走了杀人案犯时，她劝西门庆："我的哥，奴虽不懂衙门里的事，可这王法如天，哥哥千万不得随意儿戏。"

在她奄奄一息时，吴月娘卖了她的贴身侍女绣春，只留下迎春一人，这在她心上又狠狠戳了一刀。她把唯一的一支金簪给了迎春留作念想。此时她已万念俱灰，明白"这世道分明不是老实人过的了。"明白了"恩多也是空、情多也是空，都成了南柯梦"；"思量他也是空，瞒怨他也是空，都做了痴心梦"；"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糊涂梦"；"费心机也是

空，装糊涂也是空，都做了奈何梦”。她明白了，但明白得毕竟太晚了。

饰演李瓶儿的青年演员张虹，曾获得江苏省青年演员一等奖首名的桂冠，又在“中国戏曲名家演唱会”等全国性的艺术活动中崭露头角，她戏路宽，功力深厚，对饰演的脚色有深度的把握，观众称赞她把李瓶儿“演活了”。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登上台去给她献花，请她签名留念。

一台《李瓶儿》，唱红了京都。

可又谁能知道，为了这场精彩的演出，为了把李瓶儿的形象成功地搬上舞台，主创人员花费了多少心血。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创作难度极大的作品，从 1989 年起，这部剧本先后修改了 20 余稿，其中有 3 次是重起炉灶，4 次重新排练。晋京前夕，正是羊年的春节，剧组下狠心放了几天假，让演职人员松弛一下，和家人团聚，而编剧周长钟却把自己关进招待所里，进行进京前的最后一次修改。

4 月 23 日上午，剧组在吉祥戏院召开了“江苏梆子戏《李瓶儿》座谈会”，50 余位中国戏剧界、金学界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出席，戏剧家马少波、齐致翔、著名学者王利器、冯其庸、刘辉、沈天佑、卢兴基等热情发言，肯定了《李瓶儿》的改编创作和演出的成功。

马少波说：“《金瓶梅》中的人物，有一些是在舞台上常见的，像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等，但这些多是取自《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把《金瓶梅》直接再现于舞台，我是第一次看到。《金瓶梅》是一个禁区，不少人谈虎色变，现在江苏省梆子剧团的同志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金瓶梅》搬上戏剧舞台，是

一个创举。这戏从剧本到表演、导演、音乐、舞美，创作态度严肃，戏比较完整。这个戏的成功，我认为主要是它汲取了《金瓶梅》的精髓，在人物形象塑造、语言及情节运用等方面都比较忠于原著，特别是对于表现那个阶级社会的人际关系、阶级压迫和对女性的摧残、扭曲，都作了较好的探索，反映了一个大的环境、大的时代。它不只是表现男女的故事，而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善恶美丑。这种善恶美丑在阶级压迫中进行了检验，既尊重原著，又推陈出新，是《李瓶儿》成功的关键。”

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齐致翔也认为："对《金瓶梅》的评价，在今天这么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在非常明确了要弘扬民族文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应该责无旁贷地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把它进一步地开掘出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值得我们中国首先把它研究透，并且能够流传下来，在全世界作为一部很能为我们民族争光的作品。”

在《金瓶梅》戏中，江苏梆子戏《李瓶儿》是反响较为强烈的一部。河南省豫剧三团改编并演出的无场次全本《金瓶梅》，其影带由河南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但这台戏和上海越剧团的《西门庆与来旺妇》一样，都没有能够获得进京演出的机会。

39

敢以画笔补造化

——吴以徐和他的《金瓶梅百图》

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金瓶梅》研究的发祥地——江苏徐州揭开帷幕。

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金学”研究专家和学者，汇集古彭城，出席这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金学”盛会。

使“金学”家们感到惊奇的是，大会辟了一间专门的展厅，展出了一位三十二岁的青年画家创作的《金瓶梅百图》。

《金瓶梅百图》是继清季《皕美图》以来第一次以绘画形式对这部文学名著风貌的艺术展现。一百幅作品，选取了《金瓶梅》全书一百回中的一百个中心情节，采用山东木版年画的方式，平视而独立的构图画面，稚拙夸张程式化的造型，再加上大红、大绿、大黄、大紫的设色，充满了现代情趣。尽管这一组钜制尚未完成，有些画幅还是没有着色的墨稿，但不同肤色的观赏者们还是深深地被震撼了。

创作了这组作品的吴以徐成了整个会议期间被注目的人

物，他甚至当场接到了被邀请到国外去办专展的请求，日本学者池本义男先生则迫不及待地提出要买下他的全部画稿。

然而，直到1991年岁末，拖了整整三年的《金瓶梅百图》，才算涂上了最后一滴丹青。

吴以徐何以躬谨如斯？

吴以徐，1957年生于徐州市，高中毕业后曾到农村插队，198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现在是徐州市彭城大学的美术教师。他画油画，也作剪纸和瓷盘画以及藏书票设计。1985年参与了中国新潮美术——85美术运动，其油画《童年的记忆》和《城市生活》组画产生过很大的反响。

1987年，吴以徐开始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他试图在传统艺术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从民间艺术及毕加索的主体构成、分解汲取养分，用现代观念观察世界，在认识自己民族的时候，找到一个可以为历史期待的位置。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读到了《金瓶梅》。

也许是生长在《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缘故，这部书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在冲击着他，他萌动了画一部《金瓶梅百图》的构想。

《金瓶梅》是一部禁书，除了崇祯本插图和《清宫珍宝丽美图》，可资借鉴的资料十分匮乏。如果仅仅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一种视觉上的再现与移植，或滞留于一般插图意义上的依情节的发展进行简单平面的艺术处理，那也不难。难就难在不落古代巢臼，以现代人对生活和艺术的全新理解与认识，去贴近、去包容原著，跳出文学作品插图性的绘画格局，使一百

幅画作构筑起一个与《金瓶梅》原著并行不悖而又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绘画世界，营造、创设出在气势上宏大到堪与原著相媲美的视觉艺术空间。

吴以徐宣称，他要再创一部《金瓶梅》！

中国的传统劳作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吴以徐的作息与之相差正好一百八十度。他的作画，全部是业余时间。或许当人们正沉湎于最坦诚、最真实的梦境之中，他的开掘才最轻松，最清晰。

历时五载，一千八百多个日夜的孕育与劳作，《金瓶梅百图》终告杀青。

谁知道在这一千八百多个日夜中，他的灵魂经历了多少痛苦与洗炼。

对吴以徐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并寄寓着使命感的大制作。当一百幅画作呈现出来时，宛如一组组皮影人儿身穿着艳丽的服装一幕幕地出现在大红、大绿，美艳无比的色彩氛围的舞台上，上演着他们的故事。

吴以徐的探索是成功的。

对民间工艺和民间美术的热爱，使他找到了一种最好的表现形式：正是那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图式上对大红、大绿、大紫、大黄单纯而鲜艳的色彩的追求，驱除了人们对《金瓶梅》普遍怀有的好奇感和神秘感，并把通篇的市井俗味赋予现代意义。他用晃眼的红绿涂抹出的脂粉楼台、浮尘人生，已经有意识地将人们想象中的满纸宫阁秘事和床笫生活的《金瓶梅》予以分离。

吴以徐所营造的那个《金瓶梅百图》的世界，再现了晚明

社会在金风玉露吹拂下逐渐变异的市井生活和“院墙文化”中的林林总总。

吴以徐没有回避《金瓶梅》情节中的性描写，固然，以艺术的手法处理那些性场面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人体在性的活动中是具有美感的，因为那正是上帝赋予人体某种功能完美的表现。《金瓶梅》中所表现出的“性”与“色”，也是对整个人类心灵深处某种秘密的揭示。吴以徐在处理此类情节时，注重绘画语言的形式美感，把画面渲染得十分明艳，在一种凝固感中令人们感觉不到画中人物在偷鸡摸狗、男盗女娼，而是欣赏到图中的人物在做游戏——身体的游戏。

对吴以徐的《金瓶梅百图》，“金学”家和艺术评论家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著名“金学”家田秉锷谓：《金瓶梅百图》“又是一部《金瓶梅》！这是吴以徐的创造。你不但可以借视觉感知它的形色，还可以借综合的感知把握它的神韵——当‘戏’看：一幅画便是一幕戏，百幅画便是百幕戏。生旦净末丑窜跳其间，粉墨登场，各呈其情，总归于曲终人散；当‘歌’听：一幅画便是一支歌，百幅画便是百支歌，丝竹呕哑，一唱三叹，曲曲都浸着人生的迷惘与无奈；当‘诗’吟：一幅画便是一首诗，百幅画便是百首诗，或风、或雅、或颂，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田秉锷《金瓶梅百图·序》）。

田秉锷认为：“有人说，《金瓶梅》是说不尽的。我以为，《金瓶梅》也是画不尽的。吴以徐以二十世纪人的理解，借助极富民族风情的色彩绘出了永逝的十六世纪风貌；一切再现性的

画面上，都体现着全新的审美选择。所以，《金瓶梅百图》又是十分现代化的。现代化作为一种精神，它包容着对历史的承认，也包容着对自己的承认。”（同上）

中国金瓶梅学会对大型中国画《金瓶梅百图》的《学术鉴定书》中说：

> 该画作精心描摹出文学原著所叙及的时代社会风情，且能刻意发掘这一风情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及人生况味。作者以明艳的色调来体现别具新姿的晚明市井生活，以稚拙的意趣来品鉴西门商家的欢愉与忧患，均属有意味的史笔。作品创作气度恢弘，艺术营构严密，生活视野开阔，是为正确解读《金瓶梅》的形象读物之一。
>
> 我们认为，吴以徐先生具有较好的文史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且已对《金瓶梅》一书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识见，其以现代造型手段弘扬民族文学遗产，光华祖国文化传统的努力，尤可赞赏。

1992年，《金瓶梅百图》由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画册以铜版纸精印，装帧设计非常华美、考究。虽然价格不菲，但很快被购藏者抢购一空。

40

好遣春泥作奇观

——逯彤和“泥人张”大型彩塑《金瓶梅》

在徐州举办的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本来是个纯学术交流会议，却有两件艺术盛事大爆了冷门儿。这两件艺术盛事，即是青年画家吴以徐的大型中国画《金瓶梅百图》和天津“泥人张”第五代传人逯彤的大型系列彩塑《金瓶梅》的展出。

说起天津“泥人张”彩塑，原本是清代道光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艺术。到今天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创始人张明山以制作小型彩塑泥人闻名遐迩，他“触手成像，神采悉具”，被时人誉为“泥人张”。光绪十八年，某外国人慕名求塑反映中国民俗的题材，他取“出大殡”为场景，塑出锣鼓笙箫，亭台楼阁及各种人物近百名，形神具妙，无一重复，被视为奇观。

其子张玉亭，擅长塑麻姑仙女，有“天人”之称。第三代张景佑的作品，多取材于劳动人民。“泥人张”彩塑，一直是以

家庭作坊的形式延续发展的，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传至第四代，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曾获得巴拿马赛会一等金牌奖，并先后在南洋各地展览会上荣获奖状、奖牌二十余件。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曾高度评价“泥人张”的作品：“其观察之精到与其作法之敏妙，足以颉颃今日世界最大塑师”。

1959年，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成立，由第四代张铭传授技艺，“泥人张”彩塑遂从一个家族的艺术活动，发展为社会性的艺术事业。1963年，北京举办“泥人张”彩塑首次展览，郭沫若曾赋诗一首：“用泥造人有女娲，明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

生于1945年的逯彤，为“泥人张”的第五代传人。他自15岁进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学艺，三十年后已成为工作室的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作品多次入围国内外美展，曾以中国工艺美术家的资格赴日本表演彩塑艺术。早在1964年，19岁的逯彤即以其作品《山里人》被选人当年的全国美展，并且得到了中央美院傅天仇教授撰文嘉赏，《美术》杂志将他的作品显赫地刊发在封面上，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他又以《晨》、《阿坝牧女》人选全国美展。八十年代创作的《春江花月夜》，是逯彤艺术上的转折点，也是他以彩塑形式再现古典文学名著的一个尝试。这件以张若虚的同名诗为背景的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却各具形神，非常精到地体现了诗的神韵。

如果说逯彤的艺术追求以《春江花月夜》为发轫，那么，几年后的大型系列彩塑《金瓶梅》，则是蔚成大国了。

这一组经过三年时间的酝酿和塑制的大型系列彩塑，是

"泥人张"艺术史上规模最大，人物最多的大手笔！也可以说是"泥人张"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套彩塑，从《笑笑生孤愤写金瓶》始，至《张竹坡批点金瓶梅》止，共为二十六组，一百零五个人物。在各组彩塑的安排次序上，打破了原著的章回，既不失故事情节之原貌，亦顾及了彩塑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使群像、组像、单个塑像交错排列，整个立体画面聚散相间，起伏跌宕。人物与真人实景的比例，除首组《笑笑生孤愤写金瓶》和末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为1：5外，其余二十四组都是1：8。同时，为了表现典型人物和环境，再现了不可忽略的场景，从而使整套彩塑准确体现出《金瓶梅》的文学精神与历史内涵，以视觉艺术鲜明了原著的叙事语言。

这个专题展览作为研讨会的学术交流项目，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赞誉。

中国《金瓶梅》学会的《学术鉴定》书称赞他："其融相关人物与典型场景于一体的造型意识，串连若干戏剧场面为一完整故事，以及使这一故事富有浓郁史诗风貌的创作手法，尤可嘉许。我们认为创作者具有较高的文史修养，且已对《金瓶梅》一书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认识。作品所体现出的使中国传统民间技艺汇人当代典范文化的努力，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

专展的成功使逯彤受到了鼓舞，他填词《一剪梅》曰："常依星光拜笑翁，书总翻腾，茶亦香浓。汗捏百人千日成，彩也鲜明，泥也传情。组组群塑布长龙。聚在彭城，迷在金瓶。竹坡若见可批评？梦自萦萦，心自怦怦。"

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之后，他又对这套彩

塑进行了补充,最终完成了四十组一百六十八个人物的定稿,并于当年12月参加了在广州的展出，再次获得盛誉。

1990年12月14日至23日，这套大型彩塑在新加坡皇后坊文物馆展厅再度一展风采。新加坡城轰动了，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留连忘返，人们争相拉着逯彤，请他签名或合影留念。布展期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还把他邀到总统府，接见了他，并签字合影。

逯彤的成功,使“泥人张”彩塑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逯彤也是一个对《金瓶梅》情有独钟的艺术家，他之所以选取这个题材，是他觉得“泥人张”这种民间彩塑工艺形式，比较适合于表现《金瓶梅》这部以描写世情为主旨的作品。

逯彤这套大型系列彩塑，有着显明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为：

一、使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示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金瓶梅》不同于《红楼梦》、《水浒传》或《三国演义》，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已经有足以被人们公认的模式，但《金瓶梅》中的人物，除少数几个出现于《水浒传》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人们所不太熟悉的。因此，逯彤所采用的是系列化、多侧面的形式，使人物性格及个性立体化，让主要人物多次登场。如西门庆在四十组中曾十七次登场，潘金莲十二次登场，武松也有六次之多，让观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如何摆脱千人一面、缺乏个性是系列彩塑的难点。如《吴神仙贵贱相人》这个场面，登场的有十多个人物，而且其中八个女性年龄相近，但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春梅的自命不凡，潘金莲的洋洋自得，李瓶儿的温和谦让，都是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逯彤还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差异。同是发配递解，武松和来旺儿却大不相同，一个是壮士为兄报仇的遗恨，一个是凡夫遭受凌辱的气恼；《潘金莲私仆受辱》和《李瓶儿情感西门庆》，都是一样赤身裸体遭受鞭打的场面，前者重在显示潘俏娘的奸诈和诡辩，西门庆不为所动，后者却反映出李瓶儿的率真和娇羞，而西门庆则若有所怜。

二、在彩塑中大量引入为塑造典型人物所必需的场景。传统的彩塑，往往仅用桌椅、山石之类的小型场景，大多不设景。但因为系列化的内容所需，故事场景的设置便成为一个新课题。比如《元宵赏灯》，是展现民俗风情的长卷，书中描写的场面极为宏大繁盛，逯彤大胆变革传统，为这一场面设置了层次分明、规模巨大的外部场景，既体现了宋明时期灯节的繁华闹热，又将在楼上嗑瓜籽儿的西门庆的妻妾们的种种神态刻画得纤毫毕现，精细之极。再如《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中的灵堂，《来旺儿盗拐孙雪娥》中的后门和院墙，都是作为大型场景在其内容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场景的设置使这套彩塑更加贴近和体现了《金瓶梅》原著的文学精神与历史精神。

三、审美地处理原著中的性场面。"性"是《金瓶梅》中一个不可能回避的客观存在，而在"泥人张"乃至整个中国的彩塑史上，却从未出现过裸体的人物形象。中国文化向来注重内涵、圆润、丰厚、含蓄，不可能完全套用西方雕塑的手法。逯彤在处理特定情节时，采用了裸裎互见、侧面刻画和避实就虚的手法。如《武大捉奸》一组，西门庆踢翻武大夺路而走，床上的潘金莲赤着上身，急以被遮下体；《烧夫灵和尚听淫声》却从讽诵经忏，宣扬法事的七个和尚那神魂颠倒、心猿意马、垂

涎三尺的丑态上，映照出了没有出场的西门庆、潘金莲二人的淫荡。《西门庆初会林太太》是一组直接表现性行为的场景，逯彤在表现手法上采取了用一床锦被将二人遮盖在床帐之内，却露出了西门庆和林太太两张面孔和一只紧紧抓住褥子的纤手。

天津“泥人张”彩塑艺术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形象逼真、生动，结构准确，色彩典雅，形神兼备。但要表现如此巨大的场景和如此众多的人物，传统手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表现技巧上，逯彤则有意识地吸收了西方雕塑艺术和其它相关艺术的表现方法。

四十组彩塑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泥人张传统手法所表现的，如《笑笑生孤愤写金瓶》、《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吴神仙贵贱相人》、《西门庆奉迎蔡御史》、《西门庆大闹丽春院》等；另一种是代表《金瓶梅》彩塑总体风格的作品，以大刀阔斧、无拘无束的手法，衣纹简练劲利，线条粗犷豪放，敷色简洁富有生气，如《武松杀嫂》、《武松发配孟州》、《帘下勾情》、《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李瓶儿情感西门庆》等。再一种则是极度夸张、纵横恣肆的浪漫手法，如《烧夫灵和尚听淫声》等。

在构图风格上，则吸收了泼墨、狂草粗犷奔放、洒脱飘逸的艺术特点，形成了凝重含蓄、流动自然之风。如《武松杀嫂》一组，金字塔构图中武松凝眉怒目，口衔尖刀，双手扯开潘氏衣襟，脚踏妇人双手于地下，妇人散发的跪姿，使整个情节富于紧张、冷峻而又凄惋的气氛。

大型系列彩塑《金瓶梅》以磅礴大气展现了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精神风貌，也将传统的“泥人张”彩塑艺术推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的艺术魅力将是恒久的。



41

和素与《金瓶梅》满译本

《金瓶梅》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字译本是满文译本。

这个译本全100回，40卷，80册，(内补写13册）刊刻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没有署译者的名字。

该译本比张竹坡的评本晚13年，它的底本也是康熙三十四年的张评本。

满文《金瓶梅》的译者是谁？

有人说是满州正白旗人舒穆鲁氏（徐蝶园)，有人说是康熙皇帝的弟弟，但都缺乏有信可征的资料以证其实。

那么，究竟谁是译者？

生活在乾嘉年间，对满州风俗十分稔熟的礼亲王昭梿在《啸亭续录》中有一段记载：

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礼，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及定鼎后，设翻书

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其深文奥义，无烦注释，自能明晰，以为一时之盛。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

（《说库》丛书本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

到了宣统三年正月，《国粹学报》第七十五号发表了署名钝宧的《小三吾亭随笔》，又谓：

经年于厂肆见有《金瓶梅》，全用满文，惟人名则旁注汉字，后为日本人以四十金购去，贾人谓是内府刻本。后阅《啸亭续录》，乃知翻译出户部郎中和素之手。和素所译尚有《西厢记》。国初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择旗员中谙习满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满文以行。此或当时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

这位钝宧，即冒广生，字鹤亭，他是江苏如皋人，清末进士，民国后曾担任浙江省瓯税关监督等职。

据此，满文译本的翻译者为和素了。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谈谈“翻书房”。

清代开国之始，从康熙到乾隆，很注重满族语言和习俗的

保存，同时，也非常注意吸取汉文化的精华。许多满族文人以开明的态度学习汉语文，并着手翻译汉文书籍。翻书房于是应运而生。

这个"翻书房"，便设在紫禁城午门内西庑（即太和门西廊下），掌翻译谕旨、御论、册祝文字。

《圣武记》说："太宗崇德四年，曾命达海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顺治七年，翻译《三国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程等赏鞍马银币。又闻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每戰辄陷阵，海公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文《三国演义》授之。"

《霞举堂集》也记："章皇帝初亲大政，一日，有中涓奉二册书至政事堂，命词臣之通国语者翻译以进。乃《玉匣记》，元帝化书也。"

《粟香二笔》谓："翻书房某公国书为今时第一，恭醇二王以折扇命书，次日，写毕进呈。王阅之，起首乃'黑狗'二字，时童薇研总宪同在南书房，王顾童曰：'古来文字，从未有黑狗二字起首者。'童应声曰：'当是《前赤壁赋》耳'。王续阅后文果是。盖国书无'壬戌'字，以黑为水，以戌为狗也。"这是"翻书房"里闹的一个大笑话。

最早也最知名的满文翻译家就是《啸亭续录》里提到的那位达海。他于天聪六年对蒙语十二字头加以圈点，使刚刚初具形声的满文字始称完备。达海九岁读汉书，通晓满、汉文义。自太祖以来，凡与明国及朝鲜往来书牍，皆出此手。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部经典，达海还翻译过《万宝全书刑部会典》、《素书三略》等。

和素，也是一位很杰出的翻译家。他表字存斋，是满州镶黄旗人，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御试清文第一名，赐号巴克什，充皇子师傅，缮书房总裁。他精通音乐，著有《琴谱合璧》十八卷，他翻译的著作有《清文左传》、《清文菜根谭》、《清文三国志》等。

钝宧说和素译《金瓶梅》也许是“游戏出之”，不太确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即命“严禁淫词小说”，“翻书房”是上层翻译机关，翻译刊刻《金瓶梅》这样一部书，不可能不会得到上面的首肯。

满文《金瓶梅》有一篇序言，不妨抄引如下：

> 试观，大凡编撰故事者，或扬善惩恶，以结祸福；或娱心申德，以昭诗文；或明理论性，譬以他物；或褒正疾邪，以断忠奸，虽属稗官，然无不备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部书，在平话中称为四大奇书，而《金瓶梅》堪称之最。凡一百回为一戒，篇篇皆是朋党争斗、钻营告密、亵渎贪饮、荒淫奸情、贪赃豪取、恃强欺凌、构陷诈骗、设计妄杀、穷极逸乐、诬谤倾轧、谗言离间之事耳。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者无一件。
>
> 西门庆鸩毒武大，(武大)旋饮潘金莲之药而毙命。潘金莲以药杀夫，终被武松以利刃杀之。至若西门庆奸他人之妻，而其妻妾与其婿家奴通奸之。
>
> 吴月娘瞒夫将女婿藏入家中，奸西门庆之妾，家中淫乱。吴月娘并无廉耻之心，竟恃逞于殷天锡。来

保衰渎，而蔡京等人欺君妄上，贿赂公行，仅二十年间身为刑徒，其子亦被正法，奸党皆坐罪而落荒。

西门庆心满意足，一时巧于钻营，然终不免贪欲丧命。西门庆临死之时，有喊叫的，有逃走的，有诈骗的，不啻灯吹火灭，众依附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败亡。报应之轻重宛如秤戥权衡多寡，此乃无疑也。西门庆寻欢作乐莫逾五六年，其谄媚、钻营、作恶之徒亦可为非二十年，而其恶行竟可致万世鉴戒。

自寻常之夫妻、和尚、道士、姑子、喇嘛、命相士、卜卦、方士、乐工、优人、妓女、杂戏、商贾，以至水陆杂物，衣用器具，嬉戏之言、俚曲，无不包罗万象，叙述详尽，栩栩如生，如跃眼前。此书实可谓四奇之中佼佼者。

此书乃明朝闲儒生卢楠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此书劝戒之意，确属清楚，故翻译之。余趁闲暇之时作了修订。观此书者，便知一回一戒，惴惴思惧，笃心而知自省，如是才可谓不悖此书之本意。倘若津津乐道，效法作恶，重者家灭人亡，轻者身残可恶，在所难免，可不慎乎！可不慎乎！至若不惧观污秽淫靡之词者，诚属无禀赋之人，不足道也。如是作序。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榖旦序。

在这篇序言中，译者继承、吸收了前人对《金瓶梅》的批评成果，将《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并

称四大奇书，且称《金》为四书中之佼佼者。并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劝戒之书，“凡一百回为一百戒”，“便知一回一戒，惴惴恩惧，笃心而知自省”。和素独具慧眼，把《金瓶梅》提高到小说史的最高地位。

另外，和素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是“明时逸儒卢楠”，英国人维利（Arthur Waley）根据这一说法写成了《金瓶梅》英译本序言，亦执此说。但是他们并未找出依据，不知是根据传闻抑或有文献可徵，亦未可知。

满译本《金瓶梅》有多种刊本和抄本，据胡文彬先生《金瓶梅书录》载，尚有《满汉金瓶梅》（清刊本，残，存北京首都图书馆），满译《金瓶梅》（刻本，三种，分别藏日本东洋文库、首都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北京民族研究所、民族宫），还有一种抄本，藏首都图书馆。另外，有易名为《世态炎凉》之满译本抄本，藏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42

传到了日本

《金瓶梅》最早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宝永年间（1688～1704年）。

1941年，在日本日光市的轮王寺慈眼堂，发现了一部百回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全本），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共十六册，卷首有欣欣子的序和东吴弄珠客的序，不仅与我国在1932年于山西介休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发现时间上只差了九年，而且版式相同。

日本发现的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慈眼堂的所有藏书一样，盖有“天海藏”字样的书章。

天海，是江户前期的一位天台宗僧侣，大约生于天文五年（1536），逝于宽永二十年（1643），这部书若是天海和尚在世时所收藏，那么，《新刻金瓶梅词话》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可确定为1643年。

嗣后，在六十年代初，日本山口县德山毛利就举氏家中，又发现了一部《新刻金瓶梅词话》。毛利氏于宝永五年（1708年）

所写的《御书物目录》中，此书已列入其间。从这个信息推测，这部“词话”传入日本，至迟在宝永五年之前。

在毛利氏家发现的这部《金瓶梅词话》，全书十八册，在各册的封面上大字写着《金瓶梅词》（无“话”字），其下，用稍小些的字标注该册所收回数，卷首依次有欣欣子的序、东吴弄珠客的序、廿公的跋、四贪词。各册首页，右上方加盖有“德藩藏书”印章，其下有纵长方形的“明治二十九年收讫”印记。

藏书印上的“德藩”，是江户时代的德山藩（诸侯），现在的收藏者毛利就举氏，是这个德山藩的藩主的后裔。

除了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在毛利家的书库里，还珍藏着从江户直到明治时代制作的几种所藏图书目录，其中最古老的是宝永五年（1708）的书目，就是上边提到的《御书物目录》。这份目录标有“德山主入元次识”的识语。德山主入元次，便是德山藩第三代藩主毛利元次，宝永五年，正好是他在位期间。

这位毛利元次，资性聪慧，爱好和汉之学，据说，他在江户时代入朝时，常常参加纲吉将军的经筵，同时，他还喜欢搜集古今图书，在宝永五年目录的识语中，他曾追述说：“先人之性，有好嗜之癖。……不胜计。余亦有书癖，如过者不及，故欲忘却，不克禁，他见者可谓书癖。”据传说，他曾屡次派人去京都，搜访购求和汉图书。他所开列的书目中，其汉籍广泛地涉及经、史、子、集各类，还有大量的地方史志和小说戏曲类图书。不用说，《金瓶梅词话》也是由这位元次公访得的。

后来，毛利元次在他的宅邸旁边，修建了一所藏书室，名曰“栖息堂”，收藏长年累月搜集访求到的图书。晚年时候，毛

利元次因一些不值当的小事，跟萩的宗藩闹纠纷，享保元年(1716年)德山藩因幕府命令被撤换，毛利元次被监管于出羽国新庄藩，其馆邸和居宅被拆毁，历经艰辛搜集购求的大量图书也被没收，转移到了萩那里，直到享保四年五月，毛利元次获得赦免，返回故里，被没收的图书才归还原主。

在毛利元次之前，明代小说多有传入日本者。日本内阁文库藏《新刻绣像金瓶梅》，全一百回，共二十一册，（正文二十册，回前插图合辑为一册）有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并眉评。据御文库《书目》记载，此书于正保元年藏入红叶山文库。日本的正保元年，即公元1644年，这个年限同慈眼堂藏本的传入差不多。

这一年的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十七卷，称：正德三年(1713年)，有"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二十四本一百回"传入，该书中标有"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序康熙已亥祭中"字样。

同时，这套"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书目序中是注明了："俗小说也，即《金瓶梅》也。"由此，可以推断出：1、《金瓶梅》一书的详细内容，已为当时的日本有关方面的官员所知道，并在日本也有流传。2、张竹坡的评点本，最晚在1713年时传入。

在这之后近一个世纪的《金瓶梅》传入情况，从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中可见大端：

正德五年（1715）二月，第四十九番船宁波船主：《第一奇书》一部，四套二十四本；

宽延四年（1751）末四月，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拾番船携

来书籍备忘:《金瓶梅》十一部各两套(四部各二十四本,七部各二十本);

天宝十四年(1843),会所收入书籍账目:《袖珍金瓶梅》一部二套二十四册。

嘉永五年(1852)亥贰番船同四番船子壹番船书籍账目:《金瓶梅》一部两套。

安政二年(1855)卯十一月,卯壹番船书籍账目:子八番船,《绣像续金瓶梅》袖珍七部各两套。

同时,大庭休教授所著《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研究》,开列了从正德五年(1715年,中国清康熙五十四年)到安政二年(1855年,中国清咸丰五年,太平天国五年)一百年来的《金瓶梅》舶载情况和书目,在这一个世纪内,《金瓶梅》的各种版本(《袖珍金瓶梅》、《绣像金瓶梅》、《第一奇书》等)传入日本共有二十一部之多。

但是,这些舶载运到日本的《金瓶梅》诸版本,放置在一般人不容易接近的地方,长年秘藏。那个时期,船载到日本的中国明代小说,流行最广的是《剪灯新话》、《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和《西游记》,这些小说几乎全被翻译过,有的还被改编和改写,但《金瓶梅》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日本对《金瓶梅》的翻译介绍,是从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泽田重渊开始的。泽田重渊精通汉语和汉文化,酷爱中国白话小说。他开设"风月堂"书店,从宽永初年(1624年)开始,刊行以儒学为主的日本书刊和佛书。他所著的《俗语解》一书,将中国小说、传奇中的俗语,按日文字母顺序排列,书中所引小说类中便有《水浒传》、《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小说。

同一时期，大阪医生冈南闲乔，也曾写过两本《金瓶梅》译文。

当时虽然没有更多正统的《金瓶梅》译本，然而却有一些帮助、引导读者阅读这部小说的书籍出版。如上野图书馆收藏一手抄本《金瓶梅の难语·难句》，便是阅读《金瓶梅》的工具书。

江户时期唯一的一部全译本《金瓶梅》，藏于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这部书第一册卷首题：《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可见这是以张竹坡批评本为底本的。

这部译本将《金瓶梅》一百回逐字抄录，用日文字母断句，注音、释义，历时五年方完工。译者是荷塘一圭，由其门人高阶正巽按其训读、语释而加以注释。

荷塘一圭，字远山，名圆陀，号一圭，又称荷塘道人。在长崎崇福寺出家时，从汉语翻译周某学习中国方言，跟姑苏人李邺嗣学音韵学，跟闽中徐天秀学梵歌，同当时在长崎的中国人江艺阁、李少白、朱柳桥等过从甚密，学到了不少中国文学和词曲知识。因此，他的注释本举一反三，旁征博引，涉及了大批古典书目。

几乎与此同时，江户时代末期的通俗小说家曲亭马琴，写出了自己改编的《新编金瓶梅》。

这部改写本，依据《金瓶梅》故事主轴为蓝本，把书中的主要人物换成了日本名字。如把潘金莲换成阿莲，把武松换成大原武松，把武大郎换成大原武大郎，把西门庆换成西门屋启十郎。对书中的淫乱场景，也进行了适度删节。

这部书耗费了马琴十六年光阴，第一集刊刻时，马琴六十

五岁，第十集（最后一集）刊刻时，他已八十一岁了，眼睛近乎失明，只能一句句口述，让他的儿媳妇阿道记录，再进行最后整理。

据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教授田瑞穗先生所提供的资料，马琴的这部改写本是在日本公开宣传《金瓶梅》的唯一先例。

马琴的这部改写本未能像《水浒传》、《西游记》那样受到日本读者的喜爱，由于它带有所谓"第一淫书"的定评，所以一直被认为是"非君子阅读谈论之物"，最多也不过是那些学习唐话（当时的中国语、中国通俗语文）的汉学家偷偷地从桌子下面取出读读而已。

在改写《金瓶梅》之前，马琴还写了一部书《云妙间雨夜月》，这部小说也攫取了《金瓶梅》的大量情节，写一风尘女子莲叶（金莲），为富豪木贺十郎霸占，后因十郎妻醋意大发，十郎只好将莲叶赐给手下人武泰（武大郎）为妻，但莲叶十分讨厌武泰，钟情于武泰之胞弟武章（书中人物伊原二郎武章，即脱胎于《金瓶梅》之武松）。但武章堂堂正正，坐怀不乱。莲叶大怒，无中生有，中伤武章非理……

显而易见，这部小说将《金瓶梅》中的张大户、潘金莲、武大郎、武松的故事原封不动地进行了移植。

接下去，马琴又参照《水浒传》中裴如海与潘巧云勾搭成奸，续写淫妇借佛事私通和尚的情节。这部小说曾被先后译成英、德文，并改编成歌舞伎上演。

《金瓶梅》的正式译文，出现于明治十五年（1882，中国清光绪八年）十月，书名《原本译解金瓶梅》，译者松村操（？一1884），由日本鬼屋诚分册刊行，到十七年五月刊行五册，译到

原本第九回，译文受曲亭马琴的影响较重。

这个译本先于英、德、俄、法等译本，是国外的第一部《金瓶梅》译书。

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井上红梅以口语试译，题曰《金瓶梅与支那社会状态》，由上海日本堂书店发行，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于同年一月初出版，译到原文第十五回，中卷在同年三月初版，译到原文第三十回，下卷付梓于同年十月，译到原文第七十九回，以西门庆纵欲暴亡作结束。

这个本子不是全译，只是一个节译，同时，越往后，省略的地方越多，误译之处也越多。

这个译本之后，大正十四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金畏、山田政合译的《全译金瓶梅》，由光林堂出版，昭和二十三年，尾坂德司译的《全译金瓶梅》，共四册，一百回，由东西出版社出版。接着又有丹羽文雄的译本《西门庆家的人们》等。

二战之后，随着肉体文学的流行，《金瓶梅》开始公开地再现它的全貌，这个时期日本翻译出版的《金瓶梅》版本有：

井上红梅：《西门庆》昭和二十二年（1947）1月，东京·柳泽书店刊

泉修一郎：《金瓶梅词话》昭和二十三年（1948）1月，东京·美珠书房刊

丹羽文雄：《私版金瓶梅》，昭和二十三年（1948）6月～8月，《小说界》第1卷，第1～3号；

小野忍　千田九一：《金瓶梅》第1册——昭和二十三年（1948）9月，第一～十回，第2册——昭和二十三年（1948）11月，第十一～二十回，

第3册——昭和二十四年(1949)1月，第二十一～三十回，第4册——昭和二十四年(1949)5月，第三十一～四十回，由东京东方书局刊行。

尾坂德司：《全译金瓶梅》(以“第一奇书”本译出)，第1卷——昭和二十三年(1948)9月，第一～十九回，第2卷——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第二十～四十六回。第3卷——昭和二十四年(1949)3月，第四十七～七十三回。第4卷——昭和二十四年3月，第七十四～一百回。由东京东西出版社刊行。

林房雄：《金瓶梅》，昭和二十四年(1949)6月，由东京文艺俱乐部社刊发表，全二十三章。

小野忍·千田九一：《金瓶梅》，昭和三十一年(1956)11月，东京·河出书房刊《世界风流文学全集》第十卷，中国篇(一)(至原第三十四回)。

富士正晴：《金瓶梅》，昭和三十二年(1957)9月，东京·创元社刊《世界大浪漫全集》第25卷。

山田风太郎：《秘钞金瓶梅》，昭和三十四年(1959)四月，东京·讲谈社刊。

小野忍·千田九一：《金瓶梅》，东京·平凡社刊《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15(上)、16(中)、17(下)卷。上卷——昭和三十四年(1959)7月，第1～31回，中卷——昭和三十五年

(1960) 4 月，第 32～64 回，下卷——昭和三十五年 12 月，第 65～100 回。
世界翻译研究会:《金瓶梅》，昭和四十一年 (1966) 11 月，浪速书房刊《爱的世界文学》七。
上田学而：《金瓶梅》，东京·人物往来社刊，第 1 卷——昭和四十二年 3 月，第 2 卷——昭和四十二年 2 月，第 3 卷——昭和四十二年 3 月，第 4 卷——昭和四十二年 4 月。
矶村谦:《金瓶梅 (全)》，昭和四十三年 (1968) 8 月，浪速书房刊。
冈本隆三：《完译金瓶梅》，东京·讲谈社刊。第一卷——昭和四十六年 (1971) 7 月，第 2 卷——昭和四十六年 8 月，第 3 卷——昭和四十六年 9 月。
驹田信二：《驹田信二的金瓶梅》，昭和四十七年 (1972) 12 月，东京·二见书房刊。原连载于《忏悔周刊》。
小野忍·千田九一：《金瓶梅》，东京·岩波书店刊《岩波文库》全 10 册。第 1 册——1973 年 6 月，第一～十回，第 2 册——1973 年 8 月，第十一～二十回，第 3 册——1973 年 10 月，第二十一～三十回，第 4 册——1973 年 12 月，第三十一～四十回，第 5 册——1974 年 2 月，第四十一～五十回，第 6 册——1974 年 4 月，第五十一～六十回；第 7 册——1974

年6月，第六十一～七十回；第8册——1974年9月，第七十一～八十回；第9册——1974年10月，第八十一～九十回；第10册——1974年12月，第九十一～一百回。

村上知行：《金瓶梅》，东京·角川书店刊，第1卷——昭和四十八年(1973)10月，第2卷——昭和四十八年11月，第3卷——昭和四十九年（1974）1月。

同时，日本翻译家还翻译出版了《金瓶梅》的几种续书：

米田祐太郎：《绘图玉娇李》，昭和二年（1927）1月，东京·支那文献刊行会刊。译文51章，截至原文12回。

尾坂德司：《续金瓶梅隔帘花影》上卷。昭和二十五年(1950）10月，东京·千代田书房刊。

尾坂德司：《续金瓶梅》，上、下2卷。东京·千代田书房刊。上卷——昭和二十六年9月刊。

(以上据泽田瑞穗先生《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

二战之后，日本的《金瓶梅》研究也日趋活跃，《日本百科大辞典》、《日本家庭百科事汇》、《大百科事典》、《国民百科大辞典》、《世界文艺大辞典》、《东洋历史大辞典》、《日本文学辞

典》、《世界文艺辞典》、《世界历史辞典》、《世界文学辞典》、《中国新文学辞典》、《世界大百科辞典》、《中国学艺大辞汇》、《亚洲历史事典》、《中国语学新辞典》、《英国大百科全书国际大百科事典》、《文学辞典》、《中国古典文学辞典》、《中国小说世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东方奇书55册》等数十种辞书列有《金瓶梅》专条。《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教科书中介绍了这部旷世奇书，高度评价了《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

许多学者亦不断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如佐佐木基一在《彻底性的胜利》一文中，指出《金瓶梅》就描写世态人情来说，可以称作是近代心理小说中的一个场面。

鸟居久靖先生是卓有成果的一位日本《金》学家，他著有《金瓶梅词话编年》一书，对原书中多处时间不衔接提出了论证，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金》学研究是一个积极的促进。近年来，国内翻译介绍了鸟居久靖、长泽规矩也、小野忍、泽田瑞穗、荒木猛、铃木阳一、上村幸次、饭田吉郎、日下翠、上野惠司、大内田三郎、寺村政男、阿部泰记等学者的专论，在中国《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汉学家池本义男先生，辑《金瓶梅词话文献研究丛书》凡十五编，总字数已逾千万，这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为"金学"界所叹为观止。

43

最有意味的“生日贺词”

——由库恩的《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所引出的故事

1944年5月20日，是德国英泽尔出版社社长的七十寿诞，这一天，他接到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写给他的一封特别的生日贺信，信中写道：

> 从今日起，《金瓶梅》一书不再做为非法出版物而受到禁止。[①]

由此，这部由弗郎茨·库恩所完成的德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n；Cder，die abente uer-licne Geschichte Von Hsi Men und seinen sechs Frauen)，终于在遭到严令查禁的12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

---

① 这个材料是留德读比较文学的李士勋博士所提供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法文《金瓶梅》译者雷威安先生，曾认为是库恩本人在1944年5月20日七十大寿之际“获得了德国宣传与民族建设部部长的开禁命令”（见雷威安《金瓶梅法译本导言》）。按，弗朗茨·库恩生于1884年，卒于1961年，活了77岁，1944年他应是60岁，而不是70岁。另外，官方的解禁令，一般会下达给出版社而不会是作者本人。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发生的纳粹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残是空前的。这场包括文化革命在内的纳粹运动，把矛头指向了国内外一切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化艺术。

赵鑫珊先生《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曾描述过如下场面：

> 1933年5月10日，在约摸午夜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柏林国家歌剧院前面的广场，那里堆集了一大批书籍，学生把火炬扔在书堆上，然后再不断丢进许多经典，最后烈焰焚毁了大约2万册名著。包括以下文化名人的作品：
>
> 马克思、爱因斯坦、托马斯·曼、海因利希·曼、孚希特汪格、瓦塞曼、A·茨威格、S·茨威格、雷马克、A·凯尔，当然，还有许多外国著作家的作品，包括杰克·伦敦、H·凯勒、H·G·威尔斯、纪德、左拉、弗洛伊德、U·辛克莱、普鲁斯特，施尼茨勒……
>
> 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发表了讲话。他说：犹太和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从灰烬中，一种新的精神诞生了。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它还照亮了新时代。"你们干得好，在这午夜之际把过去的（非德意志的）精神统统付之一炬。这是一次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
>
> 为什么要焚烧这些书籍？标准是什么？
>
> 戈林回答：因为这些书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运动。或者用当时一份学生的宣言来说，凡是

"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攻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德国人民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希特勒的文化革命理论》，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

不知道这一场燃烧在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方的"秦火"中，是否也投进了库恩的《金瓶梅》译本，但该译本自 1930 年出版后，第 3 年即宣布成为禁书，肯定也是基于以上的缘由。

库恩，欧洲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他曾译介过我国的《红楼梦》、《水浒传》、《肉蒲团》等书，他的这个《金瓶梅》译本，影响颇大，备受西方国家的推崇，后来的英、法、瑞典、芬兰、匈牙利等译本，有多半是根据库恩的德译本转译。同时，这个译本自 1954 年以来，曾数次再版，（1954 年以后各版都由德国威斯巴登岛社出版）

由于库恩的译本文字流畅，文采飞扬，所以拥有很多读者。弗朗克教授指出他译文的长处是："语言生动，读起来轻松，富有诗的热情"。但是由于他任意地删削和添加，也"导致了对原作错误的联想。"

在库恩之前，《金瓶梅》在德国尚有片断译文出版或发表，德国语言学家、东方语学教授格奥尔格·加布伦茨（Georg Gabelentz）根据满文本翻译的德译文《金瓶梅》片断，1879 年发表在法国巴黎的一家杂志上，H·鲁德斯贝格（H·Rudelsberger）曾把《金瓶梅》的第三回译成德文，题为《西门庆之艳遇》，收入德国出版的《小说》一书。冯·埃·察赫（Von·E·

Zach）也曾翻译过《金瓶梅》中的几首诗词，发表在1932—1933年《德国卫报》3—8月号合订本上。

德文节译本《金瓶梅》，除库恩的译本之外，还有马里奥·舒伯特（Mario Schubert）根据张竹坡评本节译的《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这个本子大概只有库恩节译本的一半，1950年由苏黎世W·克拉森出版社出版。

库恩的译本，其蓝本是张竹坡的《批评第一奇书》本，库恩是著名的汉学家．一般认为他的译文流畅易读，且能传达原作风貌。但也有人认为库恩的译本其中多有穿凿附会，个别情节甚至添枝加叶，与其说是译书，倒不如说他是作了一次“枪手”。评论家布罗默·何斯特似乎对库恩给予了更多的原谅，说库恩当时不仅有时间的压力（每月须交出100页译文），还有经济上的压力（只付给他1200页的稿费），但他的译文使人隐约地感到他的才华。弗朗克惋惜地表示：“要是他曾经献出一部语言上、学术上都很强的全译本就好了。”库恩的译本在德国褒贬参半，或者说有时是批评多于赞誉。“德国之声”电台中国编辑部编辑多纳特曾批评说：“他在翻译中对原文任意砍伐，除了主要故事情节予以保留之外，一切旁枝均被删除”。这样一来，“生活的充实、那些关于中国古时候日常生活丰富的信息便永远失去了”。“不过有一点他却丝毫也没有省略，这就是那些风流的细节。在库恩的译本中，虽然这个译本只有900页，但此一部分内容比祁拔3000页的译本还要丰富”。德国汉学家卢茨·毕格教授还证实，库恩译本中色情的细节描写，不完全是原作中固有的，许多都是库恩根据后来的中国评论家的注释加进去的。记者艾琳还指出库恩有一个惊人的疏忽，他把西门庆死于

33 岁改为 43 岁。

库恩自己说，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莱比锡岛社在苏州获得的皋鹤堂本《金瓶梅》的。这个本子共 24 卷，有张竹坡评语，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刊刻上的错误，但是比较易懂，所以就拿这个本子来作蓝本了。

库恩在为他的译本撰写的《跋》文中说：

“《金瓶梅》的文字有许多双关的含意，它的描写常有辛辣讽刺，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对各种人物都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优缺点，没有唯心主义的写法。由此，《金瓶梅》这部小说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它可说是不可多得的明代文献。谈到它的艺术性，那无可争辩的是属于最好的作品。但它也有一些情节的描述对欧洲读者是难以理解的。我这个译本的出版不是研究团体倡议的，完全是出版家个人的勇气，这个译本能够问世，需感谢出版家。很可能有一些专家们会对这个译本有争论。这个译本不是为少数专家服务的，而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为广大受过教育的读者服务的。”

库恩的译本从 1954 年到 1970 年，曾 4 次再版，发行量很是可观。然而，即使是开禁之后，库恩的译本在书店里还是被放置到淫秽图书的架子上去的，很多德国读者对此书一直抱有神秘感。

曾在柏林墙那一边的民主德国，对此书的传播也一直讳莫如深。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笔者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过一篇一位民德作家的小说，题为《第六个钉子》，说的是一个工人想走工长的“后门儿”，便送了一套译成德文的中国小说《金瓶梅》给他，但又怕别人知道这件事，就把书装在一只挎包

里，将包挂在更衣室的第六个钉子上，然后提醒他的工长把书取走。

小说似乎没有谈及那部《金瓶梅》是谁的译本，但我想一定会是库恩的译本。因为第一，库恩的译本在东、西德流布最广，再版最频，第二，那位工人把装有这套书的挎包挂在第六个钉子上，也是一种提示：库恩的译本书名不就叫《西门与六妻妾奇情史》吗。

从三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库恩的译本曾被转译成英、法、瑞典、芬兰、匈牙利等各种文字[①]，这种“一窝蜂”式的被转译，除了库恩译本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译者对汉语的隔膜。

显然，这里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偏差，大多数转译者不懂汉语，不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去参考原著，只能根据库恩的本子去穿凿附会。

更有甚者，有的版本号称是库恩本的节译，但这“节”却绝非“节”掉了书中的淫秽描写，相反，他们却把这一部分情节添油加醋地强化，而删除了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对这部名著进行了野蛮的轮奸。

---

① 由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转译的英文译本，伯纳德·米奥尔翻译，书名亦为《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全书也分49章，共两卷，由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及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分别在1939、1940年出版，并于1960年及1962年出版了纽约卡普利科恩图书公司版。

法文转译本有让·皮埃尔·波雷译本，内容书名与库恩译本同，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1949年版。另有赫尔曼·海斯等集体译本，书名《金瓶梅》，由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2年出版。

瑞典文转译本由埃尔塞与哈甘·若莱特合译，书名同库恩本，1950年于斯德哥尔摩出版。

芬兰文转译本的转译者是雅尔玛·帕尔塔南，书名同库恩本，此译本1955年出版了第三版，译文参考了英文和瑞典文转译本。

匈牙利转译本书名《金瓶梅：十六世纪中国无名作家小说集》，也分49章，但作两卷，由布达佩斯欧罗巴出版社出版，1971年出版第1卷，1973年出版第2卷。

法国汉学家艾金布勒对此非常愤慨，他曾指出："非常明显，千百个分散流传在欧洲的各种语言的不同本子，它们都带着商品拜物教的框框，（它比一部看来是'淫书'的销路更好?）把这部杰作删削得残缺不全，几乎把它堪称为杰作的全部内容都删掉了，却坚定不移地保留了那些色情下流的细节，那各种各样的同性或两性的嬉戏的姿式。最糟糕的是这些内容多样的大杂烩都是受库恩选本的影响。这种意识上的下流，就下流在把《金瓶梅》这部书看作一部下流的书。这种节选本竟沦为一些轻佻的、令人厌烦的小幅图画而构成整个巨幅的文明堕落的全图。"（艾金布勒《金瓶梅法文全译本前言》）

有不少转译本的命运亦和库恩的译本一样多灾多难。法国让·皮埃尔·波雷（Jean—pierre Porret）的转译本《金瓶梅：西门庆与六妻妾奇情史》，算是个还不错的译本，由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于 1949 年出版了第一卷，309 页，很受法国读者欢迎，但法国官方担心西门庆的生活方式会给法国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而下令将该书查禁。这一禁令直到 1979 年才宣布撤销，出版社因此得以将全书的后两卷出版。

这个禁令一直维持了三十年，在西方禁书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了。

库恩还翻译过《续金瓶梅》的全译本，题《隔帘花影》（Biumenschaten hiu erdem vorhang），这个本子 1956 年由布莱斯高 E·泽曼出版社出版。该译本也曾被转译成英文节译本。

44

祁拔兄弟与《金瓶梅》

来自“故乡”的小说

祁拔兄弟是德国人。他们是第一部《金瓶梅》德文全译本的译者。

《金瓶梅》被介绍到德国，最初的译本是嘉伯伦茨兄弟从满文本转译的，他们的译文有两回曾发表在德国《环球》杂志第Ⅱ/1863期（第143～146页）和第Ⅱ/1864期（第348～350页）上，这个译本发表出来的只是三十五回前的几个片断（西门庆升堂审判韩二捣鬼等情节），题为《中国的司法》，这个译本稍晚于1853年法国巴赞的译本。遗憾的是，除了这已刊出的两章译稿之外，他们的译作没能获得出版，全部译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佚失，不知所终。

现在德国读者所见到的最完整的一个译本，便是祁拔兄弟历尽磨难，花了三十年光阴才译竣的《金瓶梅》了。

祁拔兄弟，兄名阿尔图尔·鲁道夫·费迪南，弟名奥托·

弗里德雷希·威廉。他们的父亲鲁道夫·祁拔，是一个中级邮政官员。在他的五个子女中，生于1878年的阿尔图尔排行第三，生于1880年的奥托排行第四。另外三个全是女孩子。

祁拔兄弟出生在东普鲁士的利克市，在他们读小学之前，父母便双双去世了，这一群孩子很小便成了孤儿。

他们的叔叔把他们接到英斯特堡家里抚养．在那里，阿尔图尔和奥托一起进入小学读书。可是，由于英斯特堡的生活费用太高，他们的叔叔只是一个小官吏，实在不堪重负，一年零三个月之后，这一群孤儿便由他们的姨妈收养了。

姨妈住在同属东普鲁士的甘木毕内，她家里有一间织布作坊和一片店铺。三个月之后，阿尔图尔被普鲁士柯尼斯堡的一家孤儿院收为住读生，第二年奥托也来住读。

柯尼斯堡的这家孤儿院，名王家孤儿院，是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一世1701年1月18日被加冕为"普鲁士国王"时建立的。孤儿院的小钟楼上镌着金字谢词：

"Aà maicrem Dei Glcraln pia data acoelo Croua"

这所孤儿院，同时也是一所初级文科中学，同别的学校一样，开设有拉丁文和希腊文课，但是没有九年级毕业班。这是一种风俗。每年在住读生中挑选两三名最优秀者，保送到别的王家文科中学去继续学习，直到有资格进入大学为止。阿尔图尔在八年级学业结束时成为幸运的"保送生"。

奥托读了四年书，因为整个学校的体制被取消，奥托只好又回到甘木毕内，在那里，他也在为数不多的文学中学班里于1899年复活节毕了业。

阿尔图尔的志向是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姨妈家却不可能

为他提供读大学的费用。他于是便去一家药店当学徒，在那家药铺他干了一年半，不顾一切困难跳级进入阿尔玛·马特·阿尔贝蒂娜大学。当时他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马克，他一边读书，一边通过当家庭教师的方式挣钱。当奥托通过大学考试时，他劝弟弟学他的样子自己帮助自己，兄弟俩相濡以沫地生活在一起。奥托选择了法律，他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闯过了难关。

柯尼斯堡大学那种真正的学院精神刺激着祁拔兄弟，阿尔图尔研究印度日尔曼语言学，特别是其中古印度和伊朗的梵文，同时也研究伊朗阿维斯塔的禅语，即查拉胡斯特拉人的圣经。日尔曼语言文学、英国语言文学和哲学成了他的专修学科。1906年，阿尔图尔通过国家考试，被聘为东普鲁士奥斯特罗市人文中学的教育参议。他换了几次工作，刚刚在威廉港安顿下来，娶了妻室，便到了服役期。在他于甘木毕内的轻步兵团服兵役时，他弟弟奥托差不多同时在威廉港的第三海军营(海军陆战队)报了名。

因此，奥托随部队到了中国的青岛，当时德国人的租界地。他在那里服役期满，调换了职业，在一家德中贸易的德国公司谋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家大公司工作的几年中，他得以走了中国一些大的海港城市，也从中国内地认识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在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奥托学会了中国话和艰难的方块文字。

从此，奥托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他的中国老师那里，奥托接触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也知道了《金瓶梅》这样一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他感到这部发生在山东的故事，就像自己“故乡的小说”一样，有一

种不可名状的亲切感。

奥托立下志愿，他要把这部小说译成德文。

第一次回国休假时，他向哥哥阿尔图尔讲了自己的这一宏大的计划，他希望能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共同完成这一工程。阿尔图尔立即表示愿意作弟弟的合作人，奥托回到青岛以后,阿尔图尔便迫不及待地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自学起中文来。凭着他对语言的敏感和过人的毅力，他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壮心百劫终不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被迫将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的殖民地交给日本人，因此，在中国工作的所有德国人，都返回故国。

回国后，奥托在哥达市的法院谋到了一份工作，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了。不久，他参加了陪审官考试，当了律师，第二年又结了婚。

从这时候起，祁拔兄弟俩开始了他们计划中的翻译工作。

奥托与当时很有声望的一家印刷所的主人很熟，于是，这个印刷所便接受了出版《金瓶梅》第一卷的意向。二十年代，中德贸易得以恢复，奥托带着妻子，随同一家贸易公司重返中国。这次到中国，他主要居住在汉口和长沙，这段日子差不多有5年多，他们有了两个女儿——哈娜和赫尔嘉，她们都出生在长沙。

1928年，奥托翻译的《金瓶梅》第1卷已经杀青，这一卷包括了原著的第一至第十回，交由原来谈定的恩格哈德——莱

耶出版社出版。

这一卷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四年之后，他们又把第2卷交给了这家出版社（第十一至二十三回），并作出了翌年刊出第三卷的预告。

没过多久，希特勒的文化专制政策开始实行，大量主张自由、独立或与纳粹思想相悖的文学作品遭到禁毁。祁拔兄弟的《金瓶梅》译本也难逃厄运，成为禁书，甚至连印刷厂的印版也被销毁了。

希特勒亲自下令烧毁这部两卷集的译本，法国汉学家艾金布勒曾在谈到祁拔兄弟的译本时说：“祁拔兄弟的德文删节本……自1928年以来就已着手进行的全文摘要第一册，和全文最初的两卷集，被希特勒认为只值得当火烧，于是这部书就被这个疯子于1933年连同所有值得保存的文学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这是祁拔兄弟的光荣！尽管希特勒终于灭亡，许多德语读者显然因此而无法读到这部分为四十九章的译本。”（《金瓶梅法译本前言》）

对于祁拔兄弟，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多少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兄弟俩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继续干下去”。他们一致坚定地表示。没有出版时限的压力，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一个回目一个回目地译下去，为了更好地把握原著，他们以全新的方式完成了对全书的注释。

这个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奥托的儿子在俄国战场上阵亡，阿尔图尔居住的威廉港不停地遭到轰炸，他的妻子死于心力衰竭。奥托居住的哥达市居所也被炸弹摧毁，他们的手稿虽然被抢救出来，可原书的两百幅插图却在轰炸中化为灰

烬，这使祁拔兄弟痛心疾首。

为了这部书，兄弟俩忍受了千辛万苦，在高压文化政策之下，译书的工作只能悄悄进行，兄弟俩居住在两个城市，除了每年一次聚在一起讨论之外，主要靠通信交流翻译情况，为了保密，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一种速记符号。二战的炮火笼罩整个欧洲，他们却依然忘我地工作着，即看不到出版的希望，也得不到任何经济补贴，但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咬牙把这一伟大的工作坚持下来。到二战结束时，兄弟俩已完成了这部煌煌百回巨著的九十九个回目，距离最后的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很快，他们一鼓作气完成了最后一回的翻译，并编定了注释卷。注释卷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祁拔兄弟将全书中各种疑难问题分列 92 个大条目，590 个小条目，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书中涉及到的关于中国文化、历史、风俗、习尚以及宗教等诸方面的知识，旁征博引，且加入自己的见解，是一部完整面系统的《金瓶梅》导读。

一直到 1956 年奥托逝世，1961 年阿尔图尔逝世，这之前，他们兄弟二人始终在不断地校正修订他们的译文，这一部全译本，耗去了兄弟俩近三十年的光阴。

豹死皮存　人死名在

祁拔兄弟的《金瓶梅》全译本的翻译工作虽然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即告完竣，但这部书的出版却要迟得多。当时，苏占区的出版社曾表示可以出版这部全译本，哥达即在这个占领区，但是，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占领区内，“已经不再有

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了。”

可在西德，也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这部译稿，原因是英泽尔出版社出版的库恩的译本几乎覆盖了德国所有的图书市场，所以其他出版社对接受这部全译本并不感兴趣。——库恩的译本虽系节译，但原著中的性描写却并未剔除而且添枝加叶地作了许多渲染。

五十年代末期，终于有一家以介绍东亚文化为主旨的瑞士小出版社——“天平出版社”接受了这部译作。而此时，奥托已于1956年病逝，阿尔图尔也年近80岁了。天平出版社在出版这部译稿之前，很及时地请阿尔图尔写了《传序》和译书经过。阿尔图尔1960年也去世了。

天平出版社的主理人是费立克斯·M·维斯纳，他原系奥地利人，他的祖父由于喜欢瑞士这个千湖之国，从1895年起便花钱买了瑞士国籍。维斯纳读了十年大学，学过化学、日尔曼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俄语、印度哲学和宗教史，大学毕业后在马奈塞出版社当编辑时出版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第一卷的译本。1949年他独资创办了天平出版社。四十年来，他编辑的中国小说丛书已出了二十余部。

维斯纳跟阿尔图尔一样，多年向往但却从未有机会到过中国，他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却一往情深。他喜欢中国的戏剧和小说，也喜欢神秘的中国哲学。他企图向东方世界去寻求一种人生的理想，因而受到指责。瑞士书报检查官曾将维斯纳两度送上法庭，开头一次是六十年代初，他出版了中国禁书《肉蒲团》，第二次是七十年代他出版了道教小说《株林艳史》，曾被处以罚款和没收存书的处罚。但维斯纳不服，顽强坚韧地同书

报检查官展开斗争，直到1974年，瑞士最高法院才宣布他无罪。瑞士汉学界的权威恰尔纳教授曾将维斯纳比作热情介绍希腊文化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另一位教授则称天平出版社是“通向未知的中国的哥伦布的航船”。

维斯纳在出版这部《金瓶梅》全译本时，十分谨慎地在扉页声明：

> 汉堡天平出版社谨告：此书只限售给专门从事文学和学术研究的人员及具有这方面常识的书商。
>
> 凡将此书出卖、扩散或带广告性地出借给不具上述知识者，或将此书公开展出、出示、转交、提供、出售或出借给十八岁以下青年者，均将受到惩罚。

这一节文字，在后来再版时被删掉了。然而，1967年，奥托·祁拔的女儿哈娜·维伯夫人到邮局海关去领取出版社寄赠的样书时，却遇上了麻烦。海关人员看了上述文字，又看看眼前这位年轻女士，神情顿时严肃起来，维伯夫人作了好一番解释，才得获放行。

祁拔兄弟的译本，1967年出版了第一卷之后，又过了十五年，六卷本的译作才全部出齐。《德国之声》的一名编辑，逐字逐句将这部巨著进行了校订。这部长达三千一百五十页的全译本面世之时，恰是原作诞生四百周年之前夕。

幕尼黑汉学家赫伯特·弗郎克为这部译本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了这部世界名著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也赞誉了祁拔兄弟的贡献，他指出：“单是这部小说提供的东西，就可以了解

十六世纪中国的全部文化史。”前言写道：

在世界一切民族文学中，中国的这部作品是唯一的一部任何种类的史诗都不具有的……在明朝(1368—1644)，中国的小说艺术达到了第一个顶峰。当时，在历史题材和神怪题材小说之外，第一次出现了现实主义的世俗小说，《金瓶梅》肯定是这类小说中最伟大的杰作。如果说能反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是小说的标志，那么从任何意义上讲，《金瓶梅》都当之无愧。

……即使是汉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终于有了一部在德语区迄今仍然不熟悉的中国小说被完整地和忠实地翻译出来了。仅此一点，它就应该赢得毫无保留的承认。个别说明或措词可能过于谨慎，则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如何，文学之友、文化史家和民俗学家，都会第一次在这部德语的中国十六世纪的巨著中，发现那些再现出来的一个真正的译本所能涉及的东西。此外，汉学家们更应该对这部迟迟问世的祁拔译本表示感激，因为对一个汉学家来说，一部欧洲语言的译本摆在面前，总是一个重要的帮助，尤其是在某些特别需要借鉴的地方，更是如此。

……如果说译者终于未能看到他们的——magnum opus（全部作品）问世，是值得惋惜的话，那么可以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里使人想起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豹死皮存，人死名在。”

“德国之声”中国编辑部编辑安德里亚斯·多纳特，撰写了

半个小时的广播稿，题为《〈金瓶梅〉——中国的一部四百年的小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多纳在这篇广播稿中说："如果说这个在明朝还那么光辉灿烂的中央帝国突然崩塌不是历史的不幸的话，那么小说《金瓶梅》早已使后来崩溃的根源在明朝社会的现实中清晰可见。《金瓶梅》是一部卓越的社会批判作品，它也使欧洲的读者认识到中国在最近几百年中为什么落到了欧洲人的后面。"

多纳还称赞："这部三千页的小说显然比《魔山》、《卡拉玛佐夫兄弟》或《战争与和平》内容更丰富。"

祁拔兄弟 1928 年 2 月为第一卷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说："《金瓶梅》不同于任何其它中国小说，它可以使读者获得生动的印象，这种印象只有长期在中国人中并与中国人在一起生活才能感觉到。令人惊异的是，小说里普通的人性的东西存在于一切奇特的中国的东西之中。它的影响大大超出种族与时代的不同。所以这部小说在今天的作用仍然显得那样现实，正如它在几百年前一样。在同一时代，即十六世纪，德国的小说中压根就没有哪怕是近似可与之比类的作品。"

目前，祁拔兄弟的德文全译本，除天平出版社出版之外，乌尔施坦出版社、迪欧格尼斯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且每年都有再版。这部小说标价五百马克，价格虽昂贵，但销路却极好。在书店里，它是世界文学名著架上一部最惹人注目的小说。

如出版家为这部小说所作的广告中写道："这一天终于来了，两位德国兄弟经过 30 年最细心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忠于原著的杰出的译文——全世界第一个完整的译本！"

45

书名的趣与误

——并由此谈《金瓶梅》之西译

《金瓶梅》的汉语书名，其寓意再明白不过了，从三位女主角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和而成，铺排一部世情文字。

但是，这三个汉字所提供的审美意韵，却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首先看到了这个书名的妙处，他曾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

又说："《金瓶梅》三字连贯者，是作者自喻。此书里虽包藏许多春色，却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流香芝室，为千古锦绣才子作案头佳玩，断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头物也。噫，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则又如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以上均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这里，张竹坡由书名的妙处引申到了作者写作此书的意图，同时，也把这个书名理解为全书审美形象的佳构。

《金瓶梅》这个书名，是打开全书中诸多迷宫的一把钥匙，“瓶里梅花，春光无几”、炎凉冷热的一部大关目，一开始就给你点破了。

另外，《金瓶梅》这个书名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得体的审美直观，对读者有形象的吸引力，绝非随意的拼凑。不信，你把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个人的名字重新组合一下，比如“潘李庞”、“莲儿梅”、“金瓶春”、“莲瓶梅”等等，那可就差劲多了。

读完全书之后掩卷沉思，你会发现《金瓶梅》这部书，单是一个书名，便是一部极有韵致的古琴曲，十面埋伏，余音不绝。

撷书中人物姓氏为书名，此一方法实从《金瓶梅》始。后之来者，多有仿效，如《平山冷燕》便是书中四个人物——才子平如衡、才女山黛、淑女冷绛雪、书生燕白颔的姓名中各取一字而成，东施效颦，已不足为观。

《金瓶梅》在国门以外的传播，最早当是日本。日译《金瓶梅》，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书名，有的只是在书名前冠以“全译”、“原本译解”、“私版”、“秘钞”、甚至“妖异”等用以招揽，书名面目全非的却不多见。昭和三年的译本易名《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昭和十四年丹羽文雄的译本《西门家的人们》，和来路不明的那个译本《多妻鉴》，则是一般的个案了。

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很大，中国古典名著译介到西方，光看书名就吓你一跳，《水浒传》成了《强盗与士兵》，

《水边的故事》;《西游记》成了《猴》，这就是我们名著的面目。

《金瓶梅》的外译，东方语有日、朝、越、蒙文，欧译西译有英、法、德、拉丁、瑞典、芬兰、俄、匈牙利等文种。尤其是欧译，不论是片段、节删还是全本，以《金瓶梅》原名直译的实是凤毛麟角。

西方关于《金瓶梅》的译介，始于上一个世纪中期，现知最早的西文译文为法文，是巴赞的《武松与金莲的故事》。

巴赞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专事中国戏曲研究，他的这个译本，相当于《金瓶梅》原著的第一回，收入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中。

欧洲最早的《金瓶梅》全译、节译本，也同样出现于法国。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埃·德·莫朗的译本定名为《金莲》，由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于1912年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翻译的。

乔治·苏利埃·德·莫朗在中国长大，他去过中国许多地方，从南方到北方，几乎跑了大半个中国，他喜欢中国的山水形胜，了解中国的历史和艺术，尤其喜欢中国的方块字。莫朗写过二十多本关于中国的书，倾尽一生的精心，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

莫朗在他的译本的序言中，把《金瓶梅》同《一千零一夜》相提并论，认为这两部书的趣旨多有共同之处。但莫朗的译本，错误之处亦不少见，李辰冬曾撰文直指其失："《金瓶梅》的文字多系明时方言，即令我国学者，尚有不晓之处，忠实翻译，定有难事。此书系百回大作，而译者只以二百余页了之，其潦草从事，不问可知（何按：莫朗的译本为全一册，294

页)，况且好多成语全译错了”（见李辰冬《金瓶梅法文译本》，原载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25日《文学副刊》第252期)。李辰冬详尽举出了莫朗译错的词语，如“奴家”，本系妇女对丈夫或长者的自称，而莫朗却将其译作“家庭的奴隶”；“燕窝”本为珍贵食品，然而却被译成“燕的窝口”等等。然而莫朗的法文译本，毕竟是将《金瓶梅》全貌介绍给法国读者的第一部，功不可没。

让·皮埃尔·波雷的法文节译本，因系从德国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转译而来，所以书名与库恩的相同，曰《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1949年由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出版第一卷，309页，该卷1953年又出了修改版，342页，但迅速被禁止发行，1979年方才取消禁令，于是后两卷得以出版。1967年法国又出版了波雷翻译的两卷本《金瓶梅》，内容与德国库恩的译本相同。

约瑟夫——马丹鲍尔和赫尔曼·海斯等人的节译本，1962年由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出版，该书亦由库恩的译本转译，但书名却径直译作《金瓶梅》。

值得称道的法文译本是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威安先生的全译本《金瓶梅词话》，它是法文的第一个全译本。这个译本1984年在巴黎出版，全书长达2756页。

雷威安，原名安德埃·列维（Andre Levg)，1925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市，在中国生活了12年，1937年返回法国，1974年获国家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波尔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教授、巴黎第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出版过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著多种。

雷威安的此一译本，忠实于原作，合乎译文信、达、雅的要求，颇受西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和法语读者的欢迎。

按照法文的句法，《金瓶梅》三字，则必须倒置以成为“梅花插在金属的花瓶中”。按照雷威安的理解：“金”指金属，亦指中国五行意义上的时序与方位（属秋，属西），“瓶”，则指细颈的花瓶，使人联想起富有生殖能力的花托。

雷威安说：“‘瓶’这个词儿比‘花盆’当更具有女性感。因中国的‘瓶’字意味着一切长颈容器，从酒瓶到药瓶乃至曲颈瓶。这也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这个名称如此恰如其分地符合传统说法——‘梅花插在金莲的阴户里’，说明了第二十七回的情节。”

原书第二十七回的情节，系指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那段丑态的描写，西门庆曾把一枚李子塞进潘的阴户中。无独有偶，在英语中，“梅子”和“李子”也是同一个词：“Plum”，所以在对书名的理解问题上，美国人跟法国人出现了一致性的偏差。

美国匹茨堡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柯丽德在《（金瓶梅）中的双关语》一文中说：“《金瓶梅》这几个字当然可以读作‘金瓶里装的梅子’，既然潘金莲在西门庆的最后玩乐中充当了盛梅子的壶（瓶），这些人物情节就为我们提供了组成小说书名的词汇。”

柯丽德此文，是专论《金瓶梅》第二十七回的，他认为这一回虽包含着小说中最触目的色情描写，但也处处充满了隐喻。比如《金瓶梅》这个书名的含义，就在以上所引的那段文字中。然而，小说原文是“李子”，而绝非“梅子”，这是语言的差异和局限而造成的误读。

以中国读者的普通的阅读经验去看，雷威安的这种理解方式未免落于穿凿，当然，中国人和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必苛求。

雷威安的译本，进行过一些删节，删节是为了在“艰难得要命的文句和使人弄得莫明其妙的转折之间”，“优先考虑保持读者阅读的兴味”。因为“翻译者不知道在这小说的长河里用什么办法去消除航行的困难”。对雷威安先生的苦衷，中国读者也会深为理解，《金瓶梅》语言现象十分驳杂，作者涉猎史典，俯拾皆是，方言之繁纭，几及四海，俚谚之出口，达乎鄙俗，尤其是叙述中间杂的歇后语、隐语、双关语，不经多方推敲，而不知其所以云。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读这部书，也是挺费劲的，何况是雷威安先生。

难能可贵的是，在雷威安的译本中，“用口语叙述方式的传统套语，以及穿插在叙事中用韵文形式表达的连续的回忆和评论，都完整地予以保留。中国的文字结构紧密，一般难能在译文中把原来的诗词逐字译出：我对这种忠实的直译不打算一试。我觉得更要紧的是尊重叙事的自然流畅，同时保持小说的结构和原来的抒情风格相一致，并注意到那些被大部分译者所疏忽的细微之处……在这部小说中，人们往往发现一些部分事涉粗俗，用词也有文、野之分，以致我们在迻译时对古今切口、土话把握不定，有时不得不冒险从事。我们倒是很愿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持书中的谚语、熟语原来的古色古香的风味的，它们是无法想象的丰富，可又往往带有令人生畏的模糊——这样的情况数以千计。注释但求说明状况，作简要回顾，如遇必要，用各种不同的方面加以评注；但这决不是自诩博学，因为注释

不是给专家学者看的，而是注给一心向往的读者看的，目的在于启发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所以注释以清晰为上，简洁服从于清晰。尽管如此，我们这部译本旨在提供一个不必借助注释即可读懂的本子。”（以上所引雷威安语，均见诸于雷威安先生《金瓶梅法译本导言》）

雷威安的译本分为十个部分，每个部分标上一个题目，每个题目概括十个回目：

第一部：《金莲》

第二部：《瓶儿》

第三部：《惠莲》

第四部：《王六儿》

第五部：《渎职》

前半部《金瓶梅》，也就是说《金瓶梅》原著前五十回的内容，到此打住。这五个部分中，有四个部分采用了书中女人的名字作标题。

第六卷：《少爷之死》

第七卷：《枕边的幻想》

第八卷：《西门庆暴亡》

第九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十卷：《土崩瓦解》

从第六卷起，标题的改动全出于译者之手。

这个译本，在书前附有法国学者艾金布勒的《前言》。

这位艾金布勒曾搞过一个类似《金瓶梅》的模本，书名竟叫作《云雨》。云雨，是中国人对于色情嬉戏的隐喻。

严格地说，那个本子算不上是翻译，只是一个中国古代的

色情和恋爱故事的改写本。

艾金布勒生于1909年，法国以研究比较文学而著称的学者，又是小说家，曾以《合唱队的孩子》、《水蛇皮》两部作品轰动一时。他不懂汉语。1949年，他从埃及回到法国不久，隐居山中，翻译劳伦斯的小说《金钱》，同时，为写作那部后来使他获得盛名的《兰波的神话》，在这些工作的间隙中，他读到了鲍莱的《金瓶梅》节译本。那个本子是根据库恩德文本转译的。这部改头换面的名著给了艾布金勒很大的阅读愉悦，他放任自己冒险地被书中那些“云雨”的故事所吸引，所以后来就干脆以此为主题，搞出了那个《云雨》的单行本。该书1969年由纳吉尔书局出版，1978年再版。

以上是《金瓶梅》在法国的传播情况。

《金瓶梅》被首次译成德文，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事。德国语言学家、东方语学教授奥尔格·加布伦茨兄弟的《金瓶梅》片段德译，其蓝本是满文本《金瓶梅》。他们的译作发表在巴黎出版的《Revue Or－ientale et Americaine》杂志1879年的10—12月号上。该译本是将《金瓶梅》原作第三十四、三十五回中关于韩二捣鬼与王六儿被捉奸送交衙门，到西门庆升堂审判将韩二等人赶出公堂为止，拼到一起，题为《中国的司法》。

另外，H·鲁德斯贝格将《金瓶梅》原作第十三回译成德文，题为《西门之艳遇》，收入德国出版的《小说》一书。

《金瓶梅》的第一个德文全译本是根据《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本所译出，由奥托·祁拔和阿尔图尔·祁拔博士兄弟俩合作，历经三十年才告完成。

弗郎茨·库恩根据张竹坡评本节译的德文译本，则名《金

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后来许多转译本皆沿用此一书名。

库恩的译本在德国曾多次再版，1983年，为庆祝库恩的生日，出了两卷本的精装本。同年，前东德的克本豪伊尔出版社也出了库恩的节译本，第一次把《金瓶梅》当作“爱情冒险小说”出版，并附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后记。

以上二种，均有专章论及，此不赘述。

我们再来看英文的翻译。

最早的英文译本题为《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此译本系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转译的，全一册，215页，附有黑白插图，1927年由纽约“The Library of facetiouslore”出版。

另一个节译本的译者是伯纳德·米奥尔，他的英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是根据库恩的译本转译的。全书也分49章，共两卷，863页，由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及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在1939、1940年先后出版，1960年及1962年，纽约卡普利科恩图书公司予以再版，该书863页，附有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撰写的导言。

阿瑟·韦利在导言中论述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创作情况、时代背景、作者考证、以及版本鉴定等。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韦利根据满文译本的《序》提到卢楠一说，而他自己却认为应是徐渭。

英文全译本是克莱门特·埃杰顿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译出的，书名《金莲》，这个译本被视为第一个而且是长期以来唯一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过老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该译本共分四卷，凡1523页，由于英国出版法规的限制，其中一些段落用拉丁文译出，这种译法当然是处于不得已。1990年，波鸿大学汉学家布罗默·何斯特发表专文，批评了埃杰顿的译本把性描写部分以拉丁文翻译的作法，他认为这对语言的流畅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雷威安也曾批评说，这样一来，只有天主教士团的成员才能明白了。埃杰顿辩护说，他之所以插入拉丁文，是英国的作家从未那样直接地描写过性行为，因为除了使用令人尴尬的拉丁文，没有别的办法。这一版本1939年由伦敦G·劳特莱基出版社出版，1954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修订再版，把拉丁语部分挖版改换为英语。1972年又由纽约Paragon Book Gallerg出版了修订本。

《金瓶梅》片段（第一回内容）的译文系Chal chu与Winberg合译，收录在1956年美国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宝库》一书中。

另外，《金瓶梅》中西门庆迎娶潘金莲的一段故事，由塞缪尔·巴克译成英文，以连环画的形式推出，题名《中国的唐·璜》，1960年拉特兰查尔斯E·塔特尔公司出版。

1987年，王丽娜教授在《〈金瓶梅〉在国外续述》一文中透露："据悉，由芝加哥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芮效卫翻译的英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即将在美国出版。毫无疑问，这一新的英文全译本将对西方读者欣赏《金瓶梅》的艺术和西方学界开展《金瓶梅》的研究，提供更大的方便。"

这位芮效卫，原名大卫·劳埃，1933年出生在南京，1960年哈佛大学硕士，五年后在该校远东语言文学系获博士学位，

1963年至1967年任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从1967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他曾著有《郭沫若的早年》、《论张竹坡评著金瓶梅》(后者收入浦安迪编《中国叙事文学》，1977年普林斯顿版)等。他曾提出《金瓶梅》作者为汤显祖说，撰有《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向1983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主办的《金瓶梅》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芮效卫的译本的情况，因为没有得到新的资料，不知结果如何，想必已早在大洋彼岸"悬之国门"了吧。

再谈谈俄文和匈牙利文本。

俄文译本书名《金瓶梅》，翻译者是前苏联汉学家马努辛。

马努辛1926年出生于莫斯科省，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4年获副博士学位。1949年至1951年，曾在中国担任翻译，精通汉语。1956年在莫什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讲师，1969年升副教授。这个俄文译本，据《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百回本节译，分作两卷，凡3938页。1974年，马努辛译完此书后去世，译文的修改由中国民族学专家瑟切夫完成。译文的修改，曾得到日本《金瓶梅》研究专家小野忍的帮助。此译本1977年由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附有原书中明崇祯间插图和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撰写的序言和注释。

匈牙利本书名《金瓶梅》，也是据库恩德文本所转译，49章，2卷，布达佩斯欧罗巴出版社出版，1971年出版第一卷(1—28章，526页)，1973年出版第二卷(29—49章，416页)。这个译本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匈牙利文译本。

俄文版的《金瓶梅》，书名是直译的，前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说，潘金莲这个名字，意译为"金莲花"，"在中国，过去

把女人的小脚称作金莲，小脚是女性优美的主要标志。古老的传说讲，仿佛有一位国王下令用黄金制作一批莲花，把莲花放在地上，叫自己的爱妃踩着金莲花走过去。她好像是在地上步步生金莲。金莲叫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瓶儿的意译是'花瓶'，按中国古老的概念，花瓶是母爱和女人天然物的象征。难怪新娘的花轿里一定要放上盛满粮种或者珍宝的花瓶，表示祝愿五谷丰登，多子多孙。小说中提到的中国古代游戏——投壶，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春梅——'春天的梅花'，在小说里占有重要地位……不能排除的是，作者把小说称作《金瓶梅》，是想赋于作品较为深刻的含义。'金'——意思是'黄金'，不过它的原意是'金属'。按照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观点，金是阴的向征。关于'瓶'，'花瓶'的含义我们已经说过了。'梅'——'野梅花'，具有特殊的比喻意义。流传至今的十五世纪末民间图画上，画着一只花瓶，里面插着一枝象征男性力量的野梅。古老的评注里特别强调小说名称的这个深刻含义。"（见前苏联鲍·李福清《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在这里，鲍·李福清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去理解《金瓶梅》书名的喻意，可谓最得心旨。美国学者W·爱伯哈德曾编了一本《中国文化象征词典》，兹将对"金"、"瓶"、"梅"三字的文化象征含义的阐释摘引如下：

金（Metal）：

"五行"之一，与它有关的象征是西方和白色。

据古书《洪范》中所说，与金有关的还有五脏之中的肺，五官之中的"听"，五种天气之中的"冷"。在

一本简洁的古代中国医书《黄帝内经》中，金还与人体的一“窍”（鼻）以及一情（悲）相关联。金的基本概念与西方和秋季有关，秋季是植物走向死亡的季节；在古代中国，它是执行死刑的季节。因此，金（→剑）也有刑杀工具的含义。

瓶（vase）

“瓶”与“平”（和平、平安）同音，瓶子里装上不同的植物、花等，可以表达丰富的象征含义。

……从前，有一种具有特殊作用的“宝瓶”。里面装的是五谷——黍、麦、高粱和两种豆子，它在婚礼中使用，是一种象征繁殖的仪式。

梅（plum）

梅花树还在未长叶子之前，就已经开花了，它是春天最先开花的树。……梅象征着冬天与处女。

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个吉祥之神。“梅花”是过去丫环和侍女常见的名字，隐含着性愉快的含义，妓院的床上常常使用的“梅花床罩”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秘码，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神秘的。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更有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沃尔夫拉姆·爱伯哈德《中国的象

征语言》)。

由《金瓶梅》书名所引起的趣味与误读，其意韵之隽永，足可发人深思。

46

来自东方的“黑色羔羊”

——西方人眼中的《金瓶梅》

《金瓶梅》是世界的。

因为它首先是中国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之一，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共同财富。

《金瓶梅》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传入西方，那片陌生而神秘的大陆立刻接受并包容了它，它被称作来自东方的“黑色羔羊”。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金瓶梅》的出版与研究日趋进展，仅是德国库恩的节译本及其欧洲大陆各个国家的转译本，发行量已超过了20万册。

法国著名汉学家、法语全译本《金瓶梅》的译者雷威安教授，公布这个大大打了折扣的数字的时候，在诞生了《金瓶梅》的中国本土，即使是这部书的研究者，要看到这部书的全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至于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刚刚打开的国门之内发出了“瓶梅独秀”的慨叹。

中国与西方，不仅有地理意义上的阻隔，而且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就在这长期阻隔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发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金瓶梅》在西方人的眼里，会是一部什么书？

德国著名汉学家赫伯特·弗朗克在德文全译本序言中指出："《金瓶梅》是中国现实主义的世俗小说中最伟大的杰作。如果说能反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是小说的标志的话，那么从任何意义上讲，《金瓶梅》都当之无愧。"

一位从事文学研究二十年的瑞士教授说："只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曾经给我过与《金瓶梅》相似的深刻而又动人的印象……为了不使自己失望，现在我还应该读什么书呢？"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说：《金瓶梅》"颇像日本的'浮世'，它不蔑视活语言，题材则趋向日常生活。"

日本的"浮世"，又称"浮世草子"，或谓"浮世草纸"。是日本在江户时代元禄前后流行的大众小说的称谓。流行时间从1682年《好色一代男》问世开始，前后约八十年。浮世草子从正面描绘现世生活和人，描绘町人（市民）生活的现实社会。阿瑟·韦利很精辟地指出了《金瓶梅》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小说。

关于《金瓶梅》的性描写，德国人知道中国人对《金瓶梅》早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弗朗克说："尽管如此，欧洲人并未被这种可疑的名声所吓倒。"德译本译者祁拔也说：色情描写不是小说的本质，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作者"深思熟虑的幽默"和"道德的严肃"。

美国的东方学者罗夫，曾经对《金瓶梅》是淫书的非难提出质疑和辩护："作为艺术作品，本书……属于……这种最高的

境界。必须断然否定说这部小说不道德的论调……这里没有不道德，就和左拉和易卜生的作品同样地是艺术巨匠手中的艺术品。”（《满州文学素描》）

前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对《金瓶梅》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长篇小说《金瓶梅》里，人的感情和情欲被推到了第一线。这部小说出现在十六世纪后半期不是偶然的。这时中国正盛行直觉主义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他赞成承认人身上的主观情感因素。在他之后，许多剧作家，尤其是汤显祖，极力宣传正是要描写最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发展到疯狂程度的情感的体现。这条线也贯穿着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李福清《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法国汉学家艾布金勒则认为，《金瓶梅》这部世情小说，不仅是作者所处的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而且也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镜子，读《金瓶梅》可以读出西方社会道德演变的影子。他说：“读《金瓶梅》，我好像目睹大宋江山的每况愈下，我倒愿意听说欧洲：那是金钱万能的世界，是商人的天国，他们可以随意用金钱买取权势。在我们今天，这种权势不再体现为西门庆的酒壶，和他的四分利回扣的高利贷，但是表现在多用民族的神秘的权利，和那些与梵蒂冈有联系的银行，借助于喷气式飞机，存款深藏在国库的天堂里。”

在这里，艾布金勒强调了《金瓶梅》不仅有巨大的文学价值，而且是一部重要的“社会学文献”。“这部‘猥亵’书——《金瓶梅》，难道它只是关心中国北宋王朝的来日吗？我忧心忡忡地从《金瓶梅》这部书中读到了我们西方社会道德的演变，无论公私都在变。……这个故事的读者，如果他是法国人，他就

会明白这些大腹便便，圆而凸出，丑恶之极，可厌之至的躯体，他们每年夏天点缀着我们的海滩和我们的游泳场所。最简朴的宴请，也给你传唤几名歌姬、娼妓、舞女，正当人们交杯传盏，喝着中国酒或者葡萄酒，饱填举世珍馐入肚之际，她们就曼歌起舞。”（艾布金勒《〈金瓶梅〉法译本导言》）

《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一个封建主义之将死，资本主义已萌芽的暴力荒淫没落的世纪。作者纯粹用一副史家笔墨，勾勒出了那个世纪的荒诞与腐败。

荒淫与暴力——在《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身上体现出来的这两大时代特征，是互为因果同时又恶性循环的。他疯狂地占有女人，疯狂地攫得权力，他的暴亡，也正是那个世纪的必然归宿。美国勃朗·米勒的名著《男人·女人与强奸》一书，即根据社会、历史、战争等环境心理学，分析了暴力与性的这种连锁关系。

可怕的是那个《金瓶梅》时代并没有彻底死亡。不论在东方或者在西方，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所投下的黑魅魅的影子。

不独是汉学家艾布金勒，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出版的“百科全书”或“文学辞典”，都特别强调了《金瓶梅》的社会讽谕意义：

《法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

“《金瓶梅》为中国十六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它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美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虽然写得是中国十二世纪早期的故事，实际反映了中国十六世纪末期整个社会各个等级人物的心理状态，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佛教观点，对中国十六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苏联简明文学百科辞典》“金瓶梅”条：

“《金瓶梅》是一部中国社会和风尚小说。……小说作者揭露批判封建家法制度和一夫多妻制、金钱的腐蚀作用，嘲笑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封建统治者的精神贫乏以及模仿他们的资产者，把寺庙变成妓院的敲榨勒索的僧侣。他同情人民和一切保护人的尊严，为个人幸福和爱情而斗争的人。”（以上均为王丽娜译）

由此，可看出西方对中国这部现实主义的古典名著的推重。

另外，西方的学者们还十分推崇《金瓶梅》的小说艺术与小说美学。

前苏联汉学家、俄文本《金瓶梅》译者马努辛教授说：“《金瓶梅》这一部作品，融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于一体。同样，古典戏剧（鼎盛时期在十三世纪）也吸收了小说的因素。在中国的平民艺术中，各种体裁的发展，往往有一个把已经发展的种类和体裁逐渐综合于刚刚诞生的新体裁的过程，这种综合在《金瓶梅》中特别明显。……分析《金瓶梅》的创作方法和创造典型的手段，分析它表现人物的手法，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研究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的各个阶段，看到现实主义通向胜利的历程。”（B. C 马努辛《〈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载《远东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7 年版，冯昭玙译）

以“中国讽刺小说”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娥尔嘉·费舒曼，则把《金瓶梅》称之为一部“生活的散文”：“正如法国风俗现实主义派以‘生活的散文’来与古典主义昂扬的诗情相抗衡一样，《金瓶梅》的作者也摒弃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传统，它不写英雄伟绩，不写神灵鬼怪，而是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人甚至在犯罪中也没有达到真正的感情高度，因为他们犯罪完全出于图财谋利。‘生活的散文’闯人文学，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庸俗关系，他们的猥琐的情趣、反常的兴味、卑下的志向。”（娥尔嘉·费舒曼《论〈金瓶梅〉》，载《中国讽刺小说》莫什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冯昭玙译）

娥尔嘉·费舒曼列举出在《金瓶梅》中“生活的散文”所包括的诸多方面，如“生理情欲”、“金钱”、“犯罪”、“愚蠢”等等。

“生活的散文”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金瓶梅》在小说美学史上的独特价值。这一论断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一个法文全译本的译者雷威安先生，称《金瓶梅》是一部“真正的古典小说”，“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他说：“《金瓶梅》中如此具有特点的日常生活琐碎而细致的现实主义手法，以罪恶、财富、以及堕落腐化的性生活为内容，又重新找到了这种短小精悍每回自成格局的文章体裁。”（雷威安《〈金瓶梅〉法译本导言》）

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玛丽·伊丽莎白·史各特（中文名史梅蕊）女士，则着力探讨《金瓶梅》和《红楼梦》中

的“花园意象”。她认为：“中国小说中很少有比《金瓶梅》更巧妙而充分地在创作中运用‘花园’这个传统。只有产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以描写花园为中心，集清代中叶文人文化之大成的《红楼梦》才能与之媲美。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脱胎于那产生《金瓶梅》的晚明文化鼎盛期的风俗习惯，所以，从《红楼梦》的构思中可以看出那是对早先那部小说的结构和意图等方面的呼应和发展。花园是这两部小说中压倒一切的意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除序幕和结局外，这两部小说的极大部分篇幅都用以描写后花园的生活琐事。……家庭在这里是盛世皇朝的一个缩影和模型，而花园则是反映了更加微妙和不可捉摸的宇宙秩序，等级森严的人类社会也被置于多极的无限之间，无穷无尽地交替变化的和谐之中。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庭院设计中明和暗、石和水、实和虚所体现的意义。”（见史梅蕊《〈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花园意向》，沈亨寿译自1983年印第安那大学主办《金瓶梅国际讨论会论文》打印稿）

这是对《金瓶梅》小说艺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拓展。花园——是一个审美的艺术空间，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那些发生在花园里的故事，那些与花园的繁茂与凋零密切相关的女人们的命运，以及发生在花园里的灵与肉的殊死的搏斗，都给这一个“典型环境”以非同寻常的意味。

法国波尔多大学著名教授、学者安德鲁·雷威安先生把《金瓶梅》称作“小说家的小说”，他指出：《金瓶梅》“是小说家的小说，它把生活中的砂砾变成金子，这种笔法现代中国作家仍需向他学习。这部小说是为成年人写的，而不是为过分看重那些色情段落的未成熟的年青人写的。事实上几乎不能说人

们过高估计了《金瓶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在例举现实主义的杰作《水浒传》和《红楼梦》时，每每忽略他们不是针对生活的现实而写作的，小说家们能从《红楼梦》学到的东西，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金瓶梅》的启发。"（安德鲁·莱维《评〈金瓶梅的艺术〉》美国《中国文学》杂志1981年第1期。按：《金瓶梅的艺术》香港孙述宇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出版）

"小说家的小说"——真是精彩的评价！作为小说家的小说，《金瓶梅》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它的小说属性整体格局和小说的本体意义，已越来越引起国内研究者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雷威安先生的启示和影响。

大洋彼岸的"金"学热正方兴未艾。如果说五十年代西方学界对《金瓶梅》的研究尚处于一般的评介阶段，那么，从五十年代开始，专题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五十年代以前，西方《金瓶梅》的研究者多出自欧洲，五十年代后，研究者则多集中于美国，而且一大批青年学者加入到"金"学研究队伍中来。如今，美国学界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学者，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了：韩南、郑培凯、芮效卫、夏志清、玛丽·伊丽莎白·史各特（史梅蕊）、杨沂、凯瑟琳·卡列茨（柯丽德）、安迪鲁·浦拉克斯（浦迪安）、戴维·罗尔斯顿（陆大伟）……由于他们的加盟，这部旷世奇书的研究与探索，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47

《金瓶梅》在越南

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

约在公元前4世纪，原是中国百越人的一支雒越人占据红河中下游一带，形成部落联盟。原始公社崩溃，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据越南古史记载，最早出现的国家有文郎国和瓯雒国，但这些都是神话和传说。公元前207年，中国秦将赵陀建南越国，于其地设置交趾、九真二郡。越南古史把南越国列入王统，称赵陀为赵武王，推尊为开国之君。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以其地设9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越南境内。自此，越南正式纳人中国中央王朝的版图，经历了长达1000余年的“郡县时代”（亦谓之“北属时期”）。

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越南才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王朝——李朝。1909年李公蕴建朝后，曾于1010年下诏迁都升龙（今河内），定国号为大越。这份诏书用成熟的汉文写成，是越南至今尚存的最早的文献，也是越南文学的滥觞。

在此之前，越南没有成文的文学，只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流

传，如《貉龙君传》、《山精水精》、《雍圣》等民间神话故事和一些民歌、民谣等。

从李朝建立到二十世纪初的“勤王运动”时期（1885—约1900），越南文化与文学完全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正宗。李朝时代，儒学大倡，1070年在首都河内建立文庙，塑孔子、周公像。1075年开科取士，一仿汉制。翌年设国子监，培养人才。定汉文为全国统用文字，13世纪末，在汉字基础上创造本国文字“字喃”。

“字喃”的基础仍是汉字，但有些字比汉字还要复杂。18至19世纪时，字喃文学达到了成熟阶段，出现了《宫怨吟曲》、《花笺传》、《蓼云仙传》、《金云翘传》等名著，后者系根据中国清代“青心才人”所著《金云翘传》所改写的长诗，有学者论述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是受《金瓶梅》影响的一部小说。改编这部作品的是越南诗人阮攸。

至于越南国语——拉丁化越南文的采用，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了。

《金瓶梅》被译介到越南，最早见于胡文彬先生之《金瓶梅书录》：

《金瓶梅》，越南文，全100回（?）未见。

至于这个版本是由谁来译介的？译于何时？依据的是哪一个版本？是节译还是全译？因胡文彬先生未见此本，故语焉未详。

1992年我在“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结

识了台湾清华大学、文化大学讲师陈益源博士。陈博士不久前曾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访问越南，在河内、胡志明市作过为期三周的考察，考察课题是越南汉喃书籍存在的实际状况。在考察期间，陈博士曾应邀出席文化部在河内举办的《中国文学在越南出版情形》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召集越南全国重要出版单位，与中国文学专家座谈，对象以现代文学为主。但讨论会办了一个书展，这个书展上展出的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却大多数是古典小说，如：《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七侠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居然也有一部《金瓶梅》陈列其间。

陈益源博士会议期间曾惠我一份资料，谈了他所见到的版本情况。

陈博士所见越南文翻译的《金瓶梅》(KIM BỈNH MAI)，是越南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NH Ā X—V ẤT B ÀN KHOA H ỌC XÃ HỒI)出版的，出版时间为1989年3月，系越南昭阳出版社（NH Ả XUÂ B À N CHIEÊ DŰŐNG）1969年译本的再版。全书一套8册，凡100回，近2000页。

1969年首次在西贡出版的《金瓶梅》越译本，书首冠有“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岁建戊午孟夏”（Mùa ha Nám Mẩu N ġo Gia T ỉnh 37triều D— ại Minh），观海道人序，书末附“乾隆四十六年，岁次辛丑季秋月”（Tháng cuồi thu n—ăm Càn long 46 tr ier Thanh）简斋袁枚识之跋文。

译者误将“袁枚”译作“袁枚识”（Ciàn— Trai VIÊN—MAI—TH ỦC），是对中国古人署名习惯不熟悉之所致。因此，

知翻译所据底本，当系近现代中国坊间排印《古本金瓶梅》之类的删节本。后人伪托的序、跋，译者似乎深信不疑。

陈博士说，1989年河内再版的《金瓶梅》越译本，译文似未修订，仅在观海道人序前，增加了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以及河内师范大学黎德念（LÊ ĐỨC NIỆM）教授撰写的《前言》。在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中，执《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说。而黎德念教授则以12页的篇幅，对《金瓶梅》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在《金瓶梅》惹人争议的话题上多有公允之言。

中国坊间之《古本金瓶梅》之类，出现于民国二年（1913）之后，传入越南当在此一期间至1969年以前。

除了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再版的《金瓶梅》之外，陈博士还在胡志明市书店里见到过别家出版社的最新排印本，但那新印本却仍然是1969年西贡译本的翻版。越南学者对陈博士说，虽然越南的出版社竞相印行越译《金瓶梅》，但因售价昂贵，一般读者是买不起的。

谈到越南学界对《金瓶梅》的看法，陈博士援引了河内师范大学梁维恕（TRƯƠNG ĐIỀV ÀN HỌC）执笔的一则《金瓶梅》辞条：

> 中国作家兰陵笑笑生（真名可能是李开先，1502—1568）的长篇小说，作品主要描写《水浒》人物之一——土豪西门庆，充满罪恶、污秽的一生。把《水浒》中西门庆作了延长，创造了许多人物与情节。（以下有接近全文一半的篇幅，叙述《金瓶梅》主要人物与情节，并解释书目来由，略。）

……《金瓶梅》具体、细节地暴露了旧社会恶霸、土豪奢侈生活与趋附、谄媚权门以便剥削人民的诡计。它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少有的写实作品。作者着力于日常生活细节的详细描写。如果根据话本而成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中，叙述倾向是简练的，那么在此作品中，生活画幅是宽阔的。《金瓶梅》这个贡献对后来的小说，如《红楼梦》，有显著的影响。

《金瓶梅》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那是过于偏重淫污、腐败行为的描写，而作者丝毫没有表示态度；作者也吝于对被压迫、迫害的人们，尤其是妇女，表示同情，妇女似乎只是被玩弄的对象。从前，《金瓶梅》一直被视为"淫书"，被列入"禁书"。

(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文学辞典》第一册)

陈博士还谈到，这位梁维恕，还曾在其专著《为了了解中国八部古典小说》中，也曾以16页的篇幅，详细评介了《金瓶梅》，惜未详尽介绍梁文之内容。但由上面一则辞条，其观点已见大端。梁氏的这部专著1990年11月由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所提到的中国八部古典小说，指得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红楼梦》。

陈博士谓：中越关系，渊远流长，同出一源。两国图书往来，过去纵有书禁，然交流之频繁，绝不比日本、朝鲜逊色。我

国历朝传入越南图书甚夥，颇有藉赖保存者。中国的古典小说在越南翻译介绍，近、现代高潮迭起。自1905年至1968年间，翻译作品便达316部之多。仅是《三国演义》，从1907年到1952年，据不完全统计有7种不同译者的越译本出现。

越南对于《金瓶梅》的接受，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是时间较晚且又有所限制的。况且他们实际上仅有的1969年的这个译本，所据原书（《古本金瓶梅》）也绝非明智之选择。

陈博士认为：作为历史关系深厚的邻国学者，他们其实是最有资格在《金瓶梅》向南传播和影响的课题上，提出他们的发现以及各种研究见解的。



48

根是地下的枝

——《水浒传》与《金瓶梅》

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三次较为重大的变革：第一是唐传奇的产生，如鲁迅先生所说：“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者相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第二次是宋元话本的出现，在描写题材上由奇幻怪异转向通俗，小说观念开始产生。在此一基础上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长篇，以其恢宏大气和史诗般的笔触展现了一个新的文学宇宙。

从小说形态学意义上分析，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形成了拟实小说的第一形态——故事型小说。

《金瓶梅》是在前两次小说变革的前提下，完成了由故事型向生活型过渡时代的转化，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故事型小说的一统天下，成为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生活小说。

《金瓶梅》拦腰斩断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浪漫精神传统和英雄主义风尚，改变了拟实小说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拓

原书缺页

《金瓶梅》却从繁复的社会生活图景中，独辟蹊径，以明代中叶社会生活的剧变为背景，描绘出了中国封建制度之将死，资本主义因素已萌芽的一幅时代百态。洋洋百万言小说中，既无铁马金戈的征战场面，亦无运筹帷幄的远虑深谋，有的只是穿衣吃饭、打情骂俏、亲来朋往，吹牛拍马之类的“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的平凡而又琐碎的世俗生活。然而，如明末文学家张岱所说：“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正是通过这些世俗人情的细微的描写，《金瓶梅》才蕴含了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审美意蕴。“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欣欣之《金瓶梅序》）

《金瓶梅》所展现的，是一个世俗生活的大世界：

——全书一百回，复现了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八百余人，复现率最多的人物关系有祖孙、父子、母女、姊妹、兄弟、夫妻、妻妾、翁婿、叔嫂、叔侄、舅姑、姨表、姑表、主仆等等，几乎囊括了中国家庭和亲戚关系的全部对应称谓；

——《金瓶梅》第一次用艺术笔法勾勒了晚明时期的民间百业经营图卷，其人物职业数十百种，除却官吏、衙役、皂隶、尚有船家、轿夫、猎户、卖婆、巫婆、接生婆、布贩、盐贩、银匠、画匠、酒保、医生、优伶、江湖戏子、杂技艺人、道士、和尚、尼姑、教书匠、裁缝、仵作、相面、看风水、卖炊饼、卖馉饳、卖水果、卖枣糕、卖翠花、卖棺材、磨铜镜、开旅店、开当铺、开药铺、开纸张铺、开绸缎铺、代人写状纸、乃至于巢子、乞丐、偷儿、强盗、帮闲、篾片儿、地痞……林林总总，万花筒般砌筑起一座座芸芸众生的画廊。

——《金瓶梅》还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戏剧史料，按种类分，计有院本、教坊杂剧、海盐戏、苏州戏、步戏、门词儿、剧曲清唱、队舞，走马耍解、木偶戏、家乐等。按剧目计，有《中山狼》、《雌木兰》、《韩湘子》、《蓝关记》、《还带记》、《白兔记》、《寄真容》、《玉环记》、《香囊记》、《双宗记》、《邮亭》、《两世姻缘》、《南西厢》、《彩楼记》、《孙华荣杀狗劝夫》、《五鬼闹判》、《张天师着鬼迷》、《钟馗戏小鬼》、《老子过函关》、《六贼闹弥勒》、《雪里梅庄周梦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风》、《洞宾飞剑斩黄龙》、《赵太祖千里送荆娘》等不下三十余种。另外还有各种散曲，计有散套27套，其中收录曲文较全的14套，仅存曲牌或句首的13套，能查到其出处的小令126支，这是前无古人的。

——《金瓶梅》所包含的饮食文化资料也是很丰富的。仅是酒类，便有金华酒、羊羔酒、南酒、葡萄酒、双料茉莉酒、药五香酒、木樨荷花酒、竹叶青、滋阴摔白酒、菊花酒等几十种，所列举的食品，包括主食、菜肴、糕饼、糖食、干果、鲜果，品类名目计有二百余种。仅是现在考证时感到冷僻和陌生的食品，便有百十种，如：馉饳、河漏子、波波、艾窝窝、蒜烧、肉鲊、细鲊、鯗鲊、鰣鲊、木樨银鱼鲊、火熏肉、十香瓜茄、五方豆豉、黄鼠、泡螺、芝麻泉眼儿、蜜润丝环儿、板搭馓子等。便是后来的《红楼梦》，也远不及此。其洋洋大观，足可以编一部厚厚的《金瓶食谱》。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寄意于时俗”，确是《金瓶梅》由故事型转为生活型的第一大特点。“新刻”的评点者张竹坡在批点这部书时，也高度赞

赏了这类“俗人、俗事、俗境”的家庭日常生活描写，一再指出它的妙处在于“偏在没要紧处写照”。通过这些生活细胞的展示，揭示人与人生的种种堂奥，深入细致地显示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的种种本质。

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金瓶梅》中所写的，虽不过是“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井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垒枕席之语，驵验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蚩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形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部《金瓶梅》中，耿介与油滑并存、纯美和滥淫交错，拯世同利己杂陈，人生幻化、发迹变泰，一切人间情态，无不毕现于其中。《金瓶梅》以汪洋恣肆的笔法，独树一帜地从世俗人生角度反映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时代的灾难，入骨三分地写出了其当世的弱国民性，揭示了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的黑暗和窳败。

《金瓶梅》所完成的由故事型小说向生活型小说转化的第一个步骤，即内容的生活化和现实化倾向，是晚明时期文化精神和哲学思想新走向在艺术上的投射。

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加深，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体系也发生了变异，出现了以“心”反“理”的新思潮流派——泰州学派。王艮以“百姓日用之学”为其发轫，对程朱理学的“天理”之道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大大阐发了“心”即人的自然要求、自然欲望的合理性。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符合“天理”的，“人欲”与天理并无矛盾。换言

之，“人欲”亦即“天理”。李贽则把“日用之学”发扬光大，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答邓石阳》），“以身为市者，自当有为之货，固不得以圣人而为市井病”（《续焚书》）的学说。

这种前所未有的肯定人的天然之性的主张，体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要求，对重农抑商的传统儒学思想进行了批判。

在此文化主潮的影响下，《金瓶梅》应运而生。这是小说由故事型转化成生活型的主要动因。

二、空间结构的网络化

北京大学教授马振芳先生说过：生活小说改变了拟实小说处于故事阶段的结构形态。

在《金瓶梅》之前，我国故事型的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主要是板块型的。如《三国演义》，基本上是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故事拼接而成的。这些多个集团争天下的故事，就是一个个情节的单元或曰板块。虽有一些细节描写，比如“青梅煮酒论英雄”，但却淹没在这些板块错动的裂缝之中。

《水浒传》因为是在广泛收集民间故事、话本及戏剧演出的基础上而成书的，其结构也是由“鲁十回”、“武十回”等各个主要英雄人物的传记为一个个板块联接而成，故有大段拼接连缀的痕迹。

因此，郑振铎先生说：“除了《金瓶梅》之外，《水浒》、《西游》都是英雄历险故事，都只是一件百衲衣，分之可为许多短篇，合之——只是以一条线串之。”

《金瓶梅》是文人独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虽然借助了《水浒传》中的故事生发开来，还不能完全摆脱说唱文学的影响。但从其结构布局上，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文人独立创作的特征。

《金瓶梅》虽然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形式，但却没有严格按照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结构来按排章节。

故事型的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常常采用制造悬念的方法，在一个非常紧要的关节上停住，用以吸引读者（或听众），如“欲知××性命如何，且看（或且听）下回分解”。古代阿拉伯的《天方夜谭》也用这样的方式：善讲故事的女郎每当看到太阳升起时，便把一个故事拦腰打住。这种叙述方式在故事型小说中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而《金瓶梅》的结构却为之一改。

《金瓶梅》的词话本（《金瓶梅词话》）虽也用“毕竟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形式，但实际上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悬念。下一回的开篇，亦大多不会去延续上一回的故事，而是另行铺展别的情节。它的章回体只是一种分段的手法，“且听下回分解”更是徒具形式。至于说散本（指《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回末索性全都改为以诗作结或以俗语作结。如“谁人掬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崇祯本第三十回）；“闲来无事倚门楣，恰见惊闺一老来。不独纤微能济物，无缘滴水也难消”（《第一奇书》本五十八回）。这些回末诗或熟语的功用，一是对全回作一哲理性总结，二是作一种概览式的提要。《金瓶梅》章节之间的照应，不在回末，而在故事情节顺理成章的发展之中。这与现代小说的表现

方式，几可争一日之短长了。

故事型小说，为适应讲故事的需要，多采用“一线串珠”的结构框架。而生活型的小说要表现生活的繁复庞杂，用线性结构显然已不能服务于它的艺术大思维。

因此，《金瓶梅》首次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首创了回环型的网络状结构。

《水浒传》的空间处理形式，是以纵向直线式为主，有时也采取纵向双面式的叙写方法。这种方法，多用于表现较为复杂的事件。由于故事头绪繁杂，往往一事多面，作者不可能一笔写到，故采取“话分两头”的形式，说完一面，再说另一面。面与面之间的衔接，虽有先有后，但借助于作者的“交待”，读者读过之后，也能得到事件的各个部分在空间中并存的印象。如第十三回至第十六回，梁中书与蔡夫人商议筹办生辰纲，这是一面，作者交待：“当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话下。不说梁中书收买礼物器玩，选人上京……且说山东济州郡郓城县……”接下去便叙述晁盖等探知押送生辰纲消息并准备劫取之另一面。接下来交待：“话休絮繁。却说北京大明府梁中书……选日差人起程”。于是按下郓城县这边不表，而叙北京杨志沿途押送生辰纲而来。行至黄泥冈，才把这故事的两头合而为一，进入“吴用智取生辰纲”的叙写。

从总体结构上说，《金瓶梅》是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是由细节和细节所表现的现实生活为经纬的。它也有情节，如马振芳先生所言，它的情节，“只是网的纽结与线索”。

这张网以西门庆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层层盘结、幅射，几尽将明季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道德观念、世态人情、风

俗习尚尽收其中。上至皇帝朝廷，下到市井细民，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不触及。这是《金瓶梅》在我国长篇小说艺术结构上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这张多线的网以主人公的商业活动和家庭生活“网开一面”，有西门庆聚殓财富的过程，及其由此而牵扯到的江南一带蓬勃发展的丝织、棉纺及手工业发展的情况。有西门庆贪赃枉法、行贿求官的活动，有西门庆家的妻妾争风吃醋，也有明季末世皇帝和弄臣们靡烂腐朽的生活，以及由于皇帝的昏聩所造成的政治上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经济上的颓危和一切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一张网环环相扣，纲举目张。沉沉浮浮，清晰而不断线。一丝一缕，纤毫不乱。某一条线叙述某一具体事件时，又穿插另一事件于其中，时空交错，波澜迭宕。它不以时间为结构单位，使故事情节直线发展，而在同一时间内，向无限的空间延伸，纵横交错，经纬交织。如武大被潘金莲设圈套害死，潘金莲盼望西门庆迎娶之时，西门庆却又为一笔家财娶了孟玉楼。这中间插入了一个媒婆薛嫂，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得复杂和多层面了。又如第六十五、六十六回，主干线索是李瓶儿丧事。从“首七”到“五七”，吊唁、念经、出殡、守灵、荐亡诸事，忽断忽续，前后时间一月余。其间，穿插其它事情共五件：1、宴请钦差六黄太尉，共分四次穿插；2、收用官哥奶妈如意儿及潘金莲因嫉妒而争风，共穿插两次；3、贲四的女儿长姐出嫁；4、韩道国与西门庆谈店中生意；5、东京相府管家差人给西门庆下书。后三件事，是一次插叙完成，总计一月之间，一笔并写六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张竹坡把这种创作

方法称之为“趁窝和泥”。当代金学家罗德荣先生说：“在趁窝和泥的描写中，做为‘窝子’的具有主干意义的情节线索，是纵向发展的，其起讫在时间上自然构成一个相对封闭式的区间。作者利用事件发展的自然间歇或偶然事件的外部作用，使之分割为似断实连的若干片段，同时在片断与片断之间穿插他人他事。这样，被穿插的情节，也就是所谓‘泥’，无论是一次叙完，或者也分割为或断或续的片断在多次穿插中叙完，就都无法超越主干线索所拥有的时间区间。”（见宁宗一、罗德荣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第三章《金瓶梅的美学意蕴》）

《金瓶梅》的情节结构是非常独特的。或忙笔正写，或闲笔插入，每于剑拔弩张之时，“偏夹叙他事入内”，这种独特的结构手法，使作品有了曲折有致的节奏感，同时亦包容了更大的社会生活容量。如西门庆娶李瓶儿的情节，预设了一条伏线，使李瓶儿先嫁了蒋竹山。西门庆生子加官，众官前来祝贺，车马如云，何等光耀，然而其中偏偏有几位老太监点了几支不合时宜的小曲儿，说了些不吉利的话语，为这件事埋下了注定要到来的噩运的悲剧性伏笔。起到了“伏线千里之前，又流波千里之后”的艺术效果。

回环式结构是《金瓶梅》的首创。这部小说写出了人物和事件之间事事相关的因果关系：西门庆霸占了潘金莲，毒死了武大，勾引了李瓶儿，又气死了花子虚，最后死于潘氏的淫荡。潘金莲逼死了宋惠莲，害死了官哥，也使李瓶儿因气丧生，最后终被武松杀死。

在这回环反复的蛛网式的结构中，人物关系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情节结构互为因果又互为映照，既有高度的现实感，又

使全书脉络贯通，形成了一个横面空间有度、纵向时间有数的高度有机化、艺术化的新格局。

三、人物形象的多元化和立体化

故事型的小说以幻为奇，塑造出的文学形象是鲜明生动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武松、鲁智深、林冲、李逵等艺术形象。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艺术个性的创造已进入了自觉阶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故事型小说的人物，便会发现这些人物更多的具有形象的概括性，虽然鲜明，但比较单一，有类型化的趋势。清代批评家毛宗岗曾把《三国演义》的人物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诸葛亮这样贤相的典型，具有忠、雅、智多种性格特点，和关羽这样忠、勇、节、义的名将典型，以及曹操这样奸雄型的人物，具有“似乎忠”、“似乎顺”、“似乎义”的性格特点。另一种则不具有多种性格特点，只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单向的性格层面，如徐庶、庞统善于斗智，周瑜、司马懿工于用兵、郭嘉、程昱善料人事，马超、黄盖锐勇超群。作家描写这些英雄人物，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的故事背景之中，以非常之事写非常之人。如鲁迅所说：“这些英雄或者奸雄，都永远是示众的人物，而读者是永远的看客。”读者从这些人物形象中，可以感受到力和某种美，但却不会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呼吸，一起思考。

《金瓶梅》完成了由故事型向生活型小说的历史性过渡，其第三个重要标志是人物性格由单元变为多元，由平面转化为立体。它不是根据作者思想的需要随意抽取人物性格的某一两个

特征，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从不同层面展示人物性格的立体化，由简单而走向精微，由外貌而转入内心，使人物性格有更大的涵容量与多变性。

我们不妨把《金瓶梅》从《水浒传》中“借”来的几个人物作个比较。

从《水浒传》中借来的几个人物中，改塑最多的是武松。

《水浒传》中的武松同《金瓶梅》中的武松相比，《水浒传》中的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的好汉。景阳岗打虎，显出了他超乎常人的英雄胆魄；怒斥潘金莲调情，写出了武松清正高洁的人伦品格；告别兄长时的谆谆叮咛，足见武松的手足情深；杀嫂祭兄，又写出武松久贮心中的大恨深仇。《金瓶梅》在这几个方面几乎是照搬了《水浒传》，但《金瓶梅》中的武松已不是《水浒传》中的武松了。《金瓶梅》写出了作为英雄的武松，更写出了作为常人的武松。他没有能够像《水浒传》中那样靠着一身神勇如入无人之境，把一个个坏人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剜了仇人的心肝祭了含冤而死的兄长。《金瓶梅》中武松杀嫂，已没有了那种逼人的豪气，首先，他采用了“色诱”的手段使潘金莲上钩，杀嫂之后，《水浒》中的武松是主动向官府投案，宣称自己“虽死而不怨”。《金瓶梅》写武松杀嫂后，“提了朴刀，逾后墙，赶五更挨出城门，投十字坡张青夫妇那里躲住，做了头陀，上梁山为盗去了。”写出了作为常人的武松性格之真实，这比《水浒传》中的武松，思想与性格上差异颇大。

再说潘金莲。《水浒传》中介绍她的身世说：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作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金瓶梅》则作了脱胎换骨的改写：

这潘金莲，原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因她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长成一十八岁，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尤细尤弯。张大户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厉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

张大户"收用"潘金莲后，添了许多病症，后终被主家婆察觉，将金莲甚是苦打。张大户这才倒赔了房奁，将潘金莲嫁给那位"三寸丁谷树皮"武大，武大不在家时，他便"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

潘金莲嫁给武大后，对这个婚姻十分不满，《金瓶梅》除了抄《水浒传》文字外，增写了一大段潘金莲唱的《山坡羊》：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强化了她对婚姻"相配"的要求。

《金瓶梅》对潘金莲这一形象的改写，首先是改变了她的身世，提高了她的文化素养。王婆说她："这个雌儿来历，虽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会一手好弹唱，针指女工、百家奇曲，双陆象棋，无般不知"。

潘金莲在故事型的《水浒传》中，只是个泼妇的形象，而《金瓶梅》中，却赋于她更丰实的性格内容。她被几次转卖，在精神和肉体上倍受摧残。与武松的调情，实际上是她利用自己的优势（长得漂亮）向自己的命运所进行的第一次抗争。而她付出的代价所得到的却是一场羞辱。西门庆利用她对婚姻的不满诱骗了她，使她的性格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门庆特殊的家庭环境中，她逐渐变得淫荡狠毒，变成了一个嫉妒狂和报复狂。她不顾一切地害人，追求肉体的享乐，最终死于武松设下的圈套。她在制造别人的悲剧的同时，也导演了自己的悲剧。各种私欲的排列组合，构成了她纷纭复杂的精神世界。对潘金莲形象的刻画，很清晰地白描出了人物性格演变的逻辑。

最后谈谈西门庆。

西门庆在《水浒传》中，是个一般的地痞流氓和土豪恶霸，一味渔猎女色的"奸诈小人"，刚出场旋即退场。《金瓶梅》中却成了主角和核心。《金瓶梅》中的西门大郎发迹变泰，成为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商人兼高利贷主。这一艺术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个，也是面貌全新的唯一者。

西门庆的形象，在《金瓶梅》中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官僚和富商两位一体的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和异化。贪得无厌的占有欲

是他性格的主导特征和内在动因。

他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疯狂地占有女人，无所顾忌地贪赃枉法，另一方面，他又仗义疏财，对穷朋友应伯爵、常时节也打得火热。他果断凶狠，但有时又胆怯无能。当他的亲家陈洪被划为杨戬同党，因而有可能株连到他时，吓得“魂魄不知哪里去了”，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寡情霸道，有时却又异常多情。李瓶儿死去，他哭得呼天抢地，死去活来，不能不说动了真情。但就在为李瓶儿守灵的时候，却在灵堂里和奶子如意儿通奸。美与丑、善与恶、灵与肉、理性与感性都统一在他对于财、色、权力的追求和占有上。人性和兽性交织得难解难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在地上的西门庆。

《金瓶梅》从《水浒传》中借来的其他人物，如武大、王婆、何九叔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写，这些人物无一不毕现了多元化的特质和人性深层的动机。

巴尔扎克说：“人物是在他们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正是那样一个时代，才孕育了《金瓶梅》中这样一群畸形的人物。在这群人物身上，无不深深打着时代的烙印。这也是生活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色。

综上所述，《金瓶梅》以冷隽的笔触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沸扬的激情，以现实的描写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浪漫的热情，形成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新类型——生活型。

从小说形态学的意义上研究，《金瓶梅》所完成的这个转变是划时代的。

这个转变，为后来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生活型小说开拓了现实主义的先河。

49

枝是空中的根

——《金瓶梅》与《红楼梦》

《金瓶梅》与《红楼梦》，是明清文学的两座并峙的高峰。这两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同为说部中的大山水。它们在短短二百年内相继出现，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最先道出《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内在联系的，是为《红楼梦》作评语的脂砚斋。他在甲戌本第十三回曾有眉批谓“写个个皆知，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第二十八回“薛蟠说酒令”一段又有眉批谓：“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发（泼）”。第六十六回中焦大骂：“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王八”。脂砚斋批曰：“极奇之文，极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王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王八’，岂不更奇”。从这三条眉批所透出的信息来看，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过程中，是深受了《金瓶梅》的影响的。

后来的批评家，对《金》、《红》之间的关系，多有论述。清人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说："《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者为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据抄本）

清人张其信《红楼梦偶评》也说："此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像而出之。"（据光绪三年宝仁堂刊本）

翻开一部《红楼梦》，随处可以看到《金瓶梅》的影子，故有《红楼梦》乃《金瓶梅》的倒影之说。

这里，我们不作寻章摘句的繁琐对比，仅从其美学风貌、小说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刻划诸方面，作一些比较分析。

一、两部世情文字

《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

《红楼梦》也是一部世情书。

两部书都是通过一个家庭来反映整个社会。

《金瓶梅》写得是一个暴发户的市侩家庭，《红楼梦》写得是一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贵族家庭。

这两部小说都深入而具体地描写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内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写了这个家庭的败落过程。然而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没有孤立地去描写这个家庭，而是以这个家庭为中心，展开了广阔的社会背景，通过一个家庭的兴衰，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

《金瓶梅》的中心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崇祯本“入话”有云：“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这段入话，概括了西门庆这个市侩家庭从“荣”到“枯”的全过程。西门庆从一个破落商人子弟，通过夤缘钻营、奸淫拐骗、投机倒把、放高利贷以至贪赃枉法等种种卑劣手段而发迹，积财至数十万金，官做到掌刑正千户，正当他日高中天、飞黄腾达而不可一世的时候，由于贪淫好色，纵欲过度，遽然暴亡，这个家庭从此一落千丈：“老婆带着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另挦了”。如张竹坡所说，“花开豆爆出来的，复一一烟消火灭了去。”

《红楼梦》中贾府的兴衰，则更具醒世意味。

当年，贾府是何等的辉煌荣耀——“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可是，曾几何时，这个百年望族居然”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其败落之势，可谓摧枯拉朽。

贾府败落的原因，是内里蛀空的结果。贾家子孙，仅是安富尊荣，无人运筹谋划，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已很难维持这个庞大的家庭，更何况一个个腐化堕落，荒淫无耻，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搞得荣、宁二府只有门前那两个石狮子算是干净的。（《金瓶梅》中是连一对干净的石狮子也不曾有过的。）嫡庶、父子、母女、婆媳、兄弟、妯娌、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残害，同室操戈，亲骨肉们“一个个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终于导致了一个家庭的毁灭。

相形之下，《红楼梦》中的贾府比《金瓶梅》中的西门府具有更高的典型性，因为它包含着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时代和社会内容。《红楼梦》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贾府中，凡是封建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都在这里有相应的表现。贾府的大观园，实际上便是封建末世的大观园。贾府的毁灭，因此也便预言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毁灭。

《金瓶梅》写了西门庆一家的同时，也写出了王招宣家、尚举人家的衰落，与之对应。

《红楼梦》写贾府，亦有史、王、薛三大家族作为陪衬。"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是何等的气焰。但好景不长，全都衰落了下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问题总是出在"接班人"的身上。以薛家为例，那个绰号呆霸王的皇商之子薛蟠，实在是胸无点墨、愚蠢至极的一个败家子。"长了这么大，文不文，武不武，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算盘，从没拿过；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他不学无术，把"唐寅"读成"庚黄"，行酒令时把"眼睛急得铜铃一般"，憋了半日，说出来的竟是："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吟诗唱曲，附庸风雅，唱出的却是"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他横行不法，嫖妓女，偷丫头，玩龙阳，下作不堪，为买香菱，打死了冯渊；换酒迟了，将酒保野蛮打死，有这样的不肖子孙，这个家不败才是怪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西门府，是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特殊时期所产生的一个怪胎。贾府，则完全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一个缩影。

《金瓶梅》中，我们看到的全是那个社会的种种丑恶。西门庆的家庭虽然衰落了，但是西门庆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并没有彻底死亡——有一个更像他的张二官接替了他的官职，而他的家产，却由他生前亦步亦趋的奴才玳安（后改名西门安）继承，他们都是这一个阶级的合法继承人，是活着的西门庆。

《红楼梦》中，尽管贾府的长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又出了几个颇有才干的人物，但最终还是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没落。因为这个家庭赖以支撑的那个封建社会，本身已千孔百疮，彻底的腐烂了。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从西门府到贾府，两部世情文字，留给人们多少咀嚼不尽的回味。

二、大乘与小乘

有学者谓：《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

我则认为：《金瓶梅》是“小乘”，《红楼梦》是“大乘”。

所谓“乘”，是梵语的意译，即交通工具之意，系指能将众生从烦恼之此岸载至觉悟之彼岸的教法而言。

“小乘”，为众生说法；

“大乘”，为大智慧者或成为菩萨者说法。

为众生说法，《金瓶梅》将浇漓的世风与人欲的险恶一点不留情面地撕破给众人看，“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一字一句，全都是生命的惩戒。

为大智慧者或成为菩萨者说法，《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

假语村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句一字，全都是情境的寄托。

《金瓶梅》与《红楼梦》全都是在解剖社会，但“前者解剖的是胃肠，后者解剖的是心肝。前者流出的是腐臭的粪便，后者流出的是腥红的血液”（陈景河语，引自作者未刊稿《隐寓手法初探》）。

《金瓶梅》的寓意，自不待言，有张竹坡《寓意说》早已为之张目。笑笑生的朋友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有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盖有谓也。”廿公《金瓶梅》跋则谓：“《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鲁迅先生也认为：“《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而鸣之。”

《金瓶梅》开卷第一回，便开宗明义：“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

《金瓶梅》确是一部“指斥时事”的书，它明作宋朝纪年，实写明代史实。吴晗先生曾考证了书中的“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以及“小令”流行等都是明代万历中期的“时代痕迹”。而当时震动朝野的“册立东宫”事件，在《金瓶梅》中也多有反映。著名“金学”家魏子云先生指出，《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讽谏明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以及册立常洛为太子这一事件的。魏子云先生曾撰《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一文，把《金瓶梅》第一回开头所引的“丈夫只手把吴钩”一词以及接下

去的阐述，喻为“戴在帝王头上的王冠”。因为那一大段文字讲了刘邦、项羽一流帝王如何因女色而祸国的故事，特别是刘邦因宠戚夫人而废嫡立庶，与明神宗宠郑妃而废长立幼非常相似。

黄霖教授还注意到了《金瓶梅》中有个不太起眼的人物——他就是第六十五回出场的山东两司八府中的右布政陈四箴。这个人物在书中无足轻重，但他的名字却寓意着一段非常重要的史实：那便是万历十七年冬，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陈“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箴，直攻明神宗之失。同时，这段史实亦与《金瓶梅》正文之前的“四贪词”分别以“酒”、“色”、“财”、“气”作劝诫相合，《金瓶梅》的政治讽谕，不言自明。

由此看来，《金瓶梅》又何尝不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

《红楼梦》也是一部揭示当代政情的书，它继承了《金瓶梅》讽谕时事的传统并且发扬光大。它的讽谕也更加隐蔽又相当巧妙。作者曹雪芹自称此书“无朝代可考”，“不干涉时事”，只是描写“闺友闺情”。翻开一部《红楼梦》，确确实实扑朔迷离，官制是明、清混淆，服饰是满、汉杂陈，地点则似北似南，都是曲笔，让你无法“对号入座”。并不像《金瓶梅》那样，让人看了蔡京就想到严嵩，看了郑爱月就想到郑妃。

有学者曾指出，在《红楼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贾珍、薛蟠、贾政身上，可以看到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些品行，名曰“分身法”，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但其隐逸的曲笔，却更多引起了寻幽探秘者的注意。

如《红楼梦》的开篇，即写出了一个意味隽永的神话：女

娲补天，炼得五色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独一石没派上用场，遗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块石头很是自我嗟叹，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便苦求将它携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那僧道发了慈悲，将其袖之而去，投胎于贾家，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又回归大荒山。

有学者认为，这块石头，是整部《红楼梦》的钥匙——

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便是谜底。“大荒山”，实指现今的长白山。汉魏时，中原人即称长白山曰大荒山或太皇山，辽金时，长白山始定名。因为长白山是满族的发祥之地，作者将其设置原出于长白山，含义是非常深刻的。三万六千五百块石头俱去补天，只遗一石未用，托生宝玉，落藉京师，其所见所闻所历，揭示了当年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满族贵族，一旦取得了政权，便很快地走向没落。

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再现了满族童贞时期的女神萨满文化，而“风月宝鉴”则是萨满最重要的神具。另外，书中马道婆所施“魇魔法”，实是萨满的巫术活动。

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中大观园，隐写皇家御园——圆明园，贾府的重楼深院隐写故宫。

也有学者认为：元春在太虚幻境的册子上也隐伏天机，那册子上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怎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隐指康、雍移代，康熙死于壬寅（虎）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于癸卯年（兔）继位，正是所谓“虎兔相逢”，这一年元妃死，元妃死而贾家败，意思是清朝到了雍正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些都曾被指斥为“隐寓”派的繁冗考证，未免失诸于偏

颇。

从《红楼梦》中隐逸的曲笔，我们确实看出曹雪芹实在是“深得金瓶壸奥”的。

三、似曾相识的故事架构

说《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是由于《红楼梦》中有许多情节和故事框架，能从《金瓶梅》中找到影子。这些情节，或仿效、或借鉴，或暗合，痕迹宛然，比如：

从《红楼梦》第五回太虚幻境薄命司所藏金陵十二钗的册子，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了《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府妻妾们相面所作的判词。它们都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提纲挈领地写出了书中主人公的命运。

所不同的是，《金瓶梅》中吴神仙“贵贱相人”，那位吴神仙有些“蹦蹦来迟”——故事情节进行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他才出现。那些女人们的基本情况，读者已经熟悉，算不得是“伏笔”。吴神仙把这些妇女悉数“相”过，其中最起作用的是春梅。吴神仙说她“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吴月娘当时颇不以为然，因为春梅毕竟是个丫头，纵使她日后果然做了西门庆的姨太太，生了儿子，日后儿子做了官，凤冠也只该由她这个嫡母来戴，绝对轮不到婢作妾媵的春梅头上。春梅不服，说“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后来果然成了周守备夫人。

而《红楼梦》中那个金陵十二册的册子，则一开始就全然打开，把书中几十位女子勾画出了命运的轮廓。但那些判词全

是谜语，留下了许多悬念，在后来的情节与人物的发展中，一一揭示了金陵十二钗的谜底。在此一方面，《红楼梦》的技巧就高得多了。

《红楼梦》中秦可卿发丧的场面，与《金瓶梅》中李瓶儿出殡的场面，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金瓶梅》中李瓶儿出殡的盛大场面，虽然铺排了大段的骈、散文字，但都是为了显示西门庆家的豪富。《红楼梦》中秦可卿的葬礼，除了反映贾府的势力和气派之外，还暴露了贾府中道德的败坏，暗示了贾珍与秦可卿翁媳之间的暧昧关系，同时，也借这个场面刻画了凤姐的精明强干和争强好胜的性格。

以棺木而论，李瓶儿的棺木，"原是尚举人父亲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时带来，预备他老夫人的。两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这一副。墙磕、底盖、堵头俱全……板是无比的好板"。尚推官家为什么要出让这副寿木呢，办理此事的陈经济说："不是明年上京会试，用这几两银子，便也还舍不得这副板"。商品社会刚刚萌芽，那个诗礼传家的尚举人家便开始中落，而西门庆这个胸无点墨的泼皮，却成了富甲一方的新贵。

《红楼梦》中秦可卿的棺木，亦是"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声如玉石"，是铁网山上出的万年不朽的好板。这棺木也有一番来头——"原系忠义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用。"这里涉及到的，却是政治上的兴衰。故脂砚斋认为这一段描写，是曹雪芹从《金瓶梅》中学得。

再如，《红楼梦》七十七回王夫人赶逐晴雯等丫头，可谓是《金瓶梅》八十五回、八十六回吴月娘发卖春梅、潘金莲的演化；王熙凤计害尤二姐，与潘金莲陷死李瓶儿，原本一脉相承；《红

楼梦》中鲍二家的上吊自杀，与《金瓶梅》中宋惠莲上吊自杀，亦有如影随形之感……

另外，除了一些重要的故事框架，在许多琐屑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方面，《金瓶梅》与《红楼梦》，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金瓶梅》写西门庆家妻妾的服饰，极尽细腻，可作一部明代妇女服装小史来看。太医给李瓶儿开药方，医案足足写了四五百字，严然一篇医学论文；西门庆家大宴小宴，其饮食之丰富，足可以编一部《金瓶食典》；还有书中那些造房、扩院、串亲、迎客、吵骂、斗殴、弄花、斗草等等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虽千头万绪，但意脉连贯，主次分明，布局和谐均衡，这些都对《红楼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红楼梦》在细节描写方面，更是文意隽永，笔触生动。对贾府的饮食、衣履、起居的描写，出神入化，精心提炼。每一个细节的描写，都展示出了故事情节的纵深进展和人物性格的复杂丰富。比起《金瓶梅》来，更加富有典型性和倾向性，更加趋于完美和成熟。

《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不只是表面的形似，《红楼梦》之于《金瓶梅》，也不仅是借鉴和继承，重要之处在于发展与升华，在于对小说审美领域的全新的开拓。

四、青出于蓝的人物形象

在《金瓶梅》之前，中国的长篇小说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多是程式的、单面的。《金瓶梅》的最大成功，便是克服了它以前那些小说对人物形象所惯用的粗线条的描写，使人物的刻画

趋于细腻、生动、传神和高度的性格化。

《金瓶梅》中没有拔树举鼎的英雄，更多的却是庸庸碌碌的“庸众”，在喧嚣的《金瓶梅》世界中，可谓是“庸人如云”。然而，这如云的庸众中却有着无尽的欢乐——“大阴谋的成功，小骗术的胜利，得一笔外财，赚几分巧钱，都能给目光如豆的庸人巨大的欣喜；生男育女、婚丧嫁娶、迎朋会友、走亲串户，都能给生活枯燥的庸人短促的忙碌和忙碌中的兴奋；甚或东家失窃、西邻遭火，聚讼殴斗，杀生害命，也会使庸众们在愤激或平静的啾啾唧唧的议论中获得快慰……多么容易欢欣与陶醉的庸众啊。”（卜键《世风浇漓与生命的惩戒》，原载《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红楼梦》中也有一个纷纷扬扬的庸众世界，但将两部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行止加以比较，便泾渭分明地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如贾琏的淫乱纵欲之于西门庆，凤姐的残忍乖滑之于潘金莲，尤二姐的忍气吞声之于李瓶儿、尤氏的有德无能之于吴月娘，贾雨村的忘恩负义之于吴典恩，等等等等，无不酷肖。但细看起来，《红楼梦》中的人物所包含的容量，要比《金瓶梅》丰满、深厚。

在王熙凤的身上，确实可以看到那个俏口毒心的潘金莲的影子。两个人都一样美艳伶俐，风情万种，也都一样的残忍狠毒，又很有才干。但潘金莲对男人，是“坐家女找皮匠，逢（缝）着的就上”，不管他是女婿、是童仆、还是地痞无赖，都不加选择，而王熙凤却有着自己所恪守的标准，贾瑞打她的主意，她略使小计，便把那个风流浪子置于死地。潘金莲自恃美貌，对西门府中所有的女人都不正眼瞧一下，她像一条疯狗，逮

谁咬谁，树敌颇多，谁妨碍了她，她就不择手段地把谁置于死地，甚至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是一样地尖酸刻薄。但她又心直口快，别人有所顾忌不便明说的事，她会直愣愣给捅出来，因此孟玉楼说她是一个“有口没心的行货子”。而王熙凤则不然，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毒设相思局，害死了贾瑞；弄权铁槛寺，逼死了张金哥和她的未婚夫；巧言将尤二姐骗入大观园，又借刀杀人逼其吞金自尽；因泼醋与贾琏大闹，逼得鲍二家的自缢身亡，真是罪恶累累。但她照顾黛玉这一班小姊妹时，又是那样的机趣横生，诙谐可亲，在贾母、王夫人面前，又那样聪明乖巧，百灵百俐，讨人喜欢。她害死贾瑞、尤二姐的手段，也比潘金莲害死李瓶儿高明得多，不显山又不露水，她一面是蛇蝎，一面是美女，这一形象就比潘金莲鲜明、丰富的多。可以说王熙凤是潘金莲的升华。

王夫人和吴月娘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表面和善，内心险恶。不同的是，贾政是个道学先生，不敢做礼法之外的事，夫妻间未发生龃龉。同时，王夫人对姨娘们和下人极有权威，她骂赵姨娘，赵姨娘连气也不敢出，贾母指派到怡红院的丫头，她不打一声招呼，就凭着性子赶走，在这方面，吴月娘该是自叹弗如的。西门庆是个色狼，见了女人，不分良莠就想弄到手，吴月娘一劝，夫妻就反目，直到西门庆死后，她才得以发挥主母的权威，把潘金莲和春梅发卖了。

尤二姐和李瓶儿，同是性格软弱的女人，她们唯一的希望，也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但都因儿子的死而被逼死。李瓶儿本来是能够保护儿子和她自己的，以她嫁到西门府之前对花子虚、

蒋竹山的狠毒，她完全可以不受潘金莲的陷害，而尤二姐所面对的对手，却是她无力反抗的，所以她的死比李瓶儿的死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但不是依样画葫芦，无论从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真实性还是从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红楼梦》都较《金瓶梅》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五、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

《金瓶梅》与《红楼梦》，反差最大的一点是它们各自呈现的美学风貌。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个具有浓厚市井色彩的社会横断面，它的人物流品很复杂：新贵、达官、显宦、伙计、奴婢、道士、和尚、娼优、媒婆、小贩、相士、揽头、掮客，三教九流，无不俱备，纯是一篇活脱脱的“市井文字”。

《红楼梦》的审美对象则是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人物主要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王公、贵胄，以及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各种人物。因此，《红楼梦》的美学风貌，便完全有别于《金瓶梅》而全用一副诗家笔墨。

《金瓶梅》中复现率最多的事件是经商、谋财、造房、扩院、串亲、迎客、吵骂、斗殴、闲聊、嫖妓、祝寿、听戏、占卜、诵经、婚娶、丧葬等等；

《红楼梦》中复现率最多的事件是：品茗、读曲、听琴、吟诗、结社、谈情、说爱、游览、赏月、葬花、乞梅、观灯等等。

《金瓶梅》中有个“女儿国”，西门庆的妻妾和那些围着他颠倒奉行的婢女、仆妇、妓儿、歌女，也是一样的花团锦簇，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却看不到充满诗意的闺情，更不见心有灵犀的真爱，有的只是争风吃醋，排挤倾轧。她们虽也经常聚在一起唱曲、下棋，但更多的却是骂街、扯谎、打斗、耍心眼等等。

《红楼梦》中也有个“女儿国”，而且是更为庞大的“女儿国”，《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副册、四副册上的女子，有六十多人，加上不在册的女性，共有二百三十七人之多。《红楼梦》着力描写的，是大观园、怡红院里那一群“水做的骨肉”的女儿们。她们的生活，则完全是一种“诗意的居住”。你看：“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栊翠庵茶品梅花雪”、“风雨夕闷制风雨词”、“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题柳絮词”……这些回目，便蕴藉了多少诗的情愫，甚至连悲伤也是那样的美伦美奂：“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淹留。”（林黛玉《唐多令》）

这两者的差异，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有学者作过这样的比较：“盖《金瓶梅》写市井小人，求其通俗，《红楼梦》则为闺阁儿女，求其雅驯，……《金瓶梅》说淫欲而写得真实，《红楼梦》谈情爱而变得空灵”。“《金瓶梅》注重实际，个中人物贪财好色，趋势嗜利之状，不论何时何地，皆能遇到。故社会状

态，如明镜照影，无所逃遁，写得实实在在，颠扑不破；《红楼梦》则不然，其写富贵骄侈，虽恶在人耳目，其主要脚色如宝玉钗黛诸人，完全出于理想，恐欲界之中，千古不易一见，或有其才无其色，或有其人无其遇，不独不能见此面目，直难闻其语言。”（癡云《〈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

《金瓶梅》是市井中人，《红楼梦》是性情中人；《金瓶梅》是人欲横流的物质世界，《红楼梦》是诗情画意的理想之国；一个大俗，一个大雅，但二者都是很真实的。《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包含着极大的理想成分，可是我们不会感到其中的虚假，相反，这些人物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永久的艺术魅力。理想的成分并未使现实主义色彩因此削弱，反之却使作品的现实主义更加焕发出光彩。

对于环境的描写，二书更是雅俗互见。

你看西门庆家的厅堂：

> 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帘，地上下铺狮子滚绣球绒毯，正当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皂色起楞的桌子。桌上安着涤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校椅，两边挂画都是紫竹竿儿绫边玛瑙轴头。正是：鼍皮画鼓振堂庭，乌木春台盛酒器。

再来看西门庆的书房：

> 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珠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

> 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蜓脚一封书大理石心壁画的帮桌儿，桌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手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应伯爵取过一本，揭开观阅，上面写着蔡老爷、蔡大爷、朱太尉、中书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处知县、知府四宅。（三十四回）

这些环境中，处处充满了市井气和铜臭，使西门庆这个暴发户的市侩嘴脸，跃然纸上。西门庆也有个花园，其情调却是“乔风杨柳纵蛾眉，带雨海棠陪嫩脸”，一看便知此乃是个采花大盗的淫乱道场。

而《红楼梦》的景物描写，却处处荡漾着诗的韵致，大观园的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一亭一舍，都是作者心中的万千丘壑，读一读十七回那大段的文字，那精细而又简约的摹写，会一步步把你带入一个如诗如梦的化境。

《红楼梦》写景，并不把正在进行的情节中止下来，或者游离人物的情绪、性格去做静态的描写，而从情节的演进中去点缀渲染，让人物始终感受着环境。大观园的景色是在贾政带领一群清客和儿子去观赏刚刚辟建的这处园子，并题匾额对联时展开的，每个人的品题和对自然景物的感觉都融入了他的经历和性格。潇湘馆的描写也是如此，对这个所在，关于景物的实写只有寥寥几句话：“数楹精舍，有千百竿翠竹庶映”。只是宝

玉所题的一幅对联，道出了潇湘馆的神韵："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此处脂砚斋批道："尚字妙极，不必说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犹字妙，尚绿犹凉四字，便如置身于森森万竿之中"。这样的手法，从古典诗词假借而来，却实在比那些繁冗琐碎的描写要高明得多。

潇湘馆是黛玉住的地方，这里也隐含着一个伤感的神话："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这正象征着黛玉的悲剧性格，黛玉也因此得了"潇湘妃子"的雅号。

《红楼梦》中的许多富有诗意的场景，如芒种饯花，冬闺集艳、品笛感凄清、联诗悲寂寞等，也都体现了"情景交融"，"情与景会"这样的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红楼梦》正是在《金瓶梅》所开拓的路子上，又加以创造性发展，终于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是有扬弃、有选择的，这种扬弃和选择，是成就《红楼梦》这部不朽作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50

《金瓶梅》传播纪年表

1568年（明隆庆二年）～1582年（明万历十年）

笑笑生完成《金瓶梅》（吴晗《〈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

始有抄本流传（见袁宏道《与董思白》）。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

袁宏道写《觞政》自序，再次举出《金瓶梅》，将其同《水浒》一起作为小说中的逸品推賞。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

沈德符同袁小修相遇京邸，谈起"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金瓶梅》）全本"。同时，冯梦龙怂恿刊刻此书（《野获编》）。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此之前拥有抄本者，有徐阶、王世贞、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丘志充、袁中道、谢肇淛、文在兹等人。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

《金瓶梅词话》初刻本问世（《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

1621年—1627年（天启元年——七年）

刻本《新刻绣像金瓶梅》刊行。

1628年—1644年（崇祯元年——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

刻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行。

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

二月，禁淫词小说。《金瓶梅》被禁。

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即彭城张竹坡评本）初刻本刊行。该书有皋鹤堂本、本衙藏版本、在兹堂本、影松轩本、目睹堂本、金阊书业堂本等诸版本。

1707年（清康熙四十七年）

满文译本《金瓶梅》出现，序言中标明系“康熙四十七年

五月谿旦”，该本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全译本。

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

禁淫词小说。毁书销版，违者徒流有差。

1738年（清乾隆三年）

颁《书坊禁例》。《金瓶梅》向干例禁。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

六堂本《新刻金瓶梅奇书前后部》刊行。此为《第一奇书》之大删改本，几失原貌，被视为“伪本”。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

《新刻金瓶梅奇书前后部》由济水太素轩再次刊布。该本现藏于天津市图书馆。

1822年（清道光二年）

《雅调南词秘本绣像金瓶梅》刊行。废闲主人序，佚名著。

1831年—1847年（道光十一年——二十七年）

日本曲亭马琴《新编金瓶梅》出版。

1853年（清咸丰三年）

法国汉学家巴赞（A·P·L·Bazin）译《金瓶梅》片断，题《武松与金莲的故事》，收入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

1856年（清咸丰六年）

5月8日，英国伦敦博物院决定将张竹坡《第一奇书》本收入该院收藏。

1860年（清咸丰十年，日本安政十七年）

日本柳水种清著《金瓶梅曾我赐宝》出版。该书全四编，各上下二册，由一勇斋国芳绘插图，现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1879年（清光绪五年）

德国语言学家，东方语学教授奥尔格·加布伦次（Ceorg Gapelentz）译《金瓶梅》片断，发表在巴黎出版的《Revue Drientleet Améri Caine》杂志10～12月号上，该本系据满文本译出。

1882年—1884年（清光绪八年～十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十七年）

日本松村操译《原本译解金瓶梅》由东京兔屋诚刊印行。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iie De Mornt）节译《金瓶梅》为《金莲》，由巴黎庞蒂埃与法凯尔出版社出版，此书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译出，为欧洲最早之法译本。

1916 年（中华民国五年）

存宝斋出版《绘图真本金瓶梅》铅排本。这是《金瓶梅》的第一个删节本，由蒋敦复于清同治三年据《第一奇书》本删节而成。该书也被视为“伪本”。

1921 年（民国十年）

上海书局石印出版《增图像皋鹤堂奇书全集》，全 100 回，每回首标题“改过劝善新书”。再版线装 2 帙 16 册。

1923 年（民国十二年，日本大正十二年）

日本井上红梅编译《金瓶梅与中国的社会状态》由上海日本堂书店刊出。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金瓶梅》做了精辟论述，开创了中国《金瓶梅》研究的先河。

1925 年（民国十四年，日本大正十四年）

夏金畏、山田秋人合译《全译金瓶梅》由东京光林堂书店、文正书店刊行。

1926 年（民国十五年）

上海卿云图书公司排印《古本金瓶梅》出版，此为《真本

金瓶梅》之缩编本，现流布甚广。1935 年上海三友书局曾再行排印。

1927 年（民国十六年）

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介绍《金瓶梅》，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也对《金瓶梅》作了评介。

同年，英译本《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由纽约“Tne librarg face tious lore”出版，此为节译本，系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译出。

又同年（日本昭和二年）6 月日本米田祐太郎译《绘图玉娇李》由东京支那文献刊行会载出。译文 51 章，截止原文 12 回。

1928 年（民国十七年）

欧阳予倩写出京剧《潘金莲》，剧本发表于《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同年，《金瓶梅》的第一个德文译本由奥托·祁拔（Otto kibat）和阿尔图尔·祁拔（Artur kibat）兄弟二人译出，书名为《金瓶梅》，由戈塔·恩格尔哈德——赖赫出版社（Cotna Euge Cuard Regner Verlag）出版第一卷，亦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译出。

日本出版《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收入《支那情艳丛书》内。

1930 年（民国十九年）

德国汉学家弗朗茨·库恩据张竹坡评本节译的德文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h；cder，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si Men und seinen sechs Frsel·Verlag）出版。出版者为莱比锡岛社（Leipzig Insel-verlag），全书分四十九章，一册（920页），此译本还有1954年版、1955年版、1961年版。1954年以下各版皆由德国威斯巴登岛社出版。

1931年（民国二十年）

《金瓶梅词话》在山西省介休县发现。北京琉璃厂古书装订部孔千里回忆，云：文友堂（旧琉璃厂古书铺）在山西太原有分号，收购山西各县所藏旧书。在民国二十年，于介休县收购到这部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词话》，无图，当时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价八百元。郑振铎、孙楷第、赵万里等先生都来看过，最后给北平图书馆买去了。

这是词话本在国内首次发现。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新刻金瓶梅词话》由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集资，以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100部。原缺第五十二回，第7—8页（第二次影印时，以崇祯本补入缺页）。

同年10月10日，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文章用严谨的史学考证，论述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

并考证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三十年期间的作品，因而作者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

10 月，施蛰存先生校点出版《金瓶梅词话》全本删节本，刊于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国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1936 年（民国三十五年）

2 月，上海中央书店“文学珍本文库”第一集再次刊行施蛰存先生校点《金瓶梅词话》。同年，《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册由中央书店出版。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

日本丹羽文雄译《西门家的人们》由大陆书局出版。

同年，英文百回全译本《金瓶梅》由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译出，书名《金莲》（The Goldon Lotus)。此本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翻译的，译文曾得到老舍先生的指导。由伦敦 G·劳特莱基出版社(London G·Rotledge）出版，共四卷，其中一些段落用拉丁文译出。此译本 1954 年由纽约 Paragon Book Gallerg 出版了修订本。西方研究者认为，此一译本忠实于原作，未作删节，译文较流畅，是一种颇便阅读的译本。

同年，由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转译的英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Chin Ping Mei; The adven-

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由伯纳德·米奥尔（Bernard Miall）翻译，全书也分四十九章，共两卷，863页。出版者系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John·Jane）及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N·Y·G·P·Putnam's Sone）。该译本附有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撰写的导言。此英文节译本曾于1960及1962年再度出版，出版者为纽约卡普利科恩图书公司（Capricorn Books）。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姚灵犀著《瓶外卮言》，由天津书局出版。是为第一部研究《金瓶梅》之专著。书中《金瓶小札》，收有《金瓶梅》中难解词语共1755条，并予注释，以资解读方言俗语之借鉴。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12月，北京艺文书房出版全本《金瓶梅词话》，分装20册。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日本昭和二十二年）

井上红梅译著《西门庆》由东京柳泽书店出版。

1948年—1949年（民国三十七——三十八年，日本昭和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尾坂德司译《全译金瓶梅》由东京东西出版社出版，全书100回，依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译出。

昭和二十三年，泉修一郎译《金瓶梅词话》前十回由

东京美珠书房刊行。

小野忍、千田九一合译《金瓶梅》由东京东方书局刊行，底本用词话本，第 1 册，昭和二十三年（1948）9 月，第 1—10 回；第 2 册，昭和二十三年 11 月，第 11—20 回；第 3 册，昭和二十四年（1949）1 月，第 21—30 回；第 4 册，昭和二十四年 5 月，第 31—40 回。

林房雄译《金瓶梅》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6 月由东京文艺俱乐部社刊行，全书共 23 章。

根据库恩德文节译本转译的法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i ou lafin de lamerveilleuse histoite de Hsi Men avec ses six femmes）由让·皮埃尔·波雷（Jean-Pierre Porret）翻译，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Paris，Guy le Prat）1949 年出版了第一卷，309 页。附有保罗·拉维涅（Paul lavigne）撰写的导言。该书出版后，深受法国读者欢迎，但官方却下令查禁该书，理由是担心西门庆的生活方式会给法国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直到 1979 年，才取消禁令。

日本高泽圭一绘《绘物语金瓶梅》由日本镜书房印行。

1950 年

瑞典文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Cnin Ping Mei Romanen om Hsimen och haus sex fraur）由埃尔塞（Elsie）与哈甘·若莱特（Hǎkan Jollet）合译，于斯德哥尔摩出版。

同年，德文节译本《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Episoden

ausdem leben Hsi Mens und seiner sechs Frauen）由马里奥·舒伯特（Mario Scnubert）译出，由苏黎世W·克拉森出版社（zürich W. Classen）出版，一册，336页，所据底本为张评本，内容约为库恩本的一半。

1951年（日本昭和二十六年）

小野忍·千田九一合译的《全译金瓶梅》由东京三笠书房刊出，收入《世界文学选书》丛书，以词话本为底本。

1954年

香港文光书局排印出版《古本金瓶梅》，精装4册，卷首有明嘉靖三十七年观海道人序，清乾隆四十六年袁枚跋。

1955年

台湾四维书局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

1956年

朝鲜文译本《金瓶梅》由金龙济译出，并由南朝鲜正音社出版，系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的全译本。书名副标题为：《十六世纪中国无名作家小说集》，书后附有插图，回目按张评本简化标题译出，分作五卷。

1957年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新刻金瓶梅词话》，《出版说明》谓："本书影印目的，在供古典小说研究者参考。"

1958年

台湾文友书局排印出版《警世奇书金瓶梅》，分4卷，精装2册，卷首有袁枚跋。

1960年

英译本连环画《中国的堂·璜》出版。译者塞缪尔·巴克(samuel Back)，由拉特兰查尔斯E·塔特尔公司(Rut land Charles E. Tuttle Co)出版。同年，东京塔特尔公司(Tokyo Tuttle Co)亦出版该书。《绘图古本金瓶梅词话》由台北启明书店出版。

1962年

法文《金瓶梅》(Cnin Ping Mei Femmes derriere un Voile)出版。译者约瑟夫—马丹鲍尔(Josepn-Martin Bauer)及赫尔曼·海斯(Hermann Hesse)等，出版者为巴黎卡尔曼—莱维(Calmann-lévy)出版社。全一卷，436頁，根据库恩德文本转译。

1963年

4月，《新刻金瓶梅词话》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出版。该本以慈眼堂藏本"两部配备完整"，分十卷，每卷10回，第6册书末附有《清宫珍宝皕美图》。

1965年

南宫博长篇小说《潘金莲》由台北大风书局出版。

1966年(日本昭和四十一年)

11月,由日本世界翻译研究会译出的《金瓶梅》,在浪速书房《爱的世界文学》中刊出。

1968年(日本昭和四十三年)

砚村谦译全本《金瓶梅》由浪速书房出版。

同年,小野忍、千田九一合译《金瓶梅》刊于东京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卷。

1969年

越南文译本《金瓶梅》(KIM BÌNH MAI)在西贡昭阳出版社(NHĀ ZỦAXVÀ T̀ B ẢN CHIÈU DŬONC)出版。书首冠有"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岁建戊午孟夏"观海道人序,书末附"乾隆四十六年,岁次辛丑季秋月"简斋袁枚跋,因知所据底本,乃中国坊间本《古本金瓶梅》之类的节本。

1971年(日本昭和四十六年)

冈本隆三译《完译金瓶梅》由东京讲谈社出版,全书共分三卷。

1972年(日本昭和四十七年)

驹田信二译《驹田信二的金瓶梅》由东京二见书房出版,该

译文曾连载于《忏悔》周刊。

1973年(日本昭和四十八年)

村上知行译《金瓶梅》由东京角川书店出版。

同年,匈牙利文译本《金瓶梅》(Szèp Asszon yok Egy Gazdag Hàzban Csin Ping Mej)由布达佩斯欧罗巴出版社(Buda pest, Európa köny vkiadó)出版。该书为库恩本的转译,也分49章,但分作两卷,书名副标题《十六世纪中国无名作家小说集》,书后附有托克依·弗伦茨(汉名杜克义—Tökei Ference)撰写的后记。

1974年(日本昭和四十九年)

小野忍、千田九一合译《金瓶梅》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全10册,100回。

《大字足本金瓶梅》由台北文源书局排印出版。

1977年

俄文译本《金瓶梅》(Цветы слиВы взолотои baze, Или ЦЗИНЬ НИН Мэ ЙРоМаН)由马努辛(в·маннухин)译出,此译本根据《金瓶梅词话》百回本译出,(节译),分作两卷,由莫什科文学出版社(М' худоЖ·ЛИт')出版。附有明末木刻本插图。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以《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为题序本书。序中说:"译者马努辛译完此书后就去世了,译文的修改由中国民族学专家、艺术家、中国服装研究者勒·波·瑟切夫(сьIчев)担任。此译本还得到了

日本翻译家小野忍教授的帮助。”

同年，台湾学者刘师古（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由台北石室出版社出版。

1979年

台湾学者魏子云《金瓶梅探源》由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颇大反响。

大陆学者朱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专论《金瓶梅考证》，重提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引起争论。

1980年

徐朔方在该年度第一期《杭州大学学报》撰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提出了《金瓶梅》作者是嘉靖间李开先。

张远芬在《徐州师院学报》上连续发表了《金瓶梅作者新证》等文章，确认《金瓶梅》作者是嘉、隆、万间山东峄县人贾三近。第二个“金学”研究高潮由此而发端。

台湾增你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删节横排本《金瓶梅词话》全3册，卷末附魏子云《金瓶梅故事编年》。

1982年

香港太平书局影印出版《全本金瓶梅词话》，全6册。

1983年

5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全赛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与会学者有美国汉学家韩南、芮效卫、

梅仪慈、浦安迪、史梅蕊、陆大伟，及法译本译者雷威安等。“《金瓶梅》透视”是这次会议的主题词。与会专家广泛一致地以宗教观点来观察这部小说。

同年，为了庆祝库恩的生日，德国英泽尔出版社再版了库恩的《金瓶梅》节译本。该书为两卷本，特精装。同年，前东德的克本豪伊尔出版社也出版了库恩的节译本，第一次把《金瓶梅》当作“爱情冒险小说”出版，并附有风趣的后记。

1985年

4月，在江苏徐州市召开第一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

4月，法译本《金瓶梅》由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安德烈·雷威安教授译出，列入“七叶丛书”出版。该本据《金瓶梅词话》译出，卷首有译者序文，正文每回有崇祯本插图二帧，共200帧，卷末附有详细的注解。

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瓶梅词话》洁本（戴鸿森校本），该本删去了19174字，上下两册，印行10000套，凭购书票供应。

四川省自贡川剧团演出魏明伦编剧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该剧在上海、北京演出后反响十分强烈。

1986年

吉林省京剧团上演8场新编古代京剧《金瓶梅》，该剧曲演潘金莲与陈经济的爱情故事，编剧齐铁雄。

1987年

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该书由王汝梅、于凤树校点，删除10385字。

1988年

4月，文学古籍刊行社据1957年影印本重印《金瓶梅词话》，线装、两函、21册，内部发行。

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1000套，该书四函三十八册，图200帧，供副教授以上教学研究人员参考。

5月，新华通讯社发出古典名著《金瓶梅》将搬上荧屏的消息，40集电视连续剧《金瓶梅》在吉林筹拍。该剧编剧为吉林省京剧团剧作家齐铁雄、符季君，由著名导演陈家林执导。12月，该剧被停拍。

10月，第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召开。

1989年

5月，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临清县举行。

。6月，《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在齐鲁书社出版，会校王汝梅。该本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件批准，为适应学术研究需要而出版的，也是崇祯本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版一字不删的排印本。

同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徐州市召开。

1991年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出版，该本收录于《李渔全集》第十二、十三、十四卷。张兵、顾越点校，黄霖审定，出版单位：浙江古籍出版社，所据底本为日本内阁文库本。有删节。

1992年

6月，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枣庄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7个国家的100多名专家、学者。

四川、河北警方相继破获《金瓶梅》特大盗印案。

1993年

吉林省京剧团、省文化厅再次筹拍40集电视连续剧《金瓶梅》。2月，到北京郊区搭设外景棚。5月，广电部令其停止拍摄，收回准拍证。

1995年

《金瓶梅词话校注》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该书由冯其庸担任顾问，白维国、卜键校注，全四册，一函，有删节，以日本大安本为底本，印量3000套。

本书重要参考书目（含文论）

○论著部分：

·《新刻金瓶梅词话》　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绘图古本金瓶梅词话》台北启明书店1960年排印本。

·《绣像古本通俗小说金瓶梅词话》上海奇文书局本。

·《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首都图书馆藏本。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清康熙乙亥本。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文龙评，北京图书馆藏在兹堂刊本。

·《绘图真本金瓶梅》1916年存宝斋本。

·《古本金瓶梅》1935年上海三友书局本。

·《续金瓶梅》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本。

·《三续金瓶梅》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金瓶梅资料汇编》候忠义　王汝梅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金瓶梅资料续编》周钧韬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金瓶梅资料汇录》黄山书社，1986年9月版。

·《金瓶梅资料汇编》黄霖编，中华书局 1987年3月版。

·《明代金瓶梅史料诠释》魏子云著 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6月版。

·《论金瓶梅》吴晗、郑振铎等著，胡文彬张庆善选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金瓶梅书录》胡文彬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金瓶梅新证》张远芬著 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

·《金瓶梅研究集》杜维沫、刘辉合编，齐鲁书社 1988年1月版。

·《瓶外卮言》姚灵犀著 天津书局1940年8月初版。

·《金瓶梅探原》魏子云著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4月版。

·《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魏子云著 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8月版。

·《金瓶梅劄记》魏子云著，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3年12月版。

·《金瓶梅原貌探索》魏子云著 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3月初版。

·《金瓶梅探索》王汝梅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9月版。

·《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刘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6月版。

·《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徐朔方著 齐鲁书社 1988年1月版。

·《我与金瓶梅》周钧韬 鲁歌主编，成都出版社 1991年7月版。

·《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吴红 胡邦炜著，巴蜀书社 1987年10月版。

·《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黄霖 王国安编译，齐鲁书社 1989年10月版。

·《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徐朔方编选校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

·《金瓶梅素材来源》周钧韬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

·《金瓶梅评注》毛德彪 朱俊亭评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沈天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

◯论文部分：

·《金瓶梅英译志》《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3期，1930年3月10日。

·《金瓶梅在德国》《文艺战斗》第12期，1931年6月1日。

·《金瓶梅法文译文》李辰冬 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25期，1932年4月23日—25日。

·《明代小说与子弟书》傅惜华 北京艺文社1944年刊《艺文杂志》第2卷第10期。

·《金瓶梅的日译和欧译》〔日〕小野忍 台湾《中外文学》第4卷第8期 1976年1月。

·《金瓶梅编年说》魏子云 台湾《中外文学》第8卷第11期，1980年4月。

·《金瓶梅头上的王冠》魏子云，台湾《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2辑，台北联络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6月版。

·《金瓶梅的出世与流传》魏子云 台湾《中华文艺》第20卷第1期，1980年9月。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宁宗一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黄霖《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金瓶梅最早付刻人浅探》李锦山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金瓶梅在国外》王丽娜《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金瓶梅在国外续述》王丽娜《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　1988年1月



后　记

这本书差不多写了整整5年，从1992年夏天开始收集资料、拟定题纲、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和社会问卷调查活动，直到今日——1997年3月26日，总算为800多页的原稿画上了最后一个标点。

这是我所有的习作中最为旷日持久的一部。旷日持久，并不是由于过多的深思熟虑，而是因为我对这个选题始终缺乏自信。今天我终于完成了它，这是师长和朋友们鼓励、鞭策的结果。

1992年6月，我参加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邂逅金学大家魏子云先生，魏老知我有写作《金瓶梅传播史》的设想，非常高兴，再三鼓励我一定要下力气完成这本书。

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师友的帮助，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陈益源博士，留德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李士勋博士，热情、慷慨地提供了海外《金瓶梅》传播方面的资料。山东临清《金瓶梅》学会、徐州中国《金瓶梅》资料馆以及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古籍部的同志也提供了许多便利。剧作家齐铁雄兄长的帮助更让我难以忘怀。发

稿前，因为修改某一章节，齐铁雄老兄用特快专递寄来了我所急需的大量资料。难得的是，我与这位老兄虽书来信往，但至今尚未谋面。如此古道热肠，令我感动。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谭湘大姐和李烁女士一直关注这本书的进程，春节期间，谭湘大姐还专门打来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因为她们的关注，我才下决心闭门两个多月，对全部稿件进行了最后一遍修改和完成未写的章节。没有她们的鞭策，这部书稿的完成将是遥遥无期的。杨晖老师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仔细审读了原稿，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今年的夏天分外炎热，杨晖老师的审读工作是在挥汗如雨中进行的，令我十分感动。文化艺术出版社编审黄克先生是我尊崇的前辈学人，他终审本书时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数千字的审读意见，为最后定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并致谢忱。

涉足金学园地，我是个后来者，才疏学浅，故这本书的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我期待着师友们的批评。

何香久

1997年7年26日沧州醪斋



附 录

《金瓶梅》传播史资料

与董思白

袁宏道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耳。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见《袁宏道集笺校》。董其昌，字思白。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即1596年，时袁宏道在吴县。）

与谢在杭

袁宏道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莫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

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

（见《袁宏道集笺注》卷五十五。谢在杭，名肇淛。此信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在公安作。谢肇淛《小草斋文集》二十四有《金瓶梅跋》云："余于袁中朗得其十三。"是宏道藏本非为全帙。宏道藏本抄自董其昌藏本。）

觞　政

袁宏道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刘炫《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酒谱》、朱翼中《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胡氏《醉乡小略》、皇甫崧《醉乡日月》、侯白《酒律》，诸饮流所著纪传赋诵等为内典。《蒙庄》、《离骚》、《史》、《汉》、《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说》、《颜氏家训》、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据自娱斋刊《山林经济籍》）

附：屠本畯《视履约·酒鉴》跋：

《觞政》、《酒鉴》皆酒人之事，山泽所宜。施于轩冕险矣，行于阛阓左矣，授于高华骇矣。戒慎旃哉！戒慎旃哉！屠田叔跋。

（自娱斋刊本《山林经济籍》）

游居柿录

袁中道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写于万历四十二年，即1614年）

野 获 编

沈德符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

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沈德符，字虎臣，号景倩，浙江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举人，1642年卒，著有《清權堂集》、《万历野获编》。）

味水轩日记

李日华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正月）五日（1615年12月24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浙江嘉兴人，万历进士。）

山林经济籍

屠本畯

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瓮肠。

（屠本畯卒于1622年。）

三遂平妖传序

张无咎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尝辟诸传奇：《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他如《七国》、《两汉》、《两唐宋》，如弋阳劣戏，一味锣鼓了事，效《三国志》而卑者也。《西洋记》，如王巷金家神说谎乞布施，效《西游》而愚者也。至于《续三国志》、《封神演义》等，如病人呓语，一味胡谈。《浪史》、《野史》等，如老淫土娼，见之欲呕，又出诸杂刻之下矣。

王缑山先生每称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堪与《水浒》颉颃。余昔见武林旧刻本，止二十回，开卷即胡员外逢画，突如其来；圣姑姑不知何物，而张鸾、弹子和尚、胡永儿及任、吴、张等，后来全无施设，方诸《水浒》，未免强弩之末。兹刻回数倍前，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始终结构有原有委，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余尤爱其以伪天书之诬，兆真天书之乱，"妖由人兴"，此等语大有关系。即质诸罗公，亦云青出于蓝矣。使缑山获睹之，其叹赏又当何如耶？书已传于泰昌改元之年，子犹宦游，板

毁于火，余重订旧叙而刻之。子犹著作满人间，小说其一斑，而兹刻又特其小说中之一斑云。楚黄张无咎述。

（题张无咎作《平妖传》序有两种。一为《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的序，后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陇西张誉无咎父题”。另一本为墨憨斋手校《平妖传》序，后署“楚黄张无咎述”。两种文字略有异同。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陇西张誉无咎父题”序对《金瓶梅》是否定的：“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账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

陶庵梦忆·不系园

张　岱

甲戌（1634）十月，携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余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语。……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四川剑州人，后迁居浙江山阴。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约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以后。《陶庵梦忆》是其晚年著作。）

天爵堂文集笔余

薛 冈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所宜焚者，不独《金瓶梅》，《四书笑》、《浪史》当与同作坑灰，李氏诸书存而不论。

（《天爵堂文集笔余》卷二，据天启年间薛三省、李维桢、米万钟序刻本。）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张竹坡

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

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其寓意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情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至于以悌字起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恻测，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学风影等辈，借端恐谎，意在骗诈。夫现今通行发卖原未[本]禁示[止]，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夫邪说当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劈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若不预先辨明，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是用抒诚以告仁人君子，其予量之。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张竹坡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一

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齐说出，是大关键处。二

先是吴神仙，总览其盛；便是黄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净师，一洗其业，是此书大照应处。三

冰鉴定终身，是一番结束，然独遗陈敬济。嘻笑卜龟儿，又遗潘金莲；然金莲即从其自己口中补出，是故亦不遗金莲，当独遗西门庆与春梅耳。两番瓶儿托梦，盖又单补西门；而叶头陀相面，才为敬济一番结束也。四

未出金莲，先出瓶儿；既娶金莲，方出春梅；未娶金莲，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儿，又先出敬济。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夹写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诸人，又极尽天工之巧矣。五

会看《金瓶》者，看下半部。亦惟会看者，单看上半部，如生子加官时，唱韩湘子寻叔，叹浮生犹如一梦等，不可枚举，细

玩方知。六

《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莲有事生气，必用玉楼在旁，百遍皆然，一丝不易，是其章法老处。他如西门，到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后数十回大章法。七

《金瓶》一百回，到地俱是两对章法，合其目为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后两事，中有一语过节；又有前后两事，暗中一笋过下，如第一回用元坛的虎是也；又有两事两段写者，写了前一事半段，即写后一事半段，再完前半段，再完后半段者；有二事而参伍错综写者；有夹入他事写者。总之，以目中二事为条干，逐回细玩即知。八

《金瓶》一回两事作对，固矣，却又有两回作遥对者，如金莲琵琶，瓶儿象棋作一对，偷壶偷金作一对等，又不可枚举。九

前半处处冷，令人不耐看；后半处处热，而人又看不出。前半冷，当在写最热处玩之即知；后半热，看孟玉楼上坟，放笔描清明春色便知。十

内中有最没正经，没要紧的一人，却是最有结果的人，如韩爱姐是也。一部中诸妇人，何可胜数，乃独以爱姐守志结，何哉？作者盖有深意存于其间矣。言爱姐之母为娼，而爱姐自东京归，亦曾迎人献笑，乃一留心敬济，之死靡他，以视瓶儿之于子虚，春梅之于守备，二人固当惭死。若金莲之遇西门，亦可如爱姐之逢敬济，乃一之于琴童，再之于敬济，且下及王潮儿，何其比回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将爱姐作结，以惭诸妇。且言爱姐以娼女回头，还堪守节，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过悔非，一竟丧廉寡耻，于死路而不返哉！十一

读《金瓶》须看其大间架处，其大间架处，则分金、梅在一处，分瓶儿在一处；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处。金、梅合而瓶儿孤，前院近而金、瓶妒，月娘远而敬济得以下手也。十二

读《金瓶》须看其入笋处，如玉皇庙讲笑话，插入打虎；请子虚，即插入后院紧邻；六回金莲才热，即借嘲骂处，插入玉楼；借问伯爵连日那里，即插入桂姐；借盖卷棚，即插入敬济；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儿；借翡翠轩，插入瓶儿生子；借梵僧药，插入瓶儿受病；借碧霞宫，插入普净；借上坟，插入李衙内；借拿皮袄，插入玳安、小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其用笔不露痕迹处也。其所以不露痕迹处，总之善用曲笔逆笔，不肯另起头绪用直笔顺笔也。夫此书头绪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数也。我执笔时，亦必想用曲笔逆笔，但不能如他曲得无迹，逆得不觉耳，此所以妙也。十三

《金瓶》有节节露破绽处，如窗内淫声，和尚偏听见；私琴童，雪娥偏知道；而裙带葫芦，更属险事；墙头密约，金莲偏看见；蕙莲偷期，金莲偏撞着；翡翠轩，自谓打听瓶儿，葡萄架早已照入铁棍；才受贿，即动大巡之怒；才乞恩，便有平安之谗；调婿后，西门偏就摸着；烧阴户，胡秀偏就看见，诸如此类，又不可胜数。总之，用险笔以写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既已露破，乃一语即解，绝不费力累赘，此所以为化笔也。十四

《金瓶》有特特起一事、生一人，而来既无端，去亦无谓，如书童是也。不知作者，盖几许经营，而始有书童之一人也。其描写西门淫荡，并及外宠，不必说矣。不知作者，盖因一人之出门而方写此书童也。何以言之？瓶儿与月娘，始疏而终亲；金莲与月娘，始亲而终疏；虽故因逐来昭，解来旺起衅，而未必

至撒泼一番之甚也。夫竟至撒泼一番者，有玉箫不惜将月娘底里之言罄尽告之也。玉箫何以告之？曰有三章约在也。三章何以肯受？有书童一节故也。夫玉箫、书童不便突起炉灶，故写藏壶搆衅于前也。然则遥遥写来，必欲其撒泼，何为也哉？必得如此，方于出门时，月娘毫无怜惜，一弃不顾，而金莲乃一败涂地也。谁谓《金瓶》内，有一无谓之笔墨也哉！十五

《金瓶》内正经写六个妇人，而其实只写得四个：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是也。然月娘则以大纲，故写之。玉楼虽写，则全以高才被屈，满肚牢骚，故又另出一机轴写之。然则以不得不写，写月娘；以不肯一样写，写玉楼；是全非正写也。其正写者，惟瓶儿、金莲。然而写瓶儿，又每以不言写之。夫以不言写之，是以不写处写之。以不写处写之，是其写处单在金莲也。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吁！文人之笔，可惧哉！十六

《金瓶》内，有两个人为特特用意写之，其结果，亦皆可观，如春梅与玳安儿是也。于同作丫环时，必用几遍笔墨描写春梅心高志大，气象不同。于众小厮内，必用层层笔墨，描写玳安色色可人。后文春梅作夫人，玳安作员外。作者必欲其如此，何哉？见得一部炎凉书中翻案故也。何则？只知眼前作婢，不知即他日之夫人；只知眼前作仆，不知即他年之员外。不特他人转眼奉承，即月娘且转而以上宾待之，末路依之。然则人之眼边前炎凉，诚何益哉。此是作者特特为人下砧砭也。因要他于污泥中，为后文翻案，故不得不先为之抬高身份也。十七

李娇儿、孙雪娥，要此二人何哉？写一李娇儿见其未遇金莲、瓶儿时，早已嘲风弄月，迎宾卖俏。许多不肖事，种种可

杀。是写金莲、瓶儿，乃实写西门之恶。写李娇儿，又虚写西门之恶。写出来的，既已如此，未写出来的时，又不知何许恶端不可问之事于从前也。作者何其深恶西门之如是。至孙雪娥出身微贱，分不过通房，何其必劳一番笔墨写之哉？此又作者菩萨心也。夫以西门庆之恶，不写其妻作倡，何以报恶人？然既立意另一花样写月娘，断断不忍写月娘至于此也。玉楼本是无辜受毒，何忍更令其顶缸受报？李娇儿本是娼家，瓶儿更欲用之孽报于西门生前。而金莲更自有冤家债主在，且使之为娼，于西门何损，于金莲似甚有益，乐此不苦，又何以言报也。故用写雪娥以至于为娼，以总张西门之报，且暗结宋蕙莲一段公案。至于张胜、敬济后事，则又情因文生，随手收拾，不然：雪娥为娼，何以结果哉！十八

又娇儿色中之财，看其在家管库、临去拐财可见。王六儿财中之色，看其与西门交合时，必云做买卖，骗丫头房子，说合苗青，总是借色起端也。十九

书内必写蕙莲，所以深潘金莲之恶于无尽也，所以为后文妒瓶儿时，小试行道之端也。何则？蕙莲才蒙爱，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唤猫，金莲睃见也。使春梅送火山洞，何异教西门早娶瓶儿，愿权在一块住也。蕙莲跪求，便尔舒心，且许多牢笼关锁，何异瓶儿来时，乘醉说一跳板走的话也。两舌雪娥，使激蕙莲，何异对月娘说瓶儿是非之处也。卒之来旺几死而未死，蕙莲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莲为之也。作者特特于瓶儿进门，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儿也。而瓶儿不悟，且亲密之，宜乎其祸不旋踵，后车终覆也。此深著金莲之恶。吾故曰：其小试行道之端，盖作者为不知远害者写一样子。若随手看去，便说西门庆

又刮上一家人媳妇子矣。夫西门庆，杀夫夺妻，取其财，庇杀主之奴，卖朝廷之法，岂必于此特特撰此一事，以增其罪案哉！然则看官每为作者瞒过了也。二十

后又写如意儿何故哉？又作者明白奈何金莲，见其死蕙莲死瓶儿之均属无益也。何则？蕙莲才死，金莲可一快，然而官哥生，瓶儿宠矣。及官哥死瓶儿亦死，金莲又一大快。然而如意口脂，又从灵座生香，丢掉一个又来一个。金莲虽善固宠巧于制人，于此能不技穷袖手，其奈之何。故作者写如意儿全为金莲写，亦全为蕙莲、瓶儿愤也。二十一

然则写桂姐、银儿、月儿诸妓，何哉？此则总写西门无厌，又见其为浮薄立品，市井为习。而于中写桂姐特犯金莲，写银姐特犯瓶儿，又见金、瓶二人，其气味声息，已全通娼家。虽未身为倚门之人，而淫心乱行实臭味相投，彼娼妇犹步后尘矣。其写月儿，则另用香温玉软之笔，见西门一味粗鄙，虽章台春色，犹不能细心领略，故写月儿，又反衬西门也。二十二

写王六儿、贲四嫂以及林太太，何哉？曰：王六儿、贲四嫂、林太太三人是三样写法，三种意思。写王六儿者，专为财能致色一着做出来。你看西门在日，王六儿何等趋承，乃一旦拐财远遁，故知西门于六儿，借财图色，而王六儿亦借色求财。故西门死必自王六儿家来，究竟财色两空。王六儿遇何官人，究竟借色求财。甚矣，色可以动人，尤未如财之通行无阻，人人皆爱也。然则写六儿，又似单讲财，故竟结入一百回内。至于贲四嫂却为玳安写，盖言西门只知贪滥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而窃玉成婚，已伏线于此矣。若云陪写王六儿，犹是浅看。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用心，

有何千万愤懑而于潘金莲发之，不但杀之割之，而并其出身之处，教习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畅也。何则？王招宣府内，固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今看其一腔机诈，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吾知其自二三岁时，未必便如此淫荡也。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敦礼义，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而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扬威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情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且教其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其待小使女如此，则其仪型妻子可知矣。宜乎三官之不肖荒淫，林氏之荡闲踰矩也，招宣实教之，夫复何尤。然则招宣教一金莲，以遗害无穷，身受其害者，前有武大，后有西门，而林氏为招宣还报，固其宜也。吾故曰：作者盖深恶金莲，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故写林太太也。然则，张大户亦成金莲之恶者，何以不写？曰：张二官顶补西门千户之缺，而伯爵走动说娶娇儿，俨然又一西门，其受报亦必又有不可尽言者。则其不着墨处又有无限烟波，直欲又藏一部大书于无笔处也。此所谓笔不到而意到者。二十三

《金瓶》写月娘，人人谓西门氏亏此一人内助，不知作者写月娘之罪纯以隐笔，而人不知也。何则？良人者妻之所仰望而终身者也。若其夫千金买妾，为宗嗣计；而月娘百依百顺，此诚《关雎》之雅，千古贤妇人也。若西门庆杀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盗贼之行也。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违其间，视为路人，休戚不相关，而且自以好好先生为贤，其为心尚可问哉！至其于陈敬济，则作者已大书特书月娘引贼入室之罪，可胜言哉！至后识破奸情，不知所为分处之计，乃

白日关门，便为处此已毕。后之逐敬济，送大姐，请春姐，皆随风弄柁，毫无成见。而听尼宣卷，胡乱烧香，全非妇女所宜。而后知不甚读书四字，误尽西门一生，且误尽月娘一生也。何则？使西门守礼，便能以礼刑其妻，今只为西门不读书，所以月娘虽有为善之资，而亦流于不知大礼。即其家常举动全无举案之风，而徒多眉眼之处，盖写月娘为一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人也。夫知学好矣，而不知礼，犹足遗害无穷，使敬济之恶归罪于己，况不学好者乎！然则，敬济之罪，月娘成之；月娘之罪，西门刑于之过也。二十四

文章有加一倍写法，此书则善于加倍写也。如写西门之热，更写蔡、宋二御史，更写六黄太尉，更写蔡太师，更写朝房，此加一倍热也。如写西门之冷，则更写一敬济在冷铺中，更写蔡太师充军，更写徽钦北狩，真是加一倍冷。要之加一倍热，更欲写如西门之热者何限，而西门独倚财肆恶；加一倍冷者，正欲写如西门之冷者何穷，而西门乃不早见几也。二十五

写月娘必写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开讲，早已劝人六根清净，吾知其必以空结此财色二字也。夫空字作结，必为僧乃可。夫西门不死，必不回头，而西门既死，又谁为僧？使月娘于西门一死，不顾家业，即削发入山，亦何与于西门说法？今必仍令西门自己受持方可。夫西门已死，则奈何？作者几许痴瞒，乃以孝哥儿生于西门死之一刻，卒欲令其回头受我度脱，总以圣贤心发菩萨愿，欲天下无终讳过之人，人无不改之过也。夫人之既死，犹望其改过于来生。然则，作者之待西门，何其忠厚慨恻，而劝勉于天下后世之人，何其殷殷不已也。是故既有此段大结束在胸中，若突然于后文生出一普净师，幻

化了去，无头无绪，一者落寻常窠臼，二者笔墨则脱落痕迹矣，故必先写月娘好佛，一路尸尸闪闪，如草蛇灰线。后又特笔出碧霞宫，方转到雪洞，而又只一影普师，迟至十年，方才复收到永福寺。且于幻影中，将一部中有名人物，花开豆爆出来的，复一一烟消火灭了去。盖生离死别，各人传中，皆自有结，此方是一总大结束。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针万线，又尽幻化了，还之于太虚也。然则，写月娘好佛，岂泛泛然为吃斋村妇，闲写家常哉？此部书总妙在千里伏脉，不肯作易安之笔，没笋之物也，是故妙绝群书。二十六

又月娘好佛内，便隐三个姑子，许多隐谋诡计，教唆他烧夜香，吃药安胎，无所不为，则写好佛又写月娘之隐恶也，不可不知。二十七

内中独写玉楼有结果，何也？盖劝瓶儿、金莲二妇也。言不幸所天不寿，自己虽不能守，亦且静处金闺，令媒妁说合事成。虽不免扇坟之诮，然犹是孀妇常情，及嫁而纨扇多悲，亦须宽心忍耐，安于数命，此玉楼俏心肠高诸妇一着。春梅一味托大，玉楼一味胆小，故后日成就，春梅必竟有失身受嗜欲之危，而玉楼则一劳而永逸也。二十八

陈敬济严州一事，岂不蛇足矣？不知作者一笔而三用也，一者为敬济堕落入冷铺作因，二者为大姐一死伏线，三者欲结玉楼实实遇李公子，为百年知己，可偿在西门家三四年之恨也。何以见之？玉楼不为敬济所动，固是心焉李氏。而李公子宁死不舍，天下有宁死不舍之情，非知己之情也哉！可必其无白头吟也。观玉楼之风韵嫣然，实是第一个美人，而西门乃独于一滥觞之金莲厚。故写一玉楼，明明说西门为市井之徒，知好淫而

且不知好色也。二十九

玉楼来西门家，合婚过礼，以视偷娶迎奸赴会，何啻天壤。其吉凶气象已自不同。其嫁李衙内，则依然合婚，行茶过礼，月娘送亲。以视老鸨争论，夜随来旺，王婆领出，不垂别泪，其明晦气象，又自不同。故知作者，特特写此一位真正美人，为西门庆不知风雅定案也。三十

金莲与瓶儿，进门皆受辱．独玉楼自始至终，无一褒贬。噫，亦有心人哉！三十一

西门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三十二

狮子街，乃武松报仇之地，西门几死其处。曾不数日，而子虚又受其害。西门徜徉来往，俟后王六儿，偏又为之移居此地。赏灯偏令金莲两遍身历其处，写小人托大忘患，嗜恶不悔，一笔都尽。三十三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三十四

每见批此书者，必贬他书，以褒此书，不知文章乃公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此文之妙者而评之，而彼之妙，固不掩此文之妙者也。即我自作一文，亦不得谓我之文

出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不得谓天下更无妙文妙于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文，即若据为己有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其用心偏私狭隘，决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何能批人之好文哉！吾所谓《史记》易于《金瓶》，盖谓《史记》分做，而《金瓶》合做，既使龙门复生，亦必不谓予左袒《金瓶》，而予亦并非谓《史记》反不妙于《金瓶》，然而《金瓶》却全得《史记》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只赏其文之妙，何暇论其人之为古人，为后古之人而代彼争论，代彼谦让也哉！三十五

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没搭撒，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概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只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近见七才子书，满纸王四，虽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则谓何不留此闲工，多曲折于其文之起尽也哉！偶记于此，以白当世。三十六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亦有时日也。开口之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月

某日某某人，某日是其节令，齐齐整整挨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账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挨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三十七

一百回是一回，必须放开眼光作一回读，乃知其起尽处。三十八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创成。人想其创造之时，何以至于创成，便知其内许多起尽，费许多经营，许多穿插裁剪也。三十九

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四十

看《金瓶》，将来当他的文章看，犹须被他瞒过；必把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方不被他瞒过。四十一

将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是矣。然又不如将他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我先将心与之曲折算出，夫而后谓之不能瞒我，方是不能瞒我也。四十二

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四十三

《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如正未娶金莲，先

插娶孟玉楼。娶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瓶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如武松问傅伙计西门庆的话，百忙里说出“二两一月”等文，则又临时用轻笔讨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四十四

《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自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媒婆。写一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四十五

《金瓶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作一钝笔，于瓶儿不作一深笔，于春梅纯用傲笔，于敬济不作一韵笔，于大姐不作一秀笔，于伯爵不作一呆笔，于玳安儿不着一蠢笔，此所以各各皆到也。四十六

《金瓶梅》起头，放过一男一女，结末又放去一男一女，如卜志道、卓丢儿，是起头放过者；锦云与李安是结末放去者。夫起头放过去，乃云卜志道，是花子虚的署缺者，不肯直出子虚，又不肯明明于十个中只写九个，单留一个缺，去寻子虚顶补，故先着一人，随手去之，以出其缺，而便于出子虚。且于出子虚时，随手出瓶儿也。不然，先出子虚于十人之中，则将出瓶儿

时又费笔墨，故卜志道虽为子虚出缺，又为瓶儿做楔子也。既云做楔子，又何有顾忌命名之义，而又必用一名，则只云不知道可耳，故云卜志道。至于丢儿，则又玉楼之署缺者。夫未娶玉楼，先娶此人，既娶玉楼，即丢开此人。岂如李瓶儿今日守灵，明朝烧纸，丫环奶子相伴空房，且一番两番托梦也。是诚丢开脑后之人，故云丢儿也。是其起头放过者，皆意在放过那人去，放入这人来也。至其结末放去者，曰楚云者，盖为西门家中彩云易散作一影子，又见得美色无穷，人生有限，死到头来，虽有西子、王嫱，于我何涉。则又作者特特为起讲数语作证也。至于李安，则又与韩爱姐同意，而又为作者十二分满许之笔。写一孝子正人义士，以作中流砥柱也。何则？一部书中，上自蔡太师，下至侯林儿等辈，何止百有余人，并无一个好人，非迎奸卖俏之人，即附势趋炎之辈，使无李安一孝子，不几使良心种子灭绝乎？看其写李安母子相依，其一篇话头，真见得守身如玉，不敢毁伤发肤之孝子，以视西门、敬济辈，真狗猪不如之人也。然则，末节放过去的两人，又放不过众人，故特特放过此二人以深省后人也。四十七

写花子虚，即于开首十人中，何以不便出瓶儿哉？夫作者于提笔时，固先有一瓶儿在其意中也。先有一瓶儿在其意中，其后如何偷期，如何迎奸，如何另嫁竹山，如何转嫁西门，其着数俱已算就，然后想到其夫，当令何名，夫不过令其应名而已。则将来虽有如无，故名之曰子虚。瓶本为花而有，故即姓花，忽然于出笔时，乃想叙西门氏正传也。于叙西门传中，不出瓶儿，何以入此公案。特叙瓶儿，则叙西门起头时，何以说隔壁一家，姓花名某，其妻姓李名某也？此无头绪之笔，必不能入也。然

则，俟金莲进门，再叙何如？夫他小说，便有一件件叙去，另起头绪于中，惟《金瓶梅》纯是太史公笔法。夫龙门文字中，岂有于一篇特特着意写之人，且十分有八分写此人之人。而于开卷第一回中，不总出枢纽，如衣之领，如花之蒂，而谓之太史公之文哉！近人作一本传奇，于起头数折，亦必将有名人数点到。况《金瓶梅》为海内奇书哉！然则，作者又不能自已，另出头绪说，势必借结弟兄时入花子虚也。夫使无伯爵一班人，先与西门打热，则弟兄又何由而结？使写子虚，亦在十人数内，终朝相见，则于第一回中，西门与伯爵会时，子虚系你知我见之人，何以开口便提起他家二嫂？既提起二嫂，何以忽说与咱院子只隔一墙，而二嫂又何如好也哉？故用写子虚为会外之人，今日拉其入会，而因其邻墙，乃用西门数语，则瓶儿已出邻墙已明不言之表。子虚一家皆跃然纸上。因又算到，不用卜志道之死，又何因想起拉子虚入会，作者纯以神工鬼斧之笔行文，故曲曲折折，只令看者迷目，而不令其窥彼金针之一度，吾故曰：纯是龙门文字。每于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为之出入其起尽，何异入五岳三岛，尽览奇胜，我心乐此，不为疲也。四十八

《金瓶》内，即一笑谈，一小曲，皆因时致宜，或直出本回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当于其下，另自分注也。四十九

《金瓶梅》一书于作文之法，无所不备，一时亦难细说，当各于本回前著明之。五十

《金瓶梅》说淫话，只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只一见。而春梅则惟于点染处描写之，何也？写月娘，惟扫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丑西门也。写玉楼，惟于

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楼之屈，而亦以丑西门也。是皆非写其淫荡之本意也。至于春梅，欲留之为炎凉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份，而只用影写也。至百般无耻，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儿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莲、六儿口中出之。其难堪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门，见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故王六儿、潘金莲，有日一齐动手，西门死矣。此作者之深意也。至于瓶儿虽能忍耐，乃自讨苦吃，不关人事，而气死子虚，迎奸转嫁，亦去金莲不远，故亦不妨为之弛张丑态。但瓶儿弱而金莲狠，故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其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若蕙莲、如意辈，有何品行，故不妨唐突。而王招宣府内林太太者，我固云为金莲波及，则欲报应之人，又何妨唐突哉！五十一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五十二

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五十三

做《金瓶梅》之人，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彼必能又出手眼，摹神肖影，追魂取魄，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我何以知之？我于其摹写奸夫淫妇知之。五十四

今有和尚读《金瓶》，人必叱之，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不知真正和尚，方许他读《金瓶梅》。五十五

今有读书者看《金瓶》，无论其父母师傅禁止之，即其自己，亦不敢对人读。不知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读者，乃真正看淫书也。五十六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脱，色色皆到，不然，正难梦见。五十七

作《金瓶》者必能转身，证菩萨果，盖其立言处，纯是麟角凤嘴文字故也。五十八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五十九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六十

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则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六十一

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六十二

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故曰：得天道也。六十三

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六十四

读《金瓶》当看其脱卸处。子弟看其脱卸处，必能自出手眼，作过节文字也。六十五

读《金瓶》当看其避难处。子弟看其避难就易处，必能放重笔，拿轻笔，异样使乖脱滑乜。六十六

读《金瓶》当看其手闲事忙处。子弟会得，便许作繁衍文字也。六十七

读《金瓶》当看其穿插处。子弟会得，便许他作花团锦簇、五色迷人的文字也。六十八

读《金瓶》当看其结穴发脉、关锁照应处，子弟会得，才许他读《左》、《国》、《庄》、《骚》、《史》、《子》也。六十九

读《金瓶》当知其用意处。夫会得其处处所以用意处，方许他读《金瓶梅》，方许他自言读文字也。七十

幼年在馆中读文，见窗友为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字想来，不曾教你囫囵吞。"予时尚幼，旁听此言，即深自儆省，于念文时，即一字一字，作昆腔曲，拖长声调，转数四念之，而心中必将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一字方罢，犹记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如此不三日，先生出会课题，乃"君子矜而不争"，予自觉做时，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惊，以为抄写他人，"不然，何进益之速？"予亦不能白。后先生留心验予动静，见予念文，以头伏桌，一手指文，一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顾同窗辈曰："尔辈不若也。"今本不通，然思读书之法，断不可成片念过去。岂但读文，即如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去，便味如嚼蜡，只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夫不看其妙文，然则只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揶揄。七十一

读《金瓶》必静坐三月方可，否则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七十二

才不高由于心粗，心粗由于气浮，心粗则气浮，气愈浮则心愈粗，岂但做不出好文，并亦看不出好文。遇此等人，切不

可将《金瓶梅》与他读。七十三

夫读《金瓶梅》，而文字如是，既读《金瓶梅》，而文字犹如是，此人直须焚其笔砚，扶犁耕田，为大快活，不必再来弄笔砚自讨苦吃也。七十四

做书者，是诚才子矣。然到底是菩萨学问，不是圣贤学问，盖其专教人空也。若再进一步，到不空的所在，其书便不是这样做也。七十五

《金瓶》以空结，看来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结便知。然则所云幻化，乃是以孝化百恶耳。七十六

《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七十七

《金瓶梅》是部改过的书，观其以爱姐结便知，盖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七十八

《金瓶梅》究竟是大彻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将僧尼之不肖处一一写出，此方是真正菩萨，真正彻悟。七十九

《金瓶梅》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八十

《金瓶》必不可使不会做文的人读。夫不会做文字人读，真有如俗云：读了《金瓶梅》也。会做文字的人，读《金瓶》，纯是读《史记》。八十一

《金瓶梅》切不可令妇人看见，世有销金帐底，浅斟低唱之下，念一回于妻妾听者，多多矣。不知男子中尚少知劝戒观感之人，彼女子中能观感者几人哉！少有效法，奈何奈何！至于其文法笔法又非女子中所能学，亦不必学。即有精通书史者，则当以《左》、《国》、《风》、《雅》、经史与之读也。然则《金瓶

梅》，是不可看之书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误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为不可不看之妙文，特为妇人必不可看之书，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过也。然则男子中，少知看书者，谁不看《金瓶梅》。看之而喜者，则《金瓶梅》惧焉，惧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也。如是则《金瓶梅》误人矣。究之非《金瓶》误之，人自误之耳。看之而怪者，则《金瓶梅》悲焉，悲其本不予人以可怪，而人想怪其描写淫逸处也。如是则人误《金瓶》矣。究之非人误之，亦非《金瓶》误之，乃西门庆误之耳。何为《金瓶》误人？不善读书人，粗心浮气，与之经史不能下咽，偏喜读《金瓶梅》，且最不喜读下半本《金瓶梅》，是误人者，《金瓶梅》也。何为人自误之？夫对人说贼，原以示戒，乃听者反因学做贼之术，是非说贼者之过也。彼听说贼者，本自为贼耳，故《金瓶梅》不任受过。何以谓人误《金瓶》?《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今只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虽本自娱，实亦欲娱千百世之锦绣才子者，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何以谓西门庆误《金瓶》？使看官不作西门的事读，全以我此日文心，逆取他当日的妙笔，则胜如读一部《史记》，乃无如开卷，便只知看西门庆如何如何，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是故谓之西门庆误《金瓶梅》。然则仍依旧看官误看了西门庆的《金瓶梅》，不知为作者的《金瓶》也。常见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门之大账簿。其两眼无珠，可发一笑。夫伊于甚年月日，见作者雇工于西门庆家写账簿哉？更

有读至敬济弄一得双，乃为西门大愤曰："何其剖其双珠?"不知先生又错看了也。金莲原非西门所固有，而作者特写一春梅，亦非欲为西门庆所能常有之人而写之也。此自是作者妙笔妙撰以行此妙文，何劳先生为之旁生瞎气哉！故读《金瓶梅》者多，不善读《金瓶梅》者亦多。予因不揣，乃急欲批以请教，虽不敢谓能探作者之底里，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择狂瞽，代为争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长日睡魔，少补文家之法律也，谁曰不宜。八十二

《金瓶》是两半截书，上半截热，下半截冷，上半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八十三

《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吁，一元恶大憝矣，且无论此回有几家，全顷其手，深遭荼毒也。可恨可恨！八十四

《金瓶梅》写西门庆无一亲人，上无父母，下无子孙，中无兄弟，幸而月娘犹不以继室自居。设也月娘因金莲终不通言对面，吾不知西门庆何乐乎为人也。乃于此不自改过自修，且肆恶无忌，宜乎就死不悔也。八十五

书内写西门庆许多亲戚，通是假的，如乔亲家，假亲家也；翟亲家，愈假之亲家也；杨姑娘，谁氏之姑娘，愈假之姑娘也；应二哥，假兄弟也；谢子纯，假朋友也；至于花大舅二舅，更属可笑，真假到没文理处也；敬济两番披麻带孝，假孝子也；至

于沈姨夫、韩姨夫，不阁有姨娘来，亦是假姨夫矣。惟吴大舅二舅，而二舅又如鬼如蜮，吴大舅少可，故后卒得吴大舅略略照应也。彼西门氏并无一人，天之报施亦惨，而文人恶之者亦毒矣。奈何世人，于一本九族之亲，乃漠然视之，且恨不排挤而去之，是何肺腑？八十六

《金瓶》何以必写西门庆孤身一人，无一着己亲哉？盖必如此，方见得其起头，热得可笑，后文一冷，便冷到彻底，再不能热也。八十七

作者直欲使此清河县之西门氏冷到彻底，并无一人，虽属寓言，然而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后，永不复望一复燃之灰。吁，文人亦狠矣哉！八十八

《金瓶》内有一李安是个孝子，却还有一个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个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谁谓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彝为尽灭绝也哉！八十九

《金瓶》虽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个，然却不知妇道以礼持家，往往惹出事端。至于爱姐，晚节固可佳，乃又守得不正经的节，且早年亦难清白。他如葛翠屏，娘家领去，作者固未定其末路，安能必之也哉！甚矣，妇人阴性，虽岂无贞烈者，然而失守者易，且又在各人家教，观于此可以凛型于之惧矣。齐家者，可不慎哉！九十

《金瓶梅》内，却有两个真人，一尊活佛，然而总不能救一个妖僧之流毒。妖僧为谁？施春药者也。九十一

武大毒药，既出之西门庆家，则西门毒药，固有人现身而来，神仙、真人、活佛，亦安能逆天而救之也哉！九十二

读《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错了。九十三

读《金瓶》必须置唾壶于侧，庶便于击。九十四

读《金瓶》必须列宝剑于右，或可划空泄愤。九十五

读《金瓶》必须悬明镜于前，庶能圆满照见。九十六

读《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饮，以消此世情之恶。九十七

读《金瓶》必置名香于几，庶可遥谢前人，感其作妙文，曲曲折折以娱我。九十八

读《金瓶》必须置香茗于案，以奠作者苦心。九十九

《金瓶》纯是禅门圆通后做法。我批《金瓶》，亦批其圆通处也。一百

《金瓶》亦并不晓得有甚圆通，我亦正批其不晓有甚圆通处也。百一

《金瓶》以空字起、结，我亦批其以空字起、结而已，到底不敢以空字诬我圣贤也。百二

《金瓶》处处体贴人情天理，此是其真能悟彻了，此是其不空处也。百三

《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者。百四

《金瓶梅》是部惩人的书，故谓之戒律亦可。虽然，又云《金瓶梅》是部入世的书，然谓之出世的书亦无不可。百五

《金瓶梅》三字连贯者，是作者自喻，此书内虽包藏许多春色，却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流香芝室，为千古锦绣才子作案头佳玩，断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头物

也。噫，夫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则又如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百六

此书为继《杀狗记》而作，看他随处影写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杨大郎之弟杨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韩道国之弟韩二捣鬼。惟西门庆、陈敬济无兄弟可想。百七

以玉楼弹阮起，爱姐抱阮结，乃是作者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故以《金瓶梅》为大哭地也。百八

幽梦影 〔附：江含征评语〕

张潮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

江含征曰：不会看《金瓶梅》而只学其淫，是爱东坡者但喜吃东坡肉耳。

（张潮 1650—?，安徽歙县人，字山来，一字心斋，以岁贡官翰林孔目，编有《昭代丛书》、《檀几丛书》、《虞初新志》、《幽梦影》。）

重评石头记评语

脂砚斋

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

甲戌本第二十八回眉批：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

庚辰本第六十六回写柳湘莲因尤三姐事对宝玉跌足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其下有**双行夹批**：奇极之文，趣极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

歧路灯自序

李禄园

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迁。迨于后世，则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冒之。呜呼！果奇也乎哉。《三国志》者，即陈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鸩酒自毙，袁石公先叙之矣。作者之难于述者之晦也。今天下小

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叛道焉。乌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翼圣而赞经者，正如云门韶濩，不遗夫击壤鼓缶也。夫得道之精者糟粕已具神理，得道之粗者金石亦等瓦砾，顾人之眼力浅深耳。

《续金瓶梅》者，惩述者不达作者之意，遵今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金瓶梅》为之注脚，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壶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果因禅宗，寓言亵昵，于是乎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归之劝世。此夫为隐言、显言、放言、正言而以夸、以刺，无不备焉者也。以之翼圣也可，以之赞经也可。西湖钓叟书于东山云居。

（《续金瓶梅》，清初丁耀亢撰。题署紫阳道人编、湖上钓史评，卷首有蓖隐道人序、西湖钓叟序、南海爱日老人序。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官容城教谕。清顺治六年己丑(1649)写《啸台偶著词例》，附他自己的传奇《赤松游》卷端。）

阅红楼梦随笔

周　春

天下阅《红楼梦》者，俗人与《金瓶梅》一例，仍为导淫

之书，能论其文笔若何，已属难得……。盖此书每于姓氏上着意，作者又长于隐语廋词，各处变换，极其巧妙，不可不知。

（《红楼梦约评》）

袁石公遗事录

袁　照

《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勔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

（袁照，袁宏道之孙，曾于同治间编《袁石公遗事录》。）

销夏闲记

顾公燮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

人，不复重用。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穴，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抄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值。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批拟，不称上旨。上寖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顾公燮，吴人，字丹午，号澹湖。徐树丕《识小录》，梁章钜《浪迹丛谈》，也记有伪画致祸事。）

劝戒四录

梁恭辰

钱唐汪棣香（福臣）曰："苏、扬两郡城书店中，皆有《金瓶梅》版。苏城版藏杨氏。杨故长者，以鬻书为业，家藏《金瓶梅》版，虽销售甚多，而为病魔所困，日夕不离汤药。娶妻多年，尚未有子，其友人戒之。……杨为惊寤，立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其扬州之版，为某书贾所藏。某家小康，

开设书坊三处。尝以是版获利，人屡戒之，终不毁。……某既死，有儒士捐金买版，始就毁于吴中。

妙复轩评石头记·读法

张新之

《红楼》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面，不知反面也。间有巨眼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失，仍难脱累。闲人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夫然后闻者足戒，言者无罪，岂不大妙。……

《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

（录自《妙复轩评石头记·石头记读法》。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又号妙复轩。《妙复轩评石头记》刊于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

秋水轩笔记

唐顺之条上海防善后九事，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赴闻，予祭葬。顺之，武进人，吾乡先达也。相传顺之有一仇家，以重金购得《金瓶梅》原本，而以砒霜浸制其卷叶；顺之阅书最速，以手指蘸口

津随看随蘸，及卷竟而唇麻木，遂中毒死。以正史较之，则故里传言之讹可知也。正史又云："顺之于学无所不观，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此言亦有据。乡人相传，顺之寓居青果巷盘谷楼，其楼梯曲折而盘屈，登者不易，顺之笔砚几席之间，常有伏弩，以防人行刺云云。今盘谷楼归刘氏，余每过之，辄低回不忍去。

（作者不详）

缺名笔记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纳，狱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间。会荆川解职归，遍阅奇书，渐叹观止；乃急草此书，渍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必逐叶用纸粘舌，以次披览也。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蓦觉舌本强涩，镜之黑矣，心知被毒，呼其子曰："人将谋我，我死，非至亲不得入吾室。"逾时，遂卒。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抢地而至，蒲伏于其子之前，谓曾受大恩于荆川，愿及未盖棺前，一亲其颜色。鉴其诚，许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及殓，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缳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其支体以为报也。二说未知孰是？观袁中郎《锦帆集》，有"伏枕读《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等语，则是书名重已久，然实芜秽

不足观，不只卷末建醮托生一回，荒诞不经也。

寒花盦随笔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即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一夜，读书静室，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须留遗书嘱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书数行，笔头脱落，以管就烛，佯为治笔，管即毒弩，火热机发，镞贯刺客喉而毙。凤洲大失望。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

答以《金瓶梅》。其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尔。荆川索之切。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者尔。不解荆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为严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报也？

（作者不详）

骨董琐记

邓之诚

《茶余客话》云：“《绣像水浒传》镂板精致，藏书家珍之，钱遵王列于书目，其像为陈洪绶笔。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板刻亦精。此书为嘉靖中一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指分宜，林灵素指陶仲文，朱勔指陆炳。”又云：“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当即世所传之《后金瓶梅》。前书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补，肤浅，且多作吴语。后来惟《醒世姻缘》仿佛得其笔意。然二书皆托名齐、鲁人，何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云：“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伯远携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按：今传世《金瓶梅词话》，五十三至五十五回与通行本不同，有“乘船出

游”事，口气亦不类，殆即所谓吴语。《词话》之序，题“万历丁巳”，正四十五年，未知即味水所见否？

小说丛话

曼　殊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具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凄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且其中短简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征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平子）

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淫秽之处，此外，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

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宗旨在于写淫，又何必取此粗贱之材料哉？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是《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若其回目与题词，真佳绝矣。

杂　说

吴趼人

……《金瓶梅》、《肉蒲团》，此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此非独著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书者之难其人矣。推是意也，吾敢谓今之译本侦探小说，皆诲盗之书。夫侦探小说，明明为惩盗之书也，顾何以谓之诲盗？夫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若《金瓶梅》、《肉蒲团》，淫者见之谓之淫；侦探小说，则盗者见之谓之盗耳。呜呼！是岂独不善读书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过耶！社会如是，捉笔为小说者，当如何其慎之又慎之。……

（载《月月小说》第八号，1907年）

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

王钟麒

……是以天僇生生平虽好读书，然不若读小说；读小说数十百种，有好有不好。其好而能至者，厥惟施耐庵、王弇州、曹雪芹三氏所著之小说。

……时则有若王氏之《金瓶梅》。元美生长华阀，抱奇才，不可一世，乃因与杨仲芳结纳之故，至为严嵩所忌，戮及其亲，深极哀痛，无所发其愤。彼以为中国之人物、之社会，皆至污极贱，贪鄙淫秽，靡所不至其极，于是而作是书。盖其心目中固无一人能少有价值者。彼其记西门庆，则言富人之淫恶也；记潘金莲，则伤女界之秽乱也；记花子虚、李瓶儿，则悲友道之衰微也；记宋蕙莲，则哀谗佞之为祸也；记蔡太师，则痛仕途黑暗，贿赂公行也。嗟乎！嗟乎！天下有过人之才，遭际浊世，抱弥天之怨，不得不流而为厌世主义，又从而摹绘之，使并世者之恶德，不能少自讳匿者，是则王氏著书之苦心也。轻薄小儿，以其善写淫媟也宝之，而此书遂为老师宿儒所诟病，亦不察之甚矣。

……由是观小说，至此三书，真有观止之叹矣。吾国小说，非无脍炙人口，在此三书外者。……

（《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1908年）